



维普数据库全文收录  
中国国际中文期刊卓越行动计划 建设期刊  
国际中文学术期刊数据库ICAJD 收录期刊

#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刊

##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 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s



香港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  
HONG KONG RESEARCH INSTITUT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WISVORA



ISSN 3079-4552  
eISSN 3079-4560  
编辑出版:广东国图出版管理有限公司

2卷3期  
2026年3月

#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刊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主办 香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  
Hong Kong Research Institut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编辑出版 广东国图出版管理有限公司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刊》编辑部  
编辑部邮箱 xk@wisvora.com  
投稿地址 www.wisvora.com



维普数据库全文收录  
中国国际中文期刊卓越行动计划 建设期刊  
国际中文学术期刊数据库ICAJD 收录期刊

总编辑 陈科存  
副总编辑 梅见华 孙文杰

## 编辑委员会

|     |     |     |     |     |
|-----|-----|-----|-----|-----|
| 李兆祺 | 林鑫  | 苏天  | 穆艾伟 | 熊森浩 |
| 刘伟伟 | 吕憬岩 | 黄少安 | 刘宇  | 叶明裕 |
| 陈曦  | 景瑞宾 | 崔健  | 王正威 | 李泽宇 |
| 姚金芳 | 李明蔚 | 吴钰双 | 穆尚海 | 曹一君 |
| 陈立立 | 舒波  | 袁臣辉 | 郝澳茹 |     |

## 版权声明

文章版权由文章作者与维思沃尔出版社(WISVORA Publishing)所有。单篇文章由 WISVORA Publishing 正式出版, 所刊载文章均依照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进行许可。根据该许可协议, 任何第三方在明确署名原作者与出处的前提下, 均可对本刊内容进行复制、传播、演绎使用, 无需作者及出版社另行个别授权。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刊》© 已获得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4.0 International许可



香港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  
HONG KONG RESEARCH INSTITUT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香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专注于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的学术研究与交流, 旨在为学者提供研究支持, 并促进知识的共享与应用。研究院通过出版学术期刊、举办学术会议及提供政策建议, 推动学术界与社会各界的对话与合作。

网址: www.hks.ac.cn 邮箱: info@hks.ac.cn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印刷出版 ISSN 3079-4579  
电子出版 ISSN 3078-4387

出版社 WISVORA Publishing  
维思沃尔出版社

地址 香港新蒲岗景福街99号启德工业大厦8楼D07

wisvora-publishing@wisvora.com  
www.wisvora.com

中国大陆引进  
北京中科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大陆运营  
广东国图出版管理有限公司



WISVORA  
Publishing



微信扫一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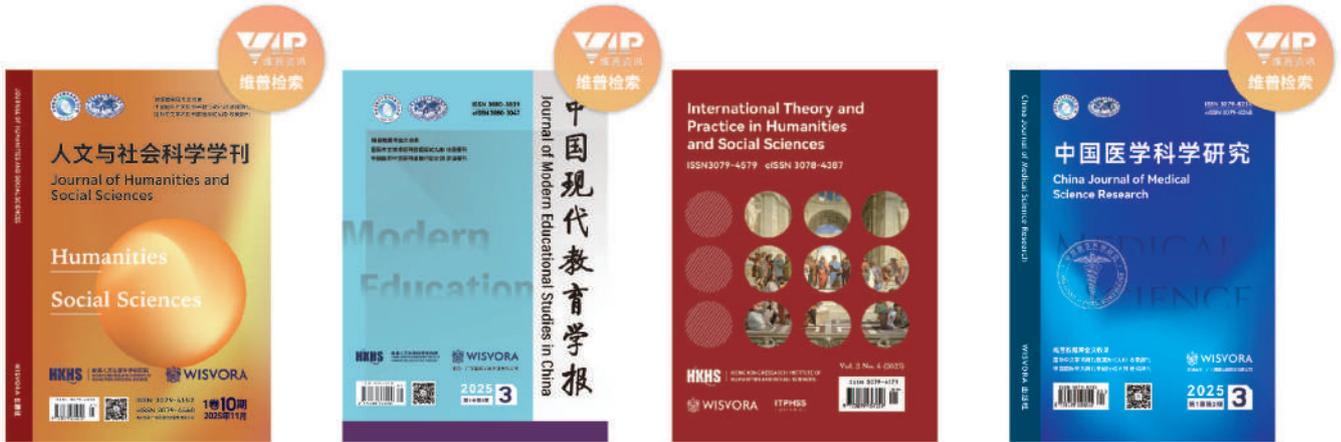
维思沃尔出版

# 学术无界，普惠可及

## Scholarship Without Borders, Access Within Reach

 WISVORA

GotuTrack  
国图出版



WISVORA是一家致力于促进创新和社会进步的国际学术出版商。我们相信，跨学科前沿研究对于理解世界和解决现实挑战至关重要。WISVORA出版社汇集了来自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和实践者，致力于打破学科界限，将研究见解与实践经验相结合，为应对全球挑战提供深入的和有效的策略。

WISVORA 还致力于推动中文学术成果的全球传播，设立多个覆盖人文、社会科学、教育、管理、艺术等领域的中文学术期刊，为中文作者提供更方便、更高效、更专业的发表选择。我们重视学术原创性与表达自由，采用快速审稿、开放获取、普惠版面费机制，努力构建一个包容、多元、国际视野下的中文学术传播平台，助力更多优质中文研究走向世界、服务社会。

学术无界，普惠可及

Scholarship Without Borders, Access Within Reach

# 10+

我们目前已成功运营10余本学术期刊，涵盖人文、社科、管理、艺术、教育等多个领域

我们运营的期刊数量

# 400+

已有来自全球的300多位学者参与我们期刊的编辑、审稿与学术合作

我们的合作学者数量

# 10000+

我们的作者社群已超过3000人，汇聚青年学者、博士生与研究机构专家

我们的作者社群规模

[www.wisvora.com](http://www.wisvora.com)  
[wisvora-publishing@wisvora.com](mailto:wisvora-publishing@wisvora.com)



## 目 录 TABLE OF CONTENTS

### 文化与文学研究

- 论果戈理的泛俄罗斯主义思想与国家认同- 侯丹.....1—6
- 方言叙事与地方书写的文学建构——《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与《小二黑结婚》比较研究- 陆嘉欣  
.....7—10
- 《瓦解》的司法叙事：阿契贝对殖民法与伊博习惯法的双重批判- 卢炳政、蓝婷.....11—15
- 陆地文学作品中的现实意义分析- 龙腾、黄新宇、余静.....16—20
- 《文选》中《楚辞》篇目的入选依据探赜- 张智涵、田子扬.....21—26
- 模拟、挪用与超越：霍米巴巴理论下《小小小小的火》中的母性抗争- 张莹凡.....27—30
- 衡阳酃酒酒文化传承及酒文化产业发展探究- 王路宁.....31—36
- 数字赋能与生态重构：黄河三角洲民歌的活态传承路径研究- 宋颢.....37—41

### 教育理论与实践

- 精准资助转型升级：职业院校“经济-技能-就业”一体化路径研究- 杨军、于迅、黄博文.....42—46
- 伟大抗战精神融入大学生思政教育实践路径研究- 王一泽.....47—49
- 社会工作嵌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逻辑、实践路径与效能提升- 付应岑.....50—53
- 财经素养教育与新农人职业技能培训融合研究- 杨冬妮、谭佳.....54—59
- 高职人事档案价值赋能师资队伍建设的建设研究- 张海宁.....60—64
- 新质生产力视域下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研究——以土地资源管理专业为例- 补蕙宇.....65—71
- 新质战斗力视域下消防“数字电子技术基础”实验体系重构- 刘玲.....72—77
- 产教融合背景下高职教师数字化教学能力的内涵重构与培育路径研究——以重庆安全技术职业学院为例  
- 李杰.....78—83
- 数智技术赋能“大思政课”的表现、遵循与进路- 梁舒乔、訾扬州.....84—87
- 课程建设与科研素养的融合：优质课程驱动下药学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模式研究——以药物化学选论  
教学为例- 王玉青、吴文浩、季红、易伟、张超.....88—91
- 课程思政视域下《基础日语》教学改革路径探析- 张修志.....92—96

## 社会与治理

- 数智技术驱动下推普助力乡村振兴的差异化实践路径探索——基于新疆疏勒与山东济宁的对比案例研究- 商冰洁.....97—100
- “人民治黄”模式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生成与运行逻辑- 赵光辉.....101—104
- 开源情报与公共外交作用的机制、效应与边界- 刘成昊.....105—109
- 习近平文化思想生成逻辑的多维阐释研究- 左苑均.....110—112
-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域下公安工作在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中的作用研究- 王啸千.....113—117

## 经济与管理研究

- 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出口韧性的影响机制研究- 冯钊涵、朱梦奇.....118—124
- 湖南湘江新区科技服务业发展路径研究：创新生态系统视角- 陈艳、高晓晓、吴霞.....125—131
- 利己与利他的双重驱动：体育迷的价值共创公民行为测度——以中国排球超级联赛为例- 杨佳宇、潘峰.....132—138
- 球队认同与体育赛事消费意愿的关系重构：基本心理需求的中介作用- 蒋柏瑞、吴晓龙、张象.....139—144

## 传媒与艺术研究

- 元宇宙背景下壮族元素在餐饮品牌 IP 视觉设计中的应用探析- 杨舒帆、刘春仪、陈文兰、胡佳莹.....145—151
- 新媒体语境下视觉传达设计的色彩运用与文化心理适配性研究- 吴鑫馨、贾涵迪、年政旭、孙旭.....152—155
- 多元与在地的交织——两湖水彩表现题材的当代维度延展- 马世杰.....156—160

# 论果戈理的泛俄罗斯主义思想与国家认同

侯丹<sup>1</sup>

(1.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 北京 100732)

**摘要:**俄国历史学家奥列格·涅门斯基提出了一个新概念,即“泛俄罗斯主义”,其形成的历史基础是东斯拉夫夫人对统一的基辅罗斯时代的共同记忆和对俄罗斯人身份的自我认同。从涅门斯基对概念本身的阐释而言,泛俄罗斯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并不是新事物,早在十九世纪就已出现。在俄国作家果戈理的书信和创作中已经可以看到以‘罗斯土地’、‘统一的俄罗斯’、‘俄罗斯世界’、‘俄罗斯信仰’等概念为核心的泛俄主义思想的具体呈现。

**关键词:**泛俄罗斯主义; 俄罗斯; 东正教

DOI: doi.org/10.70693/rwsk.v2i3.229

2012 年 4 月 18 日,在明斯克举办了主题为“西方俄罗斯主义:过去和现在”的国际会议。在会议上,俄国历史学家奥列格·涅门斯基提出了一个新概念即“泛俄罗斯主义”(Панрусизм),他在文章中指出,“泛俄罗斯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它主张所有东斯拉夫人共同的俄罗斯身份,并倡导他们的历史、文化和政治统一的理念……泛俄主义的特点是将‘罗斯土地’、‘统一的俄罗斯’、‘俄罗斯世界’、‘俄罗斯信仰’等概念现实化。‘罗斯土地’是指古代罗斯的基本领土和新的(后来东斯拉夫人居住的)土地,同时也是俄罗斯教会规定的领土。‘俄罗斯世界’——是指将世界各地的俄罗斯文化和语言的载体团结在一起的整个俄罗斯文化和俄罗斯语言的空间。‘俄罗斯信仰’——主要是指俄罗斯传统的东正教,但也包括其他具体的地方形式的东方基督教,有时也指一般的前基督教信仰。‘统一的罗斯’是指罗斯土地和人民的文化和政治上的统一。”<sup>2</sup>

涅门斯基提出了一个新的名词,但是从他概念本身的阐释而言,这个新名词的涵义并不新鲜,在俄语中早就有“全俄罗斯历史”(общерусская история)、“全俄罗斯文化”(общерусская культура)、“全俄罗斯世界”(общерусский мир)等概念来表达相似的内容,这些分散的概念结合在一起形成的就是“全俄罗斯意识形态”(общерусская идеология),即泛俄罗斯主义。泛俄罗斯主义思想形成的历史基础是东斯拉夫夫人对统一的基辅罗斯时代的共同记忆和对俄罗斯人身份的自我认同。在俄国作家果戈理的书信和创作中已经可以看到以‘罗斯土地’、‘统一的俄罗斯’、‘俄罗斯世界’、‘俄罗斯信仰’等概念为核心的泛俄主义思想的具体呈现。

在果戈理的小说《可怕的复仇》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句话:“一直到喀尔巴阡山听到的语言都是俄语,而山的另一边有些地方的语言与俄语很像;但在那个地方已经是不同的信仰,不同的语言了。”<sup>3</sup>喀尔巴阡山脉“形成一个巨大的马蹄形屏障横亘在加里奇人和匈牙利人之间。”<sup>4</sup>加里奇地区即今天乌克兰境内的加利西亚,喀尔巴阡山脉作为一道天然屏障保护着包括加里奇地区在内的乌克兰领土。《可怕的复仇》讲述的故事发生在 1596 年教会合并之后,此时加利西亚地区已经是波兰——立陶宛联邦的国土;而在果戈理生活的年代,加利西亚地区归奥地利帝国管辖,可见,果戈理对乌克兰疆域的描述既不是基于十七世纪的政治现实,也不是基于十九世纪的政治现实,他以语言和信仰为基础划定俄罗斯疆域的界限,其依据来源于古老的基辅罗斯时代。

10 到 13 世纪中叶,在古罗斯的土地上形成了一个以基辅为中心的政治体,十九世纪学者将那个时代命名为

**作者简介:**侯丹(1976—),女,博士,研究方向为俄罗斯文学。

<sup>2</sup> Олег Неменский Панрусизм <https://zapadrus.su/2012-04-11-14-59-43/2012-04-11-15-07-21/622--lr.html>

<sup>3</sup> 果戈理:《果戈理短篇小说选》,侯丹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第47页。

<sup>4</sup> 果戈理:《果戈理短篇小说选》,侯丹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第46页。

基辅罗斯，在古斯拉夫语中的记载则是罗斯（Роусь），或罗斯国土（роусьская земля）。基辅罗斯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国家，而是一些不同城市和部落之间的联盟。公元 988 年左右，弗拉基米尔大公带领罗斯土地上的臣民皈依了基督教。统一的信仰让分散各处的公国臣民有了一致的精神生活，从此东正教成为罗斯人的共同信仰，也成为此后俄罗斯人自我身份认知的宗教基础。需要注意的是，基辅罗斯选择的是拜占庭的希腊正教，而不是罗马的天主教，他们的宗教选择和对信仰的忠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后来的历史进程。

自从 1240 年基辅罗斯被蒙古人攻陷之后，罗斯国土陷入四分五裂的状态。位于西南边境的加利西亚——沃里尼亚公国最终一分为二，沃里尼亚被立陶宛公国吞并，加利西亚则被波兰收入囊中。罗斯国土的分裂最终导致了信仰与文化的分裂，波兰文化和罗马天主教对罗斯人民的影响日益加剧，罗斯人在不同的文化空间里各自发展，最终形成了乌克兰、白俄罗斯和大俄罗斯。“大俄罗斯逐渐地与莫斯科公国联系在一起，而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则与立陶宛和波兰拴在一块了。虽然都始于同一个基辅传统，但政治上的分离逐渐拉大了文化间的差异。”<sup>1</sup>

1596 年，波兰治下的部分东正教神职人员在基辅都主教的带领下宣布服从罗马教皇的领导，接受天主教，但保留东正教仪式的元素，双方签订了《布列斯特联盟条约》，联合教派就此出现。波兰政府和罗马教会希望通过根除西部俄罗斯人身上的东正教信仰来割裂他们与莫斯科俄罗斯人的联系，因为这个精神信仰被理解为“俄罗斯信仰”。十七世纪初，在天主教势力的压迫下波兰——立陶宛联邦境内罗斯旧土上的东正教徒多次爆发起义。1654 年，哥萨克领袖梅尔尼茨基在起义失利后，选择与莫斯科结盟，双方签订了《佩列亚斯拉夫条约》，赫梅尔尼茨基带着他的军队和土地一起并入了莫斯科。《佩列亚斯拉夫条约》的签订导致了俄罗斯与波兰——立陶宛联邦之间长达十三年的战争，最终两国在 1667 年签订了《安德鲁索沃条约》，基辅、斯摩棱斯克和第聂伯河左岸的大部分领土并入了莫斯科公国。基辅罗斯的国土与人民实现了自 13 世纪蒙古人入侵以来的最大规模的统一。18 世纪末，日渐衰弱的波兰被俄罗斯、奥地利和普鲁士三次瓜分，俄罗斯统一了除加利西亚地区之外的全部罗斯国土，以莫斯科为中心的统一的俄罗斯世界和俄罗斯文化开始形成。

果戈理的故乡——位于第聂伯河左岸的波尔托瓦——在《安德鲁索沃条约》签订之后并入了俄罗斯帝国的版图。果戈理出生于 1809 年，在他成长的年代小俄罗斯与大俄罗斯结合为统一国家已经是一个确定无疑的政治现实，果戈理在全俄罗斯团结统一的意识形态影响下成长，形成了带有朴素的泛俄主义色彩的历史观。在小说《可怕的复仇》中果戈理对俄罗斯疆域的界定正是建立在基辅罗斯时代全罗斯国土的概念之上。

## 二

果戈理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初曾经先后在爱国女中和彼得堡大学担任历史教师一职业，他花了很多时间来研读乌克兰历史，在报刊上发表历史研究文章，甚至打算写出一部多卷本的乌克兰史和一部世界通史，在对乌克兰历史的解读和地区称呼上都表现出了果戈理的泛俄主义倾向。

关于自己的故乡，果戈理很少叫它“乌克兰”，总是亲切地称之为“小俄罗斯”。小俄罗斯和乌克兰是可以互换的名称，在波兰——立陶宛联邦时代对这一地区还有另一种叫法——罗塞尼亚，不同的称呼不仅与不同的政治力量有关，而且也与自身的身份选择密切相关。“小俄罗斯”的叫法不仅保留了对基辅罗斯时代的共同记忆，而且表明了对俄罗斯人身份的认同。

在果戈理写下的所有关于乌克兰历史的文本中，他采用的说法都是“小俄罗斯历史”。1834 年 1 月果戈理在给波戈津的信中说，“我现在完全沉浸在《小俄罗斯历史》和《世界通史》的写作中……”<sup>2</sup>他在给自己的同乡马克西莫维奇的信中承诺：“我要从头到尾”写完《小俄罗斯的历史》。<sup>3</sup>同年，果戈理在《北方蜜蜂》上发布了“关于出版《小俄罗斯史》的公告”，请求人们寄送不同的材料：笔记、编年史、歌曲等给他，帮助他完成小俄罗斯史的写作。他在公告中写道，“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部令人满意的关于独立于俄罗斯近四个世纪的小俄罗斯人民的历史。”<sup>4</sup>他想亲自撰写一部小俄罗斯史，“详细介绍俄罗斯的这一部分是如何从俄罗斯分离出来的；这个好战的民族，性格和功绩皆十分独特的哥萨克是如何在其中形成的；三个世纪以来，哥萨克是如何用手中的武器获得他们的权利并顽强地捍卫他们的宗教……整个国家如何逐渐获得新的权利取代旧的，最后完全与俄罗斯合并”。<sup>5</sup>在果戈理的认知中“小俄罗斯”是统一的俄罗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此，他将乌克兰称为“俄罗斯的这一部分”，将他

<sup>1</sup> (美) 尼古拉·梁赞诺夫斯基 马克·斯坦伯格：《俄罗斯史》（第八版），杨烨 卿文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 年，第 136 页。

<sup>2</sup> Гоголь Н. В.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14 т. Изд-во АН СССР, 1937—1952. Т. 10. 1940. с. 294.

<sup>3</sup> Гоголь Н. В.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14 т. Изд-во АН СССР, 1937—1952. Т. 10. 1940. с. 296.

<sup>4</sup> Гоголь Н. В.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14 т. Изд-во АН СССР, 1937—1952. Т. 9. 1952. с. 76.

<sup>5</sup> Гоголь Н. В.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14 т. Изд-во АН СССР, 1937—1952. Т. 9. 1952. с. 76.

独立于俄罗斯的历史视为一种“分离”。

果戈理将立陶宛——罗斯时代看作是罗斯领土的分割和文化的断裂，他在《略论小俄罗斯的形成》一文中果戈理写道：“南部俄罗斯在立陶宛王公强有力的庇护下，完全从北部俄罗斯分离。它们之间的一切联系都中断了，形成了称呼同一名字——俄罗斯的两个国家，一个处在鞑靼的桎梏下，另一个处在同一的帝王权标下。但它们之间已经没有往来了。”<sup>1</sup>果戈理把波兰和立陶宛对乌克兰的统治看成是俄罗斯人受外族压迫的历史，他从乌克兰民歌中听到了人民“心灵的哭声”，“它的尖叫声有时听起来很像心灵的哭声，以至于心脏突然间颤抖起来，仿佛有一把锋利的铁器触碰到它。有时凄凉的、冷漠的绝望是那么强烈，以至于听众出了神，感觉希望已经远离了世界。在另一些地方听到的是断断续续的痛苦呻吟。这是用暴力把婴儿从母亲身边夺走、伴着残忍的笑声把婴儿砸向岩石时，母亲发出的令人难以忍受的号哭……在那个时代，当教会合并凶猛地闯入时，小俄罗斯就是这样毫无防范。通过这些声音，人们可以猜到它过去的苦难……”<sup>2</sup>

在布列斯特联盟签订之后，联合教派开始大肆吞并东正教教堂，南俄草原上勇敢强悍的哥萨克群体成为抵抗异教入侵、守卫东正教的俄罗斯世界的主要力量。果戈理在他的“小俄罗斯”小说中特别写到了那个特定历史发展阶段的乌克兰人民，他把历史表现得明亮而生动，同时达成了两个目标：让世界看到了南俄草原上的小俄罗斯人，并唤醒了这个民族的自我意识，使他们了解自己的过去，相信自己的未来。

### 三

果戈理热爱乌克兰，这是毋庸置疑的，他通过文学写作抒发自己对故乡的热情，塑造出乌克兰充满诗意的美好形象。但果戈理并不是一个狭隘的民族主义者，他始终认同自己的俄罗斯人身份，身份认同就其本质而言是以统一的古罗斯时代记忆和宗教情感为前提的，这一记忆和情感在果戈理以哥萨克为主人公的历史小说中表达得最为鲜明。

在小说《可怕的复仇》中哥萨克首领达尼洛说，“上帝保佑，我还没干过一件有损名誉的事：一直在保卫东正教信仰和祖国，不像那些流浪汉，当东正教徒殊死战斗的时候，天知道他们在哪儿闲逛，过后却突然出现，来收割不是他们播种的庄稼。”<sup>3</sup>在哥萨克人的认知中东正教与俄罗斯是一个密不可分的统一体，他们是最虔诚的东正教徒，为了守护信仰不惜献出生命，“这一民族在起始时已具有一个主要目标——同异教徒战斗并保持自身的宗教纯洁。”<sup>4</sup>达尼洛将背叛东正教看成是不可饶恕的罪行，他的岳父因为暗地里同东正教俄罗斯的敌人——天主教徒相互勾结出卖自己人而被他关在了地牢里。在小说《塔拉斯·布尔巴》中背叛东正教信仰的安德烈遭到了更加可怕的惩罚，他因为爱上波兰美女离开了自己的队伍，加入了天主教徒的阵营，最终在战场上被自己的父亲老布尔巴亲手杀死。

《塔拉斯·布尔巴》是一首关于俄罗斯精神、俄罗斯力量及全体俄罗斯世界的赞歌，一个关于爱情与背叛、鲜血与勇气的传奇故事在哥萨克与异教徒展开殊死斗争的宏大背景之下具有了超越故事本身的家国意义。果戈理笔下的塔拉斯·布尔巴不仅是小俄罗斯的守卫者，而且是整个东正教的俄罗斯世界的守卫者，布尔巴在小说结尾处发表的悲情演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等着吧，会让你们知道什么是正教的俄罗斯的信仰，这一天正在到来，并且一定会到来！如今远近四方的人们已经感觉到，俄罗斯的土地上正在出现自己的帝王，世界上将没有一种力量会不屈服于他的！……”<sup>5</sup>果戈理不断地将哥萨克气质、正教信仰以及爱国激情与俄罗斯联系在一起，认为哥萨克气质来源于“俄罗斯性格中粗犷而又奔放的习性”<sup>6</sup>，这是俄罗斯性格中的一面得到深入发展的结果。哥萨克勇士希洛在倒下之前对伙伴们说到，“别了弟兄们！伙伴们！祝正教的俄罗斯大地万寿无疆，祝它永远光荣！”<sup>7</sup>斯捷潘在被长矛挑杀之前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但愿敌人统统完蛋，俄罗斯大地永远欢乐！”<sup>8</sup>果戈理在有意地强调哥萨克与俄罗斯世界的所属关系，强调以东正教信仰为精神纽带的整个俄罗斯世界的统一性。

从乌克兰草原到遥远的莫斯科在果戈理的疆域界定中都属于“俄罗斯大地”，整个“俄罗斯大地”都是哥萨克们要守护的对象，他们效忠的并不是莫斯科里人的俄罗斯，而是信仰意义上的俄罗斯，因为罗斯时代实际的政治空

<sup>1</sup> 果戈理：《果戈理全集》第七卷，彭克巽译，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69页。

<sup>2</sup> Гоголь Н. В.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14 т. Изд-во АН СССР, 1937—1952. Т. 8. 1952. с. 96—97.

<sup>3</sup> 果戈理：《果戈理短篇小说选》，侯丹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第12页。

<sup>4</sup> 果戈理：《果戈理全集》第七卷，彭克巽译，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71页。

<sup>5</sup> 果戈理：《果戈理全集》第二卷，陈建华译，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195页。

<sup>6</sup> 果戈理：《果戈理全集》第二卷，陈建华译，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50页。

<sup>7</sup> 果戈理：《果戈理全集》第二卷，陈建华译，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155页。

<sup>8</sup> 果戈理：《果戈理全集》第二卷，陈建华译，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156页。

间就是俄罗斯东正教会管辖的领土，“当罗斯的众公国被宰割时，在赢取东斯拉夫民族的信任上，教会比任何一个世俗君主都更有优势。”<sup>1</sup>“没有比信仰更强大的力量”，正教信仰将所有东正教徒凝聚到了统一的精神旗帜之下，哥萨克人最终选择与莫斯科公国联合也恰恰是因为莫斯科公国在宗教和世俗的双重意义上成为俄罗斯世界的精神领袖。15世纪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在拜占庭帝国陷落之后把称号改为“全罗斯大公”，首次公开表达了收集全罗斯领土的野心，宣告了反对波兰、立陶宛夺取基辅罗斯遗产的立场。与此同时，从前统一的基辅都主教辖区在十五世纪一分为二，一个中心在莫斯科，另一个中心在维尔纳（现在的维尔纽斯）。随着拜占庭帝国的陷落，教会将恢复正教荣光的希望寄托在莫斯科身上，莫斯科也开始以“第三罗马”自居。1547年在伊凡四世的加冕典礼上，“大主教马卡在伊凡的身上画了一个十字，并将莫诺马赫的王冠戴在他的头上，这象征着他的权力既来自于教会，也来自于拜占庭帝国。”<sup>2</sup>东正教的精神权威中心从基辅转移到了莫斯科，这是乌克兰的东正教徒最终背弃波兰、倒向莫斯科的一个重要原因。

需要指出的，小说《塔拉斯·布尔巴》共有两个版本。第一版发表于1835年出版的小说集《米尔戈罗德》中，第二版收录在1842年出版的四卷本文集中。在第一版中果戈理提到十五世纪的乌克兰时，说那里是“有争议的、未决定归属的财产”<sup>3</sup>；而在第二版中果戈理直接将乌克兰称为“原始的南俄罗斯”<sup>4</sup>。塔拉斯·布尔巴的形象在第一版中是乌克兰草原上的哥萨克，而在第二版中布尔巴是“俄罗斯大地”上的哥萨克，他变成了一个坚定的泛俄主义者，热情捍卫俄罗斯东正教和沙俄帝国，那段充满帝国意识的悲情演讲也是1835年版本中不曾出现的内容。这些改动都表明果戈理在第二版中有意识地加强了哥萨克与俄罗斯之间的联系，“关于乌克兰和俄罗斯这两个民族具有共同的历史命运的思想，关于这两个民族兄弟般联系牢不可破的思想贯穿于《塔拉斯·布尔巴》的始终。”<sup>5</sup>

#### 四

对俄罗斯语言的忠诚是果戈理泛俄主义倾向的另一个表现。作为一名作家，果戈理终其一生都用俄语写作。要理解果戈理的选择，有必要了解一下当时俄罗斯社会的语言使用情况。彼得大帝改革之后，在俄罗斯日常生活中法语和俄语并存：前者主要用于上流社会之间的交际和公文信函，而后者主要是在平民中间使用。“18世纪的俄罗斯书面语是一种毫不优美的语言混合体，由古老的教会斯拉夫语、一种被称为“公署体”的官僚术语和从波兰引进的拉丁语组成。没有固定的语法或者拼写方法，许多抽象的词语也没有清晰的解释。这是一种学究式的晦涩语言，和上流社会的口语（基本上是法语）以及俄罗斯农民所讲的大白话之间没有什么联系。”<sup>6</sup>在当时的俄国上流社会，文学阅读仍然以法国作品为主，“19世纪初俄罗斯诗人所面临的挑战：必须创造一种以社会中人们所说的语言为基础的文学。”<sup>7</sup>普希金在前辈作家的基础上革新了俄罗斯文学语言，创造了全新的俄罗斯标准语。当果戈理步入文坛时，俄语文学写作正处于蓬勃发展之际，作家们用俄语写作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俄国社会有教养阶层开始对俄语文学产生兴趣并用俄语进行通信。果戈理曾多次赞美俄语的优美和丰富，“没有一种词语能像俄语词这样多姿多彩，这样大胆、活泼，扣人心弦，这样沸腾、充满活力，这样恰如其分。”<sup>8</sup>“俄语在您面前是个庞然大物！深深的乐趣呼唤着你，那就是陷入其浩瀚无边并捕捉其奇妙规律的乐趣，在其中，就像在一个宏伟的建筑中一样。”<sup>9</sup>当时乌克兰语作为一种地方性语言只限于在小俄罗斯居民中间使用，一些乌克兰作家用它来写作具有地方特色的喜剧，果戈理的父亲也创作了几部这样的喜剧，但它不适用于严肃文学的创作。当时乌克兰语的高级书面语形式尚未形成，现代乌克兰书面语是在为果戈理作传的著名传记作家库里什发明的拼写法基础上形成的，而库里什在1856年出版的《南俄笔记》第一卷中才首次使用这种拼写方式。

库里什在发明了新的乌克兰语拼写法之后，看到自己的发明被分离主义者滥用，感到十分痛心，他在给加利西亚亲俄派人士雅科夫·霍洛瓦茨基的信中写道：“你知道，在你们加利西亚被称为库里什夫卡的拼写法，是我在俄罗斯所有人都忙于在老百姓中普及识字的时候发明的。为了让那些不能长时间学习的人识字更容易，我发明了一种简化的拼写法。但现在他们却把它做成了一面政治旗帜。波兰人很高兴地看到，不是所有的俄罗斯人都以同样的方式书写俄语。他们开

<sup>1</sup> (英)杰弗里·霍斯金：《俄罗斯史》（第一卷），李国庆 宫齐 周佩红 郭燕青译，南京日报出版社，2013年，第68页。

<sup>2</sup> (英)杰弗里·霍斯金：《俄罗斯史》（第一卷），李国庆 宫齐 周佩红 郭燕青译，南京日报出版社，2013年，第103页。

<sup>3</sup> Гоголь Н. В.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14 т. Изд-во АН СССР, 1937—1952. Т. 2. 1952. с. 283.

<sup>4</sup> Гоголь Н. В.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14 т. Изд-во АН СССР, 1937—1952. Т. 2. 1952. с. 46.

<sup>5</sup> (俄)米·赫拉普钦科：《尼古拉·果戈理》，刘逢祺 张捷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年，第188页。

<sup>6</sup> (英)奥兰多·费吉斯：《娜塔莎之舞：俄罗斯文化史》，郭丹杰 曾小楚译，四川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65页。

<sup>7</sup> (英)奥兰多·费吉斯：《娜塔莎之舞：俄罗斯文化史》，郭丹杰 曾小楚译，四川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65页。

<sup>8</sup> Гоголь Н. В.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14 т. Изд-во АН СССР, 1937—1952. Т. 6. 1951. с. 109.

<sup>9</sup> Гоголь Н. В.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14 т. Изд-во АН СССР, 1937—1952. Т. 12. 1952. с. 125.

始特别赞美我的发明：他们以它为基础建立自己的荒唐计划……看到这面旗帜在敌人手中，我将是第一个打击它的人，并将以俄罗斯统一的名义放弃我的拼写法……”<sup>1</sup>因此，果戈理对俄罗斯语言的忠诚在当时的乌克兰知识分子中间并非异类，更不是对乌克兰语的背叛，而是站在全俄文化的立场做出的合理选择。

俄罗斯哲学家特鲁别茨科伊曾写道：“自彼得时代以来在俄罗斯存在和发展的文化，不是莫斯科文化有机的、直接的延续，而是基辅、乌克兰文化的有机直接延续。它可以在文化的所有分支中找到痕迹。以文学为例，在莫斯科和西部俄罗斯的优美文学、宗教文献和科学文献中使用的语言都是教会斯拉夫语。”<sup>2</sup>教会斯拉夫语受到各个地区日常生活口语的影响，在不同区域逐渐形成了不同的变体，俄语就是从教会斯拉夫语发展而来，因此，果戈理用俄语写作传承的仍然是基辅文化传统。果戈理不仅以自己的艺术创作开创了俄国文学史上的一个时代，而且对俄罗斯文学语言发展的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将活泼的乌克兰民间语言输送到俄语当中，创造了生动而鲜明的表达方式，以自己的努力让俄罗斯文学语言的面貌变得更加丰富多彩。乌克兰《U-论争》报纸主编安纳托里·格拉西姆丘克曾引用苏联作家米哈伊尔·阿列克谢耶夫的话对此作出评价，“果戈理这个最伟大的巫师改变了俄罗斯文学语言的本身，用浪漫主义的强风吹鼓了它的风帆，给予俄语单词独特的乌克兰式的狡黠，那就是‘笑’……”<sup>3</sup>

## 五

果戈理说：“应当热爱俄罗斯”<sup>4</sup>，这对当代俄罗斯人来说很好接受，但我们必须知道的是，果戈理口中的俄罗斯也包括乌克兰。乌克兰和俄罗斯在历史上作为一个曾经统一的国家在国防、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甚至在人民的精神气质上也是相互渗透、相互补充的。果戈理在给自己的挚友斯米尔诺娃的信中曾经写道：“关于我的心是怎样的，是霍霍尔人<sup>5</sup>的还是俄罗斯人的，因为我从您的信中看到，这个问题一度成为您和他人议论和争论的主题，我可以告诉您，我自己也不知道我的心是霍霍尔人的还是俄罗斯人的。”<sup>6</sup>对果戈理来说俄罗斯是他的祖国，乌克兰是他的故乡，在他对两者的爱之间不存在任何矛盾，他既不愿，也不能对自己的心灵做出非此即彼的区分。

今天，在俄乌两国彻底分裂为两个国家，且政府间关系并没有向良好方向发展之后，两国之间正在展开一场“争夺果戈理”的意识形态运动。一直以来果戈理在俄罗斯都被认为是自己人，在所有俄罗斯文学史著作中果戈理都占据了十分重要的一席，他不仅是俄罗斯心灵的表达者，同时也是其建造者，如果没有果戈理俄罗斯的精神文化将会呈现出另一种样貌。而在乌克兰，人们对果戈理的态度是复杂的，亲俄派人士喜欢果戈理，将他的创作看成是两国人民共同的精神财富，而乌克兰的民族主义者对果戈理却有着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一些人把试图把果戈理打造成乌克兰民族主义作家，把他的作品解释为对沙俄帝国的批判与否定，割裂他与俄罗斯之间的血肉联系，另一些人则拒绝把果戈理看成自己人，把他当成一个纯粹的俄罗斯作家来对待，甚至在一些乌克兰本土的教科书中都把果戈理的名字归入外国作家之列。一些乌克兰学者指责果戈理为了成为一名俄罗斯作家而放弃了他的乌克兰身份，这是片面且荒谬的，苏联作家米哈伊尔·阿列克谢耶夫曾经写道，“果戈理如果在精神上、血统上、本质上不是乌克兰人，能写出《狄康卡近乡夜话》、《索罗庆采集市》、《五月之夜》、《塔拉斯·布尔巴》吗？”<sup>7</sup>大多数乌克兰人是愿意接受果戈理的，但是他们更愿意接受一个去俄罗斯化的果戈理，这种意愿在2000年出版的《塔拉斯·布尔巴》的乌克兰语译本中表达得十分明确。

十月革命之前，《塔拉斯·布尔巴》在版本数量和发行量方面都处于领先地位。因为它与官方人民性的概念相当一致，所以它的出版得到了俄罗斯国民教育部的支持。这部作品在小俄罗斯很受欢迎，乌克兰人在这部作品中发现了自己的过去，发现了自己的民族特性，并为自己哥萨克祖先们的丰功伟绩感到自豪。在苏联时代，《塔拉斯·布尔巴》以其崇高的爱国主义激情和英勇无畏的牺牲精神受到俄乌读者共同的喜爱，苏联学者普罗霍洛夫曾写道，“对于我们祖国的所有人民来说《塔拉斯·布尔巴》都是那样一部作品，其伟大的爱国主义思想将永远流传。”<sup>8</sup>苏联解体之后在《塔拉斯·布尔巴》中反复出现的“俄罗斯”一词在乌克兰人眼中开始变得刺目。在苏联解体

<sup>1</sup> Отрывок из письма П.А. Кулиша к Я.Ф. Головацкому, см.: Твори Пантелеймона Куліша. Львів, 1910. с. 699 – 700.

<sup>2</sup> Трубецкой Николай Сергеевич. Европа и Евразия <https://document.wikireading.ru/hcs2uj6C9I>

<sup>3</sup> УАргумент. 02.02.2015 <http://uargument.com.ua/print.php?id=10669>

<sup>4</sup> 果戈理：《果戈理全集》第六卷，任光宣译，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121页。

<sup>5</sup> 沙皇俄国时代对乌克兰的戏谑表鄙称呼。

<sup>6</sup> Гоголь Н. В.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14 т. Изд-во АН СССР, 1937—1952. Т. 12. 1952. с. 418—419.

<sup>7</sup> УАргумент. 02.02.2015 <http://uargument.com.ua/print.php?id=10669>

<sup>8</sup> Прохоров Е. И. «Тарас Бульба» в русской критике // Гоголь Н. В. Тарас Бульба / АН СССР, М.: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СССР, 1963. с. 198.

之后出现的乌克兰语译本中"俄罗斯"和"俄国人"等词皆被删除,"俄罗斯力量"被译为"乌克兰力量","俄罗斯大地"变成了"哥萨克大地"<sup>1</sup>,将果戈理从全俄罗斯视角展开的历史叙事压缩为乌克兰民族主义叙事,这显然违背了果戈理的创作初衷。

乌语新译本中对《塔拉斯·布尔巴》的改写反应了乌克兰人民在苏联解体之后急于摆脱俄罗斯的长期影响、确立独立民族身份的心态。果戈理在小说中明确表达的全俄罗斯统一的理念、以及他对全体俄罗斯世界的祝福和期待不仅没有实现,而且俄乌两国曾经不分彼此、合二为一的历史也成为当代乌克兰人极力摆脱的过往。

综上,中世纪波兰和立陶宛对乌克兰地区的占领与统治造成了乌克兰与大俄罗斯在政治和文化上的长期分离。十七世纪下半叶,随着罗斯国土的重新统一两者之间在意识形态上的差异逐渐消弭,形成了统一的以东正教为基础的俄罗斯世界。早在十九世纪,俄国作家果戈理就表现出了与涅门斯基提出的"泛俄罗斯主义"相一致的思想倾向。'罗斯土地'、'统一的俄罗斯'、'俄罗斯世界'、'俄罗斯信仰'等概念在果戈理的文论、书信与文学作品中得到了一一呈现。把果戈理作品中的乌克兰和俄罗斯当成两个截然不同的民族来看待是完全错误的。果戈理时代的乌克兰是庞大的俄罗斯帝国的一部分,这片土地和人民无论是从族群层面、还是宗教层面都早已和大俄罗斯融为一体。正如不能从过去的视角评判现实一样,同样不能从现实的视角来评判过去,我们不能从当下政治现实出发去质疑果戈理的选择,对于果戈理本人和他的作品唯有放在历史和文化的语境中才能进行客观的评价。

参考文献:

- [1] Олег Неменский Панрусизм[EB/OL] <https://zapadrus.su/2012-04-11-14-59-43/2012-04-11-15-07-21/622--lr.html>
- [2] 果戈理:《果戈理短篇小说选》[M],侯丹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
- [3] (美)尼古拉·梁赞诺夫斯基 马克·斯坦伯格:《俄罗斯史》(第八版)[M],杨烨 卿文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
- [4] Гоголь Н. В.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14 т.[M] Изд-во АН СССР, 1937—1952. Т. 10. 1940.
- [5] 果戈理:《果戈理全集》[M],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
- [6] (英)杰弗里·霍斯金:《俄罗斯史》(第一卷)[M],李国庆 宫齐 周佩红 郭燕青译,南京日报出版社,2013年。
- [8] (俄)米·赫拉普钦科:《尼古拉·果戈理》[M],刘逢祺 张捷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年。
- [9] (英)奥兰多·费吉斯:《娜塔莎之舞:俄罗斯文化史》[M] 郭丹杰 曾小楚译,四川人民出版社,2018年。
- [10] Твори Пантелеймона Куліша[M]. Львів, 1910.
- [11] Трубецкой Николай Сергеевич. Европа и Евразия[EB/OL] <https://document.wikireading.ru/hcs2uj6C9l>
- [12] УАргумент. 02.02.2015 [EB/OL]. <http://uargument.com.ua/print.php?id=10669>
- [13] Гоголь Н. В. Тарас Бульба / АН СССР[M], М.: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СССР, 1963.

## On Gogol's Pan-Russianism and National Identity

Hou Dan<sup>1</sup>

<sup>1</sup> Institute of Foreign Literatur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China

**Abstract:** Oleg Nemensky, a Russian historian, proposed a new concept, "Pan-Russianism", which was formed on the historical basis of the East Slavs' common memory of the unified Kievan Ross era and the self-identification of the Russian identity. From Nemensky's interpretation of the concept, we can see pan-Russianism as an ideology is not a new thing. It has emerged already in the 19th century. In the letters and writings of the Russian writer Gogol can be found the concrete presentation of the concepts such as 'the land of Ross', 'united Russia', 'the Russian world', 'the Russian beliefs' and so on.

**Keywords:** Pan-Russianism; Russia; Orthodoxy

<sup>1</sup> 参见 Редакція Івана Малковича та Євгена Поповича на основі перекладу Миколи Садовського о. <https://ukrclassic.com.ua/katalog/gg/gogol-mikola/1752-mikola-gogol-taras-bulba>.

# 方言叙事与地方书写的文学建构

## ——《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与《小二黑结婚》比较研究

陆嘉欣

(聊城大学 山东 聊城 252000)

**摘要:** 研究以《哈克贝利 费恩历险记》和《小二黑结婚》做比较, 研究方言叙事和地方性书写在文学里的作用, 通过细致分析文本, 展现了两部作品如何运用方言叙事手法精准刻画人物身份, 推动文学大众化, 并将物理、社会与心理空间有机融合, 将地域经验升华为人类共通的价值。这种“以小见大”的办法让我们看到文学从“乡土”到“人类”提升的路子。

**关键词:** 方言叙事; 地方性书写; 空间叙事; 文学大众化; 民族认同

DOI: doi.org/10.70693/rwsk.v2i3.275

### 一、引言

方言叙事是文学里用方言的语音、词汇、语法特点来叙述, 把人物身份、阶层、文化认同编进“声音”里, 地方性书写是用地域风物、民俗细节、空间叙事做线索, 搭出有呼吸感的“具体世界”, 研究拿《哈克贝利 费恩历险记》和《小二黑结婚》当例子, 研究方言叙事和地方性书写在文学创作中的重要作用。

### 二、方言叙事的文学作用

方言叙事在文学作品里, 不只是简单的“怎么说话”, 而是精准塑造人物形象的“声音”工具。核心艺术功能通过语音、词汇、语法的特点体现人物的社会阶层、教育背景、地域文化认同、道德品性, 达到“闻其声, 如见其人”的效果, 让人物活起来。

在《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里, 哈克说的密苏里方言, 有不标准的说法, 像“I says”“I reckon”和口头常用词, 直接显出他是边缘少年和没受过正规教育的底层人, 这种语言本身就是对所谓“文明社会”规矩的反抗, 和他想追求自由的内在想法相契合, “国王”和“公爵”说出来的夸张、虚伪的南方方言, 就像照妖镜, 一下子就看出他们是诈骗犯, 毫无道德底线, 在《小二黑结婚》里, 二诸葛总说“不宜栽种”“恩典恩典”, 三仙姑撒泼时喊“刘修德! 还我闺女!”, 这些话塑造了他们满脑子封建迷信和小市民毛病的旧式人物, 人物形象靠语言一下子就立起来了。方言叙事让人物形象长在具体的社会文化环境里, 变得有血有肉、真实可信。

方言叙事具有独特的幽默讽刺功能, 使社会批判更具艺术性和感染力。马克吐温在小说《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中大量密苏里方言与黑人英语的混杂对话, 使夸张、豪放、粗土的方言成为“反讽工具”。例如, 吉姆感激哈克时说道: “Pooty soon I’ ll be a-shout’ n’ glorious” (很快我就要欢呼啦), “Pooty” (Pretty)、“shout’ n” (shouting) 词汇的非标准拼写, 不仅仅是滑稽的语言表达, 也暗含黑人奴隶的教育缺失。《小二黑结婚》中“二诸葛”与“三仙姑”的人物绰号极具讽刺效果。“神仙”称号本应象征超脱与智慧, 但二人实际愚昧庸俗: 二诸葛算卦屡屡出错, 三仙姑下神只为敛财。此外作者刻画三仙姑“看起来好像驴粪蛋上下了霜”, 用粗鄙的乡

**作者简介:** 陆嘉欣(2005—), 女, 本科在读, 研究方向为外国文学。

**通讯作者:** 陆嘉欣

村比喻讽刺其年老却浓妆艳抹的滑稽形象。这体现了作者借助口语化比喻丑化人物行为,使得三仙姑虚荣的特点喜剧化具象化,引发读者哄笑。

方言叙事能够有力推动文学大众化和平民化。赵树理把晋南方言俚语用进小说创作,保留语言的原生态特色,又做了艺术加工,让它符合文学表达规范,拉近了小说和农民读者之间的距离,比如,“米烂了”意思是“饭煮糊了”,“十分哄伙”形容人多热闹,气氛活跃,“顶门上”是晋语里头顶的俗称,这些词语不是知识,是叙事里自然出现的活语言,接地气,不低俗,通俗易懂,还有艺术魅力,真正融入了农民的阅读经验,用平等对话实现了文学普及。马克·吐温写《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的时候,美国文学作品的语言大多照着英国文学讲究文雅的写法,用的是以上流社会的说话习惯为标准的英语,马克·吐温敢用美国南方底层人物的口语当整本书的讲故事的语言,美国文学不用再受英国标准的限制,靠“地道的美国声音”和普通读者拉近了感情,让美国文学更贴近普通人,在语言上让美国英语有了自己的话语权,让美国文学有了自己的身份。方言土语不是当成知识讲给读者,而是用平等的样子给读者讲,赵树理化用晋南农民语言,马克·吐温提纯美国南方口语,本质都不是陈列方言知识,而是靠这种扎根泥土的语言,打破作者与读者之间、文本与生活之间的隔阂,在平等的交流中推动文学的大众化。

方言叙事也能向读者展现地方的独特文化。《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中的密苏里方言与黑人英语是美国密西西比河地域文化的印记以及社会文化的隐喻。小说中多处使用双重否定句式如“we hadn’ t robbed nobody”,这种表达集中在无教育的美国边疆方言中,体现西南边疆地区的粗犷表达,与东部精英社会的语言规范形成对立。另外,吉姆用“two angels hoverin’ roun’ ”(两个天使盘旋)解释道德抉择,体现黑人对基督教的信仰,体现19世纪中后期的美国,尤其在南部,黑人原有的非洲文化传统与信仰体系被主流基督教文化覆盖。而且小说中大量使用黑人英语词汇(如“nigger”、“git”),也是蓄奴制废除后种族歧视持续存在的隐喻。

《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里的密苏里方言和黑人英语,体现美国密西西比河地区的自然地域文化,也暗示当时的社会文化。小说里不少地方用双重否定句子,像“we hadn’ t robbed nobody”,这种说法多在没受过教育的美国边疆方言里出现,体现出西南边疆地方粗糙的说话方式,与东部精英社会的语言规矩截然不同;吉姆用“two angels hoverin’ roun’ ”(两个天使盘旋)表达道德上的选择,能看出19世纪中后期的美国南部黑人信仰基督教,黑人原来的非洲文化传统和信仰体系被主流基督教文化冲击,小说里还常用黑人英语词,像“nigger”“git”,这也暗示着奴隶制废除后种族歧视仍然存在。

赵树理小说里不少方言词能显出山西淳朴的社会文化和生态文化,称谓语是小说《小二黑结婚》语言里的重要部分,那些朴实亲切的称谓语,能显出人的社会属性,还带着山西的地域风情。“二诸葛”和“三仙姑”是最典型的例子,这两个称呼彻底代替了他们的本名刘修德和于福老婆,成了他们的社会身份标签,“小二黑”和“小芹”用“小”字开头起名,体现当地人起乳名的习惯。小说里还有不少地域生态文化负载词,像方言里的“四指雨”意思是“毛毛雨”或者“蒙蒙细雨”。“炕”是指用砖或土坯砌成、上面铺席、下有孔道和烟囱相通、可以烧火取暖的床,这是北方农村特有的东西,侧面体现出当地的气候生态。

### 三、地方性书写的作用

地方性书写和空间叙事能形成互相帮衬、合在一起的互相影响的关系,文学作品里的叙事空间大致能分成三大类:物理空间、社会空间(也就是物理环境的延伸)和心理空间(也就是认知空间),地方性书写把这三大空间串起来,合到一个更大的空间背景里,空间叙事直接清楚地显出地方性的特点。

《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里,马克·吐温用密西西比河当核心写地方上的事,把物理空间、社会空间、心理空间串在一起,展现19世纪美国南部地方特性,构建层次丰富的叙事世界。有地方特色的密西西比河不只是故事发生的地方,还是流动着的叙事线索,这条河控制着叙事的节奏和方向,它的自然景观——有时宁静如画,有时波涛汹涌——也直接参与情节氛围的制造。物理空间能清楚反映和影响社会空间,河岸上的“文明”社会满是清规戒律、家族世仇、宗教虚伪和种族压迫,河上木筏里氛围自由和谐,关系平等融洽,马克·吐温用密西西

比河构建的“河上-岸上”空间二元对立，揭示美国当时虚伪腐朽的价值观和对自由平等的朴素追求间的尖锐社会矛盾。物理空间能清楚反映和影响社会空间，河岸上的“文明”社会满是清规戒律、家族世仇、宗教虚伪和种族压迫，河上木筏里氛围自由和谐，关系平等融洽。马克·吐温用密西西比河构建“河上-岸上”空间二元对立，揭示美国当时虚伪腐朽的价值观和对自由平等的朴素追求间的尖锐社会矛盾。密西西比河暗示主人公心里的成长和变化，哈克在河上漂流时，内心道德上很矛盾，他受岸上社会里蓄奴想法的影响，又和吉姆天天相处，被他善良、实在的性格打动，密西西比河的隔离空间，让他不用直接受岸上社会的打扰，能自己思考，他豁出命帮吉姆，标志自己的道德良心打败了社会教的偏见，完成了心里成长和道德醒悟。

《小二黑结婚》里，赵树理写山西太行山区的地方特色，刘家蛟村这个地方的封闭，不只是故事发生的实际地方，还是权力运作的社会地方和人物心理的直接反映。小说里“村外”“砖窑”“山沟”这些地理空间描述，能看出太行山区村落周围都是山、交通不方便的自然情况，真实反映出封闭、不跟外界来往的实际特点，传统观念和陋习在这样相对封闭的地方继续存在，还变得更厉害。小说里“村外”“砖窑”“山沟”这些地理空间描述，能看出太行山区村落周围都是山、交通不方便的自然情况。这些描写真实反映出此地封闭、不跟外界来往的实际特点。传统观念和陋习在这样相对封闭的地方继续存在延续。这种物理空间影响着社会空间的权力结构。福柯的空间权力理论认为，空间是权力关系的具体表现，在刘家蛟村这个社会空间里，权力不是平均分布的。金旺兄弟趁着基层政权还不成熟，把村政权空间变成实现自我意志工具，开“斗争会”、非法捆绑，压制小二黑和小芹，“区政府”代表更高权力和进步想法，是另一个对立的、新的社会空间。当矛盾交到区上后，民主政府的介入扭转了局势，惩罚恶势力。这种“村里”到“区上”的空间移动，展现了新旧社会力量的角逐与更替。最终外部空间的冲突会慢慢内化为人物的心理空间。例如，三仙姑在区政府这个新地方穿着不合适的衣服被大家围着笑话，让她觉得羞耻。她“把自己从头到底换了一遍”，拆了香案，这体现新的社会空间体验冲击和重塑个人的心理空间。

地方书写虽然聚焦地域特色但是能反映普世价值。地方色彩文学作家们用他们熟悉的身边环境、发生的事和遇到的人写出来的是一个“乡土小世界”他们想努力说的其实是超越地域和时代限制的人类共有的东西。

马克·吐温的《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里，密西西比河不只是地理上的河，而是有普遍意义的自由象征，它是主人公逃离虚伪、压迫的“文明”社会的具体通道，也成了平等安宁的理想地方，表现出人们对自由的普遍追求。哈克和吉姆坐木筏漂着，逃离岸上社会的压迫，像蓄奴制、家庭暴力、宗教伪善这些，木筏这个封闭的小地方，社会强加给人的身份标签暂时去掉，成了“唯一光明的角落”。白人少年哈克和逃亡黑奴吉姆的关系，从带着社会偏见的“主仆”关系，慢慢变成相互信任和依赖的平等伙伴，这种跨过种族间隔的友谊，就在象征自由的流动河流上孕育。

在小说《小二黑结婚》中小二黑与小芹反抗包办婚姻的斗争，表面是解放区农村的地方现象，实则也映射了人类对自主选择权的永恒渴望。小二黑不答应父亲二诸葛安排的童养媳，说“你愿意养你就养，反正我不要”，小芹把母亲三仙姑收的彩礼“扔了一地”，喊“谁收了人家的东西谁跟人家走”，这种抗争仍能体现出人追求婚恋自由和人性尊严的普遍想法。

地方性书写是一条先“深入地方”之后“走出地方”重塑民族文化认同的文学路径。赵树理自称“文摊文学家”，把太行山区具体问题，像封建会道门、基层政权不纯等问题，变成全民族关注的解放议题。金旺兄弟恶行揭露农村政权改造紧迫性，和全国上下“民主改革”宏大叙事相呼应。刘家蛟村就像封闭的宗法社会缩影，金旺兄弟把持村政权的权力结构反映出旧中国农村普遍困境，区政府惩处恶霸象征民主政权再造地方秩序，单一地域空间升华为“新旧中国交替”的民族映射，实现“从乡土中国到政治中国”的升华。在《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中，马克·吐温巧妙地将地方性叙事升华为对19世纪美国民族共同议题的深刻反思。“国王”与“公爵”作为流动于河岸社区的骗子，以虚假身份骗取哈克与吉姆的同情，又通过编造悲情故事欺诈沿岸村民，其行为不仅暴露了个人的贪婪，更折射出社会整体在“镀金时代”下金钱至上的价值观。与此同时，小说对沿岸小镇空间的描写

进一步强化了社会颓败。摇摇欲坠的房屋、荒芜的公共场所以及游手好闲的流浪汉，共同构成了一幅物质与精神双重荒芜的图景。这些小镇不仅是地理位置，更展现出当时美国社会在工业化冲击下道德沦丧与社会关系瓦解。

#### 四、结语

密西西比河的木筏漂流，太行山沟的婚恋抗争，记下 19 世纪美国南部和 20 世纪中国解放区的历史细节，从地方的喜怒哀乐生发出对尊严、自由、正义的长久追求。地方就像镜子，照出人性、文明、时代的共同问题。本研究启示我们在文学创作中在不同里找共鸣，在乡土里看天下，把个人故事放进人类精神的大星空，给民族认同和文明对话添上温度。

#### 参考文献：

- [1]梁建军.从《小二黑结婚》看赵树理小说的艺术风格[J].名作欣赏,2025,(27):127-129
- [2]笪玉霞.美式幽默特质追寻:小说《哈克·芬》的一种解读[J].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学报,2017,34(05):26-31.
- [3]李松睿.地方色彩与解放区文学——以赵树理的文学语言为中心[J].文学评论,2016,(01):49-57.
- [4]张威,王占斌.《小二黑结婚》中文化负载词的翻译[J].海外英语,2012,(07):181-184.
- [5]张秀燕.从 Moment in Peking 看林语堂对中国文化特色词的补偿翻译[J].河北北方学院学报,2011(1):28-31
- [6]曾言.全球化语境下的“地方性”书写——以阿来《尘埃落定》的空间叙事为视角[J].长江小说鉴赏,2025,(31):96-99.
- [7]孙胜忠.美国地方色彩文学主题探得——从马克·吐温、安德森和福克纳谈起[J].山东外语教学,1999,(01):39-42+47.

## **Dialectal Narrative and the Literary Construction of Local Writing —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Adventures of Huckleberry Finn and The Marriage of Young Blacky**

**Lu Jiixin**

*(Liaocheng University, Liaocheng, Shandong, China)*

**Abstract:** This study conduct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Adventures of Huckleberry Finn* and *The Marriage of Young Blacky*, focusing on the literary functions of dialectal narrative and local writing. Through a close textual analysis, it reveals how both works employ dialectal narrative techniques to precisely depict characters' identities and advance the popularization of literature. Moreover, the two works organically integrate physical, social and psychological spaces, and elevate regional experiences into universal human values. This approach of revealing the grand through the trivial enables us to discern the evolutionary path of literature from the local to the humanistic dimension.

**Keywords:** Dialect Narrative; Regional Writing; Spatial Narrative; Popularization of Literature; Ethnic Identity

# 《瓦解》的司法叙事：阿契贝对殖民法与伊博习惯法的双重批判

卢炳政<sup>1</sup> 蓝婷<sup>2</sup>

(1.四川外国语大学, 重庆 400000, 2.四川外国语大学, 重庆 400000)

**摘要:** 本文聚焦钦努阿·阿契贝《瓦解》中的司法叙事, 以伊博族习惯法与英国殖民法律的碰撞为核心, 从宗教法、财产法、教育法三个维度, 剖析两种文明世界观的激烈碰撞。研究发现, 殖民法律以暴力与掠夺为本质, 瓦解了伊博习惯法的社群与神圣根基; 而伊博习惯法自身的僵化与暴力缺陷, 使其难以抵御殖民现代性的冲击。阿契贝以双重批判立场既揭露殖民法律的压迫本质, 也不回避本土法律的内在顽疾, 最终揭示核心命题: 传统若要在文化碰撞中存续发展, 必须以批判性反思为前提, 摒弃自身不合理性与殖民法的压迫性, 在传统价值内核与现代性合理要素之间寻找平衡。

**关键词:** 《瓦解》; 阿契贝; 司法叙事; 习惯法; 殖民法; 双重批判

**基金项目:** 2025年四川外国语大学校级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SISU2025YZ065)——阿契贝《瓦解》中的司法民族志书写研究

DOI: doi.org/10.70693/rwsk.v2i3.274

## 1. 引言

钦努阿·阿契贝(Chinua Achebe)是现代非洲文学核心人物, 被誉为“非洲文学之父”。他始终致力于打破西方殖民话语对非洲野蛮化、边缘化的刻板叙事, 重构非洲文化的主体性与历史话语权。1958年出版的《瓦解》(Things Fall Apart), 凭借对伊博部落(Igbo)乌姆菲亚(Umuofia)在英国殖民入侵下社会结构、本土文化与生活方式崩塌过程的细腻书写, 成为非洲英语文学经典。《瓦解》不仅是首部让非洲文学真正走进全球视野的经典, 更以从非洲“内部”(Duerdon and Pieterse 4)视角记录殖民创伤的独特立场, 为理解殖民主义对非影响提供了不可替代的范本。

《瓦解》的意义远不止于一部描绘文化危机的小说。阿契贝以奥贡喀沃(Okonkwo)的悲剧命运为线索, 将殖民冲击的核心从文化习俗的瓦解延伸至制度权力的博弈。伊博人拥有一套完善的司法体系, 其以祖先神谕(Agbala)为权威、社群共识为基础、恢复性正义为目的; 当英国殖民者带着教堂与法庭进入伊博社会时, 他们摧毁的不仅是祖先崇拜等表层习俗, 更是支撑伊博社群存续千年的习惯法体系。这套司法制度与殖民当局以理性证据为核心、以规训惩罚为手段的英国法律形成尖锐对抗——这种对抗并非对等的文明对话, 而是殖民势力以法律为工具对本土制度的强制碾压, 也为阿契贝的双重批判提供了核心场域。

通过阿契贝对破碎亲属规范(如恩沃埃埃在传教士教育影响下背弃祖先信仰)与强制推行的英国普通法的刻画, 我们得以见证法院、学校、成文法等殖民机构如何沦为摧毁伊博族习惯法的策略性工具。这种系统性瓦解迫使社群陷入马哈茂德·曼达尼(Mahmood Mamdani)所称的“二元公民身份”(16): 一种在强加的殖民合法性与遭抹除的本土法学体系之间撕裂的破碎身份。而这种身份撕裂的核心, 正是伊博族习惯法的瓦解与殖民法律的强制植入, 这也构成了小说司法叙事的核心关切。

需明确的是, 本研究所言“司法叙事”, 特指阿契贝在小说中通过具象化情节、人物命运与制度碰撞, 对法律实践、正义观念及权力关系的文学书写, 其核心是通过伊博习惯法的运行逻辑、殖民法庭的暴力实践, 以及二者冲突引发的社会裂变, 具象呈现法律殖民主义的本质与文化碰撞的深层张力。而本研究的核心立场即“双重批判”: 既批判殖民法的暴力霸权与文化掠夺, 也直面伊博习惯法在神权依赖、性别等级等方面的内在局限, 且这一批判将通过宗教法、财产法、教育法三个核心维度具体展开。在此基础上, 本研究以文学与法学的跨学科视角

**作者简介:** 卢炳政(2000—), 男, 四川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非洲文学;

蓝婷(1999—), 女, 四川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非洲文学;

**通讯作者:** 卢炳政

为切入点，立足西非文学经典《瓦解》的司法叙事，探讨文学书写如何具象化记录法律殖民主义的暴力本质，进而阐释阿契贝的双重批判立场及其后殖民法理学启示。

## 2. 殖民法律暴力：阿契贝的批判维度

《瓦解》中的伊博族有一套独特的司法体系，这套体系“完善且有效”（Rhoads 65）。伊博族的法律体系以传统习俗、宗教信仰和氏族集体意志为核心，紧密围绕维护部落秩序、敬畏祖先与神灵展开，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伊博族法律核心来源是氏族传统习俗与神权意志，地母阿尼、丘陵之神阿格巴拉等神灵及祖先灵魂被视为法律的终极赋者。伊博族法律有效地维护着社会秩序，“确保氏族的生存并巩固其传统”（Osei-Nyame 12）。伊博族的法律体系通过多层级的约束与调节机制，将个体行为、家庭关系、氏族利益与神灵意志绑定，形成了殖民前相对稳定的社会秩序。

伊博族的法律体系通过多层级的约束与调节机制，将个体行为、家庭关系、氏族利益与神灵意志绑定，形成了殖民前相对稳定的社会秩序。而这一稳定体系，在英国殖民法的强制介入下被彻底打破。殖民法院以法律为压迫工具，打破了伊博族既有的法律体系与社会秩序。英国殖民者意图建立“一个以英国判例为范本的社会”（Reichman 55），对伊博族本土法与本地实际予以粗暴漠视。作为白人殖民统治的政治工具，殖民法院并非独立司法机构，其运作完全服务于白人对伊博族的控制与掠夺。殖民法庭合法性源于白人殖民当局，而非伊博族的文化认同，核心功能是通过法律外衣确立殖民权威，镇压本土反抗。例如，白人在乌姆奥菲亚设立法院后，首要任务是维护基督徒利益、镇压对殖民秩序的挑战。法院由“无知的行政长官”（阿契贝 156）主导，其既不了解伊博族的习俗与神权传统，也无视本土社会的运行逻辑；辅助审判的差吏多来自外地，被伊博族称为“科特玛”（156），因蛮横且不熟悉本土文化而遭普遍憎恨。殖民法院毫无程序正义可言，常用欺骗性传唤、非法监禁和肉体虐待等手段镇压反抗者：行政长官以协商教堂冲突为由，邀请六位部落首领举行“所谓的谈判”（172），却在他们陈述案情时突然逮捕、戴手铐关入守卫室；监禁期间，差吏剃光首领们的头发、剥夺饮食、强迫撞头，肆意羞辱有头衔者的尊严。这种先逮捕后罗织罪名的暴力模式，既违背了法学意义上“程序正义”的核心原则，又与伊博习惯法“先听证后裁决”的程序正义传统形成鲜明对立，尽显殖民法律的霸权本质。

殖民法院的处罚不以秩序修复为目的，而以震慑反抗、掠夺资源为核心。其一方面通过暴力惩罚确立权威，另一方面通过罚款掠夺财富，这种惩罚加掠夺的双重属性，与伊博习惯法“处罚即修复”的逻辑完全对立。更值得批判的是，殖民法院将伊博族文化习俗斥为“野蛮”，强制推行白人价值观作为唯一标准：斯密士牧师的信徒埃诺克斯撕毁祖先灵魂的面具，殖民法院不仅未追究其亵渎神灵的行为，反而予以保护。这实质是否定伊博族的文化尊严，强迫其接受欧洲宗教与法律逻辑。

殖民法的暴力本质已充分暴露，而伊博习惯法自身的僵化与暴力缺陷，使其难以形成有效抵抗，二者的对立构成了阿契贝双重批判的核心场域。

## 3. 冲突中的双重审视：伊博习惯法的局限与殖民法的霸权

前文已揭示殖民法律以暴力为核心的压迫本质，而这种压迫并非孤立存在，其与伊博习惯法的碰撞，构成了阿契贝展开双重批判的核心场域。两种法律的冲突并非所谓“文明对原始”的单方面碾压，而是殖民霸权与本土传统的激烈碰撞：殖民法以文明为幌子实施霸权，伊博习惯法则因自身的僵化与暴力难以抵御冲击，二者的对抗既彻底暴露了殖民法的掠夺本质，也凸显了伊博习惯法的内在局限，共同构成了后殖民社会的法律困境。

### 3.1 冲突本质：殖民法的压迫性与伊博习惯法的内在局限

《瓦解》中伊博族习惯法与殖民法律的碰撞，绝非单纯的司法程序冲突，而是两种文明世界观的根本对立。伊博族习惯法植根于社群团结、宗教虔诚与恢复性正义，是与部族社会结构深度交织的文化实践；英国统治者强加的殖民法律则是统治工具，以理性主义与惩罚性逻辑为根基。二者的对抗并未形成双向互动，而是殖民法对本土法的强制碾压，这既暴露了殖民法的霸权缺陷，也凸显了伊博习惯法的内在局限，最终加速了伊博族社会的分崩离析。

伊博族习惯法的核心特征是社群本质与神圣根基。其合法性并非源于成文法规，而是来自部族集体意志、祖先权威，以及大地女神阿尼、神谕阿加拉等神灵的意志。伊博族司法体系“竭力恢复社会安全，而不诉诸惩罚”（Elechi 398）。伊博族习惯法法律是一种社群实践。小说中，纠纷由长老会议或埃格伍古（Egwugwu）裁决，惩罚的目的是“解决纠纷”（83），修复社会与神圣秩序，而非惩罚个体。例如，奥贡克沃意外杀死埃塞乌杜之子的行为被判定为“女性的罪行”（111），判处七年流放。这一判决既净化了血迹污染的土地，也让部族得以维持与神灵的和谐。但伊博族的习惯法并非毫无缺陷。对超自然权威的依赖也导致了将孩子视为不祥之物而遗弃的

残忍行为；此外，僵化的性别等级制度也使女性与贱民奥苏 (Osú) 处于边缘地位。

相比之下，殖民法律是一套自上而下的世俗体系。殖民法核心原则是理性证据与国家权威，“背后的意识形态早已为殖民法律事业奠定了正当性基础” (Reichman 66)。这些原则与伊博族法律逻辑直接对立。司法裁决需依据证人证词与实物证据，将神谕与祖先智慧斥为野蛮迷信。殖民法庭由无知的行政官与腐败的信使科特马运作，始终将殖民利益置于正义之上。白人法庭把一块有争议的土地被判给恩纳玛家 (157)，并非因其拥有习惯法上的权利，而是因为他们贿赂了法庭信使。这一裁决将对伊博人而言神圣的土地简化为商品。殖民法律的惩罚性本质及其对文化语境的漠视，使其沦为压迫工具而非正义载体。

### 3.2 宗教法冲突：神权司法的僵化与世俗法庭的文化霸权

宗教信仰是伊博族习惯法的灵魂，是伊博族社会秩序的基石。对伊博人而言，法律并非人类发明，而是祖先与神灵意志的体现。然而，殖民世俗法庭否定超自然权威，将法律简化为理性的世俗治理工具。这种神圣与世俗司法逻辑的碰撞，不仅动摇了伊博族宗教法的合法性，也侵蚀了部族的精神凝聚力。

伊博族宗教法的合法性建立在三大支柱之上：祖先共融、神谕权威与仪式执行。伊博人相信祖先与生者共存，其意志通过埃格伍古面具审判具象化，即部族长老佩戴象征祖先神灵的面具，代表祖先行使裁决权。埃格伍古面具审判赋予“法律和习俗神圣的约束力” (Irele 6)，因此埃格伍古的裁决被视为绝对正确。第十章中，埃格伍古裁决乌佐乌鲁的婚姻纠纷，命令乌佐乌鲁用一壶酒道歉。这一判决既修复了家庭和谐，也维护了部族的道德准则。神谕，尤其是阿加拉，是伊博族法律的另一核心支柱。它们仲裁超出人类判断范围的纠纷，如谋杀、作物歉收或伊克美弗纳等俘虏的命运。当神谕下令处死伊克美弗纳时，部族无条件服从，因为违抗神谕意味着招致神灵的愤怒。宗教法还通过仪式强制执行。禁止暴力的和平周与向阿尼的献祭，确保部族行为与神意保持一致，使守法成为一种精神责任。

殖民世俗法庭否定这一神圣逻辑，强加了一套理性主义的司法体系。殖民行政官对伊博族文化一无所知，将神谕贬为木偶，将埃格伍古审判视为野蛮仪式。司法裁决依赖证人证词与实物证据，完全无视罪行的精神维度。殖民法庭还保护违反伊博族宗教禁忌的基督教皈依者。当埃诺克斯下埃格伍古的面具时，法庭没有惩罚他，反而逮捕了报复性摧毁教堂的部族领袖。这种选择性执法表明，殖民法律的公平理性只是幌子，其真实目的是强加基督教与欧洲价值观，压制伊博族宗教身份。

这场碰撞对伊博族社会造成了灾难性后果。宗教法曾为部族提供了共同的目标与合法性，其仪式与裁决将个体与社群、神灵紧密联结。当殖民法庭否定这一神圣权威时，部族失去了精神支柱。伊博族人民对伊博族神灵未能保护部族感到幻灭，进一步加剧了社群分裂。神圣与世俗法律的对抗，由此成为传统与现代性冲突的隐喻，这场冲突让伊博族社会陷入迷茫。

### 3.3 财产法冲突：社群所有权的消解与土地商品化的剥削

土地是伊博族社会组织的一大核心。伊博族财产法的核心特征是社群所有权与神圣联结。其氏族集体精神围绕着“土地的神圣性、祖先应受尊重的权利以及氏族生存的首要地位” (Oliver 123) 三个传统。对伊博人而言，土地并非私有商品，而是神灵的馈赠，由部族为当代人与后代子孙托管。继承权遵循社群原则，确保资源分配服务于集体生存。然而，殖民统治强加了私有财产权制度，将土地商品化，摧毁了部族的社群精神，使财产法沦为经济剥削的工具。这一转变不仅破坏了伊博人与土地的关系，也撕裂了维系部族的社会纽带。

伊博族财产法植根于土地属于部族，而非个人的信念。部族将土地分配给成员耕种，但所有权仍归集体所有。奥贡克沃流放期间，他的土地由其他部族成员耕种，这体现了使用即占有的原则，既确保土地不会闲置，也彰显了资源共享的社群本质。土地更具有不可分割的神圣性。祖先神灵栖息于此，耕种土地必须遵守严格的禁忌与仪式，任何对土地的亵渎都被视为对祖先与神灵的冒犯。

殖民统治通过将土地视为商品，彻底颠覆了这一体系。传教士被授予“凶森林” (Evil Forest)，建造教堂，这既是对土地的亵渎，也象征着殖民势力对伊博族神圣地理空间的否定。殖民法庭进一步强化了商品化。在土地纠纷案件中，法庭因恩纳马家族贿赂信使而将土地判给他们，将土地这一神圣的社群资源简化为经济交易的对象。这一判决直接违反了伊博族习惯法。

土地商品化与带来了毁灭性的社会后果。对伊博人而言，土地不仅是经济资源，更是社群身份的象征，因为它将生者与祖先、神灵紧密相连。当土地成为商品，这种精神联结被打破，部族的社会纽带也随之瓦解。白人法庭基于贿赂作出的不公裁决，不仅制造了直接的利益冲突，更侵蚀了社群内部的信任，削弱了人们对奥贡克沃等传统权威的尊重，进而加剧了社会分裂与整个社会的瓦解。阿契贝对这一转变的刻画表明，殖民财产法摧毁了部族的经济与社会根基，使他们沦为殖民统治的受害者。正如奥比埃里卡哀叹的那样：“他在那些使我们团结一致

的东西上面割了一刀，我们已经瓦解了”（157）。

#### 3.4 教育法冲突：口头传统的局限与殖民教育的思想控制

教育是一切文化的命脉，对伊博人而言，教育是一种社群性的口头实践，传递祖先智慧、道德价值观与生存技能。伊博族的教育法虽未成文，却通过讲故事、仪式与社群参与运作，将个体培养为负责任的部族成员。殖民统治引入了教会学校，这些学校优先传授基督教教义与欧洲价值观，以“认知灭绝”，即本土知识的消亡，取代了口头教育。这不仅切断了年轻一代与文化根源的联结，还将他们培养成殖民利益的服务者，完成了思想殖民。

伊博族口头教育是一种社群性的整体实践，讲故事是其核心。通过故事，伊博族人“作出道德或说教性评”或是“传播有关过去传说和辉煌的知识”（Bawa, Essobiyou and Likambantién 39）。奥贡克沃给儿子们讲述“富有男子气概的暴力和流血故事”（48），以灌输部族的男性理想。女性与儿童也参与其中。埃喀维菲给女儿埃玛金讲述乌龟的故事，传授机智与谦逊。

殖民教会学校否定这一口头传统，强加了一套文本导向的教育体系，优先传授欧洲知识与基督教教义。尽管伊博人皈依基督教很大程度是为了“享受作为基督徒所能获得的回报”（Ekechi 105），但是殖民教育损害了民族文化归属感。奥贡克沃的儿子恩沃依埃被教会学校吸引，并非因为基督教教义，而是因为赞美诗与故事让他得以摆脱父亲的暴力男性气质。基督教教导使得他否定部族价值观。他抛弃原名恩沃依埃，改用依撒克，并与家人断绝关系。教会学校不仅传授新知识，还摧毁了伊博人的自我价值感与文化归属感。

认知灭绝的后果极为深远。在教会学校接受教育的年轻一代，与口头传统及社群价值观渐行渐远。他们不再理解部族的禁忌、仪式或道德准则，拒绝长老的权威，“文化对他们不再具有凝聚力”（陈榕 163）。奥贡克沃与长老们坚守传统教育，而恩沃依埃等皈依者则拥抱欧洲价值观，使部族陷入分裂。教会学校还服务于殖民利益。它们将伊博族人培养为“法庭书记”与“教师”（162），这些劳动者能够为殖民行政机构服务。这使教育沦为经济与政治统治的工具，伊博人被训练成服从者而非反抗者。然而，阿契贝也揭示了殖民教育的矛盾性。它在摧毁本土知识的同时，也为受压迫者提供了出路。这种复杂性凸显了阿契贝的批判。认知灭绝不仅是知识的丧失，更是能动性的丧失，伊博人被剥夺了自我定义的能力，“口语叙事传统已被入侵的西方书写传统所取代”（朱峰 140），被迫通过欧洲人的视角看待世界。

最终，伊博族口头教育与殖民教会学校的碰撞，完成了伊博族社会的瓦解。失去了氏族文化凝聚力，部族再也无法抵抗殖民统治。阿契贝对这场教育对抗的刻画，深刻批判了殖民主义的暴力。

#### 4. 结语

阿契贝通过宗教法、财产法、教育法三个维度的司法叙事，完成了对殖民法与伊博习惯法的双重批判。阿契贝并非简单否定任一体系，而是指向后殖民社会的良性法律建构路径，即摒弃殖民法的压迫性与本土法的不合理性，在传统文明的价值内核与现代性的合理要素之间寻找平衡。

阿契贝的法律书写表明，殖民法律并未简单取代伊博族法律，而是瓦解了部族的社群结构，使法律从凝聚力量沦为分裂根源。与此同时，伊博族法律的反抗虽展现了其集体行动能力，但它无法适应殖民现代性的特质注定其走向消亡。阿契贝承认“就像其它民族的过去一样，我们的过去也有好的和不好的方面”（9），因此其辩证刻画既不美化“原始”，也不合法化“文明”，反而揭示了殖民主义的暴力干预如何打破伊博族社会的脆弱平衡，留下一个两种体系都无法填补的真空。

阿契贝的后殖民法理学思考，始终以辩证审视为核心，既拒绝殖民话语对本土文明的全盘否定，也不回避本土法律体系的内在顽疾。这种辩证性首先体现在双重批判的立场上：面对殖民法院的司法暴力，阿契贝毫不留情地揭露其本质；而对伊博族本土法律，他同样没有美化，而是直面其不合理性。这种双重批判意识，更指向本土文明的必要自我批判。阿契贝笔下的本土法律存在内部反思的可能，奥贡克沃杀死伊克美弗纳后内心的动摇，暗示本土法律的神圣性已出现裂痕。角色的困惑，本质是阿契贝赋予本土文明的自我审视能力：传统若要存续，不能依赖神权的绝对权威，而需直面自身的暴力与僵化。

阿契贝的辩证思考在于，法律现代性不应是殖民暴力的附庸，本土性也不应是野蛮的代名词；后殖民社会的法律建构，需以自我批判为前提，在保留本土文明价值内核的同时，剔除暴力与不平等，最终走出一条既非殖民复刻、也非传统固化的道路。

#### 参考文献：

- [1] Duerdon, Dennis, and Cosmo Pieterse, eds. *African Writers Talking*. London: Heinemann, 1972. Print.  
[2] Mamdani, Mahmood. *Citizen and Subject: Contemporary Africa and the Legacy of Late Colonialism*.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6.

- [3] Rhoads, Diana Akers. "Culture in Chinua Achebe's *Things Fall Apart*." *African Studies Review*, vol. 36, no. 2, 1993, pp. 61-72.
- [4] Osei-Nyame, Kwadwo. "Chinua Achebe Writing Culture: Representations of Gender and Tradition in *Things Fall Apart*." *Chinua Achebe's Things Fall Apart: New Edition*, edited by Harold Bloom, Bloom's Literary Criticism, 2010, pp. 5-22.
- [5] Reichman, Ravit. "Undignified Details: The Colonial Subject of Law." *Chinua Achebe's Things Fall Apart: New Edition*, edited by Harold Bloom, Bloom's Literary Criticism, 2010, p. 51-67.
- [6] 阿契贝.《瓦解》.高宗禹译,重庆出版社,2008.
- [7] Elechi, O. Oko, et al. "THE IGBO INDIGENOUS JUSTICE SYSTEM." *Colonial Systems of Control: Criminal Justice in Nigeria*, University of Ottawa Press, 2008, pp. 395-416.
- [8] Irele, F. Abiola. "The Crisis of Cultural Memory in Chinua Achebe's *Things Fall Apart*." *African Studies Quarterly*, vol. 4, no. 3, 2000, pp. 1-40.
- [9] Lovesey, Oliver. "Making Use of the Past in *Things Fall Apart*." *Chinua Achebe's Things Fall Apart: New Edition*, edited by Harold Bloom, Bloom's Literary Criticism, 2010, pp. 115-139.
- [10] Bawa, Kammampool, Siro Essobiyou, and Kombate Likambantién. "Folklore and Cultural Identity: A Study in Chinua Achebe's *Things Fall Apart*." *European Journal of Literature,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Studies*, vol. 7, no. 2, 2023, pp.26-43
- [11] Ekechi, F. K. "Colonialism and Christianity in West Africa: The Igbo Case, 1900-1915." *The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 vol. 12, no. 1, 1971, pp. 103-15.
- [12] 陈榕."欧洲中心主义社会文化进步观的反话语——评阿切比《崩溃》中的文化相对主义."外国文学研究 .03(2008):158-169.
- [13] 朱峰."家乡土地上的流浪者:《瓦解》中奥贡喀沃的悲剧."外国文学评论 .04(2013):130-142.
- [14] Achebe, Chinua. "The Role of the Writer in a New Nation." *African Writers on African Writing*, edited by G. D. Killam, Heinemann, 1973, pp. 7-13.

## Judicial Narrative in *Things Fall Apart*: Chinua Achebe's Dual Critique of

### Colonial Law and Igbo Customary Law

Lu Bingzheng<sup>1</sup>, Lan Ting<sup>2</sup>

(<sup>1</sup> School of English Studies, Sichu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Chongqing, China; <sup>2</sup> School of English Studies, Sichu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Chongqing,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judicial narrative in Chinua Achebe's *Things Fall Apart*. Taking the collision between Igbo customary law and British colonial law as its core, it analyzes the fierce confrontation between the worldviews of these two civilizations from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religious law, property law, and education law. The study finds that colonial law, whose essence lies in violence and plunder, has undermined the communal and sacred foundations of Igbo customary law; meanwhile, the inherent rigidity and violent flaws of Igbo customary law have made it difficult to resist the impact of colonial modernity. From a stance of dual critique, Achebe not only exposes the oppressive nature of colonial law but also does not evade the inherent flaws of indigenous law, ultimately revealing the core proposition: for tradition to survive and thrive amid cultural collision, it must be premised on critical reflection—abandoning both its own irrationalities and the oppression of colonial law, and seeking a balance between the core of traditional values and the rational elements of modernity.

**Keywords:** *Things Fall Apart*; Chinua Achebe; Judicial Narrative; Customary Law; Colonial Law; Dual Critique

## 陆地文学作品中的现实意义分析

龙腾<sup>1</sup> 黄新宇<sup>1</sup> 余静<sup>2</sup>

(1.广西民族师范学院, 广西 崇左 532200; 2.第九二三医院幼儿园, 广西 南宁 530022)

**摘要:** 本文以广西壮族作家陆地的长篇小说《美丽的南方》《瀑布》及《故人》等中短篇小说为研究对象, 探讨其文学作品的当代现实意义。通过文本细读和文学地理学等理论, 从理想信念、乡土书写、人性探微和创作理念四个维度, 分析作品对当代青年精神塑造、文化认同强化、人性道德关怀和文学创作发展的启示价值。研究发现, 作品中坚定理想信念、浓郁乡土情怀、深刻人性洞察和“真情写作”原则, 为应对当代社会精神迷茫、文化根脉断裂、道德价值失范等问题提供文学参考与精神资源。本研究旨在拓展陆地研究深度与广度, 打破刻板印象, 挖掘作品超越时代的永恒价值与普遍人性关怀。

**关键词:** 陆地; 现实主义; 《美丽的南方》; 《瀑布》; 当代价值

DOI: doi.org/10.70693/rwsk.v2i3.302

### 一、陆地创作与时代背景概述

#### (一) 陆地个人简介

陆地(原名陈克惠), 文学创作生涯跨越中国现当代多个重要时期, 早年考取延安鲁迅艺术学院, 后担任广西文联主席等职, 独特的人生经历深深地影响着他的创作视角与主题选择。他是延安“鲁艺”培养的党员作家, 深受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影响, 坚持革命现实主义创作方法, 强调文学与社会、人民生活紧密联系。同时, 作为壮族作家, 他的作品带着少数民族文化和地方特色,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具有独特地位。

#### (二) 陆地文学作品成就

陆地文学成就主要体现在《美丽的南方》《瀑布》等长篇小说及《故人》等中短篇小说。《美丽的南方》是壮族文学史上出现的第一部长篇小说, 主要是描写新中国成立初期壮族地区农民翻身解放、觉醒和成长。《瀑布》主要展现广西革命斗争图景, 获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这些作品在文学史上具有重要价值, 是研究广西社会变迁与民族文化的重要文献。

#### (三) 陆地文学作品特征

陆地创作对地理环境敏感且刻画精细。文学地理学认为地理因素影响作家创作, 陆地作品体现桂西南地域景观, 其作品中的自然景观不仅是故事背景, 还用于塑造人物。譬如《美丽的南方》中描绘的榕树、木棉等南方景观, 为人物形象的塑造进行铺垫和渲染。

#### (四) 陆地文学作品意义

**作者简介:** 龙腾(1988—), 男, 硕士, 研究方向为民族团结进步教育;

黄新宇(1976—), 男, 博士, 教授, 研究方向为华南少数民族文化传播、桂西南文学;

余静(1989—), 女, 学士, 研究方向为学前教育。

**通讯作者:** 龙腾

陆地创作与时代背景联系紧密，其作品创作于中国变革时期，对重大历史事件有深刻印记。他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指导，形成了革命、政治与乡土三重面向的创作观，其作品既讲革命故事，也关注乡土伦理。即使是在阶级斗争年代，他仍坚持“真情写作”，表现人性复杂，让作品得以超越时代局限，与当代读者对话、共鸣。如《美丽的南方》通过韦廷忠一家命运折射出土改时乡村变迁及精神价值转变，具有超越时代的现实意义。

## 二、理想信念的当代回响：陆地作品中的精神力量分析

### （一）陆地作品中的精神力量

《瀑布》所传递的革命精神不是空洞的道理，靠具体人物的成长过程和人生选择表现出来，故事主人公韦步平对革命理想一直追求，信念坚定，这是作品最激励人心的精神力量。现在有些青年“躺平”，精神空虚，觉得活着没意义，从反面说明理想信念对个人精神世界有多么重要。陆地写韦步平从普通青年长成坚定革命者的过程，写出为理想信念能豁出一切的英雄气概，对于价值观念多元、理想淡漠的当代社会有重要的启发。在韦步平带风仙到瑶寨参与“还王愿”习俗这个场景里，民间习俗不只是背景，也是主人公深入生活与乡亲们打成一片的具象化表现，更是革命意识与民间力量融合的深层象征。

### （二）陆地作品中的理想信念

陆地作品里理想信念深深扎根于对故土和人民的热爱，《美丽的南方》主人公把对家乡的情感与对理想社会的追求相结合，给当代青年提供了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融合的精神启示。当代社会强调个性发展和自我实现，一旦脱离社会关怀和责任担当，容易陷入思想狭隘与虚无主义。陆地作品提醒，在追求理想信念的过程中，我们不仅能够实现自我价值的提升，更能为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

在陆地的作品中，理想信念的书写如暗夜星火，其当代价值在于精神品质本身，也在于真实人性挣扎和复杂生命选择的呈现。《瀑布》里韦步平革命道路充满困惑、挫折和痛苦，他的理想信念愈发坚定，这种叙事启示当代青年，理想信念形成并非一蹴而就，在实践、探索甚至迷惘中逐渐清晰坚定。当代青年社会环境与革命年代不同，在应对困惑、寻找精神依托上，陆地笔下人物执着追寻生命意义具有强大感染力。如《瀑布》里“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勇气和担当，如同一剂良方，激励当代青年不要“躺平”，要有砥砺前行的人生态度。

### （三）陆地作品中的革命故事

邓千叶和李逊指出，陆地文学道路离不开“革命”，其代表作都在讲述革命故事、阐发革命情感、塑造鲜活革命者形象。这些革命者不是概念符号，他们的精神成长过程对当代青年具有启示意义。在当代，为理想不懈奋斗的精神新形式表现在工作、追求美好生活和社会责任担当中，陆地作品的理想信念书写是这种精神传承的文学载体。

## 三、乡土书写的当下观照：陆地笔下的“美丽的南方”与文化认同

### （一）乡土书写地方景观

陆地作品描绘了广西乡土社会、民族风俗和自然环境，这是其文学世界的一个显著特点。《美丽的南方》以细腻的笔触描绘桂西南自然与人文风貌，如榕树、木棉等自然景观，构成水墨画般的背景，是建构地域文化认同的重要载体。其创作受桂西南地理环境影响，笔端游走于桂西南的山川脉络，风雨林壑与壮乡歌圩早已熔铸为有机的文化生命体。书中描写壮族风俗，亦非静止的“文化标本”。这种将地理基因、民族记忆与文学叙事交融的实践，它既是人物悲欢扎根的精神土壤，也是族群记忆代际传递的血脉密码。

### （二）乡土书写文化传承

陆地的乡土书写给乡村振兴战略中的文化振兴带来启示。当前部分地方乡村振兴重视经济而忽视文化，他写的壮族乡村充满活力，描写了农民和土地的关系，让人们重视乡村价值和“乡愁”。他的作品与当代乡村伦理研究虽记录方式不同，但都关注地方性道德知识传承，是乡村伦理的文学性田野调查。他的《美丽的南方》描绘了乡土的美好，还揭示了里面的社会问题和矛盾，这样的辩证角度给当代乡村振兴带来启发：真正的乡土关怀，得看重乡土文化的价值，并面对内在的社会问题，在传承中实现创新发展。

### （三）乡土书写生态意识

陆地作品中的生态意识，是一种文学表达，也是一场与当代生态整体观的深度对话。小说《美丽的南方》中，深层次地展现出农民与自然之间互相依存的关系，反映了壮族万物有灵的自然观，蕴含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思想，为思考人与自然关系提供了丰富的文化资源。同时，陆地的乡土情怀不仅停留在对乡村风土人情的眷恋，更深层地体现为对乡土社会内在矛盾的深刻思考。

## 四、人性探微与道德关怀：陆地作品对当代人性的启示

### （一）对人性复杂的探索

在《故人》中，陆地不搞简单的人物塑造，没有让角色塑造陷入非黑即白的符号化，而是以细腻笔触深入刻画其内心世界，把感情里的复杂和矛盾写出来，从李冰如这个角色可以看出，其“一生执着追求真情写作，挥洒人性光辉”。在当代社会中，人与人交往功利，感情表达浮在表面，他的作品关注人性深处和呼唤真情，这对人们具有重要启发。

陆地坚守“真情写作”原则，使作品不被时代限制，具有长久的艺术价值。陆地文学创作的显著特征在于其对特定历史背景下人性复杂性的深刻探索与坚定呈现，这一点在短篇小说《故人》中尤为突出。在《故人》中，通过李冰如这一形象，深刻揭示了坚守人性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双重思考。《故人》能获得读者广泛认可，是因为陆地在阶级斗争主导的年代中忠于生活本身，真情写作、真实写作，塑造个性化人物，陶冶读者灵魂。

陆地能把握社会变革与人性之间的相互影响，小说《美丽的南方》将土地改革运动描述为一场深刻的社会制度变革，并通过知识分子和农民在土地改革实践中的思想转变，展示了社会变革如何激发人的主体性和创造性，陆地未简单地将社会变革等同于人性进步。像他写农民韦廷忠的儿子生病时先想到去榕树下祭拜，这一情节作为人物精神世界的有机组成部分，体现了他对农民精神世界复杂性的清醒认知。

### （二）作品蕴含道德关怀

在当今道德相对主义盛行的时代，陆地作品以无声的伦理韧性为当代人提供了重要的精神坐标。他的创作没有沉溺于人性的黑暗面，也没有滑向理想化的浪漫主义。相反，他在现实与理想主义之间保持了辩证平衡，使文学成为反映人性复杂性的一面镜子，同时又不失希望。例如，《瀑布》中韦步平与凤仙之间的情感描写，构建了一种植根于壮族文化根源和革命伦理的情感叙事范式，对传统爱情小说中情感表达的物质主义或虚幻倾向具有矫正意义。

### （三）对生命伦理的思考

陆地作品中的生命伦理思考为当代社会逐渐失落的生命伦理提供了深刻的启示。《美丽的南方》对农民与土地关系的描述，是对社会分析和人生哲学的呈现，反映了人与土地之间的物质依赖和精神认同。在当代社会人与土地疏远的背景下，其作品对生命根基的探寻及对存在意义的思考，与对生命根基和存在意义的探索产生了共鸣，他对土地的激情写作反映了对人类生命起源的精神回归。乡村伦理研究指出每个村庄存在独特的道德生活样式。陆地文学作品以《美丽的南方》为出发点，运用艺术手法描绘“乡村道德故事”，呈现特定时期乡村伦理关系的

变化，帮助当代读者理解乡村道德发展的规律。

## 五、创作理念的当代启示：陆地文艺思想的价值重估

### （一）陆地文学的非虚构写作

陆地的创作理念给当代非虚构写作带来启发。当代非虚构写作近年兴起，看重记录和反思现实。陆地的《美丽的南方》写土改，虽是小说却有非虚构的真实感。乡村伦理研究的“田野”路径和陆地看重深入生活的理念相似，他的作品具有艺术性和现实感。其强调深入生活的理念与乡村伦理研究的“田野”路径高度契合，给当代非虚构写作提供了参考。

### （二）陆地文学的地域性与普遍性关系

陆地文艺思想在文学创作的地域性和普遍性关系上有独特看法。作为壮族作家，他的作品充满了浓郁的民族和地域特色，但并不局限于此，而是通过地方经验挖掘对人性的普遍命运和本质进行反思。例如陆地在表现壮族乡村生活时，坚持以“在地性”为根基，既突出地域文化特质，又触及人类存在的基本问题。在全球化与本土化张力凸显的当下，这一扎根本土又胸怀世界的视角，为作家处理地方经验与普遍关怀提供了范例。邓千叶与李逊研究指出，陆地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指导，将现实主义手法融入创作，其文艺思想散见于文论与讲话中，涵盖文学主题、对象及文学与政治关系等维度。当今面临文学多元化、信息碎片化，陆地坚持艺术规律、深切关注现实的创作态度具有特别宝贵的参考价值。

### （三）陆地文学紧密联系生活

陆地文艺思想的核心是文学和生活要紧挨着，作家要到生活里去，找素材、找灵感，从他的创作里看得很清楚。《美丽的南方》写壮族乡村生活，《瀑布》写革命斗争场景，均彰显扎根现实的创作态度，为当代文学脱离生活倾向提供了方法论启示。

陆地的“真情写作”原则对当代文学情感表达具有深刻启示。其创作追求真实情感与人性深度探索，在《故人》中坚持表现人性的复杂性和真挚情感。当代有些文学作品过度侧重形式创新与市场效应而忽视情感深度，而陆地的“真情写作”原则重申了文学价值取决于表现人性真实的深度和能否打动人心力量。陆地的文学创作留下丰富作品，形成独特文艺思想，这些思想在《写作杂谈》等文论里能看到。他坚持“文学需表现个人生活与民族记忆”等原则，梳理他的创作理念，给现在的文学创作带来不少启发，尤其在文学市场化、娱乐化的今天有重要参照价值。

## 六、结语

本研究通过从理想信念、乡土书写、人性探微及创作理念四个维度对陆地文学作品进行系统分析，探讨其在当代社会的现实意义。研究发现，陆地作品中所蕴含的坚定理想信念、浓郁乡土情怀、深刻人性洞察以及“真情写作”的原则，为解决当代社会精神迷茫、文化根脉断裂、道德价值失范等现实问题提供了重要的文学参考与精神资源。

在理想信念层面，陆地通过《瀑布》中的韦步平等形象，彰显为崇高理想不懈奋斗的精神品质，更为当代青年在“躺平”思潮蔓延的语境中构筑起一道坚实的精神堤坝。在乡土书写方面，其对广西山水和壮乡文化的深情镌刻，不仅保存了珍贵的民族记忆，也为当下乡村振兴战略中的文化传承提供了借鉴。在人性探微方面，陆地坚持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探索人性复杂性，这种对真挚情感和人性深度的关注，为物质化时代的道德建设提供了资源。在创作理念层面，其强调文学与生活的联系及“真情写作”原则，对当代文学创作如何平衡艺术性与现实关怀具有启示意义。

本研究的创新之处在于从当代问题的角度系统地重读陆地作品，突破了文学史定位和革命叙事的传统框架。通过文学地理学等理论视角，揭示地域书写与文化认同建构的互动关系。与此同时，在青年心态、乡村振兴、人性启蒙等当代议题开辟了新的研究维度。

当然，本研究尚有一些不足。受篇幅与资料限制，对陆地的后期作品以及日记、信件等非虚构文本的探索不足，还需要与当代作家进行进一步的比较研究。未来的研究可扩展到分析日记、简札等第一手材料的创作过程，或者将陆地作品置于中国多民族文学的背景下进行比较，以便更全面地把握其当代价值。

陆地作为广西现当代文学与壮族文学奠基人，其作品不仅是特定时代的产物，也是超越时代的精神财富。在快速变迁的当代社会，再看陆地的作品，是回顾历史，也是思考现实，更是展望未来。他的文学世界提醒我们，追求物质进步时，不能忽视精神世界的建构，拥抱全球化的时候，不能忘记文化根脉的守护，推进社会现代化的时候，不能丢失对人性的深刻洞察和关怀，其文学世界启示我们：追求物质进步时，需重视精神建构；拥抱全球化进程中，应守护文化根脉；推进社会现代化道路上，不可缺失对人性的深刻洞察与关怀，这正是陆地文学作品的核心价值所在。

#### 参考文献：

- [1] 郭冰茹.城市、乡土与城市文学中的现代性问题[N].中国社会科学报, 2024-11-18.
- [2] 邓千叶, 李逊.革命·政治·乡土: 陆地创作观的三重面向[J].广西教育学院学报, 2024(6).
- [3] 百度百科.陆地文集[EB/OL].<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9%86%E5%9C%B0%E6%96%87%E9%9B%86/50473678>.
- [4] 任玉玲.一切景语皆情语——当代桂西南文学的地理景观书写[N].中国艺术报, 2023-2-8.
- [5] 沈明, 裴蓓, 祁守仁.乡村到城市的历史更迭: 文学桂军生态传递的家园情结[J].绥化学院学报, 2024,44(2).
- [6] 徐诗颖.用真诚笔墨挥洒人性光辉——重读陆地小说《故人》中的李冰如形象[J].广西民族师范学院学报, 2013,30(2).
- [7] 陆地.陆地文集: 第1卷[M].陈南南, 陈田田整理.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
- [8] 陆地.陆地文集: 第3卷[M].陈南南, 陈田田整理.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
- [9] 王露璐, 王璐.乡村伦理研究的“田野”路径[N].光明日报, 2023-6-30(11).
- [10] 陆地.陆地文集: 第5卷[M].陈南南, 陈田田整理.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

## An Analysis of the Practical Significance in Land's Literary Works

LongTeng<sup>1</sup>, HuangXinYu<sup>1</sup>, YuJing<sup>2</sup>

<sup>1</sup> Guangxi Minzu Normal University, Guangxi, Chongzuo, China; <sup>2</sup> No. 923 Hospital Kindergarten, Guangxi, Nanning,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focuses on Lu Di's major works like "Beautiful South", "Waterfall", and "Old Friend" to explore their practical significance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Through text - reading and literary geography theories, it analyzes the enlightening value of his works from four dimensions: ideal beliefs, native writing, human exploration, and creative concepts for contemporary youth's spiritual shaping, cultural identity strengthening, human morality concern, and literary creation development. The study finds that his works' firm ideal beliefs, strong native feelings, profound human insights, and "true feeling writing" principle offer important literary reference and spiritual resources for solving contemporary social problems such as spiritual confusion, broken cultural roots, and moral anomie. This research aims to expand Lu Di studies, break stereotypes, and explore the eternal value and universal human care in his works beyond the specific era.

**Keywords:** "Lu Di" "Realism" "Beautiful South" "Waterfall" "Contemporary Value"

## 《文选》中《楚辞》篇目的入选依据探赜

张智涵 田子扬

(云南大学, 云南 昆明 650032)

**摘要:** 作为中国现存的编选的第一部文学总集,《文选》不可不谓为后世的文学选本树立了典范,甚至发展出了一门新的学问——选学。昭明太子萧统及其文人集团对周至六朝之间的文学作品进行选择,最终将七百余首作品按照文体进行分类,编选成了《文选》,而在对作品进行选择时,萧统也有较为统一的分类依据,所以《文选》存在楚辞类篇目入选而并未选全的情况。

**关键词:** 《文选》; 萧统; 《楚辞》; 选学

DOI: doi.org/10.70693/rwsk.v2i3.311

南朝梁时,昭明太子萧统对周至六朝之间的文学作品进行编选,成《昭明文选》凡六十卷,其中,楚辞类作品主要集中于第三十二、第三十三两卷,收录篇目的具体情况为第三十二卷:《离骚经》一首;《九歌》四首:《东皇太一》、《云中君》、《湘君》、《湘夫人》。第三十三卷:《九歌》二首:《少司命》、《山鬼》;《九章》一首:《涉江》;《卜居》一首;《渔父》一首(以上皆题名屈原作);《九辩》五首(未分篇);《招魂》一首(以上皆题名宋玉作);《招隐士》一首(题名淮南小山作)。总的来说,屈原作收录六种十首,宋玉作收录两种六首,淮南小山作收录一首,一共是九种一十七首。入选篇目之多,足以看出萧统对楚辞类作品的青睐,以及对《离骚》、《九辩》等富有代表性、极富个人面目的作品的独特观照,而《九歌》、《九章》中的个别篇目如《河伯》、《大司命》、《国殇》、《哀郢》、《抽思》等却未见入选。以下从三个方面分析楚辞类作品篇目入选而并未选全的原因。

### 一、楚辞类作品问世以来的经典化

任何文学作品被收录入选本,在此之前必定经过了自身的经典化,被人认识到了它的价值,以《离骚》为代表的楚辞类作品亦然。自问世以来,“屈宋诸作”不断被发掘,尤其是汉代以来,《离骚》等作品的价值被不断发现与赋予,其作品中包含的情志不断为人所接受,所以在战国到南朝梁这极长的历史时期中这些作品得以保存,萧统才有机会将其选入《文选》。

#### (一) 汉代楚辞的经典化

有汉一朝开国之君为楚人,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汉文化的基本走向。汉在文化方面对楚有极大的继承,汉初高祖有《大风歌》,其辞曰:“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sup>[1]</sup>明显可以看出楚歌的风味。《史记》当中有“会邑子严助贵幸,荐买臣,召见,说《春秋》,言《楚词》,帝甚说之,拜买臣为中大夫,与严助俱侍中”<sup>[2]</sup>的记载,这段话本身载有两个重要信息:一,据熊良智先生考证,这段记载是现存最早出现“楚词”二字的资料<sup>[3]</sup>,说明在汉武帝前,以屈赋为代表的作品就已经形成了一个较为粗糙的选本;二,统治者(汉武帝)本人也雅好屈骚,关于这一点,还有其他材料可以证明,班固《离骚序》曰:“昔在孝武,博览古文,淮南王安《叙离骚传》”<sup>[4]</sup>,又刘勰《文心雕龙·辨骚》:“昔汉武爱《骚》,而淮南作《传》”<sup>[5]</sup>,都说明汉武帝对楚地文学的偏好。

**作者简介:** 张智涵(2004—),男,云南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在读,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古代美学;

田子扬(2004—),男,云南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在读,主要研究方向为比较诗学、日本文学。

**通讯作者:** 张智涵

从文献角度看,在东汉,《楚辞》这一作品集被正式辑录出来并且流传于后世,今本洪兴祖《楚辞补注》题为“汉护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臣刘向集,后汉校书郎臣王逸章句”<sup>[6]</sup>,正是由刘向所辑,刘向在楚辞学的功劳还不止于此,班固《汉书》“十志”之中有《艺文志》,这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古典书录,而《艺文志》整体袭刘歆《七略》,《七略》又是据其父向之《别录》而来,《艺文志》之中有诗赋略,下有“屈原赋”之属,故有理由认为刘向从目录学的角度将屈赋记录下来。

从经学的角度来看,王逸《楚辞章句》题名为“离骚经”,在原有的“离骚”后增“经”字。经者,法也。而关于其称“经”具体是在汉代的何时,李大明先生已经总结了六种说法<sup>[7]</sup>。值得再思考的是,汉是经学大盛的时代,经学在汉代也经历了今、古文经学的变迁,所以《离骚》之成为“经”,必然是一个动态的而非固态的过程。冯良方先生分西汉中期“萌而未明”、西汉后期可能正式称“经”、东汉前期称“经”之反动、东汉后期称“经”之完全系统化四个时段来讨论<sup>[8]</sup>,而《离骚》“兼好色不淫、怨排不乱,与日月争光可也”,所以从经学的角度也较容易理解其经典化。

## (二) 汉末魏晋以来《楚辞》地位的抬升

有汉以来,人们对《楚辞》的认识不断加深,《楚辞》的地位也不断抬升,《汉书·王褒传》有“宣帝时修武帝故事,讲论六艺群书,博尽奇异之好,征能为《楚辞》九江被公,召见诵读”<sup>[9]</sup>的记载;至东汉,刘向集《楚辞》,王逸述《章句》,这在楚辞学史上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自此以后,王逸的《章句》影响愈广,地位愈高,逐渐取代当时流行的其他本子,一家独大,所以今人得见的汉代《楚辞》注本只有刘向集、王逸章句的十七卷定本,其他都已亡佚。自此以后,学者研究《楚辞》就走上了标准化的道路。

魏晋以来,社会巨变,鸿都门学兴起,这一时期迎来了中国文学史上的所谓“文学自觉”的时代,鲁迅先生在其《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讲到“他(曹丕)说诗赋不必寓教训,反对当时那些寓训勉于诗赋的见解,用近代的文学眼光看来,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sup>[10]</sup>。文学逐渐从经学之中剥离,不再成为经学的附庸,故自魏晋始,文人谈《离骚》,不必完全再从“经”或“不经”谈起。学者更倾向于从《楚辞》作品本身去谈论其价值。

魏晋以及六朝时期的学者从广域视角对《楚辞》进行了文体之辨,在此之前,“赋”与“骚”界限不明,常常混淆,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乃作怀沙之赋”<sup>[2]</sup>;又其《报任安书》“屈原放逐,乃赋《离骚》……”<sup>[11]</sup>;《汉书·贾谊传》“谊既以谪去,意不自得,及渡湘水,为赋以吊屈原。屈原,楚贤臣也,被谗放逐,作《离骚赋》……”<sup>[9]</sup>,又班固《汉书·艺文志》“诗赋略”下有“屈原赋”之属,这些都说明直到东汉,学人将“骚”与“赋”仍然视作一体。魏晋诸人对于各类文体所应当具有的特征都有相应的论述,曹丕《典论·论文》曰:“夫文本同而未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sup>[12]</sup>晋陆机《文赋》云:“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凄怆。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颂优游以彬蔚,论精微而朗畅。奏平徹以闲雅,说炜晔而譎诳……”<sup>[12]</sup>,都说明当时文人对不同文体所承载的内容与情感有了一定的认知,但是其人明显还是未区分汉人所作之赋与屈宋所作之骚的区别,至南朝梁时,刘勰文心雕龙站在文学的发展史上,对“骚”与“赋”进行了源流上的考辨。

《文心雕龙·诠赋》云:“及灵均唱《骚》,始广声貌。然则赋也者,受命于诗人,而拓宇于《楚辞》也。”<sup>[5]</sup>其认为“赋”之名出于《诗经》之“六义”,重视文辞之典丽富美,通过“铺采摘文”来“体物写志”,虽然在这个层面同于《诗经》“赋”之“铺也”,但其是由于沿着《楚辞》的路子才得以发扬光大,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楚辞》才是赋体的正源。在此之前,以班固等为代表的学者多认为“赋者,古诗之流也”<sup>[9]</sup>,而刘勰以《楚辞》为赋体之源流,将其地位大大抬高,足以说明其对《楚辞》的重视。又《文心雕龙·序志》云:“盖《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文之枢纽,亦云极矣。”<sup>[5]</sup>将《楚辞》列为“枢纽”之一,以《原道》、《征圣》、《宗经》为一组,阐释执正之理,《正纬》、《辨骚》阐述馥奇之理,合起来构成执正馥奇的观点<sup>[5]</sup>,着重强调了《楚辞》相较于《诗经》变多于复的创新性,与纬书类似,是正统之外的一朵奇葩,《文心雕龙·辨骚》篇开头就说:“自《风》、《雅》寝声,莫或抽绪,奇文郁起,其《离骚》哉!”<sup>[5]</sup>是楚人多才,金相玉质,在文学史上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 (三) 《昭明文选》独列“骚”类

按《昭明文选》之体例,第一类为赋,其次是诗,接下来便是骚,不可不曰对《楚辞》有独特的观照。刘师培《论文杂记》曰“观班《志》之分析诗赋,可以知诗歌之体,与赋不同,而骚体则同于赋体。至《文选》析赋、骚为二,则与班《志》之义迥殊矣。”<sup>[13]</sup>在刘师培先生看来,刘勰的《文心雕龙》虽然将“骚”与“赋”作了源流上的考辨,但是真正将“骚”与“赋”分开,是《昭明文选》开其先河,这一说法较为妥当。而关于昭明

太子萧统为何要将“骚”独立出来，应当是受到前人的影响。《梁书·刘勰传》云：“昭明太子好文学，深爱接之”<sup>[14]</sup>，可见刘勰与萧统有过交往并且萧统对刘勰的文学观点有所接纳，故有学者以为萧统《文选》将“骚”单独列为一类当是受到刘勰的影响<sup>[15]</sup>；又傅刚先生通过对比任昉《文章缘起》与《文选》具体的文体分类，发现从著录的文体名称上看，《文章缘起》同于《文选》及《文选序》的多达五十七种，<sup>[16]</sup>这应该不是简单的巧合，任昉作为萧统文学集团中最重要的成员之一，自然会对萧统造成巨大的影响。

## 二、昭明太子的文学观念

萧统《答湘东王求文集及〈诗苑英华〉书》里面提到：“夫典则累野，丽亦伤浮。能丽而不浮，典而不野，文质彬彬，有君子之致”，<sup>[17]</sup>据此，我们可以推知昭明太子大致的文学观念。“典”，即行文太过质实，没有文采，萧统以为，文章如果毫无修饰则会流于粗野，太过华丽又会伤于浮艳，真正好的文章就如同孔子所云，同时注重内质于外在，有君子的风致。昭明太子在进行篇章选择时也有意从“典”与“丽”两方面去进行选择。

### （一）“事出于沈思，义归乎翰藻”的总标准

《文选序》一文集中体现了昭明太子萧统编纂《文选》的标准，其中萧统提到：

若其赞论之综辑辞采，序述之错比文华，事出于深思，义归乎翰藻，故与夫篇什杂而集之。远自周室，迄于圣代，都为三十卷，名曰《文选》云耳。<sup>[18]</sup>

根据这段话，我们可以总结出“事出于沈思，义归乎翰藻”的编纂总标准。“沈思”强调思想性，“翰藻”强调文学性，清代学者阮元据这句话进行了发挥：

昭明所选名之曰“文”盖必文而后选也非文则不选也。经也，子也，史也，皆不可专名之为文也。故昭明《文选序》后三段特明其不选之故，必“沈思”“翰藻”，始名之为“文”，始以入选也。<sup>[19]</sup>

既然题名“文选”，其选篇必然与要符合昭明太子所认为的“文”，前文提到，汉人重“骚”，往往是因为其认为《楚辞》在申述形式上“独依诗人之义而作《离骚》，上以讽谏，下以自慰”，同于《诗经》“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的风教形式，而在情感内质上，屈原之忠爱沉郁也与儒家的经义相符，所以“依经论骚”的观念将《楚辞》与经学紧密联系在一起。《文选》选入《离骚》诸篇，萧统明显不是从“经”的角度来理解楚骚。《文选序》单独有一段称赞屈原的话：“又楚人屈原，含忠履洁，君匪从流，臣进逆耳，深思远虑，遂放湘南。耿介之意既伤，壹郁之怀靡诉。临渊有怀沙之志，吟泽有憔悴之容。骚人之文，自兹而作。”<sup>[18]</sup>萧统称赞屈原诸作皆产生于耿介忠直之心，由于谏君不听，疏而不用，放于湘南，只能深思熟虑，将自己的拳拳忠心与郁邑之忧通过文字勉强排除。

《离骚》全文近三千字，先叙祖父之煊赫，自己更是“内美”而又重“修能”，其目的正是要继承“三后之纯粹”，“及前王之踵武”！未曾想楚国的庙堂已经尽是权奸沉湎一气，众芳芜秽，不厌求索，不仅如此，群小还到君王面前中伤他人，导致屈原被疏远。经过一系列的“陈词”过后，屈原开始了其“三次飞升”，在“飞升”过程中，分别求“宓妃”、“有娥之佚女”、“有虞之二姚”而皆不得，在面对“去”与“留”时，屈原又命占于灵氛，求问于巫咸，得到相同的结果后，屈原最终决意离开，“驾八龙之婉婉兮，载云旗之委蛇”。在一切准备停当，即将发轫之际，忽然“临睨夫旧乡”，楚国曾经的一切都是那么难以割舍，故最终屈原决定“吾将从彭咸之所居”。借助浪漫奇特的想象外衣抒发忧君爱国之思，司马迁称赞曰：“其存君兴国，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沉思翰藻，可谓兼之矣，故钱穆先生认为，纯文学作品当自屈子《离骚》始<sup>[20]</sup>。而从《文选》所收录的所有作品来看，屈赋是《文选》中绝少的作于战国的作品，说明萧统对“金相玉质，百世难匹”的《楚辞》的偏爱。

### （二）符合“篇什”的体制

除了“事出于沈思，义归乎翰藻”这一总标准之外，萧统《文选序》中还提到了其在选文体制上的要求：“故与夫篇什杂而集之”，如果非独立成篇、有连续性的文本，则不入选。这一标准主要针对史部文献而言，《文选序》云：

所谓坐狙丘，议稷下，仲连之却秦军，食其之下齐国，留侯之发八难，曲逆之吐六奇，盖乃事美一时，语流千载，概见坟籍，旁出于史。若斯之流，又亦繁博。虽传之简牍，而事异篇章，今之所集，亦所不取。<sup>[18]</sup>

史部文献之中如《史记》者，虽然也是“发愤沉思”，融入了太史公的思想，语言上“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sup>[9]</sup>，但是由于其体量庞大，创作时多使用“互见法”，如在描写项羽时，《项羽本纪》主要突

出了项羽的年轻气盛、英勇慷慨，其自刎乌江的结局令人唏嘘；而在《高祖本纪》中写项羽的鲁莽残暴，两篇需要对看才能较为全面地认识项羽。史传不易拆分，且其本身已经合为集，如果再进行选择，恐有重复之嫌，故不选之。

而以屈骚等作品并非一问世就有《楚辞》的集子，直到西汉前期，屈骚仍然多以单篇流行于世，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在评述时亦云：“太史公曰：‘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其所例举，皆单篇作品，独不云“余读《楚辞》……”<sup>[2]</sup>，说明直到司马迁的时代，仍然没有一个众人都接受的《楚辞》选本。不独《楚辞》一种，其他诸子著作在前汉亦多以篇行，《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云庄周“作《渔父》、《盗跖》、《胠箧》，以诋訛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韩非子“作《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十馀万言……”<sup>[2]</sup>而这些集子的辑录，大多要归功于刘向刘歆父子<sup>[21]</sup>。

《楚辞》中即使如《九章》者，也还需要分成九个独立的篇章看待，每篇的抒情都有其侧重点，并不能一概而论之，刘勰《文心雕龙·辨骚》对《楚辞》中的主要作品风艺术特征进行了总结：“故《骚经》、《九章》，朗丽以哀志；《九歌》、《九辩》，绮靡以伤情；《远游》、《天问》，瑰诡而慧巧；《招魂》、《大招》，耀艳而深华；《卜居》标放言之致，《渔父》寄独往之才。故能气往辄古，辞来切今，惊采绝艳，难与并能矣。”<sup>[5]</sup>《文选》骚类所选全部篇目为《离骚经》、《九歌》、《九章》、《卜居》、《渔父》、《九辩》、《招魂》、《招隐士》，除了《远游》、《天问》、《招隐士》外，其他皆同，笔者认为，萧统编选《文选》骚类，当是对刘勰《文心雕龙·辨骚》有所参考。刘勰已经提到，《离骚》与《九章》在艺术特色上具有相似的风格，《文选》仅选入《九章》中的《涉江》一章，这或许与刘勰的观点有关联。

### （三）“并为入耳之娱”，“俱为悦目之玩”的接受视角

读者对于作品的接受也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有汉以来，不同的人对文学都有不同的接受视角，《诗大序》认为“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从实用主义的观点放大文学的风教功用，其把补察时政，泄导民情当作文学最大的功能；扬雄认为“诗赋小道，壮夫不为”<sup>[22]</sup>，尊经而抑文，同意“作文害道”，将诗赋视作无用之物；曹丕认为“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努力抬升文学的地位，意欲尽力排除经学的影响，并将文学与经学相等而观。萧统也有自己的接受视角，《文选序》云：

譬陶匏异器，并为入耳之娱；黼黻不同，俱为悦目之玩。作者之致，盖云备矣！余监抚余闲，居多暇日。历观文囿，泛览辞林，未尝不心游目想，移晷忘倦。自姬汉以来，眇焉悠邈。时更七代，数逾千祀。词人才子，则名溢于缥囊；飞文染翰，则卷盈乎绡帙。<sup>[18]</sup>

萧统认为，陶匏诸器不同的乐器与黼黻等不同的文彩，目的都是为了听觉以及视觉上的愉悦，文章之道亦然，作文的目的是让人在闲暇之余“心游目想，移晷忘倦”，得到心灵上的放松与审美上的愉悦，这一条主要针对经部和子部文献。《文选序》对于不选的理由也有更为具体的论述：“若夫姬公之籍，孔父之书，与日月俱悬，鬼神争奥，孝敬之准式，人伦之师友，岂可重以芟夷，加之剪裁？老、庄之作，管、孟之流，盖以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今之所撰，又以略诸。”<sup>[5]</sup>针对诸经，萧统给出的理由是经者，常也，法也，能够同日月争光，可以规范约束人的行为，一字不可删改，由是而不选。前面引清人阮元语，萧统之名《文选》，即非文不选之意。今人常将“诗骚”合称，将二者皆视作诗体，而萧统云：“诗者，盖志之所之也。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关雎》《麟趾》，正始之道著；桑间濮上，亡国之音表。故风雅之道，粲然可观。”<sup>[5]</sup>与其说萧统将《诗经》看作文学，不如说将其视作指导文学的纲领。而子部不选的原因也十分清楚，老庄、申韩、管孟诸家，其著书的目的并不在于“心游目想，移晷忘倦”，而是在于申述自家的学说。日本学者藤野岩友在谈《楚辞》之意义时曾经提到，春秋战国时期是散文全盛的时代，北方诸国绝多散文，惟南方楚地屈子一家主韵体诗谣<sup>[23]</sup>。春秋战国是“道术将为天下裂，百家闻其风而说之”的时期，诸家为了光大己学，自然不可能用宜于抒情的韵文诗体娓娓道来，而是要选择最能够切中肯綮切中要害，且词气激烈夺人眼目的散文体来进行写作。诸子散文之中虽然有庄周之奇诡超玄，韩非之肯慎缜密，可谓沉思而备瀚藻，且其在最初也是以独立篇章流行，但是其作皆有一定的政治目的，故不之选。

### 三、《楚辞》篇目入选具体依据分析

前文已说，《文选》骚类所选全部篇目为《离骚经》、《九歌》、《九章》、《卜居》、《渔父》、《九辩》、《招魂》、《招隐士》，其与刘勰《文心雕龙·辨骚》所引除《远游》、《天问》、《招隐士》三章不同外，

其余皆同，故萧统编选《文选》骚类，当对刘勰《文心雕龙·辨骚》有所参考，但这并不是唯一的依据。以下作者将从多个方面分析论证之。

### （一）屈原诸作入选依据

胡刻本《文选》骚类题名屈原作者有：第三十二卷：《离骚经》一首；《九歌》四首：《东皇太一》、《云中君》、《湘君》、《湘夫人》。第三十三卷：《九歌》二首：《少司命》、《山鬼》；《九章》一首：《涉江》；《卜居》一首；《渔父》一首。《离骚》之入选自然是当仁不让，毫无异议，值得注意的是，《文选》选入《离骚》，依旧从王逸《楚辞章句》在“离骚”后加以“经”字，萧统当然不认为《离骚》是“经”，而仍留“经”字的原因除了保存作品原貌，尽量不加以删改的考量外，恐怕更是将《离骚》当作统率骚类的纲领。

《九章》仅录入《涉江》一篇，《九章》九篇在内容上并无明显的联系，甚至是在西汉时可能还无“九章”之名，因为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引屈作时言“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独列《哀郢》而说不《九章》，关于这一点前人已经有了较为完备的论述<sup>[1]</sup>。《涉江》之所以能够入选，或是与其旨趣有关，不少研究楚辞的学者认为《九章》之中，《涉江》成就最高，因为其最能够接续《离骚》的踵武<sup>[24]</sup>。《涉江》之一开始也是从自己写起，美己之德，后因遭谗放逐，有大量表露内心的文字，到末尾，又有了“怀信侘傺，忽乎吾将行兮”的感叹，这一句正与《离骚》“吾将从彭咸之所居”同。《九歌》十一章入选六章，萧统或是考虑到代表性的问题，东皇太一是楚国的至高神，在中原地区此神希见，故选之；而《湘君》、《湘夫人》也是因为独具湘楚特色而被选入；至于《国殇》、《礼魂》、《河伯》诸篇，要么是重祭礼而轻文学，要么是不具备代表性且有重复之嫌，故未之选。《卜居》、《渔父》，集中体现了屈子去留的纠结，对后世影响深远，故亦选之。

### （二）屈后诸作入选依据

屈原之后，有宋玉《九辩》五首（未分篇）与《招魂》一首；淮南小山《招隐士》一首。宋玉是一般认为的第一位接续屈原踵武、发扬楚骚的作家，《九辩》被认为是宋玉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人多以之与《离骚》对看，宋玉在《离骚》的基础上又进行了新的发挥，形成了个人面目。《离骚》重在写谏君不听反放逐的忧思与去留的盘桓，而《九辩》重在发“坎廪兮贫士”之幽愤，其中“悼余生之不时兮，逢此世之傴僂”之语，开有汉贾谊、相如之先河，对汉代骚体赋的形成与成熟影响深远。《招魂》“耀艳深华”，清刘熙载《艺概》论曰“枚乘《七发》出于宋玉《招魂》”<sup>[25]</sup>，《招魂》铺张扬厉，极力渲染四方之恶与楚国饮食、宫殿、歌舞之美，《七发》则“说七事以起发太子也”，两者结构、内容等诸多方面皆有相似之处，对后世大赋“体国经野，义尚光大”影响深远，故亦选之。

另外，屈骚“后语”之中，除宋玉一人之外，还选入淮南小山《招隐士》一篇。王逸《楚辞章句》除此篇以外，汉人所作另有东方朔《七谏》、严忌《哀时命》、王褒《九怀》等，皆不选。原因可能在于他人之作，皆托屈原《离骚》之体而拟之，借其事以抒己之邑郁。而《招隐士》一篇不同，其写作虽亦皆骚体，却通篇无哀怨狭仄之气，刚健宏博，是欲表达出其吐握之诚将隐士招徕。另外，《招隐士》虽为淮南小山所作，按其语气，表达的应当是淮南王安的心思，刘安及围绕其形成的“淮南学派”是汉初重要文学集团之一，淮南雅好文学，《文选》的编纂者萧统亦然，昭明太子录入此篇，或许还有欣赏淮南王学术与思想的意味在其中。

文选是中国古代文献传播与艺术批评的重要方式，体现出了选人的文学观念，昭明太子“丽而不浮，典而不野”的观点影响了其对周以来文学作品的选择，“骚”在《文选》之中独列一类体现出了萧统对楚辞的重视，这不仅是由于汉代以来楚辞经典化，而且也在于楚辞情志与萧统内心的契合。在《文选》的时代，人多以《诗经》与《楚辞》并提，钟嵘《诗品》言：“夫四言文约意广，取效风骚，便可多得”，“诗骚”合称渐为人所熟知，成为了中国文艺的重要传统之一。

### 参考文献：

- [1] (宋)朱熹著、黄灵庚点校：《楚辞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
- [2] (汉)司马迁著、(南朝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史记》，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版。
- [3] 熊良智：《楚辞成书与经典建构》，发表于《智慧中国》2021年第11期。
- [4] (汉)王逸著、黄灵庚点校：《楚辞章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

- [5] (南朝梁) 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 [6] (宋) 洪兴祖补注、黄灵庚点校:《楚辞补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
- [7] 李大明:《<离骚>称“经”时间新论》,载于《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二期。
- [8] 冯良方:《汉代<离骚>称“经”的四个演进阶段及其与经学的关系》载于《——二〇一七年云南昆明屈原与楚辞学国际学术讨论会暨中国屈原学会第十七届年会论文集》,2017年。
- [9] (汉) 班固撰、(唐) 颜师古注:《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
- [10] 鲁迅著、刘伟责编:《鲁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 [11] (清) 吴楚才、吴调侯编、钟基、李先银、王身刚译注:《古文观止》,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
- [12] 郭绍虞著:《中国历代文论选》(四卷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
- [13] 刘师培撰:《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
- [14] (唐) 姚思廉撰:《梁书》,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版。
- [15] 曹道衡:《萧统的文学观和<文选>》,载于《文学遗产》,2004年第四期。
- [16] 傅刚著:《<昭明文选>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 [17] (清) 严可均撰:《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版。
- [18] (南朝梁) 萧统著、(唐) 李善注:《文选》,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据胡克家本影印。
- [19] (清) 阮元著、万仕国、卢嫔点校:《阮元集》,扬州:广陵书社,2021年版。
- [20] 钱穆著:《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版。
- [21] 王欣夫述:《文献学讲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 [22] 孙过庭《书谱》引扬雄语,上海书画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室编:《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版。
- [23][日]藤野岩友著、韩基国编译:《巫系文学论——以<楚辞>为中心》,重庆:重庆出版社,2005年版。
- [24] 陆侃如著:《屈原与宋玉》,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 [25] (清) 刘熙载著、袁津琥注:《艺概》,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

## Analysis of the selection basis of ' Chuci ' in ' Wenxuan '

Zhang Zhihan, Tian Ziyang

(Yunnan University, Kunming, Yunnan)

**Abstract:**As China 's existing compilation of the first literary anthology, " Wenxuan " can not be said to set a model for future generations of literary anthologies, and even developed a new knowledge-choosing. Zhaoming Prince Xiao Tong and his literati group chose literary works between the Zhou Dynasty and the Six Dynasties.Finally, more than 700 works were classified according to style and compiled into ' anthology '.When choosing works, Xiao Tong also had a more unified classification basis. Therefore, there was a situation in which Chu Ci articles were selected but not selected.

**Keywords:**'Anthology ' ; xiao Tong ; 'Chuci ' ; Selection of learning

# 模拟、挪用与超越：霍米巴巴理论下《小小小小的火》中的母性抗争

张莹凡<sup>1</sup>

(1.四川外国语大学 英语学院, 重庆 400031)

**摘要:**以霍米·巴巴后殖民理论的混杂性为核心,基于伍绮诗小说《小小小小的火》中华裔底层单亲母亲贝比与艺术家单亲母亲米娅两位少数族裔女性的抗争实践,结合性别-母职维度总结出二者模拟-挪用-抵抗和解构二元对立-建立第三空间的抵抗范式,构建少数族裔单亲母亲抗争策略谱系,完整呈现少数族裔女性在种族-母职双重压迫下的抗争逻辑演进,旨在论证少数族裔单亲母亲可将母职转化为抵抗结构性压迫的策略资源,确立文化身份。

**关键词:**后殖民;《小小小小的火》;少数族裔女性;抵抗范式;母职抵抗

**基金项目:**项目来源“混杂、协商与抵抗:后殖民理论视域下《小小小小的火》中华裔移民女性的主体性建构”(SISU2025YZ105)

DOI: doi.org/10.70693/rwsk.v2i3.315

## 一、引言

在美国华裔文学谱系中,少数族裔女性反抗形象层出不穷,如谭恩美《喜福会》、汤亭亭《女勇士》、任璧莲《典型的美国佬》中在主流社会中面临文化与制度的排斥,又在性别权力结构中承受规训与支配的角色,但是为获取经济独立、重获身体自主权,她们通过协商,在主流规则与本土文化间寻找平衡,既不彻底割裂文化根脉,也不盲目臣服于主流标准,最终形成杂糅性的生存姿态。伍绮诗的《小小小小的火》更是将少数族裔女性的双重困境与日常反抗推向更具现实张力的维度。贝比,作为华裔底层单亲母亲,米娅,族裔不详,被主流社会视为不合格母亲,两人都因身份困境而时刻面临失去女儿的风险。而她们的反抗,恰是对谭恩美、汤亭亭等作家笔下反抗形态的继承与升级。

《小小小小的火》的相关国内外研究,多集中于母性、阶级议题,而缺乏以后殖民混杂性理论为核心框架的深度解读。当前国内学界对霍米·巴巴理论的应用与研究多围绕第三空间、混杂性与文化身份展开,探讨后殖民与全球化语境下小说人物的文化身份认同、身份建构及身份杂糅问题。然而,研究模式多以先引入第三空间或混杂性概念,再分析作品人物在相关框架下的身份协商与文化杂合过程,相对忽视其作为动态、积极的生存与反抗策略的实践过程。在此研究语境下,本文将摒弃身份状态的研究,聚焦于反抗策略的范式研究,通过模拟、挪用、超越三个动态环节,清晰呈现混杂性在微观层面被个体实践为具体抗争战术的过程。

## 二、米娅的“模拟-挪用-超越”抵抗范式

对于米娅而言,母职的本质是为孩子创造更好的发展可能,当流浪生活与这一目标冲突时,她选择暂时走进主流规训场域,不是认同其价值观,而是将其视为解决珀尔成长问题的必要空间,这种转向充满母职特有的牺牲与理性,源于对珀尔成长需求的清醒认知,米娅暂时放下对主流社区的排斥,主动融入主流文化社区,以母职责任为核心,重构其“模拟-挪用-超越”策略的实践形态,守护女儿珀尔的成长自主权,捍卫少数族裔单亲母亲的母职合法性(王芳,2023:107)。

首先,米娅的“模拟”<sup>2</sup>是一种以策略性妥协换取母职实践空间的保护性行为。作为身处种族、阶层与性别多

**作者简介:**张莹凡(2001—),女,在读硕士,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

<sup>2</sup> 模拟指被殖民者对殖民者文化、行为、话语的学习和重复。但这种模拟并非完全复制,微妙的差异本身就构成了对殖民权威的威胁和嘲弄,是杂交性策略的具体表现之一(巴巴,1994:122)。

重边缘的单身母亲，米娅进入西克尔高地后，面对理查德森家提供的管家工作，米娅以“谢谢你，你真是太慷慨了，我怎么好意思拒绝呢？”（伍绮诗，2018：115）作为回应，以保护女儿珀尔；刻意将公寓空间改造为“日光黄”的厨房、“深香瓜色”的起居室、“蜜桃粉色”的卧室，最终打造出“装满阳光的大箱子”（伍绮诗，2018：132）此时的模拟，是米娅作为母亲的保护性协商：她暂藏对主流母职规训的质疑，确保不被驱逐。实际上，她从不要珀尔迎合社区的完美标准，当珀尔与理查德森家孩子交往时，米娅始终提醒她保持独立思考，避免珀尔被物质至上、循规蹈矩的价值观影响；她坚持用艺术陪伴珀尔，哪怕在西克尔高地的忙碌生活中，仍会带女儿观察生活、创作作品，传递艺术真谛。她没有因驻留而放弃流动的生活底色，而是时刻准备发动停在路边的大众车，随时离开，这些模拟背后的差异揭示白人社区标准母职的话语，暗讽其虚伪性。

其次，米娅的“挪用”<sup>3</sup>体现为借助主流规则与工具，反向解构其母职规训，并传递自身的母职理念。她擅于将旧物重组为艺术品，通过摄影与装置创作挑战中产阶层的审美与价值标准。艺术创作是米娅进行符号挪用和意义重构的主要方式。米娅擅长将旧家具等别人眼中的破烂拆解并重组为全新的艺术品，攫取现有的文化材料（符号），通过打破其原有的语境和逻辑（拆解），注入新的叙事和生命（重组）。离开时为理查德森一家制作的肖像系列并非简单地复制完美表象，而是通过加入裂开的护胸中发芽的种子、振翅欲飞的纸鹤等元素，实质是用艺术工具解构白人中产标准母职的规训逻辑，使得理查德森家规训下的个体开始反思自身的处境。这些照片挪用了家庭肖像这一传统符号，却将其转化为映照内部裂痕与生命力的镜子，证明主流母职标准下隐藏的压抑与伪装，间接捍卫自己母职方式的合法性；同时，在人际互动层面，米娅向伊奇传递挣脱规训的母职理念，指导伊奇打破束缚，为莱克茜提供流产后的庇护并坚守秘密，让理查德森的子女质疑主流母职标准的合理性，揭露主流母职规训对女性的压迫，强化自己母职应包容而非压抑的主张。米娅的主动挪用让她在适应社区规则的同时，始终坚守自身的抗争立场，避免被主流同化，米娅对于母职的定义影响了贝比，使其找回抵抗的勇气，甚至直接导致白人小女儿伊奇的纵火反抗行为。米娅的母职抗争从个人坚守升级为话语传播，让少数族裔的母职逻辑获得被看见、被认可的可能。

最终，米娅通过“超越”<sup>4</sup>彻底摆脱了主流对母职的垄断性定义，确立了流动且自主的母职形态，实现母职中的主体性。她带着珀尔“辗转四十六处城镇”，将个人物品压缩至“仅能装满一辆大众车”（伍绮诗，2018：145），这种持续流散的生活，是对主流标准母职的直接超越。她用珀尔的健康成长证明，母职的核心是情感联结与自主引导，而非物质条件的固化；离开西克尔高地时，米娅选择将艺术作品留在出租屋，而非带走，再次用艺术作品嘲讽标准母职，彻底讽刺了白人一家的虚伪，以及他们被掩盖起来的被压抑的自我。她不再需要通过模拟、挪用策略获得母职合法性，而是以流动却坚定的母职实践，为少数族裔女性示范了母职可自主定义的可能。从策略性的“模拟”到创造性的“挪用”，再到根本性的“超越”，米娅的母职实践完成了一个完整的辩证循环。她以走进主流为起点，却以更坚定地走出为终点。这不是简单的回归，而是一种螺旋式的上升。她带着从主流领域中淬炼出的清醒与力量，重新回归流动的生活，但此时的“超越”已不再是当初单纯的个人反抗，而是背负着对母职更深的理解与更强的守护能力。她的旅程，最终形成了一个以母职为内核、从抗争出发并回归更高层次抗争的圆满闭环。

### 三、贝比的“二元解构与超越”抵抗范式

性别-母职的压迫形态，在贝比的母性抗争实践中核心体现为种族压迫与母职规训的深度叠加——第一世界女性通过垄断母亲职责的定义权系统性地第三世界女性的母职实践边缘化（金莉，2024：101）。在司法场域中，以第一世界权力逻辑为核心的审判主体，将贝比的产后抑郁、底层收入与短暂弃婴行为，单向度转化为失职母职的定罪依据的行为既无视种族与阶级叠加下，贝比作为华裔移民在医疗资源获取、就业机会、社会支持上的系统性匮乏，更以居高临下的规训姿态，将第一世界白人中产的母职标准作为唯一合法标尺，否定贝比基于族群文化与情感联结的母职实践合法性（王妮，2020：50）。最终，这场审判无异于一场第一世界权力通过司法机制对第三世界女性实施的主体性剥夺：一方面以定罪的形式，将贝比标签化为不合格母亲，消解其母职主张的正当性；另一方面以夺权的结果，剥夺其对亲生女儿的抚养权，实质是将第三世界女性的母职权利纳入第一世界的规训框架，完成跨种族、跨阶级性别压迫的制度性落地（王元江，2023：52）。起初，贝比因第三世界女性的种族、阶级弱势，被迫陷入第一世界规训，文化迷失状态让其混杂性实践虽处于被动阶段。她曾“跟着爱人从旧金山搬到克利夫兰”，却在爱人消失后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没人说中文”“找不到工作”“没人帮我看孩子”（伍绮诗，2018：190），在美国举目无亲的贝比最终患上产后抑郁，将孩子遗弃在消防站。她尝试配合司法系统的探视规则、以乞求式的方式争取与孩子的联结，本质是对第一世界标准母职的顺从。潜藏的母职动力让她始终保留着对不公的觉察：“我先给她打电话了，可她马上就挂了；再打，接起来又挂断”（伍绮诗，2018：256）的委屈倾诉，“我是孩子的亲生母亲，他们这样监视我，是怕我会对孩子不利吗，”（伍绮诗，2018：258）基于贝比地理与文化的双

<sup>3</sup> 挪用是从被言说到自我言说的关键转折，是创造性反抗的核心。挪用并重写白人社区的支配性符号，使其脱离原霸权语境并生成新意义，从而在拒绝臣服于主流规训的同时，为自身争取文化存在的合法性（巴巴，1994：112）。

<sup>4</sup> 超越是当文化边缘主体在既定结构内协商达到极限时，从根本上挑战乃至超越原有体系的逻辑，在二元对立的夹缝中开辟出属于主体的、哪怕是短暂或流动的“第三空间”（巴巴，1990：210-211）。

重漂泊，控方律师在法庭上强调孩子需要稳定的成长环境，却刻意将稳定与白人中产生活方式划上等号。贝比在第一世界的母职规训下陷入自我否定，认为自己底层、移民的身份确实不配为母，甚至默认司法系统的判决。

而贝比的抵抗，不同于米娅的模拟-挪用-超越模板，而是打破二元对立-建立第三空间的过程。母职既是她挣脱文化迷失确立主体性的核心锚点，也为她的混杂性策略提供了从被动适应到主动突破的行动内核，二者在不同抗争阶段呈现出递进式的共生关系。让贝比的母职动力从潜在转向显性的，是米娅“这些人为什么要把孩子从母亲那里夺走呢？”“仿佛有人拿刀片割开她的身体，把里面的血肉翻搅出来”，“斗志昂扬，仿佛连鼻孔里都燃烧着火焰”（伍绮诗，2018：258）话语中传递的母职正义。这一解构二元对立的话语以第三世界女性的视角撕开了第一世界公平合法叙事的裂缝。米娅的介入她促使贝比意识到，赢得官司的核心不仅在于夺回女儿美玲，更在于确证自身文化身份与母职实践的合理性与正当性。在米娅的影响下，贝比完成了从被动承受到能动协商的主体性蜕变。其反抗姿态的演变清晰可见：从最初面对警察驱逐与麦卡洛夫夫妇拒绝时，只能表现为无力乞求或沉默退让；到后来，她低声告知米娅“观众们支持我”（伍绮诗，2018：258），此举标志着她已初步将自身置于公共舆论的协商场域中，尝试援引外部认同来强化自我主张。她开始有意识地借用第一世界的规训工具，服务第三世界的母职诉求，让混杂性从被动适应升级为主动抗争（刘月莹，2024：45-49）。她最初试图通过学习白人中产阶级的规则来寻求接纳，她主动学习英语通过法律援助聘请律师在法庭上努力用主流社会认可的方式陈述诉求甚至在探视女儿时精心准备符合中产审美的礼物。在每周仅两小时的监督探视中，她坚持以中文沟通。贝比坚持用中文名“美玲”称呼女儿，拒绝养父母取的英文名“米拉贝尔”（伍绮诗，2018：256），并在探视时用中文交流。然而，这些策略性适应最终在根深蒂固的结构性排斥面前宣告失败司法系统以其所谓理性标准将她的母职实践判定为不合格。当法警架着瘫软在地的贝比离开法庭，她口中发出的“尖锐恐怖的哀鸣”（伍绮诗，2018：256），为她最终潜入白人府邸抱走孩子埋下了伏笔。

#### 四、抵抗范式的归纳：曲线抗争

米娅和贝比二者的母职抗争实践证明，面对强大的主流结构和看似固化的规则，边缘者并非只有正面冲击或完全臣服两条路，还可以选择一种更为迂回、也更具创造性的曲线抗争。这种抗争路径不追求在既有规则内获胜，也不寻求直接的体制性推翻，而是通过模拟主流规则以获取必要的行动空间，挪用系统内的工具与话语以解构其权威，最终在局部实现关键性的突破与超越，从而在结构的缝隙中开辟出自洽的生存与抵抗领地。

米娅的曲线抗争，是一条以策略性周旋为特征的持久之路。她通过有策略的模拟，创造性的挪用，持续性的超越，以母职为不变的伦理锚点，以混杂性策略为柔性依托，在身份的流动与创作的实践中，始终坚守着不被规训的自我主体，坚定地确立自己的文化身份。她以流浪-创作为生存常态，通过空间流动与职业选择主动疏离主流时间逻辑与职场规训，拒绝将母职等同于固定居所与中产价值观。艺术创作方面，米娅没有固定的雇主，不接受商业订单的约束，只为自己信任的艺术家工作，并坚持自己的艺术创作。当为了女儿的成长暂时结束流浪生活，却面临理查德森夫人所代表的第一世界母职标准的质疑与驱逐时，她并未妥协，而是以“模拟-挪用-超越”的动态混杂策略，以实际行动挑战并重写白人主流社会对母职的狭隘定义，完成对结构性规训的持续性超越。

相较之下，贝比的抗争则呈现为一条从迷失到觉醒的激进曲线。从被定义的他者到自主的建构者，贝比的每一步行动，都暗合着对文化霸权的解构，最终在混杂性实践中，为第三世界女性的母职形态开辟出被单一标准束缚的第三空间。起初，主流/边缘的二元对立让贝比成为被第一世界牢牢捆绑为“失语者”，她不敢反抗，更不知道如何反抗。直到米娅那句“这些人为什么要把孩子从母亲那里夺走呢”的诘问（伍绮诗，2018：258），彻底激发了她的母爱，让她最终带走女儿。贝比最终带走女儿并从系统中消失的决绝行动，标志着母职动力与混杂性策略的深度融合达到顶点。母职推动她超越第一世界规训框架，创造混杂性新生存空间，在这个空间里，她的母职合法性无需依赖第一世界的制度认可，也无需被第三世界的传统框架束缚，完全以母亲与孩子的关系为核心定义。她带走女儿的行为，既不是对第三世界传统母职被动承受的回归，也不是对第一世界母职制度认可的妥协，而是自主争取权利，践行不被定义的母职。母职动力让贝比的抗争超越规训，走向主体性重构新形态；而混杂性则让母职动力摆脱了单一文化框架的限制，成为一种能在不同权力场域中灵活调适、却始终不丢失核心的抗争能量，最终完成从文化迷失到自主定义母职的蜕变。

米娅与贝比，一者以持久的韧性在结构中游刃并消解权力，一者以瞬间的决绝从结构中突围并彰显主权。米娅的持续性与贝比的瞬间性超越，并非高低之分，而是构成了边缘女性抗争的一体两面。米娅展示了如何在漫长的日常生活中与之周旋并保持自我；贝比则展示了当周旋的空间被彻底封死时，那玉石俱焚的终极一击所具有的震撼力量。二者虽在策略形态与实践节奏上截然不同，但均以母职为支点，打破了种族-阶级-性别交织的规训结构，确立了少数族裔单亲母亲定义自身生存方式的可能。二者共同构成后殖民混杂性理论下，边缘女性以母职作为抵抗资源、实现文化身份重构与社会承认的重要实践范例。她们的抗争共同证明：在正面战场之外，边缘者的力量正在于其灵活性与创造性，她们能在模拟与挪用之间找到支点，以不同的方式，同样完成对压迫性结构的超越与对自我的重塑。

#### 五、结论

在《小小小小的火》中，美国社会中两位少数族裔单亲母亲，华裔贝比与边缘人米娅，共同演绎了霍米·巴巴混杂性理论视域下，少数族裔女性殊途同归的抗争史诗。本文通过对比两位女性的母性反抗路径，揭示以母职为目标，混杂性作为具体战术的实践效能。米娅是自觉的策略家，运用模拟、挪用与超越的抵抗范式以女管家身份“模拟”白人社区的生存法则，却挪用艺术符号揭示理查德森家中被掩盖的真相，最终通过不断迁徙的流散生活，践行对母职身份的持续超越。贝比的抗争则代表从解构二元对立到建构第三空间的混杂性抗争，二者共同构成少数族裔女性反抗的不同阶段与形态，完整呈现出这类群体抗争意识与策略的演进轨迹。在分析二者的实践时，打破对反抗结果成功或失败的简单二分法，精细捕捉边缘群体抗争中的部分突破、阶段性成果与潜在局限至关重要，贝比的抗争虽未彻底改变司法制度，却实现了母职身份的自我确认，这一结果可归为局部成功。从进入规则——在规则内部博弈——最终创造新规则的完整抵抗路径，两位母亲的互动与抉择，强有力地证明了混杂性绝非被动同化，而是一种积极的、富有创造性的能动性体现。面对强大的、无处不在的文化与政治霸权，弱势群体完全可以通过创造性的混杂策略，在系统的裂缝中争取生存与发展的可能性。在《小小小小的火》中，母职是两位少数族裔女性抗争的锚点，也是资源，在其他反抗文本乃至现实生活中，这一资源和锚点可以是职业，也可以是其他载体。所有处于边缘地位的人们用好霍米·巴巴的理论，不必害怕强权，要敢于并善于运用策略性思维，去争取、建构并言说属于自己的话语与空间。

参考文献:

- [1] 刘月莹. 2024. 主体性的觉醒 [D].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 [2] 伍绮诗. 2018. 小小小小的火 [M]. 孙璐, 译.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 [3] 王芳. 2023. “母亲”身份的再审视: 《小小小小的火》中的母性书写与社会批判 [J]. 外语教学, (5): 106-112.
- [4] 王元江. 2023. 西克尔高地的“白璧无瑕”: 文化理论视域下详析《小小小小的火》中的“种族色盲”现象与美国精英文化反思 [J]. 长江小说鉴赏, (5):46-53.
- [5] 王妮. 2020. 她们笔下的“她们”: 当代美国华裔文学中的女性书写研究[D]. 西南大学.
- [6] 金莉. 2024. 后殖民女性主义[J]. 外国文学, (06):96-108.
- [7] BHABHA H K. 1994.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M]. London: Routledge.
- [8] COBB S. 2024. Adaptation, Authorship and the Critical Conversations of Little Fires Everywhere [J]. New Review of Film and Television Studies, 22(1): 316-336.

## Mimicry, Appropriation, and Subversion: Maternal Resistance in Little Fires

### Everywhere Through Homi Bhabha's Theory

Zhang Yingfan<sup>1</sup>

<sup>1</sup>*School of English, Sichu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31,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Homi Bhabha's postcolonial theory of hybridity,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resistance practices of two ethnic minority single mothers—Bebe and Mia—in Celeste Ng's novel *Little Fires Everywhere*. By integrating the gender-motherhood dimension, it summarizes their resistance paradigm of mimicry-appropriation-resistance and deconstructing binary oppositions-establishing third space, thereby constructing a strategic spectrum of resistance for ethnic minority single mothers. The analysis fully demonstrates the evolution of their resistance logic under the dual oppression of race and motherhood, aiming to argue that ethnic minority single mothers can transform motherhood into a strategic resource to counter structural oppression, affirm their cultural identity.

**Keywords:** post-colonism; *Little Fires Everywhere*; women of ethnic minorities; resistance paradigm; maternal resistance

# 衡阳酃酒酒文化传承及酒文化产业发展探究

王路宁<sup>1</sup>

(1.南华大学 语言文学学院, 湖南 衡阳 421001)

**摘要:**酃酒系属三大古酒之一的“黄酒”中的活化石, 作为中国最早的贡酒, 蕴含着不可复制的历史文脉。衡阳酃酒市场当前所面临的问题, 如“产能分散、规模小”“消费者认知度、接受度低”等, 最终归结“酒文化功能定位模糊”这一问题。在“符号消费理论”框架下分析黄酒相较于其他酒类的酒文化市场地位, 发现衡阳酃酒发展的“破局”之法唯有从原本围绕“饮酒行为”核心不断调整的战略, 升级内化为打造“古酒文化符号”, 着力打造衡阳黄酒符号的“历史性”“地域性”以及“潮流性”, 搭乘“文旅兴城”的顺风车, 必然可以实现弯道超车。

**关键词:** 黄酒; 衡阳酃酒; 酒文化; 符号消费理论

**基金项目:** 衡阳市社科基金项目“衡阳酃酒文化产业发展模式研究”(编号: 2023D006)

**DOI:** doi.org/10.70693/rwsk.v2i3.326

“酃酒”历史悠久, 西汉《西京杂记》应该是最早记录酃酒的文献, 《卷四》载:“梁孝王游于忘忧之馆, 集诸游士各使为赋”, 其中名士邹阳作《酒赋》, 所记皆时下名酒, 曰:“其品类, 则沙洛绿酃, 程乡若下, 高公之清。关中白薄, 青渚紫停。凝醴醇酎, 千日一醒”。“绿酃”连用, 亦可作“酃绿”“酃绿”“酃醪”。关于“酃绿”有两种说法, 一种即“酃酒”“绿酒”的并称, 《文选·张协〈七命〉》有“乃有荆南乌程”一句, 李善《注》引南朝宋盛弘之《荆州记》曰:“绿水出豫章康乐县, 其间乌程乡有酒官, 取水为酒。酒极甘美, 与湘东酃湖酒, 年常献之, 世称酃绿酒。”意思是绿酒因制酒取自绿水而得名, 酃酒因取水酃湖而得名。还有一种说法, 即“酃绿”单指“酃酒”, 元代胡三省注《资治通鉴》, 曰:“衡州, 治衡阳县。县东二十里有酃湖, 其水湛然绿色, 取以酿酒, 甘美, 谓之酃绿。”强调其色泽时又常写作“绿酃”, 西晋左思的《吴都赋》就曾写道, “飞轻轩而酌绿酃, 方双饔而赋珍羞”。

“酃酒”无论是汉代还是唐宋, 皆频见于文献, 如西晋张载就曾作《酃酒赋》, 北齐魏收所著《魏书》载晋将刘裕征伐姚泓一事, 刘裕奉旨借道长孙嵩时, 便曾赠其酃酒和江南食物。既是赠礼, 那便一定价值不菲, 暗合“酃醪”本身即贡酒的背景。“绿酒”则往往又写作“绿酒”, 如李白的《前有樽酒行二首》“春风东来忽相过, 金樽绿酒生微波”一句, 有的版本又作“金樽绿酒”, 《碧玉歌》“碧玉奉金杯, 绿酒助花色”, 又常写作“绿酒助花色”。可见“绿酒”是否真是取水自绿水之酒, 尚且存疑。

大抵“绿酃”“酃绿”“绿酃”“酃醪”皆指“酃酒”, 而“绿”“绿”混同的情况, 则有可能皆指向酒的色泽。至于说因湖水湛绿, 取之酿酒故得名“绿酃”, 则有待商榷。有学者认为, 汉唐之间, 酿酒多为绿色, 时下多以酒的色泽命名酒品<sup>[1]</sup>, “酃酒”就属于“绿酒”品类中的一种。不过随着工艺的进步, 如今代表性“酃酒”产品呈金黄色。而《广韵》训“酃”为“绿酒”, 《康熙字典》按曰:“绿为清酒矣。衡阳县有酃湖, 今之酃县也, 土人取其水以酿, 晋武平吴荐儒酒于太庙”。“绿”, 古同“漉”, 即渗滤之义, 汉代常以“绿水”代指“清水”, 如“于东则洪池清漪, 绿水澹澹”(张衡《东京赋》), “绿水”即清澈的水。先秦便已分酒为“清酒”与“浊酒”, “清酒”是可用以祭祀的清洁之酒。其区别则在于过滤的精度, 前者经过渗透过滤等加工工序后酒色澄清, 而后者则较为混浊, 留有部分酒米。因此也不排除“绿酃”和“酃绿”并称的情况实则是指经过精加工, 渗透过滤后色泽清澈的酃酒, 盖属“酃酒”中的上品。

在今衡阳地区还存在这种用古法酿制的“贡酒”, 但“贡酒”如今已飞入寻常百姓家, 衡阳四乡, 基本家家户户都会酿制, 且已不复绿色。但曾因多为酃湖附近农民自制“家作酒”出售, 故又称其“湖之酒”。这种酒别名不少,

**作者简介:** 王路宁(1991—), 南华大学语言文学学院讲师, 博士, 研究方向: 地方文化。

除“湖之酒”外，还有“胡子酒”“锡壶衡酒”“夫之酒”等别称，名之“夫之”则因王船山先生曾嗜饮此酒。衡阳的酿造业一直十分兴盛，民国 24 年上海版《中国实业杂志》曾记载载：“清末民初，衡阳城内有酿酒作坊 179 家，每年产酒达 32600 担。”建国后，企业不断实行技术革新，扩大生产，今衡阳县西渡镇、衡南县泉溪镇以及衡阳酒厂，均生产湖之酒，还远销东南亚各国，尤以西渡湖之酒最知名，被评为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2014 年被评为衡阳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sup>[2]</sup>

## 一、衡阳酃酒及相关产业概况分析

如果从制酒原料来分类，酃酒是单一品类粮食（糯米）酿造的，应属于米酒，有别于高粱酒、棒子酒、绿豆酒等，也不同于采用多品类粮食酿造的白酒。以衡阳西渡湖之酒为例，主要采用传统糯稻品类麻矮糯为制酒原料，这种糯稻淀粉含量高，颗粒较小，黏性高，口感偏甜。我们通常所熟知的市面上销售的或者自制的“米酒”的概念其实是米酒发酵的“未完成”形态，既没有充分发酵、陈化，也没有完全过滤，这一形态下的“米酒”的酿造历史甚至可以追溯到仰韶文化时期，古人称其为“醴”。周代以“醴”祭神，《黄帝内经》称“醴泉”（薄酒）为百药之长，这也是米酒一直延续不衰受到喜爱的原因。

如今市面上的“米酒（醪糟）”品类繁多，其中孝感地区生产的全国米酒市场占有率最高，知名度较高，受众较广，且拥有非遗酿酒技艺，以“朱湖糯米、城隍潭水、蜂窝酒曲”为核心，六道古法工艺——浸米、蒸饭、拌曲等制酒。2001 年获湖北省首个地理标志商标，2020 年入选中欧地理标志保护名录。全市共拥有 34 家米酒生产企业，如“米婆婆”“神霖”“爽露爽”“玉泉”“府河”，“生龙”的“佬米酒、米露”系列等皆全国知名。该市米酒年产量可达到 50 万吨，占全国米酒市场份额的 80%，形成了糯米种植、加工、销售等相关产业链一条龙，相关产业年产值达 60 亿元。<sup>[3]</sup>2023 年“孝感米酒”入选国家 11 部委重点特色食品产业集群，被纳入“全国美食地图”。

孝感一带的米酒也被称为“伏汁酒”“胡子酒”，应与衡阳“湖之酒”系属同源。但前者属于低度发酵饮品，而酃酒“湖之酒”虽然从制酒原料来看，与“米酒（醪糟）”一致，都采用的糯米，却属于较高度数的甜度黄酒，发酵工艺也各异。今天的酃酒呈金黄透明的颜色，清亮如流金，现一般被归类为黄酒，且由于要求两次淘洗糯米，两次入坛发酵，全程不加水，出酒率较低。

衡阳一地从事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的注册企业共有 500 多家，其中本地白酒品牌仅 3 家（雁峰酒、天之衡酒、衡阳大曲），其中雁峰酒业兼营黄酒。专营黄酒的企业共 8 家，孵化品牌如下所示：

表 1 衡阳黄酒品牌统计表

| 企业名称             | 品牌           | 黄酒特点                     |
|------------------|--------------|--------------------------|
| 湖南鼎谷一酒业（原国营西渡酒厂） | 西渡湖之酒、黄龙玉液陈酿 | 非遗工艺、中华老字号、地理标志品牌        |
| 谋彩湖之酒（怡和实业）      | 谋彩湖          | 全手工木榨、古法发酵湖之酒            |
| 湖南零零玖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 酃酃酒          | 专注轻度酒，包括 27.5 度、9 度、16 度 |
| 酃酃酒业             | 酃酃玉液         | 养生系列采用草药曲、低度保鲜技术         |
| 湖南黄龙世家酒业         | 黄龙世家         | 采用活性黄酒工艺                 |
| 耒阳张飞酒业           | 张飞酒          | 采用窖藏工艺                   |
| 酃酒酒业             | 酃酒           | 未见公开信息                   |
| 衡阳市杏花村酒厂         | 杏花村          | 未见公开信息                   |

上述黄酒品牌中既有坚持采用古法酿造的西渡湖之酒与谋彩湖，也有不断革新，采用了新科技融合传统工艺的酃酃、黄龙世家、及酃酃酒，形成了继往开来的渐进式梯队。但当前的衡阳黄酒市场还存在一些显著的问题：

### 1.1 产能分散，未形成规模

衡阳黄酒总体产量不高，许多企业并未公开披露年产值。据公开信息可知，酃酃玉液 2018 年年产量大概在 3 万吨左右，黄龙世家年产量在 5000 吨左右，谋彩湖满负荷生产年产量方可达 1000 吨。大多数企业产能有限，资金、人才有限，无法向全国市场拓展。与年营收近 20 亿元绍兴古越龙山以及年营收超 16 亿元的会稽山牌等知名黄酒相比，衡阳企业尚未形成规模效应。企业之间未形成合力，同时也缺乏真正的全国知名的头部企业。

## 1.2 消费者认知局限

衡阳黄酒在本地乃至全国市场都缺乏辨识度。以酃酒/湖之酒为代表的衡阳黄酒无法主导衡阳本地酒品市场，消费者对于黄酒最熟悉的往往是“绍兴黄酒”，而自家饮用时则倾向于采购“米酒”，若去超市购买，多数只能买到孝感米酒，又由于“米酒”酿制门槛低，小作坊自制或者自家酿米酒则是更多人的选择。谋彩湖的品牌创始人刘谋彩曾在采访中坦言，“让人尴尬的是，黄酒的发源地的人们，大多不对黄酒感兴趣，以喝白酒、啤酒为主”，“不少衡阳人误以为黄酒的用途只是做‘醉虾’用的调料，根本不能用来喝”。<sup>[4]</sup>

## 1.3 年轻消费群体接受度低

虽然已有黄酒企业推出更受当下年轻人喜爱轻度酒，但品牌包装以及营销方式仍旧采用传统酒类的形态，对于品牌的文化表达，多采用如“三千年历贡酒史”等概念较为抽象，缺乏具体场景表达。酃酒品牌曾锚定年轻消费群体，提出了一项以品牌概念“清醒地嗨”的视频征集活动，可提供高额扶持金，却要求提交详细脚本、预算等专业材料，门槛过高，容易将普通年轻创作者拒之门外。

## 1.4 产品酒文化定位模糊且功能重叠

以黄龙玉液、酃绿玉液、黄龙世家等以宴席用酒为定位的酒品为例，完全与白酒的商务宴请、节日聚餐场景交叉，但显然消费者更易于接受且习惯采用高度白酒占据仪式感的场景，黄酒等往往会被视为“不够分量”（这与流行的酒桌文化中“醉”与“义道”之间的复杂联系有关）。而其他的采用传统工艺可饮用可调味的多功能湖之酒等中度酒品，却因为含焦糖色和较高酒精度，容易掩盖食材本味，并不适用于所有菜系，而低度数米酒在应用于调味场景中亦可替代，甚至能够超越调味功能成为菜品，如“酒酿圆子”等。

衡阳酃酒相关品类其实一直都希望古已有之的“酃酒”概念挂钩，但古酃酒如果从酒的色泽来分类，唐宋色泽呈绿，当属绿酒。这也是此酒独树一帜之处，汉唐之间这一品类的酒如此受欢迎，应当与其色泽有别于其他常见品类分不开。比如唐代的魏征就酿这种酒，唐太宗喝过后赞不绝口，赐魏征诗一首，“醕醕胜兰生，翠涛过玉薤。千日醉不醒，十年味不败”。“翠涛”即已标明其色泽。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里说，“红曰醕，绿曰醕，白曰醕”，也就是到了明朝的时候，“酃”已经作为一种代称可泛指绿色美酒了。唐诗中多次提及“绿蚁”的意象，如白居易的《问刘十九》“绿蚁新醕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中的“绿蚁”，指的就是“浮在新酿未过滤的米酒上面的泡沫”<sup>[5]</sup>，因细小如蚁，微现绿色，所以称“绿蚁”。可见此酒及其相关产物曾受到了皇亲国戚、文人墨客的大加赞许。

曾经声名鼎盛的“酃酒”不再绿，如何能让消费者将其与古代文人墨客诗作中意象挂钩呢？如何能让他们亲身体会理解酃酒的历史呢？今天可以称得上“绿酒”的，主要就是竹叶青酒。据《2025年中国竹叶青市场占有率及行业竞争格局分析报》统计，行业2024年中国竹叶青市场规模达到18.7亿元，同比增长9.3%。大抵酒品独特的颜色也为它吸引了不少消费者。

## 二、全国黄酒产业市场分析

从全国范围来看黄酒产业的发展，中国黄酒逐渐打破过于集中的区域性特征。过去，我国黄酒具有较强的区域性特点，黄酒的生产与销售主要集中在江浙沪地区。经过多年的努力，黄酒文化逐渐在全国推广，中国黄酒业传统的区域性特征被逐渐打破，安徽和湖南也成为了黄酒主要的生产与消费大省。甘肃、河南、山东、福建、陕西等地黄酒企业也逐渐实现了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双丰收，黄酒产业在全国化发展上取得了一定的进展。目前，我国黄酒主要形成了四大派系，分别为越派黄酒、海派黄酒、湘（新）派黄酒和闽派黄酒，每个派系各有特色：

现在又出现了粤派、晋派、徽派黄酒等，在酿造方法、口感、外观上都有差异。江浙沪是黄酒的核心消费区域，其中绍兴黄酒因其深厚的历史底蕴与传承获得了广泛认可，素有“天下黄酒源绍兴”“天下名酒，北为汾酒，南为绍酒”的美誉，被奉为黄酒正宗。

黄酒中富含21种氨基酸，30余种无机盐，含量远高于葡萄酒和啤酒的维生素B，抗氧化以及抑制癌细胞生长的低聚糖及多糖，可以防止心脑血管疾病、清除自由基的酚类物质，降血压、增强记忆力的γ-氨基丁酸，降胆

固醇的生物活性肽等，具有多重保健功能。以前还有“黄酒易上头”的说法，黄酒因为度数低，入口柔和，饮者容易过量导致深醉，清醒慢等问题，近年已经逐渐解决了，由江南大学和绍兴黄酒集团成立的科研攻关组已经通过菌种选育、原料优选、发酵控制和参数智能等技术手段在酿造环节就削减了酒体中的“上头”物质，其实是在黄酒制作过程中引入非产胺的植物乳杆菌 JN01，可使成品黄酒中的生物胺量骤减九成，逐步克服黄酒酒后不适的问题。

表2 中国四大黄酒派系情况表

| 派系   | 特点   | 主要地区 | 代表性品牌              |
|------|--|------|--------------------|
| 越派黄酒 | 集中了一批历史悠久、品牌知名度较高的传统黄酒企业，黄酒口味醇厚。                         | 江浙一带 | 古越龙山、会稽山、水乡国色、塔牌等  |
| 海派黄酒 | 采用新工艺，口感上与传统黄酒有所差异，其在黄酒中添加枸杞、蜜等，色泽透明、口感爽口，满足了年轻消费者的口味要求。 | 上海   | 金枫酒业、石库门上海老酒、和酒等；  |
| 湘派黄酒 | 弥补传统感性黄酒的不足，又开创了干型黄酒的新特点。                                | 湖南   | 胜景山河、古越楼台等         |
| 闽派黄酒 | 原产于福建地区，以糯米、红曲为主要原料酿造的，具有红曲香与醇香的幽雅混合香，兼备协调、醇正、柔和风味的红曲黄酒。 | 福建   | 永安吉山红、建瓯老酒、土红曲老酒等。 |

2002年以来，国家大力扶持黄酒产业，积极实施高度酒向低度酒转变。2004年，因黄酒行业向好，全国各地掀起黄酒基地扩建热，当年全国新增黄酒产能达15万吨。2005年，基于利润驱动，头部酒企相继斥巨资宣传，古越龙山创造中国黄酒行业三连冠，连续三年央视广告投放额逾2个亿，黄酒行业广告投放增加，进一步吸引投资使产能得以提高。但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大多数小企业无法紧跟头部企业加强宣传，低价竞争严重，行业营收和利润增速均放缓。2012年底，中央出台“八项规定”，白酒行业遭受重创，黄酒行业因其特点反而相对表现较好，营收及利润增速缓步上升。但2016年以后，黄酒行业规模达到顶峰，由于其自身问题以及白酒、啤酒等行业的“挤出效应”<sup>[6]</sup>，行业发展遇到瓶颈。

2025年5月国家修订发布了《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中关于公务饮酒的新规定，第二十三条明确规定：公务工作餐“不提供高档菜肴，不得提供香烟，不上酒”，因其严厉程度和明确性被业界称为“史上最严禁酒令”。

黄酒在政务消费中的占比其实远低于白酒，白酒政务消费占比已从2012年的30%降至2025年的不足5%<sup>[7]</sup>，且黄酒主要用于家庭佐餐、烹饪或喜丧宴席，而非高端政商务接待。因此，政策对销量的直接影响较小。但部分定位高端的黄酒，比如售价5200元的“酃醪玉液·梅花三弄”极度依赖节庆赠礼场景，而禁酒令引发的“低调消费”氛围可能抑制此类需求。

### 三、策略应对

制酒产业要不断升级打造成酒文化产业，“饮酒行为”必须升级内化为“文化符号”，才能让即使过剩的产能也得到消化。白酒、黄酒、红酒都想要争夺的高端酒类市场，真的是因为白酒的口感因而使其得以长期霸居榜首吗？白酒真的好喝到家家宴席都不可或缺吗？

2018年8月，酒业家传媒、中酒展组委会主办了第八届中国酒业市场论坛，论坛上，市场研究集团益普索发布了《白酒市场白皮书》，《白皮书》采用线上问卷调研方式，收集了北京、上海、广东、四川、河南、湖南、江苏、黑龙江、山东、湖北等地千余名白酒消费者的访问数据，并基于访问数据，对消费者进行细分画像，解读白酒消费特征。数据显示，大部分消费者并不具备自发了解酒体好坏的能力，有效的市场营销工作才是新酒体能被消费者发现并接受的保证。尤其无品牌提示，进行酒体盲测时，让消费者随机品尝两品牌酒体，消费者对酒体喜好程度差异不大；而当消费者知晓酒体品牌时，消费者对酒体喜好程度呈现明显差异。这一测试真实反映了酒类市场的当前格局是由“酒文化符号”决定而形成的。而白酒，高端品牌的白酒已经成为一种固化的消费符号。

从法国社会学家鲍德里亚提出的符号消费理论来看,商品不仅具有马克思所说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还具有“符号价值”。所谓“符号价值”,是指消费者在消费商品的时候,不仅消费了产品的自身,而且也消费了商品所具有的意寓、情调和品味等因素,也即消费这些符号对应的“内涵”。这也是为什么,同样功能和质量的白酒产品,有消费者愿意付出多出几倍的价格购买品牌商品。

那么如何让黄酒产品也附加这些“符号价值”呢?如何让黄酒文化符号也深入人心,走进千家万户呢?既然无论衡阳高端酒类市场还是全国的高端酒类市场都受制于“禁酒令”,那么着力打造衡阳黄酒符号的“历史性”“地域性”以及“潮流性”,必然可以实现弯道超车。着力打造中低端黄酒酒品,吸引下沉市场消费者以及年轻消费者,发展酒文化产业与文旅产业融合的模式,必将吸引全国各地不同层面的消费者,这也必将成为未来酒文化产业的发展趋势。我们认为以下几种策略或可奏效:

### 3.1 文化为魂

深挖历史基因,努力以“活态传承”打破酃酒的文化厚重感和疏离感。以“汾酒”为例,6000年酿造史无法用一两句话来阐释,那么就努力与其他历史传承元素互动,相生相融,以达到互容互推的目的。2023年初汾酒集团联合中国酒业协会等行业权威机构,正式揭牌成立“中国酒业活态文化研究院”,该机构集“研究、转化、传播、体验”于一体,汇集了文化学者、非遗传承人、营销专家与国际传播人才,聚焦“汾酒酿造技艺的活态传承”“中国酒礼的现代表达”“酒文化IP的全球化传播”等问题。该机构举办的“破圈”活动,如“汾酒X法国名厨协会(Disciples Escoffier)名厨之夜”高端品鉴活动,既推动了美食文化宣传,也推动了中法酒文化交流。在该研究院的推动下,还与中国顶级陶瓷艺术“汝、官、哥、钧、定”五大名窑合作,打造了传世陶瓷酒器,同时借助五大名窑的影响,进一步拓宽了汾酒的文化边界。又比如青岛啤酒,虽然历史较短,无法突出其厚重感,但青岛打造了“登州路啤酒街”“时光海岸精酿花园”等空间,将啤酒元素植入城市建筑,使游客通过“啤酒线路”感知青岛烟火气。衡阳也可以依托现有的衡州酒文化博览园,让酃酒千年技艺“活起来”,打造“酃酒酒都”等概念,融入城市的文旅、生活。

### 3.2 场景破界

打破单一消费场景印象,将酃酒从佐餐饮品升级为生活方式符号。当前无论是衡阳本地的酃酒品牌还是全国的黄酒品牌,都过于聚焦高端酒品市场,也过于看重“酒桌文化”背后延伸的饮酒习惯。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剧带来的“银发经济”飞速发展,经济社会内卷不断促使年轻群体亚健康问题突出,疫情后全民健康意识迅速攀升,“养生概念”酒必将成为酒类市场的“新宠”。传统酒企如茅台、五粮液、泸州老窖等头部企业纷纷布局养生酒市场,药企如振东集团也开始跨界参与开发“五和养生酒”,据市场调研显示,有57.8%的消费者将“食补”作为保健养生酒首选项,高于运动健身的35.3%,高于规律作息的26.9%,高于中医调理的14.6%。黄酒(酃酒)的相较于啤酒和白酒而言,天然具有更多的养生优势,譬如它本身乙醇含量较少,不易醉,譬如它含有丰富的酶类物质和有机酸,能刺激胃液分泌,帮助分解食物中的蛋白质和脂肪,缓解腹胀、食欲不振等问题,但衡阳黄酒显然并未重点开发更符合当下“养生”以及“口味丰富”需求的黄酒品类,即便有养生品类,也并未大力宣传,作为产品的主要卖点,例如酃酒系列中“009晋”这款酒品,加入了葛根、枳椇子、甘草、枸杞、菊花等药材,具有解酒护肝、滋阴降燥、提神抗疲劳等功效,而只是强调其定位为高端宴饮酒。如何将已然受限的旧消费场景转移至与文旅相关的养生场景,例如气泡黄酒适配露营、无醇黄酒适配球场,开发这些更具有活力的年轻化黄酒品类,是未来黄酒企业的重要课题。

### 3.3 全域融合

打造“酒旅+节庆+文创”延伸价值链,推广酃酒文化符号,辐射至全湖南乃至全国。“制造立市,文旅兴城”,衡阳美食文化兴盛,先将“黄酒(酃酒)”打造成夜市文化中必不可少饮品,推动其与夜间消费、市井文化、在地体验等消费形态的捆绑,不断挖掘黄酒的健康属性、文化底蕴,然后推动黄酒从“地域特产”向“国潮符号”转型。

## 结论

酃酒文化的传承与酃酒文化产业的发展是相辅相成的,全国黄酒市场的瓶颈问题与衡阳本地的黄酒市

场问题也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唯有将“历史积淀”“贡酒荣耀”转化为品牌价值，采用新技术、新包装辅  
以非遗技艺，革新旧体系，才能让文化“活”在产业血脉中，才能避免非遗沦为博物馆标本。

参考文献：

- [1] 王赛时.中国酒史[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0:55  
[2] 田俐.三湘风物逸闻录[M].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258.  
[3] 湖北日报.年产量达 50 万吨 占全国米酒市场份额 80%——孝感米酒 历久弥香[EB/OL]. (2023-08-25) [2025-07-20].<http://xczx.cnhubei.com/cyzx/202308/t4643082.shtml>  
[4] 华声在线.衡阳西渡湖之酒[EB/OL]. (2014-01-18) [2025-07-20].<https://hy.voc.com.cn/m/view.php?cid=166&tid=49288>  
[5] 武汉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新选唐诗三百首[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342  
[6] 即白酒、啤酒行业不断加大对本行业的投资和扩张，导致黄酒的生存空间遭到挤占。  
[7] 南方都市报.“禁酒令”风暴下的区域白酒：生死局还是新天地？[EB/OL]. (2025-06-26) [2025-07-20].<https://finance.eastmoney.com/a/202506263441360735.html>

## An Exploration into the Inheritance of Hengyang Ling Wine's Cultural Heritag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Its Wine Culture Industry

Wang Luning<sup>1</sup>

<sup>1</sup> School of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University of South China, Hunan, Hengyang 421001, China

**Abstract:** Ling wine is a living fossil among the "yellow wines," one of the three ancient types of wine. As China's earliest tribute wine, it carries an irreplaceable historical legacy. The current challenges faced by the Hengyang Ling wine market, such as "fragmented production capacity, small scale," and "low consumer awareness and acceptance," ultimately stem from the issue of "ambiguous functional positioning of its wine culture." By analyzing the market position of yellow wine's wine culture relative to other alcoholic beverages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Symbolic Consumption Theory," it becomes evident that the key to breaking through for Hengyang Ling wine lies in upgrading its strategy from one centered solely on "drinking behavior" to one that internalizes the creation of a "symbol of ancient wine culture." Efforts should focus on emphasizing the "historical," "regional," and "trendy" aspects of the Hengyang yellow wine symbol. By leveraging the momentum of "cultural and tourism revitalizing the city," Hengyang Ling wine can undoubtedly achieve rapid progress and surpass competitors.

**Keywords:** yellow wine; Hengyang Ling wine; wine culture; Symbolic Consumption Theory

# 数字赋能与生态重构：黄河三角洲民歌的活态传承路径研究

宋颀<sup>1</sup>

(1. 青岛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山东 青岛 266318)

**摘要:** 中国黄河三角洲民歌作为黄河入海口独特地理生态与移民垦殖文化孕育的口头艺术结晶, 在现代化与城镇化进程中面临传承主体断代、原生演唱场域消解、方言隔阂加剧等多重危机, 传统“口传心授”模式难以为继。本文基于对东营、滨州等核心流传区域的田野调查, 提出以“抢救性保护为基础、创新性发展为导向、活态传承为本体”的当代实践原则, 构建数字技术全面赋能的协同保护体系。研究主张: 通过高保真音频采集与多媒体数据库建设, 实现濒危资源的永久性结构化保存; 运用人工智能辅助记谱、方言语音识别等技术突破传承中的技术瓶颈; 借助新媒体传播、虚拟现实展演及文旅融合场景, 重塑民歌在社区、校园与数字空间的传播生态。最终, 本文探讨了数字技术如何推动黄河三角洲民歌从“文化遗产”向“活态文化资源”转化, 为同类非遗项目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兼具方法论意义与实践路径的参考范式。

**关键词:** 黄河三角洲民歌; 数字技术; 非物质文化遗产; 活态传承; 抢救性保护; 创新性发展

**基金项目:** 2025年山东艺术科学重点课题《黄河三角洲非遗民歌活态传承融入声乐智慧课程构建研究(L2025Z05160648)的研究成果

DOI: doi.org/10.70693/rwsk.v2i3.305

在全球化与现代化交织的语境下, 地域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存续, 常被置于传统固守与现代适应的二元论困境之中。然而, 更具建设性的视角在于探寻二者在“创造性转化”过程中的动态平衡机制。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 为这一机制的形成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方法论工具。本文以山东省黄河三角洲民歌这一濒危性突出的口头传统为具体个案, 旨在超越“保存”与“发展”的简单辩证, 深入探究数字技术如何系统性介入非遗项目的抢救性记录、本体性阐释与活态性传承全过程。研究试图通过这一微观实践, 回应一个更具普遍性的理论命题: 技术媒介的深度嵌入, 如何重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生态, 并为其在当代社会的价值再生开辟可行路径。

## 一、黄河三角洲民歌的艺术特质与存续生态危机

黄河三角洲民歌, 是在黄河周期性泛滥与泥沙淤积所塑造的独特地理环境, 以及历代移民垦殖、盐渔农并作的生产实践中逐步生成的口头艺术结晶。它并非单一的歌谣类型, 而是一个根植于地域生态与生计方式的复合性音声体系, 涵盖了劳作号子(如《黄河夯号》《推船号子》)、节令秧歌调、生活小调及礼仪音诵等多种形态。其内容深度耦合于区域开发史, 既铭刻着拓荒者的集体协作记忆、对自然力的敬畏与调适, 也流淌着市井生活的温情与幽默, 堪称一部“可聆听的地方性社会史”。

在艺术形态上, 该民歌体系呈现出鲜明的“水陆边界性”与“功能即形式”特征。旋律与节奏直接受劳动场景规制: 夯号、船工号子往往节奏铿锵、律动鲜明, 结构短促而富于呼应, 体现了强烈的集体协作性与身体实践性; 而田间小调、叙事歌曲则旋律相对舒展, 方言唱词质朴生动, 富于叙述性与抒情色彩。其演唱实践高度依赖于“情境共生”的场域——无论是集体劳作中的指挥与协力、节庆礼仪中的社群互动, 还是日常闲暇时的情感抒发, 音乐、文本、行为与空间共同构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活态文化整体。

然而, 这一深嵌于传统生产生活肌理的活态体系, 正遭遇现代化进程带来的结构性解耦, 陷入深刻的存续危机:

其一, 传承主体的代际断裂与记忆消散。据笔者近年于东营、滨州等地的田野跟踪调查, 能够系统掌握大

**作者简介:** 宋颀(1982—), 女, 副教授, 研究方向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数字人文与民俗艺术。

**通讯作者:** 宋颀

型套曲、熟知地方性演唱程式与语境内涵的核心传承人，平均年龄已逾七旬，且总数不足二十人。中年一代多仅能记忆片段，而青年一代则几乎完全脱离其生成的文化语境与知识系统。传承链条的脆弱性，不仅体现为人员的锐减，更在于伴随老者离世而发生的身体性技艺与情境化知识的不可逆流失。

其二，原生文化语境的加速消弭。机械化施工取代人工集体夯筑，机动船舶淘汰传统帆船与纤夫劳作，传统村落社会结构与季节性节庆礼仪也发生显著变迁。这使得民歌所依附的那些集体性、协作性、仪式性的原生演唱场域大幅萎缩甚至消失。民歌脱离了滋养其意义与功能的“土壤”，便极易沦为悬浮的“文化标本”。

其三，方言屏障与审美生态的变迁。民歌中大量蕴含古语、地方俗语与特殊发声韵味的方言唱词，在普通话普及与数字化传播语境下，形成了显著的接受隔阂。同时，现代多元娱乐文化塑造了不同的听觉审美习惯，导致民歌的受众基础，特别是年轻受众群体持续萎缩，其社区共享与文化认同功能随之弱化。

正如文化生态学理论所警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性”，根本上取决于其与特定文化生态系统的共生关系。黄河三角洲民歌当前的危机，本质上是其传统生态系统失衡的集中体现。因此，对其的保护已不能局限于静态的文本或音像记录，而必须转向一种积极的、介入性的生态维育与重构策略，即通过数字技术的战略性赋能，为其在当代社会重新连接受众、重构意义、植入场景，从而开辟新的存续空间与发展路径。

## 二、技术赋能下的抢救性保护与系统性传承路径构建

面对黄河三角洲民歌传承链条濒临断裂、原生语境加速消解的严峻现实，近年来，地方政府、专业研究机构与高校协同联动，围绕该遗产项目的存续展开了一系列系统性实践。这些探索逐步从早期零散的采风记录，转向以数字技术为核心驱动、以重建当代传承生态为目标的综合性干预，初步形成了“抢救性记录—多维度传习—创造性转化”的协同工作框架。

### （一）数字化建档，从静态保存到活化利用的基础工程

自“十四五”以来，黄河三角洲民歌被列入山东省非遗数字化抢救工程的重点项目。其工作核心已超越传统的录音录像，旨在构建一个可持续发展、深度关联、便于活化利用的数字资源体系。

全景语境化采集：运用多机位同步摄录、三维声音场采集等技术，不仅记录老歌手的完整演唱，更着重捕捉其表演时的身体语言、情绪状态以及与现场听众（如有）的互动，并配以深度口述访谈，形成集“音、像、文、境”于一体的全息化数字档案。例如，对《黄河夯号》的采集，便结合了历史影像、工具实物与老把式的动作分解，再现其作为协作劳动“指挥系统”的完整文化语义。

深度结构化整理：依据文化遗产领域通用的元数据标准，结合民歌特性进行本地化扩展，对采集的海量数据进行结构化标引与知识关联。每一首民歌均关联其多重属性信息：音乐本体（曲谱、音频、音阶调式）、语言学信息（方言唱词、语音标注）、文化语境（使用场合、相关民俗、流传区域）、传承谱系等，形成一个可多维度检索、可视化呈现与深度分析的民歌知识图谱。

前瞻性资源储备：与计算语言学、音乐信息检索等跨学科团队合作，开展方言唱词语音库与民歌旋律特征数据库建设。这项工作不仅服务于当下的研究与教学，更旨在为未来基于人工智能的智能记谱、风格化生成、交互式传播等深度应用储备高质量的“数据燃料”，将抢救性记录转化为面向未来的战略性资产。

### （二）“四维一体”的活态传承生态网络构建

在夯实数字化基础的同时，传承实践着力推动民歌从“档案库”重新流向社会生活的毛细血管，尝试在当代语境中重建其功能与意义，构建起“教育浸润—社区滋养—文旅赋能—节庆升华”四维一体的传承生态网络。

#### 1. 教育体系中的根脉延续

在东营、滨州等地，依托“非遗进校园”机制，开发了系列数字化校本课程与体验工坊。课程不仅传授唱腔，更通过多媒体课件、虚拟现实（VR）场景体验，帮助学生理解民歌背后的地理生态与生计方式。部分高校则开设专题研究与实践课程，引导学生参与民歌的数字化整理与创意改编，实现从“被动接受者”到“主动参与者与创新者”的身份转变。

#### 2. 社区空间中的日常回归

在新型农村社区与城市公共文化空间，设立民歌传习所与社区学堂。传承人作为“社区文化导师”，定期开展传习，并引导居民将民歌演唱融入红白喜事、节日聚会等日常生活礼仪中。通过组建社区民歌队、举办“邻里

歌会”等方式，使民歌重新成为构建社区认同、丰富精神生活的文化纽带，实现其在基层社会的“软性植入”与活态传承。

### 3. 文旅融合中的场景再生

在黄河口生态旅游区、沿黄文化遗产廊道等文旅场景中，进行创造性植入。例如，在再现古渡码头场景的景区，开发《船工号子》沉浸式体验剧，游客可参与简单的呼应演唱；在数字体验馆，通过动作捕捉技术，让游客体验“虚拟打夯”并与民歌节奏联动。此举不仅丰富了旅游产品，更在新的空间与情境中，为民歌赋予了观赏、体验与消费的当代价值，实现了文化价值向经济与社会效益的传导。

### 4. 节庆平台上的品牌塑造与对话

借助“黄河文化论坛”“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会”等高端平台，定期举办黄河三角洲民歌专题展演、学术研讨会与创新作品发布会。这些活动不仅集中展示保护成果，更致力于将其置于更广阔的黄河文化、中国民歌体系乃至国际传统音乐对话的语境中，提升其文化能见度、学术影响力与公共品牌价值，从而吸引更多广泛的社会关注与资源投入。

## 三、数字技术驱动的系统性保护与创造性转化

当前，黄河三角洲民歌的保护已进入以数字技术为支撑、注重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新阶段。该阶段不再局限于对文化表象的静态记录，而是致力于通过技术手段，深入解析遗产的内在逻辑与核心价值，推动其实现多媒介转译与跨语境传播，构建从数字存档到智慧应用的生态链，最终促进民歌在当代社会中的活态传承与价值再生<sup>2</sup>。

### （一）政府主导与跨界协同，构建数字化保护的系统性框架

黄河三角洲民歌的系统性数字化保护，得益于地方政府的政策引导与资源整合，以及跨学科、跨领域的协同机制。山东省及东营、滨州等地先后出台《黄河文化保护传承弘扬规划》及配套实施方案<sup>3</sup>，将民歌数字化抢救与活化利用列为重点任务，并设立专项资金予以支持。在此顶层设计下，逐步形成了“政府统筹—高校研发—机构实施—社区参与”的多方联动模式。例如，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与山东大学、中国海洋大学等高校的数字人文、音乐科技团队合作，共同研制《黄河三角洲民歌数字化采集与元数据规范》，为全省范围内的系统性数字化工作提供了统一的技术标准。与此同时，地方政府积极搭建产学研协作平台，推动科技企业的高保真音频采集、动作捕捉等前沿技术与文化遗产保护需求对接，提升了技术应用的适配性与前瞻性。

### （二）技术赋能与体验重构，从数字存档到沉浸式传播

数字技术的深度融合，正推动黄河三角洲民歌从静态的档案存储，向动态的、可交互的沉浸式文化体验系统转变。这一转变不仅体现在记录媒介的升级，更意味着对民歌本体艺术特征与文化语境的深度解码与多维再现，使其在新的媒介生态中实现感知深化与意义延展。

在资源采集与建档层面，当前工作已超越传统的影音记录，迈向高保真、结构化、可计算的“数字孪生”构建。具体而言，除采用专业设备进行高清全景录像与多轨音频采集外，项目团队引入了三维激光扫描与惯性动作捕捉系统，精准记录代表性传承人演唱时的身体姿态、手势轨迹及乐器形制，形成可360度观察、可数据化分析的动态三维模型。同时，通过多模态情感计算技术<sup>4</sup>，对演唱过程中的面部微表情、声学特征（如音高、音强、音色微变）及呼吸节奏进行同步捕捉与关联分析，从而将以往难以言传的“韵味”“口气”等风格性要素转化为可视化、可对比的参数化数据集。这种立体的数字化建档，为后续的学术研究、风格分析与创造性转化保存了珍贵的原始“基因”。

在应用转化层面，技术赋能聚焦于构建虚实融合的体验场景与低门槛的参与工具，旨在拉近公众与民歌之间的心理与感知距离。

#### 1. 沉浸式体验场景的深度开发

<sup>2</sup> “活态传承”强调文化遗产在当代社会生活中继续被实践、传承和发展的状态，而非仅作为静态档案存在。

<sup>3</sup> 该规划由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于2021年牵头制定，是省内推进黄河文化保护传承的纲领性文件，其中明确列出了民歌数字化等重点工程。

<sup>4</sup> 多模态情感计算指通过计算机技术分析音频、视觉、文本等多种信号，以识别和建模人的情感状态。在此用于捕捉民歌演唱中声情、身韵的统一性。

基于前期构建的“数字孪生”资源，在文化场馆与文旅景区中，综合利用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全息投影与三维空间音频技术，打造具有强叙事性与交互性的民歌展陈环境。例如，在山东省文化馆的数字非遗展厅中，观众佩戴VR设备后，可“化身”为黄河岸边的劳动者，置身于依据历史资料重建的虚拟场景中，不仅聆听《黄河夯号》高亢的歌声，更能通过手柄模拟“打夯”动作，亲身感受节奏与劳动发力之间的同构关系，实现从“观看”到“体验”的认知飞跃。另一案例是在黄河口生态旅游区设置的AR导览：游客通过手机或AR眼镜扫描实地景观，即可在现实画面上叠加呈现历史影像、民歌歌词、方言发音及地域背景知识，使静态的自然风貌转变为承载文化记忆的“活态地层”。

## 2. 智能化学习与创作工具的体系化研发

为促进民歌的传习与创新，开发了面向不同用户群体的数字化工具集。面向大众的“黄河乡音”APP<sup>5</sup>，集成了“智能方言教练”“旋律互动游戏”和“AI灵感共创”等模块。用户可通过语音跟读获得实时发音评测与纠正；在旋律游戏中通过触屏完成民歌乐句的拼接与续写；更可利用内置的AI生成模型，输入关键词（如“丰收”“离别”）后，自动生成一段风格匹配的旋律动机或歌词片段，极大激发了公众的创作兴趣。对于专业研究者与创作者，则提供了更为强大的“民歌数字实验室”平台，该平台支持对海量民歌数据进行音乐信息检索（MIR）、旋律线条可视化对比、多版本流变谱系分析及风格聚类。这些工具不仅提升了研究效率，也为音乐创作提供了基于文化本体的灵感来源与分析依据，使创新创作植根于深厚的传统脉络之中。

### （三）内核解译与语言再生，聚焦方言保护与创新性表达

民歌的艺术灵魂，深深植根于其方言唱词与地方性音乐语汇之中。在数字时代推进民歌保护，必须紧扣这一核心，实现从表层“声音保存”向深层“语言—文化系统传承”的跃升。具体而言，可从以下两方面展开实践：

#### 1. 方言唱词的精细化数字解析

应联合语言学、语音学专业力量，对民歌中的方言词汇、语法结构以及演唱中的特殊音色、装饰音等进行系统性声学标注与语言学建档。此举不仅是为现有资料建立档案，更是为后续开发方言语音合成引擎和智能译注系统奠定基础。例如，对陕北民歌中的“叠字”“拖腔”进行音高、频谱与发音位置的量化分析，能够为方言的数字化留存与再现提供模型支撑。由此，即便未来方言使用环境变迁，其内在于民歌的语言精髓仍可借助技术手段得以延续与重新诠释。

#### 立足本体的创新艺术转化

鼓励音乐家与数字艺术家以民歌核心元素——如特色音阶、节奏型、方言音韵及其文化意象——为“文化基因”，开展面向当代音乐、数字艺术、游戏动画等领域的跨界创作。例如，可将黄河号子的节奏律动转化为电子音乐的节奏基底，或借助民歌旋律生成算法设计交互式声音艺术装置。这类实践并非简单改编，而是基于文化内涵的创造性转译，旨在与当代审美对话，培育新的受众与文化消费模式，使民歌真正融入当代文化生产与传播体系。

总之，黄河三角洲民歌在数字时代的存续，应走一条以系统性保护为框架、以数字技术为支撑、以价值转化为导向的综合路径。其根本目标，是让这份源于黄河水土与劳动生活的有声遗产，在数字文明土壤中焕发新生，生长出既能连接历史与未来、又能沟通地方与世界的新型文化形态，最终实现从“亟待抢救的遗产”向“可持续循环的文化资源”的根本转变。

### 结语

黄河三角洲民歌，是黄河文明在河口冲积平原上孕育出的声音史诗，承载着移民拓荒的集体记忆、人地调适的生态智慧与地域社群的审美情感。它不仅是一种民间音乐形式，更是理解该区域历史层累、社会变迁与文化认同的“有声文献”。面对现代化进程中传承语境的结构性变迁，对其实施的抢救与保护，本质上是对一种地方性知识体系及其承载的文明片段的紧急存续。

当前，以数字技术为核心驱动的系统性保护实践，标志着黄河三角洲民歌的传承范式正在发生深刻转型。这一转型的核心，在于从静态的“标本式”保存转向动态的“生态化”维育。通过高精度数字化采集与结构化建档，我们实现了文化遗产本体的“数字永生”，夯实了“守正”的根基；而通过构建多维度传承网络、开发沉浸式体验场景、

<sup>5</sup> “黄河乡音”APP为山东省非遗保护中心于2023年上线的公益性应用，目前已收录黄河三角洲地区民歌超过200首，并提供交互式学习模块。

推动基于文化本体的创新转化,我们则是在数字空间与社会空间中,为其重建或嫁接新的生存与发展生态,践行了“创新”的路径。数字技术在此过程中,已从辅助性工具演变为重塑传承关系、激活文化内在创造力的关键性赋能要素。

这一探索的价值,超越了单一非遗项目存续的范畴。它为同类依托于特定生产生活方式、面临“语境抽离”危机的口头传统,提供了一套可资借鉴的方法论框架:即以数字化存档确保文化基因的稳定传承,以技术性转译促进其在当代的认知与接受,最终通过创造性发展实现其文化价值的现代转化与再生。这不仅有助于维系中华文化基因谱系的多样性与完整性,也为全球范围内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数字时代的“可持续活态化”这一共同命题,贡献了立足于中国本土经验的思考与实践。

展望未来,黄河三角洲民歌的“活态”之路,仍需在技术理性与人文温度、本体坚守与跨界创新、社区根基与全域传播之间寻求动态平衡。唯有如此,这条源自历史长河的声音涓流,方能不息奔涌,持续汇入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壮阔海洋。

#### 参考文献:

- [1] 刘魁立.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共享性、本真性与人类文化多样性发展[J].山东社会科学,2010(3): 24-27.
- [2] 包媛媛.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民族地区文化生态的重建[J].四川戏剧,2016(10): 112-116.
- [3] 刘清. 黄河三角洲民歌地域色彩及成因探微[J].山东艺术,2023(4): 24-33.
- [4] 张逸勤,邓三鸿,王凡铭,王昊,等.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下的数字人文学科研究:发展趋势与演进逻辑[J].辽宁经济职业技术学院.辽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25(6):181-192.
- [5] 肖鹰. 数字人文与文化遗产的活化[J].学术研究,2019(11): 34-40.
- [6] 毕翔,葛宇,程秀峰等.活动理论视域下文化遗产数字化传播服务的价值体现、场景应用与实现路径[J].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25(10): 12-23.

## Digital Empowerment and Ecological Reconstruction: A Study on the Living

### Inheritance Path of Folk Songs in the Yellow River Delta

Song Yong<sup>1</sup>

<sup>1</sup>*Qingdao Preschool Education College, Qingdao City, Shandong Province, China*

**Abstract:** As a unique oral art form nurtured by the distinctive geographical ecology and immigrant reclamation culture of the Yellow River Delta in China, folk songs of the region are confronted with multiple crises amid modern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including the discontinuity of inheritors, the disappearance of original performance venues, and the intensification of dialect barriers. Consequently, the traditional inheritance mode of “oral instruction and heart-to-heart transmission” is no longer sustainable. Based on field investigations conducted in core inheritance areas such as Dongying and Binzhou, this paper proposes contemporary practical principles centered on “rescue-oriented conservation as the foundation, innovative development as the guidance, and living inheritance as the essence”, and constructs a collaborative protection system empowered comprehensively by digital technologies. The study argues that permanent and structured preservation of endangered resources can be achieved through high-fidelity audio collection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multimedia databases; technical bottlenecks in inheritance can be overcome with the suppor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assisted notation and dialect speech recognition; and the communication ecology of folk songs in communities, campuses and digital spaces can be reshaped via new media communication, virtual reality performances, and integrated cultural-tourism scenarios. Ultimately, this paper explores how digital technologies drive the transformation of folk songs in the Yellow River Delta from “cultural relics” to “living cultural resources”, providing a referential paradigm with both methodological significance and practical pathways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similar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tems.

**Keywords:** Folk Songs of the Yellow River Delta; Digital Technology;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Living Inheritance; Rescue-oriented Conservation; Innovative Development

# 精准资助转型升级：职业院校“经济-技能-就业”一体化路径研究

杨军<sup>1</sup> 于迅<sup>1</sup> 黄博文<sup>1</sup>

(1.四川城市职业学院, 四川 成都 610110)

**摘要:** 随着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深入推进, 传统以单一经济帮扶为主的资助模式已难以满足职业院校学生成长成才的现实需求, 亟待向“发展型”资助转型升级。本研究聚焦职业院校精准资助工作, 针对当前存在的识别滞后、动态调整缺失、与技能就业脱节等现实问题, 以“数据驱动”和“类型适配”为核心视角, 提出了构建“经济保障—技能赋能—就业衔接”三位一体的精准资助路径。研究综合运用文献分析、案例研究、问卷调查与行动研究等方法, 阐述了建立多维动态识别指标体系、搭建数据互联平台、创新校企协同资助机制等核心观点与实施策略。研究表明, 该一体化路径能有效提升资助的精准性、实效性与发展性, 对于推动职业院校资助工作从“兜底保障”向“成长赋能”转型, 促进学生高质量就业与职业教育内涵式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关键词:** 精准资助; 职业院校; 技能赋能; 就业衔接; 一体化路径

DOI: doi.org/10.70693/rwsk.v2i3.276

## 一、引言

职业教育作为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促进就业创业的重要途径, 其学生资助工作是保障教育公平、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助力学生成长成才的关键环节。当前, 我国已建立起较为完善的学生资助政策体系, 基本实现了“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的庄严承诺。然而, 伴随着职业教育类型特征的不断彰显和“就业导向、技能为本”培养目标的深化, 传统学生资助模式在职业院校这一特定场域中逐渐暴露出“识别难、施策粗、效益低”的深层次矛盾。资助工作往往与经济帮扶简单等同, 未能与学生核心的“技能习得”和“就业发展”需求有效衔接, 存在“重保障、轻发展”的倾向, 导致资助资源的使用效益未能最大化, 资助的育人功能未能充分发挥。

《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十四五”职业教育发展规划》等政策文件均明确提出要“完善精准资助机制, 提高资助精准度和有效性”。这为职业院校学生资助工作的转型升级指明了方向: 即从过去粗放的、静态的、单一的经济资助, 转向精细的、动态的、综合的发展型资助。本研究立足于此政策背景与现实需求, 旨在探索一条契合职业教育规律、服务学生全面发展、贯通“经济帮扶—技能提升—稳定就业”的精准资助一体化创新路径, 以期提升职业院校资助工作科学化水平、助力学生高质量就业与职业院校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方案。

## 二、职业院校精准资助的现实困境与转型诉求

近年来, 围绕“精准资助”的理论与实践探索不断深入, 但在职业院校的具体实践中, 仍面临以下突出困境, 构成了转型升级的内在诉求:

### (一) 数据壁垒导致识别精准性不足

精准资助的前提是精准识别。目前, 多数职业院校的资助对象识别主要依赖学生入学时提交的家庭经济困难

**作者简介:** 杨军 (1995—), 男, 博士在读, 讲师, 研究方向为职业教育;

于迅 (1995—), 女, 硕士, 讲师, 研究方向为职业教育;

黄博文 (2004—), 男, 本科在读, 研究方向为职业教育。

**通讯作者:** 杨军

认定材料,数据来源单一、静态化特征明显。学籍、教务(如课业表现、技能实训成绩)、实习管理(如顶岗实习单位、津贴)、就业服务等反映学生阶段性发展状态的关键数据,与资助系统之间缺乏有效联通。学生家庭突发变故、个人学习投入波动、技能成长需求变化等信息难以及时捕捉,导致资助响应滞后,“应助未助”或“助非所需”的情况仍有发生。

## (二) 静态模式难以实现动态调整

现有资助多采取“学年评定、按学期发放”的固定模式,缺乏贯穿学生从入学到就业全过程的动态监测与调整机制。职业院校学生普遍经历校内学习、企业实训、顶岗实习等多个阶段,其经济状况、技能需求、就业压力处于动态变化中。例如,学生在顶岗实习期间可能面临租房、通勤等新增成本,或在备战重要职业技能竞赛时需要额外投入。传统的静态资助无法灵敏响应这些阶段性、个性化的资助需求变化。

## (三) 资助内容与学生核心需求脱节

职业教育以促进就业为导向,以提升技能为核心。然而,现有资助的着力点大多局限于学费减免、生活补助等经济层面,未能与学生最关切的职业技能提升、职业资格证书考取、实习岗位对接、就业竞争力锻造等发展性需求深度融合。“资助”与“育人”、“资助”与“就业”存在“两张皮”现象。这使得资助在解决学生短期经济困难后,对其长期职业发展的助推作用有限,未能将经济资本有效转化为学生的人力资本,资助的“发展性”功能弱化。

## (四) 类型特征适配性研究有待深化

相较于普通教育,职业教育具有鲜明的“校企合作、工学结合、产教融合”类型特征。现有关于精准资助的研究与实践,大多沿袭普通教育的思路,未能充分考量企业作为重要育人主体在资助体系中可能扮演的角色。如何利用企业资源(如设立企业奖学金、提供带薪实习岗位、承担部分培训费用),如何在校企协同中精准识别和帮扶实习期间遇到困难的学生,如何构建学校、企业、政府多元参与的资助生态等问题,尚缺乏系统性的机制设计和深入的实证研究。

## 三、“经济-技能-就业”一体化路径的核心内涵与理论框架

针对上述困境,职业院校精准资助的转型升级,必须跳出单一经济维度的窠臼,构建一个以学生全面发展为中心、贯通学业与职业的整合性支持体系。本研究提出的“经济-技能-就业”一体化路径,其核心内涵在于:

以精准的经济保障为基础,以系统的技能赋能为核心,以顺畅的就业衔接为目标,通过机制创新与技术赋能,将资助工作深度融入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全过程,实现从“保障型”资助向“发展型”资助的根本性转变。

该路径的理论框架可构建如下:遵循“问题诊断—模型构建—实践验证—总结推广”的逻辑主线。在“问题诊断”阶段,通过多方法调研厘清现状与痛点;在“模型构建”阶段,围绕“三维识别指标体系”、“数据驱动平台”和“校企协同机制”三大支柱进行设计;在“实践验证”阶段,选取试点进行行动研究,迭代优化模型;最终形成可复制推广的“总结”成果。

### (一) 核心支柱一: 构建多维度、动态化的精准识别指标体系

精准施策的前提是精准画像。职业院校的资助对象识别,应建立涵盖“经济状况”、“学业与技能发展”、“职业发展需求”三个维度的综合指标体系。

#### 1. 经济状况维度

除传统的家庭收入、人口负担、突发变故等指标外,应纳入学生在校期间的消费数据(经脱敏处理)、实习期间的收支情况等动态信息,更全面、实时地反映其经济压力。

#### 2. 学业与技能发展维度

引入课堂出勤率、理论课成绩、实训项目完成度、技能竞赛参与及获奖情况、职业资格证书获取进度等指标。这些指标不仅能间接反映学生因经济压力导致的学习投入不足（预警），更能主动识别出那些有强烈技能提升意愿但受经济条件制约的“发展型”困难学生。

### 3. 职业发展需求维度

关注学生的就业意向行业与岗位、求职技能培训需求、实习岗位适配度、就业心理压力等。通过问卷、访谈、就业系统数据等方式，捕捉学生在求职就业环节遇到的特殊困难，如赴外地面试的交通成本、购置特定职业装束的费用、创业启动资金短缺等。

这三个维度的指标相互印证、动态更新，共同构成对学生“经济-发展”需求的立体画像，为差异化、个性化资助方案的制定提供科学依据。

## （二）核心支柱二：打造数据贯通、智能预警的精准资助支持平台

打破数据孤岛，是实现动态精准识别的技术基础。应探索构建“职业院校精准资助大数据平台”，该平台致力于：

### 1. 内部数据整合：

打通校内学生管理、教务管理、实习管理、就业服务、一卡通消费等多个业务系统，实现学生全周期数据的自动采集与汇聚。

### 2. 外部数据联通：

在合法合规且保护隐私的前提下，探索与民政、乡村振兴、残联等部门的数据比对通道，提高家庭经济状况核验的准确性。

### 3. 智能预警模型：

基于多维识别指标体系，利用数据分析技术构建预警模型。模型可自动识别出“经济指标突然恶化”、“技能成绩显著下滑”、“就业进展长期停滞”等异常模式，主动向资助管理者和辅导员推送预警信号，变“学生申请”为“主动发现”，变“事后补救”为“事前干预”。

### 4. 决策支持功能：

平台可根据学生画像，为资助工作者提供包括经济补助额度、推荐技能培训项目、匹配实习就业机会等在内的个性化资助方案建议。

## （三）核心支柱三：创新权责清晰、多方共赢的校企协同资助机制

职业教育的特点决定了企业必须是资助生态的重要参与者。需设计一套激励相容的校企协同资助机制：

### 1. 共同识别机制：

企业导师与学校辅导员共同关注实习学生的状态，及时反馈学生在实习期间可能遇到的经济、技能或心理困难，纳入学校的动态识别系统。

### 2. 多元投入机制：

鼓励企业设立面向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专项“技能奖学金”或“实习津贴”，对考取关键职业资格证书、在技能竞赛中获奖、或实习表现优异的学生给予额外奖励。学校可将部分资助资金与企业资金配套，用于支持学生参与企业定制培训项目。

### 3. 发展衔接机制：

建立“资助-实习-就业”衔接通道。学校优先推荐受助学生进入合作企业的优质实习岗位；企业可将表现优异的受助学生列为重点录用对象，甚至签订预就业协议。实现“资助一位学生，培养一名技工，解决一个就业”。

### 4. 评估反馈机制：

学校与企业共同参与对协同资助效果的评估，追踪受助学生的技能成长与就业质量，不断优化合作模式。

#### 四、一体化路径的实施策略与保障措施

为确保“经济-技能-就业”一体化路径的有效落地，需要系统性的实施策略与坚实的保障措施。

##### (一) 实施策略

###### 1. 分阶段推进，试点先行：

选择在数据基础较好、校企合作深入的院校先行试点。从完善多维识别指标、搭建简易数据看板开始，逐步扩展到开发智能预警功能、建立规范的校企协同流程。通过试点积累经验，再逐步推广。

###### 2. 业务流程再造，部门协同：

一体化路径要求打破校内部门壁垒。需成立由校领导牵头，学生资助、教务、实习就业、财务、信息化等部门共同参与的工作专班，重组资助工作流程，确保数据共享流畅、业务衔接紧密。

###### 3. 分类施策，项目化运作：

根据三维识别指标体系的结果，设计差异化的资助“套餐”。例如：对于“经济困难型”学生，以助学金、生活补贴为主；对于“技能发展需求型”学生，提供“技能考证补贴”、“竞赛培训资助”；对于“就业困难型”学生，提供“求职交通补贴”、“职场能力培训”。通过设立具体的资助项目，实现精准滴灌。

###### 4. 强化隐性资助与心理赋能：

在提供显性经济与资源支持的同时，注重保护学生隐私和自尊，推广使用校园卡“隐形”充值、发放实物领取券等方式。加强受助学生的思想引导、心理疏导和励志教育，培养其自强不息、感恩回馈的健全人格。

##### (二) 保障措施

###### 1. 组织与制度保障：

学校应将精准资助转型升级纳入重点工作，制定配套的管理办法和实施细则，明确各部门职责与考核激励。建立常态化的校-企-政沟通协调机制。

###### 2. 技术与数据保障：

加大对资助信息平台建设的投入，确保其安全性、稳定性和扩展性。建立健全数据管理规范与隐私保护制度，确保数据合法合规使用。

###### 3. 人员与能力保障：

加强对资助工作人员、辅导员、企业导师的专题培训，提升其运用数据进行分析、识别需求、链接资源、开展发展性辅导的专业能力。

###### 4. 经费与资源保障：

在统筹用好各级财政资助资金的基础上，积极拓宽资金来源，吸引企业、社会组织和校友设立发展型资助基金。优化校内经费分配，确保有足额资源用于技能赋能和就业衔接类资助项目。

#### 五、结论与展望

职业院校学生资助工作的转型升级，是新时代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必然要求。本研究提出的“经济-技能-就业”一体化路径，旨在回应这一要求，其核心价值在于实现了三个“转向”：

资助目标从“保障学业”转向“促进发展”；资助内容从“单一经济”转向“综合赋能”；资助机制从“学校主导”转向“多元协同”。

通过构建三维识别指标体系，提升了资助的“精准度”；通过打造数据驱动平台，提升了资助的“灵敏度”；通过创新校企协同机制，提升了资助的“融合度”。最终，使得资助工作不仅能解学生一时之困，更能为其技能成才、人生出彩提供持续助力，真正将资助资源转化为提升人力资本、促进高质量就业的有效动能。

当然，这一路径的全面实施仍面临诸多挑战，如跨部门数据共享的体制机制障碍、企业参与积极性的持续激

发、贫困学生心理引导的深化等。未来研究与实践需在以下方面进一步深化：一是加强跨区域、跨院校的比较研究，提炼更具普适性的模式；二是深化对资助成效的长期追踪与评估研究，用实证数据检验一体化路径对学生长期职业发展和社会流动的影响；三是探索将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技术更深度地应用于精准识别与资源匹配，进一步提升资助的智能化水平。

总之，推动精准资助转型升级，构建“经济-技能-就业”一体化支持体系，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政府、学校、企业、社会形成合力。唯有如此，才能让职业院校的资助工作更有温度、更有力度、更有深度，为培养更多大国工匠、能工巧匠，畅通技能人才发展通道贡献应有的力量。

参考文献:

- [1]教育部. 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Z]. 2019.
- [2]财政部, 教育部. 学生资助资金管理办法[Z]. 2021.
- [3]张男星. 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内涵与路径[J]. 教育研究, 2022(03):89-98.
- [4]李术蕊. 精准资助视域下职业院校学生资助体系的构建[J]. 职业技术教育, 2021(28):65-69.
- [5]陈衍. 职业教育类型特征的再认识[J].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2023(09):15-21.
- [6]赵伟. 校企协同视角下职业院校资助模式创新研究[J]. 职业教育研究, 2022(07):23-27.
- [7]周建松. 职业院校学生发展与资助工作协同机制研究[J]. 中国高教研究, 2022(06):91-95.
- [8]王建军. 精准资助的评估体系构建研究[J]. 教育财会研究, 2021(02):56-62.
- [9]张晓东. 职业院校顶岗实习学生资助问题研究[J]. 职业技术, 2023(03):45-49.
- [10]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全球职业教育发展报告(2022)[M].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23.

##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Precise Funding: Research on the "Economy-Skills-Employment" Integrated Path in Vocational Colleges**

**YangJun<sup>1</sup>, Yu Xun<sup>1</sup>, Huang Bowen<sup>1</sup>**

<sup>1</sup>*Urban Vocational College of Sichuan, Sichuan, Chengdu,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in-depth advancement of high-quality vocational education development, the traditional funding model centered solely on economic assistance can no longer meet the practical needs of vocational college students for growth and success, and there is an urgent need to transform and upgrade to a "development-oriented" funding model.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precise funding work in vocational colleges. Addressing the current practical issues such as lagging identification, lack of dynamic adjustments, and disconnection from skill-based employment, it proposes a trinity of precise funding paths—"economic security, skill empowerment, and employment connection"—from the core perspectives of "data-driven" and "type-adaptive". By comprehensively applying methods including literature analysis, case studies, questionnaire surveys, and action research, the study elaborates on core viewpoints and implementation strategies such as establishing a multi-dimensional dynamic identification indicator system, building a data interconnection platform, and innovating a school-enterprise collaborative funding mechanism. Research shows that this integrated path can effectively enhance the precision, effectiveness, and developmental nature of funding. It holds significan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value for promot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funding work in vocational colleges from "basic guarantee" to "growth empowerment", and for advancing high-quality employment of students and the connotative development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Keywords:** Precise Funding; Vocational Colleges; Skill Empowerment; Employment Connection; Integrated Path

# 伟大抗战精神融入大学生思政教育实践路径研究<sup>1</sup>

王一泽<sup>1</sup>

(1.锦州医科大学, 辽宁 锦州 121000)

**摘要:**伟大抗战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谱系的“鲜亮底色”,“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担当精神、“舍生取义,宁死不屈”的英勇顽强精神、“不怕万死、敢打必胜”的民族气概、“百折不悔、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是新时代的思政育人不可或缺的宝贵资源。高校思政教育嵌入伟大抗战精神是高校立德树人、担当民族复兴的时代新人要求。本文系统梳理和总结伟大抗战精神的内涵和当代价值,结合新时代思政育人特色,探寻“讲好、进好、课堂外”的实践方式,推进新时代抗战精神教育进课堂进头脑进心扉。

**关键词:**伟大抗战精神;大学生思政教育;实践路径;全链条育人

DOI: doi.org/10.70693/rwsk.v2i3.277

## 一、伟大抗战精神的核心内涵与时代价值

郭泽亮(2024)从“用好红色资源,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sup>[3]</sup>的党的二十大精神出发,认为伟大抗战精神(1931—1945)属于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其中蕴含着何燕青“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主义精神和“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勇战斗精神,可以作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素材。邢君(2022)在硕士论文中提出“爱国主义、民族气节(民族气节包含民族英雄)、英雄气概、必胜信念”是抗战精神的四个方面<sup>[5]</sup>。何燕青等(2025)认为抗战精神有“精神之魂、精神之骨、精神之钙”的作用,对于大学生的理想信念、责任意识等有着积极的能动价值<sup>[4]</sup>。

### (一)核心内涵的科学阐释

伟大抗战精神是诞生于十四年抗战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家国情怀和全民抗战救亡图存的自觉担当;“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为国牺牲的民族气节,杨靖宇、赵尚志“青山不老、烈火不灭”;“不怕牺牲、不怕牺牲、流血不止”的为民族牺牲的战争英气,浴血奋战平型关、百团大战人民坚毅顽强;“百折不挠、坚忍不拔,毫不投降、决不放弃”的为国抗战到底的民族精神,支撑中华民族抗战胜利的浴火过程。伟大抗战精神传承和弘扬了“先天下之忧而,后天下之乐而”的中华传统文化,中国共产党人精神的内源性,与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脉传承、高度契合。

### (二)时代价值的多维彰显

对于新时代、新征程上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抗战精神有着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作为政治资源,它是党的建设的生动教材,弘扬党在抗战中发挥的砥柱作用精神,有利于领导干部塑造正确政绩观;作为文化资源,它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教材,弘扬其爱国精神、民族气节等价值观念,有利于培育新时代青年的价值取向;作为战略资源,它是中国梦的生动教材,“必胜信念”的精神,有利于激发青年投身中华民族复兴伟业的热情。毛泽东同志指出,抗战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醒和团结,而这种觉醒和团结的程度,是近百年来前所未有的。黄秋香等(2024)认为,将抗战精神融入“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中国历史”“抗日战争史”等历史课程中,通过以案例、情景等教学手段对大学生进行价值引导<sup>[2]</sup>。

## 二、当前大学生思政教育融入抗战精神的现状分析

### (一)课程体系构建失衡

**作者简介:**王一泽(2001—),男,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

**通讯作者:**王一泽

课程体系系统性失衡性风险：抗战精神与民族复兴作为国家级通识课程，易犯“重理论轻实践”的毛病，如果脱离地方抗战史、个人抗战故事，极容易形成“国家—社会—个人”三级叙事脱节，如高校开设《地方抗战史》选修课时，只是罗列地方抗战资料如山西抗战文化、东北抗联精神等内容，没有进一步延伸至“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爱国情怀，没有从顶层设计贯彻到底层，起不到价值传递的作用。

个体故事教学效果不理想：《抗战家书品读》这类特色课程如果仅仅停留“读—读家书”，而不是引导学生对左权将军“为了民族解放”的初心理解、张自忠“为国家民族而死之决心”的担当理解，就起不到“寓教于事、化理于情”的目的。一些高校微课出现了“只创新形式，不创新内容”的窘境，比如“抗战精神代代传”微课采用“微视频+问答交流”，没有“家书语境—精神实质—时代价值”的逻辑串联，就会让学生“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 （二）情境体验形式化

技术赋能的“形式化陷阱”。AR再现淞沪会战等历史场景，若只注重“可视性”而忽略“灵魂性”建设，就会掉入“炫技的陷阱”，如高校建设抗战文化长廊，若只以AR为“可视的历史”，缺乏“历史场景—灵魂价值”的预设与定向建设，学生“看热闹”可能多过“宁死不屈、浴血奋战”的英雄主义。

校外实践基地“浅表化利用”：与八路军太行纪念馆共建校外实践教学基地，如果没有“重走抗战场”实践体验环节，没有“写战地日记”“回顾历史”等体验环节，只是简单地参观和游览，很可能造成“到此一游”的印象，从“走”到“认同”的转化就无从谈起。山西传媒学院“宿舍红色文化建设”如果仅仅是“一舍一品”活动，而没有“宿舍公约—日常行为—精神传承”的闭环，很容易形成“有活动无教育”的情况。

## （三）育人网络同质化

线上平台“内容同质化”风险：“抗战精神学习APP”如果只设置了“历史记忆”“英雄故事”“互动测试”三大板块，没有结合Z世代青年认知特点推出“抗战精神青年说”“家书背后的故事”等内容，易造成学生的“审美疲劳”。有些高校“云上思政”平台存在“重建轻管”现象，例如微信公众号“抗战家书每日一读”栏目没有“内容策划—用户反馈—迭代优化”流程，容易造成“闭门造车”现象。

线下活动“参与性不高”：在“抗战精神进宿舍”活动中，仅让党员带团员参加“读书会”“故事会”而没有“抗战精神主题辩论赛”“微电影创作大赛”等，易导致活动参与性不强。电子科技大学“全链条育人模式”没有“课堂理论—平台体验—基地实践—网络延伸”的动态反馈，则容易出现“理论脱节”现象，效果不佳。

## 三、实践路径创新设计

### （一）构建“宏大叙事+个体故事”的课程体系

以“小切口、大切口、大视野”为宗旨，打造“国家—社会—个人”三元叙事。从国家层面，建设《抗战精神与民族复兴》的公共课程，讲述抗战精神的深层内涵与时代意义；从社会层面，开设《抗战史》选修课程，发掘山西抗战史、东北抗联精神等地方资源；从个人层面，建设《抗战家书品读》课程，通过诵读左权将军家书，读张自忠家书等方式，做到“以事说理、以人感人”。如华中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抗战精神代代传”微课，以“微视频+提问+答案”，把历史故事转化为学生身边的故事，将抗战精神传递给学生。

### （二）打造“沉浸式+体验式”的教育场景

利用校内校外红色资源，搭建“三场实景”情境体验平台。校内建立抗战文化墙，通过AR技术展现淞沪会战等，让历史“看得见”；校外与“八路军太行纪念馆”等共建校内校外体验基地，通过实地参观“重走抗战之路”，增强历史感；网络上建立“数字博物馆”，让抗战历史场景全景展现，形成“线上精神故乡”。山西传媒学院首次提出并实施了“宿舍红色文化建设”项目，通过“一舍一品”评选优秀宿舍，制定宿舍公约，将“抗战精神”融入宿舍的点滴小事中，达到“润物无声”的效果。

### （三）构建“线上+线下”的育人网络

整合“三微一端”新媒体，构建“云上思政”。网络平台上开发“抗战精神学习APP”，开设“历史记忆”“英雄故事”“互动测试”三个板块，形成“学—思—践”合一的教育；线下活动开展“抗战精神进宿舍”活动，由党员带领团员学习抗战历史，通过“读书会”“故事会”等形式，深化学习。电子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全链条育人模式”探索“课堂理论导引—平台情境体验—基地实践深化—网络资源延展”从课堂延伸到基地，从校内环境到校外环境，从线上到线下，形成了时时可学、处处能学的育人局面。

伟大抗战精神是民族的宝贵财富，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是一个系统工程，“叙事—情境—平台—协同”四大路径建设，实现理论阐释和体验实践的全程育人，校内教学和社会实践的全面育人。四链式育人，可以使大学生形成民族自豪感和认同感，更可以促进大学生为实现民族复兴伟业而奋斗。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伟大抗战精神，永远是激励中国人民战胜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强大精神动力”。加强伟大抗战精神的学习，是民族精神赓续和育人时代新人之时代所需。

参考文献：

- [1]杜志刚, 张文涛. 伟大建党精神融入大学生思政教育的实践路径探析[J]. 海南开放大学学报, 2023, 24(2): 16-23.
- [2]黄秋香, 陈梁威. 伟大建党精神融入大学生党性教育的实践路径[J]. 新丝路, 2024, 33: 109-111.
- [3]郭泽亮. 党的二十大精神融入大学生思政教育实践路径探索[J]. 党史文苑, 2024, 8: 72-74.
- [4]何燕青, 黄晓通. 伟大抗战精神融入高校思政教育的价值与路径探析[J]. 新生代, 2025, 5: 71-77.
- [5]邢君. 伟大抗战精神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D]. 闽南师范大学, 2022.
- [5] 贾东琴, 柯平. 面向数字素养的高校图书馆数字服务体系研究[C]//中国图书馆学会. 中国图书馆学会年会论文集:2011年卷.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1:45-52.
- [6] ETROWSKI A. A clearing procedure as a niching method for genetic algorithms[C]//Proceedings of the 3rd

## A Study on the Practical Approaches to Integrating the Great Spirit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into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Yize Wang<sup>1</sup>

<sup>1</sup>Jinzhou Medical University, Jinzhou, Liaoning

**Abstract:** The spirit of the great resistance war is the "bright background color" of the national spirit spectrum of the Chinese nation. The spirit of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world is the responsibility of every individual", the heroic and tenacious spirit of "sacrificing one's life for righteousness and never yielding even in the face of death", the national spirit of "not fearing death and daring to fight until victory", the spirit of "unwavering and unyielding" and the belief of "persevering without giving up and being determined to win" are indispensable precious resources for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Embedding the spirit of the great resistance war i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universities is the requirement for universities to cultivate new era individuals who are responsible for the national rejuvenation and to promote the education of the spirit of the great resistance war into classrooms, minds and hearts. This article systematically sorts out and summarizes the connotation and contemporary value of the spirit of the great resistance war, combin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explores the practical methods of "telling well, conducting well and beyond the classroom", and promotes the education of the spirit of the great resistance war into classrooms, minds and hearts.

**Keywords:** The spirit of the great war of resistanc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for college students; Practical approach; Whole-process education

# 社会工作嵌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逻辑、实践路径 与效能提升

付应岑<sup>1</sup>

(1.新疆和田学院, 新疆 和田 848000)

**摘要:**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发展需回应新时代学生的个性化需求与社会转型的现实挑战。本文从价值理念、目标取向与方法技术三个维度, 系统剖析社会工作与高校思政教育的深层契合性, 提出“理念内化-方法转化-场景应用”的三维融合框架, 探索思政工作者自主运用社会工作核心理念与方法的实践路径, 并构建“队伍赋能-机制协同-评估创新”的效能提升体系。研究表明, 社会工作与高校思政教育的深度融合, 是实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增强思政教育实效性的必然选择, 可为新时代高校育人模式创新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参考。

**关键词:** 社会工作;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嵌入融合; 实践路径; 效能提升

DOI: doi.org/10.70693/rwsk.v2i3.287

在社会结构转型加速与价值观念多元化交织的时代背景下, 传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面临多重现实困境: 单向灌输式的课堂教学难以激发学生的主动性与参与感, 内容设计与学生的学业、心理、就业等现实需求存在脱节, 教育者与学生之间的沟通存在“自上而下”的壁垒, 部分思政工作者因缺乏心理学、社会学知识储备, 难以提供个性化的育人服务。

近年来, 我国专业社会工作体系逐步成熟, 青少年社会工作的服务模式与方法技术为思政教育创新提供了新的思路。现有研究已证实二者在价值理念与方法技术层面的契合性, 但多数研究聚焦于专业社工队伍的引入, 对思政工作者自主运用社工理念与方法的实践路径探讨不足。本文认为, 无需完全依赖外部专业社工队伍, 思政工作者通过内化社工理念、转化专业方法, 即可实现与思政教育的深度融合, 构建本土化的育人模式。

## 一、理论契合性：社会工作与高校思政教育的内在关联

### (一) 价值理念同源：“助人自助”与“立德树人”的统一

社会工作的核心理念是“助人自助”, 强调尊重服务对象的主体地位, 通过专业方法帮助其挖掘自身潜能以实现自我发展。高校思政教育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 聚焦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坚持以学生为中心, 依托“大思政课”与“三全育人”体系, 在回应需求中实现价值引领与成长赋能。二者均以“以人为本”为核心价值, 既关注个体的现实需求, 也重视其长远发展, 共同指向人的全面发展。

这种理念契合不仅是专业领域的共识, 更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仁爱”思想深度共鸣。儒家“仁者爱人”的思想强调对他人的关怀与帮助, 与社会工作的“助人”理念一脉相承。“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追求, 则与思政教育的育人目标高度契合。将这种文化基因融入融合实践, 可避免对西方社工经验的简单照搬, 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思政+社工”育人模式。

### (二) 目标取向同频：价值引领与社会适应的结合

高校思政教育以价值引领为核心, 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 培养社会责任感与家国情怀。社会工作以社会适应为重点, 通过专业服务帮助学生解决实际问题, 提升适应社会的能力。二者目标取向同频互补: 思政教育为社会工作提供价值方向, 确保育人过程始终坚持正确的意识形态导向。社会工作为思政教育提供实践载体, 通过解决学生的现实困惑, 使价值引领更具实效性。

例如, 针对贫困大学生群体, 思政教育引导其树立自立自强的价值观, 思政工作者运用“优势视角”挖掘学生的潜能与优势, 为其制定个性化的学业支持与职业发展方案, 在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实现思想引导, 实现了

**作者简介:** 付应岑(1996-), 男, 硕士, 助教, 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工作。

“扶志”与“扶智”的有机统一。

### （三）方法技术互补：从单向灌输到双向互动的转变

传统思政教育以课堂讲授为主，注重意识形态的单向传递，容易导致“知而不行”的现象。社会工作则强调通过个案、小组等方法实现与服务对象的双向互动，注重问题解决与能力提升。将社会工作的方法技术嵌入思政教育，可有效弥补传统模式的不足。例如，个案工作的倾听、接纳技术可提升个别谈心的实效性，小组工作的团体动力技术可增强群体教育的吸引力，社区工作的资源整合技术可拓展思政教育的场域，实现“价值引领”与“问题解决”的有机统一。

## 二、实践路径：构建“理念内化-方法转化-场景应用”的融合框架

### （一）理念内化：树立新时代思政教育的专业理念

思政工作者需将社会工作的核心理念内化到日常工作中，树立三种专业理念：

**服务导向的教育观：**以“助人自助”为指导，将学生视为服务对象而非管理对象，关注学生的个性化需求，提供精准服务。例如，针对学业困难学生，不仅要进行纪律约束，更要帮助其分析学习困难的原因，制定个性化学习计划。

**优势视角的育人观：**聚焦学生的潜能与优势，而非仅仅关注问题与不足。例如，针对心理困惑学生，帮助其发现自身的支持系统（舍友、朋友、家人等）与应对能力，激发内在动力。

**系统整合的资源观：**将学生置于校园、家庭、社会的生态系统中，整合多方资源提供支持。例如，针对就业困难学生，联合专业教师、就业指导中心、用人单位等构建协同育人平台。

### （二）方法转化：将社工方法转化为思政工作的专业工具

思政工作者可将社会工作的三大方法转化为适合自身操作的思政工作工具：

**个案工作→精准育人档案制度：**将个案工作的核心技术转化为“精准育人档案制度”，为每位学生建立个性化档案，记录其思想动态、学业情况、心理状态等信息，通过定期沟通与评估，为学生提供针对性的指导与支持。例如，针对因挂科而产生厌学情绪的学生，思政工作者通过档案记录其学习情况与心理变化，与学生共同制定学习计划，定期跟进，帮助学生顺利通过考试。

**小组工作→主题式研讨工坊：**将小组工作的技术转化为“主题式研讨工坊”，围绕学生关心的话题设计活动，如“学业压力应对”“职业生涯规划”“价值观辨析”等。思政工作者作为工坊引导者，运用团体动力技术促进学生之间的互动交流，实现相互学习与支持。例如，开展“学业压力应对”工坊，通过“压力分享”“经验交流”“技巧学习”等环节，帮助学生掌握应对压力的方法，同时引导其树立正确的学习态度。

**社区工作→校园共同体建设：**将社区工作的资源整合技术转化为“校园共同体建设”，整合校园内的思政资源、学术资源、实践资源，构建“思政教师-班主任/辅导员-学生骨干”协同的实践平台。例如，开展各类志愿服务活动时，思政教师负责价值引领，班主任/辅导员负责技术指导，学生骨干负责组织实施，让学生在实践中了解国情、增长才干、树立理想。

### （三）场景应用：聚焦学生需求开展精准育人

针对不同学生群体的特点，运用社工理念与方法开展精准育人：

**少数民族大学生：**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核心导向，尊重其文化背景与生活习惯，通过“精准沟通”了解文化适应困惑，开展“中华民族多元文化交融沙龙”等活动，在弘扬优秀民族文化的同时强化共同体认同，同步提供学业支持与心理辅导，助力其融入校园生活与民族大家庭。

**贫困大学生：**运用“优势视角”挖掘其潜能与优势，开展“勤工助学经验分享会”“生涯规划工坊”等活动，帮助其明确职业目标，提升就业能力。整合学校、社会资源，提供经济帮扶与心理支持，构建“物质-心理-能力”三位一体的服务模式。

**心理困惑学生：**运用“精准沟通技术”进行心理疏导，构建“思政教师-心理委员-家长”三级心理支持网络，帮助学生解决心理问题，树立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开展“情绪调节工坊”等活动，教授情绪管理技巧，提升心理调适能力。

### 三、效能提升：构建融合的保障体系

#### (一) 队伍赋能：培养“思政+社工”复合型人才

高校应构建“双专业”培训体系，提升思政工作者运用社工理念与方法的能力：

基础理论培训：开展“社会工作理念与方法入门”培训，讲解“助人自助”“优势视角”等核心理念，以及个案、小组工作的基本技术。

场景应用培训：开展“思政场景下的社工方法应用”培训，结合思政工作实际，讲解“精准育人档案制度”“主题式研讨工坊”等工具的操作流程。

实践能力提升：组织思政工作者进行模拟案例演练、小组讨论等实践活动，提升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鼓励思政工作者参与社工实务项目，积累实践经验。

#### (二) 机制协同：建立融合的内部保障机制

高校应建立三大协同机制，推动社工理念与方法在思政教育中的常态化应用：

工作考核机制：将“精准育人档案建立数量”“主题式研讨工坊开展次数”“学生问题解决率”等纳入思政工作考核指标，激励思政工作者主动运用社工方法。

资源整合机制：建立“思政资源共享平台”，整合校内的思政资源、学术资源、实践资源，为精准育人提供支持。加强与校外社工机构的合作，引入专业资源提升育人水平。

交流研讨机制：定期组织思政工作者开展“思政+社工”交流研讨活动，分享实践经验，解决工作中的问题，形成学习共同体。邀请社工专家进行专题讲座，提升思政工作者的专业素养。

#### (三) 评估创新：构建“过程-结果”双维度评估体系

建立“过程性评估与结果性评估相结合”的评估体系，评估社工理念与方法嵌入思政教育的效果：

过程性评估：通过观察、访谈等方式，评估思政工作者运用社工理念与方法的情况，如“精准育人档案的建立与更新情况”“主题式研讨工坊的组织与实施情况”等。

结果性评估：通过问卷调查、访谈等方式，评估学生的思想观念、行为习惯、综合素质的变化，以及对思政教育的满意度。通过实践活动成果、用人单位反馈等，评估学生的社会责任感与实践能力。

### 四、实践案例与成效分析

#### (一) 山东青年政治学院“新青年”全人教育项目

山东青年政治学院以“全人教育”为理念，综合运用个案、小组、社区工作方法，开展新生适应工坊、“山青益学”计划、“益动”实践计划等特色服务。实践证明，该项目有效提升了学生的自我认知、人际交往能力与责任感，促进了思政教育工作者的理念转变与能力提升。例如，新生适应工坊通过“破冰游戏”“校园探索”等环节，帮助新生快速适应大学生活，提升了归属感与融入感；“山青益学”计划通过学习互助小组，帮助学业困难学生提升学习成绩，增强了学习自信心。

#### (二) 东莞理工学院“双工联动”协同育人模式

东莞理工学院引入专业社工队伍与思政教育队伍协同工作，在新生教育、心理健康服务、社区建设等领域取得显著成效。社工理念与方法逐渐渗透到思政教育中，改善了师生互动关系，丰富了教育方法与平台，提升了思政队伍的专业能力。例如，在新生教育中，社工运用小组工作方法开展“生涯规划”主题工坊，帮助新生明确职业目标；在心理健康服务中，社工运用个案工作方法为心理困惑学生提供专业辅导，提升了心理调适能力。

### 五、结论与展望

#### (一) 研究结论

社会工作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深度融合，是新时代思政教育创新发展的必然趋势。二者在价值理念、目标取向及方法技术层面的契合性，为思政工作者自主运用社工理念与方法提供了基础。通过构建“理念内化-方法转化-场景应用”的融合框架，思政工作者可有效突破传统模式的局限，提升育人实效性。实践案例表明，这种融合不仅能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还能促进思政工作者的理念转变与能力提升。

## (二) 未来展望

未来研究可从以下三个方向深化:

本土化模式探索: 结合我国高校实际情况, 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工介入思政教育模式, 避免照搬西方经验。例如, 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仁爱”思想融入社工理念, 构建“思政+社工+优秀传统文化”的育人模式。

数字化背景下的创新实践: 探索数字化技术在社工介入思政教育中的应用, 如运用大数据分析学生的思想动态与服务需求, 运用人工智能开展个性化辅导, 提升育人的精准性与实效性。

跨学科融合的育人机制: 加强思政教育与社会工作、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的融合, 构建跨学科的育人团队, 提升思政教育的专业性与科学性。

### 参考文献:

- [1]张萍萍,左斌峰,周秀华.“社会工作+思政教育”: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模式创新研究[J].铜陵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1,20(02):6-10+14.
- [2]程毅,刘军.“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工作”: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新模式探究[J].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33(01):102-107+116.
- [3]李向军.社会工作理念: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理念更新的新视角[J].青年探索,2011,(01):36-40.
- [4]王思斌.社会工作概论[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 [5]李煜.社会工作视角下新疆贫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存在问题及原因分析[J].电大理工,2016,(02):59-60.
- [6]成洪波.社会工作介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契合性、意义及其路径[J].思想教育研究,2014,(11):33-36.
- [7]汪雪娇.社会工作方法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运用[J].赤峰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13,29(13):185-187.
- [8]安民兵.社会工作视阈下少数民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思考[J].兵团教育学院学报,2014,24(05):24-27.
- [9]张书明.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工作路径选择[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6,(15):53-57.
- [10]高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的社会工作路径研究——基于山东青年政治学院的实践[J].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19,35(04):1-8.
- [11]张敏.社会工作和高校思政工作联动的理论与实践——基于东莞理工学院的实证研究[J].学理论,2018,(03):236-238.

## Embedding Social Work into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eoretical Logic, Practical Paths, and Effectiveness Enhancement

Yingcen Fu<sup>1</sup>

<sup>1</sup>Xinjiang Hetian College, Xinjiang, Hotan 848000, China

**Abstract:**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must respond to the personalized needs of students in the new era and the practical challenges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the deep compatibility between social work and colleg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from three dimensions: value concepts, goal orientation, and methodological techniques. It proposes a three-dimensional integration framework of "Concept Internalization - Method Transformation - Scenario Application", explores practical paths for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ors to independently apply the core concepts and methods of social work, and constructs an effectiveness enhancement system of "Team Empowerment - Mechanism Collaboration - Evaluation Innovation".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social work and colleg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s an inevitable choice to achieve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fostering virtue through education" and enhance the effectivenes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which can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ractical reference for the innovation of college education models in the new era.

**Keywords:** Social Work;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Embedded Integration; Practical Paths; Effectiveness Enhancement

# 财经素养教育与新农人职业技能培训融合研究

杨冬妮<sup>1</sup> 谭佳<sup>1,\*</sup>

(1.广西财经学院, 广西 南宁 530003)

**摘要:**农村经济的发展是乡村振兴的核心要素,将财经素养教育与新农人职业技能培训相融合,有助于充分发挥新农人在乡村振兴中的主体作用,推动农村经济朝着多元化与现代化方向发展。通过剖析二者的融合现状,发现目前存在融合意识欠缺、内容针对性不强、方式单一以及师资建设滞后等问题。在此基础上,探索课程整合、项目驱动、校企合作三种融合模式,并从优化培训内容、创新培训方式、加强师资建设、完善评价体系四个维度构建融合路径。

**关键词:**财经素养; 职业培训; 新农人; 乡村振兴

**基金项目:**广西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专项课题“财经素养教育与新农人职业技能培训融合研究”(2023ZJY881); 广西财经学院2022年度本科教学改革工程项目“基于四维度的本科财经素养教育第二课堂教学实践研究”(2022XJG29)

DOI: doi.org/10.70693/rwsk.v2i3.285

## 一、引言

在乡村振兴战略全面推进的时代背景下,新农人作为乡村发展的新兴力量,正日益受到关注。新农人指的是具有新理念、新技能、新思维,投身于农业生产、经营和服务的新型农业从业者,涵盖返乡创业的大学生、农民工、退伍军人,以及来自城市的农业创业者等多元群体。当前我国乡村人才队伍不断壮大,他们在推动农业现代化、促进农村产业融合、增加农民收入等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

财经素养教育对于新农人的职业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性。良好的财经素养能够帮助新农人更好地理解金融市场,合理规划资金,有效降低经营风险。新农人具备财经素养,可以准确进行成本核算,优化资源配置,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运用多种融资工具,拓宽融资渠道,解决资金难题,即便在面对市场波动和自然风险时,也能够及时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保障农业项目的稳定运营。因此,将财经素养教育与新农人职业技能培训相融合,是提升新农人综合素质和竞争力,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重要举措。

## 二、财经素养教育与新农人职业技能培训融合的现状与问题

财经素养是个体在经济社会中所应具备的综合素养,包含对货币与金融体系的深刻理解,对投资理财知识及税收与财政知识的掌握等。在国内,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对新农人的相关培训成为研究热点。学者们普遍认为,提升新农人的财经素养对于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推动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在实践探索方面,部分地区已经开展了相关的实践活动。例如,一些农村职业学校在开设农业技术课程的基础上,增设了农村财务管理、农村电商运营等课程,帮助农民掌握基本的财务知识和电商营销技巧,提升其在农产品销售和农村经济活动中的能力。一些金融机构也积极参与农民财经素养教育,通过开展金融知识下乡活动,向农民普及金融基础知识、信贷政策和金融风险防范等知识,增强农民的金融意识和金融素养。一些地区在开展高素质农民培训的过程中也加入了相应的财经素养知识普及。但是,当前财经素养教育与新农人的职业技能培训的融合仍然存在一些问题。

### (一) 融合意识不足

在当前的乡村发展体系中,政府、培训机构以及新农人自身对财经素养教育与职业技能培训融合的重视程度

**作者简介:**杨冬妮(1994—),女,硕士,助理研究员、经济师,研究方向为产业经济、风险管理。

谭佳(1986—),女,硕士,研究方向为产业经济、项目管理。

**通讯作者:**谭佳

和认识深度均存在明显不足。部分地方在制定农业发展政策和规划农民培训项目时,未能充分认识到财经素养教育对于新农人职业发展和农村经济增长的关键作用。培训资源主要集中于农业生产技术的推广与普及,忽视了财经素养教育在提升新农人综合竞争力方面的重要性。在一些地区的农民培训项目中,财经素养教育的课时占比极低,甚至完全缺失,导致新农人在财务管理、金融风险防范等方面的知识和能力严重不足,难以适应现代农业发展的需求。

此外,许多培训机构在课程设计和教学安排上,未能将财经素养教育与职业技能培训有机结合,仍然采用传统的、单一的教学模式,注重专业技能的传授,而对财经素养教育缺乏足够的关注和投入。这使得新农人在接受培训后,虽然在农业生产技能方面有所提升,但在面对复杂的市场环境和经济问题时,依然缺乏应对能力,无法实现农业生产经营的高效运作和可持续发展。

新农人自身对财经素养教育的认识也不够深刻,缺乏主动学习财经知识的意识和积极性。这种观念导致新农人在实际生产中,容易忽视财务管理、成本控制等重要环节,在面临资金周转困难、市场价格波动等经济问题时,缺乏有效的应对策略,从而影响农业生产的效益和稳定性。

## (二) 融合内容针对性不强

当前的财经素养教育内容与新农人的实际需求存在严重的脱节现象。在培训过程中,许多财经知识的传授未能紧密结合农业生产经营的实际场景和特点,导致新农人在学习后难以将所学知识应用到实际工作中。在讲解财务管理知识时,使用的案例大多来自工业或商业领域,与农业生产的季节性、周期性以及农产品价格波动大等特点不符,使得新农人难以理解和掌握,无法将这些知识运用到农业生产成本核算、收益分析和资金管理实际操作中。

教育内容的深度和广度也未能充分满足新农人的多样化需求。对于一些基础薄弱的新农人,培训内容过于理论化和专业化,缺乏通俗易懂的讲解和实际案例分析,导致他们难以理解和接受;而对于一些具有一定基础和经验的农人,培训内容又显得过于简单和浅显,无法满足他们对深入学习和提升能力的需求。在金融知识培训方面,对于一些新农人关心的农业信贷政策、农产品期货市场等内容,讲解不够深入和全面,无法帮助他们解决在实际生产经营中遇到的融资难、市场风险防范等问题。

## (三) 融合方式单一

目前的培训方式缺乏创新,在财经素养教育与新农人职业技能培训融合过程中,互动性和实践性不足。多数培训仍以传统的课堂讲授为主,教师在讲台上照本宣科,学生在下面被动接受,缺乏有效的互动和交流。这种教学方式不仅无法激发新农人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也难以满足他们个性化的学习需求。在课堂讲授中,教师难以根据每个新农人的实际情况进行有针对性地指导,导致部分新农人对所学知识一知半解,无法真正掌握和运用。

实践教学环节薄弱是当前培训方式存在的另一个突出问题。许多培训机构未能为新农人提供足够的实践机会,使他们无法将所学的财经理论知识与实际操作相结合。一些培训虽然安排了实践环节,但实践内容过于简单和形式化,缺乏与实际农业生产经营的紧密联系,无法达到预期的教学效果。

当前部分培训采取互联网课程的形式,培训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但也存在诸多问题。部分线上培训课程质量不高,内容枯燥乏味,缺乏生动性和吸引力;网络信号不稳定、设备操作不熟练等问题也影响了新农人的学习体验和效果。一些偏远地区的新农人由于网络覆盖不足,无法正常参加线上培训,导致他们无法享受到优质的教育资源。

## (四) 师资队伍建设滞后

师资短缺是制约财经素养教育与新农人职业技能培训融合的重要因素之一。具备财经专业知识和农业实践经验的复合型教师数量严重不足,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培训需求。许多从事新农人培训的教师,要么只具备农业专业背景,对财经知识了解甚少;要么只熟悉财经领域,缺乏农业生产实践经验。这使得他们在教学过程中,难以将财经知识与农业实际相结合,无法为新农人提供全面、深入地指导。在讲解农业投资决策时,由于缺乏对农业生产风险和收益特点的了解,教师无法为新农人提供切实可行的投资建议;而在讲解农业生产技术时,又无法将财务管理等财经知识融入其中,导致教学内容脱节,影响教学质量。

现有师资队伍的专业能力也有待进一步提升。教学资源未能及时更新财经知识和农业技术,无法适应现代农业发展的需求。在金融市场不断创新和农业产业不断升级的背景下,新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不断涌现,新的农业经营模式和技术层出不穷,而部分教师对这些新知识、新技术缺乏了解和掌握。

## 三、财经素养教育与新农人职业技能培训融合的模式与路径

## （一）融合模式探索

### 1. 课程整合模式

课程整合模式旨在打破传统课程体系的壁垒，将财经素养课程与职业技能课程进行有机融合，使新农人在学习职业技能，系统地接受财经素养教育。在课程设置上，以农业职业技能课程为基础，融入相关的财经素养知识模块，实现两者的深度融合。在种植养殖技术课程中，增加农产品成本核算与价格分析的内容，让新农人了解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如何计算生产成本，包括种子、化肥、农药、劳动力等各项支出，以及如何根据市场价格波动合理调整生产策略，以提高农业生产的经济效益。在农村电商课程中，融入电商平台财务管理、网络营销成本与收益分析等内容，使新农人掌握电商运营中的资金管理技巧，学会分析网络营销活动的成本与收益，优化营销方案，提高电商运营的盈利能力。

在教材方面，教材内容应紧密结合农业生产经营实际，以案例为引导，深入浅出地讲解财经素养知识与职业技能知识。通过实际的农业项目案例，详细介绍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如何进行财务规划、成本控制、风险管理等，让新农人在学习案例的过程中，将财经素养知识与职业技能知识融会贯通，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在教学方法上，采用项目式教学、案例教学等多样化的教学方法，增强教学的互动性和实践性。以项目式教学为例，教师可以设计一个农业创业项目，要求新农人在项目实施过程中，综合运用所学的财经素养知识和职业技能知识，完成项目的策划、实施和评估。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新农人需要进行市场调研、制定生产计划、预算资金、选择融资渠道、进行成本控制等，通过实际操作，提高他们的综合能力。

### 2. 项目驱动模式

项目驱动模式以实际农业项目为载体，将财经素养教育融入项目实施的全过程，让新农人在实践中学习和应用财经知识与职业技能，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在项目选择上，结合当地农业产业特色和市场需求，选择具有代表性和可操作性的农业项目，如特色农产品种植、农产品加工、休闲农业等。选择一个当地特色水果种植项目，该项目涵盖了果园建设、果树栽培管理、水果采摘与销售等环节，涉及农业生产技术、市场营销、财务管理等多个领域，能够全面锻炼新农人的能力。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明确各阶段的任务和目标，将财经素养教育内容分解到各个阶段开展跟踪培训。在项目筹备阶段，引导新农人进行项目可行性分析，包括市场需求分析、成本效益分析、风险评估等，让他们学会运用财经知识评估项目的可行性和潜在风险。例如，对特色水果的市场需求进行调研，分析市场价格走势，计算项目的投资成本和预期收益，评估可能面临的市场风险、自然风险等。在项目执行阶段，注重培养新农人的财务管理能力和成本控制意识，要求他们制定详细的项目预算，合理安排资金使用，严格控制成本。新农人需要根据项目进度，合理安排资金用于购买种苗、肥料、农药等生产资料，以及支付人工费用等，同时要注意成本控制。在项目销售阶段，指导新农人运用市场营销知识和财经技巧，拓展销售渠道，提高销售价格，实现项目的经济效益最大化。新农人可以通过电商平台、直播带货等方式销售特色水果，运用价格策略、促销策略等提高水果的销售量和销售价格，同时掌握运用财务管理知识进行销售资金的管理和核算。

项目完成后，组织新农人进行项目总结和评估，引导他们反思项目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解决方法，总结经验教训，进一步提升财经素养和职业技能水平。通过项目总结，新农人可以回顾项目实施过程中的财务状况、成本控制情况、销售业绩等，分析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之处，提出改进措施和建议，为今后的农业生产经营活动提供参考。

### 3. 校企合作模式

学校与企业通过紧密合作，共同开展新农人培训，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共同培养适应农村经济发展需求的新型农业人才。在合作机制上，学校与企业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共同制定培训计划、课程标准和教学大纲，确保培训内容与企业实际需求紧密结合。共建培训工作小组，由学校的专业教师和企业的技术骨干、管理人员组成，负责培训工作的具体实施和管理。

在课程设置方面，根据企业的岗位需求和职业技能标准，开发针对性强的培训课程。课程内容不仅包括农业生产技术、财经素养知识，还涵盖企业管理、市场营销、企业文化等方面的内容，使新农人在掌握专业技能，了解企业的运营模式和管理理念，提高职业素养和综合能力。对于从事农产品加工企业的新农人培训，课程可以设置农产品加工工艺、食品质量安全管理、企业财务管理、市场营销策略等内容，同时邀请企业管理人员介绍企业的发展历程、企业文化和管理经验，让新农人更好地适应企业的工作环境。

在教学实践中，充分利用企业的生产车间、实训基地等资源，为新农人提供实践机会。企业安排经验丰富的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担任实习指导教师，对新农人进行现场指导和培训，使他们在实践中掌握实际操作技能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学校则负责理论教学和基础知识的传授，确保新农人具备扎实的理论基础。在农产品加工企业的实习中，企业技术人员可以指导新农人进行农产品加工设备的操作、工艺流程的控制、产品质量检测等实际工作，

同时传授他们在工作中如何进行成本控制、质量管理、团队协作等方面的经验和技巧。

校企合作还可以通过订单式培养、现代学徒制等方式,进一步深化合作内涵。由学校根据企业的订单需求,制定专门的人才培养方案,为企业定向培养所需的新农人,或学校与企业共同招生、共同培养,学生在学校学习理论知识,在企业进行实践操作,实现工学交替,毕业后直接进入企业工作。这些方式能够更好地满足企业的人才需求,提高新农人的就业竞争力和职业发展能力。

## (二) 融合路径构建

### 1. 优化培训内容

为了使财经素养教育与新农人职业技能培训深度融合,切实提升新农人的综合素质,优化培训内容是关键环节。首先,深入了解新农人的实际需求至关重要。通过问卷调查、实地访谈等方式,广泛收集新农人的意见和建议,全面了解他们在农业生产经营中遇到的财经问题以及对财经知识的需求。对于从事农产品加工的新农人,他们可能更关注成本核算、资金周转和税收政策等方面的知识;而从事农村电商的新农人,则可能对电商平台的资金管理、网络营销成本与收益分析等内容更为关注。根据这些实际需求,有针对性地设计培训内容,确保培训内容与新农人的实际工作紧密结合,提高培训的实用性和针对性。

培训内容应紧密结合农业生产经营实际,突出实用性和针对性。在金融知识培训方面,重点讲解与农业生产密切相关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如农业信贷政策、农业保险种类和理赔流程、农产品期货市场等。详细介绍农业信贷的申请条件、贷款额度、还款方式等,帮助新农人了解如何通过正规渠道获得农业生产所需资金;讲解农业保险的保障范围、保费计算方法和理赔程序,让新农人能够根据自身需求选择合适的农业保险产品,降低农业生产风险;介绍农产品期货市场的基本原理、交易规则 and 风险控制方法,使新农人能够利用期货市场进行套期保值,规避农产品价格波动风险。在财务管理培训中,结合农业生产的季节性特点和成本结构,传授成本核算、预算编制、资金管理 etc 实用技能。以种植小麦为例,详细讲解在小麦种植过程中,如何计算种子、化肥、农药、劳动力等各项成本,如何根据市场价格和产量预期制定合理的预算,以及如何在不同的生产阶段合理安排资金,确保小麦种植的顺利进行。同时,还可以引入实际案例,分析一些新农人在财务管理方面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让新农人从中吸取经验,提高财务管理能力。

为了满足不同层次新农人的需求,培训内容应具有层次性和系统性。对于基础薄弱的新农人,从最基本的财经概念和知识入手,采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和案例进行讲解,帮助他们建立起基本的财经素养。先讲解货币的基本职能、银行储蓄的种类和利率计算方法等基础知识,让新农人对金融体系有初步的认识。对于有一定基础的新农人,则提供更深入、更专业的财经知识和技能培训,如投资策略、风险管理、财务分析等,帮助他们进一步提升财经素养和综合能力。讲解投资组合理论和风险管理模型,让新农人学会如何通过合理的投资组合降低风险,实现资产的保值增值。

### 2. 创新培训方式

创新培训方式是提高财经素养教育与新农人职业技能培训融合效果的重要手段,能够激发新农人的学习兴趣,提升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增强培训的互动性和实践性,使新农人更好地掌握所学知识和技能。例如体验式培训、小组实践等。

体验式培训主要通过模拟真实的农业生产经营场景,让新农人在实践中学习和应用财经知识与职业技能,提高他们的实际操作能力和应对问题的能力。可以设置农业创业项目模拟,让新农人在模拟环境中进行项目策划、资金筹集、生产管理、市场营销等环节的操作,体验创业的全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新农人需要运用财经知识进行成本核算、预算编制、资金管理等,同时运用职业技能进行生产技术操作和市场营销推广。通过模拟创业,新农人可以更好地理解财经知识和职业技能在实际生产经营中的应用,提高自己的综合能力。还可以开展金融风险模拟,让新农人在模拟的金融市场环境中,进行投资、融资等操作,体验金融风险的存在和影响。通过模拟金融风险,新农人可以学习如何识别、评估和应对金融风险,增强自己的风险意识和风险管理能力。

小组合作学习能够促进新农人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培养他们的团队协作精神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在培训过程中,以小组的形式共同完成学习任务和实践项目。开展小组实践项目,如共同开展一个小型的农业创业项目,从项目策划、资金筹集、生产管理到市场营销,都由小组成员共同完成。通过小组实践项目,组员可以更好地体验团队协作的重要性,提高团队协作能力和实际操作能力。

### 3. 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是实现财经素养教育与新农人职业技能培训融合的关键保障,直接关系到培训的质量和效果。通过多种途径打造一支高素质、专业化的融合师资队伍,为新农人提供优质的培训服务。

对于现有的从事新农人职业技能培训的教师,定期组织财经素养相关的培训课程,提升他们的财经知识水平。

邀请金融领域的专家学者、资深从业者进行授课,系统讲解金融市场、投资策略、风险管理、财务管理等方面的知识。通过在集中培训中设置不同主题的讲座,让教师们全面了解财经领域的最新动态和知识体系。鼓励教师参加各类学术研讨会和交流活动,拓宽视野,了解行业的最新发展趋势和研究成果。组织教师参加全国性的农业经济学术研讨会,让他们与同行进行交流和学学习,了解最新的农业经济政策和研究成果;参加金融行业的交流活动,了解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创新动态,为教学提供最新的案例和素材。建立教师实践锻炼机制,安排教师到金融机构、农业企业等进行跟班学习,积累实践经验,提高授课水平。

此外,还可以积极引进具有财经专业背景和丰富实践经验的人才,充实师资队伍。从金融机构招聘具有多年工作经验的金融分析师、理财顾问等,他们熟悉金融市场的运作和金融产品的应用,能够为新农人提供专业的金融知识和实践指导;从高校财经专业引进优秀的毕业生,他们具有扎实的理论基础和思维,能够为师资队伍注入新的活力。与高校、科研机构建立合作关系,邀请专家学者担任兼职教师。高校和科研机构拥有丰富的学术资源和专业人才,邀请他们担任兼职教师,可以为新农人带来前沿的学术知识和研究成果。邀请高校农业经济专业的教授为新农人讲解农业产业发展趋势和政策;邀请金融研究机构的专家为新农人分析金融市场动态和投资策略。

#### 4. 完善培训评价体系

完善培训评价体系是确保财经素养教育与新农人职业技能培训融合效果的重要手段,能够全面、客观、准确地评估培训的质量和效果,为改进培训提供依据。建立科学合理的评价指标,综合运用多种评价方式,对培训效果进行全面评估。具体可以分为以下几个维度:

第一,知识掌握程度。知识掌握程度是评价培训效果的基础指标,通过考试、作业、案例分析等方式进行考核。设计一套全面的财经知识和职业技能考试试卷,涵盖金融基础知识、投资策略、财务管理、种植养殖技术、电商运营等方面的内容,检验新农人对理论知识的掌握程度。布置与实际生产经营相关的作业,如让新农人制定一份农业项目的财务预算、分析一个农产品市场案例等,考察他们对知识的应用能力。第二,能力提升情况。这是评价培训效果的关键指标,包括财务分析能力、投资决策能力、风险应对能力、职业技能操作能力等。通过实际操作考核、项目实践、模拟演练等方式进行评估。安排新农人进行财务报表分析的实际操作考核,要求他们根据给定的财务数据,分析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组织新农人参与农业项目的实践,观察他们在项目实施过程中的投资决策、风险应对和职业技能操作能力;开展金融风险模拟演练,评估新农人在面对风险时的应对能力。第三,态度和意识的转变。这也是评价培训效果的重要方面,包括财经素养意识、风险意识、创新意识等。通过问卷调查、访谈、小组讨论等方式进行评估。设计一份关于财经素养意识和风险意识的问卷调查,了解新农人在培训前后对财经知识的重视程度、风险意识的变化等;与新农人进行访谈,了解他们在培训后的创新意识和创业意愿是否增强;组织小组讨论,观察新农人在讨论中的表现,评估他们的财经素养意识和团队协作能力。

此外,还可以引入第三方评价机构,如专业的教育评估公司、行业协会等,对培训效果进行独立评估。第三方评价机构具有专业的评估方法和标准,能够提供客观、公正的评价结果。第三方评价机构可以通过问卷调查、实地走访、数据分析等方式,对培训内容、培训方式、师资队伍、培训效果等方面进行全面评估,为培训的改进提供科学依据。

采用多元化的评价方式,确保评价结果的全面性和客观性。自我评价能够让新农人对自己的学习过程和成果进行反思和总结,提高自我认知和自我管理能力。要求新农人定期撰写学习心得和自我评价报告,总结自己在培训中的收获和不足,制定改进计划。

最后,需要注意评价后反馈。培训主办方根据评价结果,及时反馈给新农人、培训机构和教师,以便他们了解培训的优势和不足,采取相应的改进措施。对于新农人,针对他们在知识掌握、能力提升和态度意识方面存在的问题,提供个性化的辅导和建议,帮助他们进一步提升。培训机构可以根据评价结果调整培训内容和方式,优化课程设置,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提高培训质量。如果评价结果显示培训内容与新农人的实际需求脱节,培训机构应及时调整培训内容,增加实用性和针对性强的课程;如果评价结果显示培训方式单一,互动性和实践性不足,培训机构应创新培训方式,采用线上线下混合式培训、体验式培训、小组合作学习等多种方式,增强培训效果。教师根据评价结果反思教学过程,改进教学方法,提高教学水平。如果教师评价结果显示教学内容枯燥,缺乏案例分析,教师应丰富教学内容,增加实际案例,使教学更加生动有趣;如果评价结果显示教师的教学方法单一,缺乏互动性,教师应采用多样化的教学方法,如提问、讨论、案例分析等,增强课堂互动。

#### 四、结语

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关键在于培育高素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新农人的综合素质直接关乎农业现代化的推进成效与农村产业的发展质量。财经素养教育与新农人职业技能培训的深度融合,作为提升新农人核心竞争力、破解农业经营发展瓶颈、赋能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其重要性日益凸显。通过梳理了二者融合的

当前现状,明确指出融合意识薄弱、培训内容与实际需求脱节、融合方式单一固化、师资队伍建设滞后等突出问题,并针对性探索了课程整合、项目驱动、校企合作三种切实可行的融合模式,提出了优化培训内容、创新培训方式、加强师资建设、完善评价体系的具体实施路径,为二者深度融合提供了理论参考与实践指引。

财经素养教育并非独立于新农人职业技能培训的附加内容,而是贯穿新农人生产、经营、管理全过程的必备核心素养。唯有将财经素养教育与农业生产技术、经营服务能力等职业技能深度融合,才能有效帮助新农人提升风险规避能力、优化资源配置效率、拓宽融资渠道,推动新农人实现从“精通生产”向“善经营、会管理”的转型,切实提升农业生产经营的经济效益与可持续性。

当前,乡村振兴战略持续向纵深推进,新农人群体规模不断扩大、结构持续优化,其培训需求也呈现出多元化、专业化、实用化的发展趋势,财经素养教育与职业技能培训的融合仍需长期探索、不断完善。未来,需进一步强化政府、培训机构、新农人三方的融合意识,立足新农人不同群体的实际需求与农业产业发展特点,持续优化融合路径、丰富融合内容、创新融合模式,着力打造一支兼具财经专业素养与农业实践经验的复合型师资队伍,确保培训内容贴合现代农业发展需求、培训方式契合新农人学习特点。唯有如此,才能持续提升新农人的财经素养与职业技能水平,充分发挥新农人在乡村产业发展、农村建设中的核心引领作用,推动农业产业转型升级、农村经济持续繁荣,为乡村振兴战略全面落地生根、开花结果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与保障,助力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乡村振兴总目标。

#### 参考文献:

- [1]王柱国,马建富. 新质生产力视域下高职院校新农人社会化培训体系构建: 价值逻辑、现实之困、实践路径[J]. 成人教育,2026,46(02):61-69.
- [2]宋辉,王纪宏,张雪松. 乡村振兴背景下新农人培养的创新探索与实践——以吉林工程职业学院为例[J]. 职业技术教育,2026,47(02):36-41.
- [3]何湾. 以新质生产力推动农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J]. 农业经济,2025,(12):14-16.
- [4]莫玉音,戚务念. 国际财经素养测评的框架、实施与启示[J]. 教育学术月刊,2024,(05):57-65.
- [5]苏淞,龚诗阳,龚江辉. 中国居民财经素养: 基于全国实地抽样调查的现状分析与理论探索[J]. 国际金融研究,2023,(02):14-24.
- [6]张慧泽,高启杰. 新农人现象与乡村人才振兴机制构建——基于社会与产业双重网络视角[J]. 现代经济探讨,2021,(02):121-125.

## A Study on the Integration of Financial Literacy Education and Vocational Skills

### Training for New-Type Farmers

Dongni Yang<sup>1</sup>, Tan Jia<sup>1</sup>

*1 Guang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Guangxi, Nanning 530003, China*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ural economy is a core element of rural vitalization. Integrating financial literacy education with the vocational skill training for new-type farmers helps give full play to the principal role of new-type farmers in rural vitalization and drive the rural economy towards diversified and modern development. Through an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integration status of the two, it is found that there are currently problems such as a lack of integration awareness, weak targeted content, a single training method and lagging faculty development. On this basis, three integration models are explored, namely curriculum integration, project-driven learning and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and an integration path is constructed from four dimensions: optimizing training content, innovating training methods, strengthening faculty development and improving the evaluation system.

**Keywords:** Financial Literacy; Vocational Training; New-type Farmers; Rural Vitalization

# 高职人事档案价值赋能师资队伍建设的研究

张海宁<sup>1</sup>

(1.烟台文化职业学院, 山东 烟台 264003)

**摘要:** 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 高职院校人事档案作为教师职业发展的历史记录和重要凭证, 其价值实现对师资队伍建设的支撑作用。本文通过分析高职院校人事档案的内涵与特点, 探讨其在队伍建设中的多维价值与应用路径, 揭示当前档案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并提出基于数字化转型的创新应用策略。研究表明, 人事档案不仅是教师管理的基础工具, 更是促进教师职业发展、优化师资结构、提升教学能力的重要载体。通过构建“制度保障+技术赋能+协同机制+价值导向”的档案管理体系, 可以充分发挥人事档案在高职院校师资队伍建设中的赋能作用, 为职业教育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关键词:** 高职院校; 人事档案; 师资队伍; 数字化转型; 双师型教师

DOI: doi.org/10.70693/rwsk.v2i3.288

## 一、引言

高职院校是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核心载体, 师资队伍质量直接决定人才培养成效与办学竞争力, 更是支撑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服务产业升级的关键。随着相关职业教育政策密集出台, “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从“规模扩张”转向“内涵提质”, 对师资培养、评价、配置的精准化、科学化提出更高要求。高职人事档案系统记录教师职业成长, 涵盖多元信息, 不仅具备传统凭证与参考价值, 更蕴含师资建设核心数据, 其价值转化是赋能“双师型”教师培养、优化师资梯队的关键。当前高职人事档案管理存在诸多适配性问题: 一是认知偏差, 部分院校将档案视为“静态存档工具”, 忽视其动态赋能价值; 二是内容滞后, 侧重传统信息记录, 缺失“双师型”教师企业实践、技能证书等核心特质材料; 三是机制缺失, 档案管理与师资相关部门存在数据壁垒, 信息互通不畅; 四是技术不足, 数字化停留在纸质扫描层面, 缺乏数据挖掘分析能力, 难以满足精准化需求。这些问题制约了档案价值发挥, 影响师资队伍内涵式发展。据此, 本研究聚焦高职人事档案价值赋能师资建设, 立足职业教育改革与“双师型”队伍建设需求, 旨在厘清二者内在关联, 探索价值赋能机制与路径, 为高职院校优化档案管理、提升师资建设质量提供支撑与参考。

## 二、高职院校人事档案的内涵与特点

高职院校人事档案是教师人力资源管理全流程中形成的规范性文件材料集合, 以多种形式系统记载教师政治思想、专业素养、实践能力等核心信息, 既是反映教师成长的原始凭证, 也是院校师资建设、人才配置及战略制定的关键决策依据。依据相关政策法规, 其需纳入院校发展规划, 遵循科学管理、安全保密等原则, 建设需同步适配职业教育改革与“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目标, 重点强化企业实践经历、技能等级认证等高职特色信息的采集与归档。

高职人事档案兼具多重特性, 既系统覆盖教师全职业周期, 涵盖通用信息与“双师型”核心特质专项信息, 实现对教师教学与实践能力的立体刻画; 又具有动态更新性, 需随教师职业发展补充完善信息, 为师资动态管理提供鲜活数据。同时, 其需严守分级保密制度, 在合规前提下构建跨部门共享机制, 实现保密与利用的平衡; 全程贯穿政策要求, 需遵循统一规范确保各环节标准化; 还具备多元价值, 核心在于赋能师资建设, 通过挖掘核心

作者简介: 张海宁(1984—), 女, 馆员, 研究方向为档案管理。

通讯作者: 张海宁

数据服务“双师型”培养、师资梯队优化等关键任务，助力高职师资内涵式发展。

### 三、人事档案在教师队伍建设中的多维价值

人事档案作为高职师资队伍建设的核心信息资源，其价值并非局限于传统的存档保管功能，而是围绕“双师型”教师培养、师资结构优化、产教融合深化等高职教育核心需求，形成了多维度、多层次的赋能体系，具体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基础凭证价值：保障师资管理的规范性与权威性。高职人事档案是教师职业发展全流程的原始性、权威性凭证，其核心价值在于为教师资格认定、职称晋升、岗位聘任、奖惩考核等法定性、程序性工作提供不可替代的依据支撑。尤其在“双师型”教师认定这一高职师资建设的关键环节，档案中记载的企业实践年限证明、行业职业资格证书、技术等级认证、校企合作项目参与记录等信息，直接契合《关于做好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认定工作的通知》中“实践能力达标”的核心要求，成为认定工作的法定审核依据。依据《干部人事档案工作条例》《高等学校档案管理办法》等法规要求，人事档案的形成与管理遵循“真实、完整、规范”原则，其记载的信息具有不可篡改的凭证属性，能够有效规避师资管理中的信息失真、争议纠纷等问题，为高职师资管理工作的规范化、合法化提供坚实保障。

二是管理决策价值：支撑师资建设的精准化与科学化。高职人事档案蕴含的系统性数据资源，为院校师资队伍建设的战略决策提供了精准的数据支撑，是破解“盲目引才、粗放培养”问题的关键抓手。通过对档案中教师年龄结构、学历层次、职称分布、技能等级、实践领域、专业方向等核心数据的整合分析，院校可精准识别师资队伍的结构短板，如“双师型”教师占比不足、重点专业实践师资匮乏、青年教师梯队断层等。结合高职专业群建设、产业对接需求等实际，这些数据分析结果可直接转化为师资建设的具体决策：在人才引进中明确“实践能力优先”的招聘导向，在师资培养中制定针对性的企业实践、技能培训计划，在资源配置中向产教融合重点领域倾斜，从而实现师资规划与办学定位、产业需求的精准匹配，推动师资队伍建设从“经验驱动”向“数据驱动”转型。

三是职业发展价值：赋能教师成长的个性化与持续性。高职人事档案是教师职业发展的“成长画像库”，其价值在于通过系统记录教师教学改革成果、实践能力提升轨迹、科研转化成效、培训深造经历等动态信息，为教师自我认知、精准定位与持续发展提供参考依据。对教师个体而言，通过梳理档案中的成长数据，可清晰把握自身在“教学能力”与“实践能力”双维度的优势与短板，进而制定贴合高职教师职业特点的个性化发展计划，明确“教学改革突破”“技能等级提升”“校企项目深耕”等具体方向。对院校而言，基于档案数据可构建教师职业发展“一人一策”的精准培养体系：针对青年教师，依据其档案中“实践经历薄弱”的短板，推荐校企联合培养项目；针对骨干教师，结合其科研成果与行业资源记录，支持其牵头校企合作技术攻关项目，从而实现教师个人成长与院校师资队伍内涵提升的同频共振。

四是校企协同价值：深化产教融合的联动性与实效性。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高职办学背景下，人事档案成为打通校企人才信息壁垒、推动“双师型”教师队伍共建共享的重要纽带。一方面，档案中系统收录的教师企业工作经历、行业资质认证、技术服务成果等信息，为院校与企业共建师资培养基地、开展定向培养提供了精准的信息支撑，帮助企业针对性设计实践培训方案，提升教师实践教学能力与行业适配度。另一方面，在合规前提下构建的校企人才信息共享机制，可让合作企业通过授权访问，了解教师的专业背景、技能特长与研究方向，为校企协同育人、联合科研攻关、技术成果转化等合作提供人才匹配依据。同时，档案对教师参与企业项目、开展技术服务等合作成果的记录，也成为校企合作成效评价、合作深度拓展的重要参考，推动形成“档案记录—信息共享—合作深化—成果归档”的产教融合闭环，助力校企协同培养高素质“双师型”师资队伍。

### 四、当前高职院校人事档案管理的现状与问题

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与“双师型”师资队伍建设的提质增效的双重背景下，高职人事档案管理虽逐步脱离传统粗放模式，但从“价值赋能”核心需求审视，仍存在机制、技术、内容、服务等多方面结构性短板，难以支撑师资队伍精准化、科学化发展。

管理机制层面, 制度体系缺乏系统性与适配性, 多数院校未结合“双师型”建设特色与数字化转型需求构建全流程规范, 对特色信息采集归档、数据赋能应用等缺乏明确界定, 且跨部门协同存在闭环缺失, 各主体职责分工模糊、沟通不畅, 教师特色信息难以整合归档导致数据碎片化, 部分院校还存在管理权限分级割裂问题, 影响师资管理决策科学性与统筹效能。信息化建设方面, 硬件设施未达数字化转型标准, 部分院校缺乏标准化库房与专业设备, 或设备老旧不足, 阻碍数字化进程; 复合型人才队伍存在结构性缺口, 现有人员缺乏跨领域知识, 难以适配数字化操作与数据挖掘需求, 且专项培训机制缺失导致能力更新滞后; 系统功能与数据分析能力严重不足, 多停留在基础电子存档与查询层面, 未与其他师资相关系统对接形成信息孤岛, 缺乏深度挖掘与可视化功能, 无法释放数据赋能价值。档案内容与结构层面, 存在“重通用轻特色、重结果轻过程”的失衡问题, 传统静态信息占比大, “双师型”核心特色信息与动态过程性信息缺失, 且动态更新机制不健全, 依赖个人主动提交或年度归档导致信息滞后, 真实性审核与监督机制不完善, 缺乏多维度核验手段, 关键材料联动核验缺失, 存在信息失真造假风险。服务导向层面, 难以支撑“双师型”教师认定与培养, 核心认定材料缺失或更新滞后影响认定准确性, 也无法为培养计划制定提供依据; 培训需求分析与供给精准度不足, 未基于档案数据开展个性化分析, 导致培训内容与教师需求脱节, 影响培训实效性; 对教师职业规划的指导功能缺失, 未形成“档案记录—需求分析—规划指导—成果归档”的闭环, 无法实现教师个人成长与院校师资建设的同频共振。

## 五、数字化转型与创新应用对提升档案价值赋能效果的作用

在数字经济与职业教育深度融合的背景下, 区块链、人工智能(AI)等新技术的赋能与数字化转型的推进, 不仅破解了传统人事档案管理效率低、共享难、分析弱等痛点, 更推动档案价值从“静态存储”向“动态赋能”转型, 为高职人事档案精准支撑师资队伍建设和提供了技术支撑与实践路径。

### (一) 区块链技术: 构建档案可信体系, 夯实赋能核心基础

区块链技术凭借不可篡改、分布式共识、智能合约、全链路追溯的核心特性, 与高职人事档案“真实性、权威性、安全性”的管理需求高度适配, 从根源上解决档案信息失真、共享壁垒、审核低效等问题。

在档案真实性保障方面, 区块链可对教师档案形成全生命周期追溯: 从“双师型”教师企业实践证明、行业技能等级证书、校企合作项目成果等材料的生成, 到采集、归档、利用的每一个环节, 均通过时间戳、加密签名等技术记录, 形成不可篡改的可信链条, 彻底杜绝信息造假风险, 为“双师型”教师认定、职称评审等工作提供权威凭证, 契合《关于做好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认定工作的通知》中“严格审核材料真实性”的要求。

在跨部门协同与安全共享方面, 基于以太坊联盟链结合 IPFS(星际文件系统)的架构设计, 可实现“权限可控、安全可溯”的跨部门数据共享。档案管理部门、人事部门、校企合作单位等授权主体, 可在不泄露敏感信息的前提下获取所需数据, 既破解了“部门壁垒”导致的信息碎片化问题, 又通过分布式存储避免了单点故障风险, 同时符合《个人信息保护法》对敏感信息处理的合规要求。

在管理效率提升方面, 智能合约技术可实现档案审核、更新的自动化触发: 例如当教师完成企业实践并提交相关证明后, 系统自动验证信息合法性并同步归档, 无需人工干预; 当“双师型”教师认定条件触发时, 智能合约自动提取档案中相关佐证材料, 大幅缩短认定流程, 提升师资管理的精准化与高效化水平。

### (二) AI 技术: 激活数据深层价值, 强化赋能决策能力

人工智能技术通过智能处理、深度分析、精准匹配等核心功能, 突破传统档案“重存储、轻分析”的局限, 实现档案数据从“资源”到“资产”的转化, 为师资队伍建设和提供数据驱动的决策支撑。

在档案智能处理方面, 自然语言处理(NLP)技术可对教师教学反思、学生评价、科研报告等非结构化数据进行语义分析, 提取核心能力关键词; 图像识别技术可实现纸质档案(如技能证书、实践证明)的自动扫描、文字提取与分类归档, 大幅提升档案数字化效率; 数据清洗算法可自动识别重复、错误、过时的档案信息, 保障数据质量。

在教师能力画像构建方面, 机器学习算法可整合档案中结构化数据(学历、职称、技能等级)与非结构化数据(教学成效、实践经历、行业评价), 构建多维度“教学能力+实践能力”双核心画像。通过画像可精准识别

教师在“双师型”素养上的短板，如“专业技能扎实但教学方法单一”“理论教学能力强但企业实践经验不足”等，为个性化培养提供精准依据。

在需求预测与精准赋能方面，AI技术可基于档案数据构建教师发展预测模型：通过分析教师成长轨迹、行业发展趋势、院校专业建设需求，预测教师在技能提升、培训深造、职业晋升等方面的潜在需求，为院校制定“一人一策”的培训计划、校企合作项目匹配、师资梯队优化等决策提供科学支撑，推动师资培养从“统一化”向“个性化”转型。

### （三）数字化转型：重构管理服务模式，提升赋能整体效能

高职人事档案数字化转型并非简单的“纸质转电子”，而是通过技术赋能、流程再造、服务升级，构建“规范高效、安全可控、精准适配”的现代化档案管理体系，其成效直接体现在管理效能、数据价值与服务适配三个维度。

在管理效能提升方面，数字化转型实现了档案管理全流程的提质增效。例如，无锡职业技术学院通过搭建人事档案数字化管理平台，实现存量档案100%数字化扫描、增量档案实时电子化归档，档案调阅时间从平均2个工作日缩短至15分钟，审核效率提升70%以上；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学院通过数字化系统实现档案收集、整理、审核、利用的线上闭环管理，大幅降低人工成本，解决了传统档案“查找难、归档慢”的问题。

在数据安全保障方面，数字化转型通过“权限分级、加密存储、备份冗余”等技术手段，构建多层次安全防护体系。相较于传统纸质档案易丢失、易损坏、易泄露的风险，电子档案通过身份认证、操作日志追溯、数据加密传输等功能，实现“谁访问、谁操作、谁负责”的全程管控，既保障了教师隐私信息安全，又符合《干部人事档案工作条例》对档案安全的严格要求。

在服务适配性提升方面，数字化转型推动档案服务从“被动查询”向“主动赋能”转变。例如，深圳职业技术学院通过数字化档案系统与“双师型”教师认定系统、师资培训系统的数据对接，实现认定材料自动提取、培训需求精准推送、成长轨迹动态追踪，使档案数据直接服务于“双师型”教师培养、师资队伍建设等核心任务，其档案利用率较转型前提升3倍，为院校师资队伍建设的决策提供了80%以上的数据支撑，充分彰显了数字化转型对档案价值赋能效果的放大作用。

## 六、优化高职院校人事档案管理的策略建议

推动高职院校人事档案管理优化升级，是适配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赋能“双师型”师资队伍内涵建设的关键举措。结合当前档案管理存在的机制、技术、内容等短板，需立足多维度协同发力，构建“制度保障、技术支撑、管理协同、教师参与、区域均衡”的全域优化体系，全面提升档案管理规范化、数字化、智能化水平，充分释放档案数据价值，为高职院校师资队伍建设与核心竞争力提升提供坚实支撑。

制度层面：完善管理机制与规范。建立覆盖档案全生命周期的标准化操作规范，明确各环节技术标准与细则，通过流程标准化提升档案系统性与可用性；构建“学校—部门—岗位”三级监督体系，推行“双随机一公开”检查与问题追溯制度，形成多维监督格局；将档案管理纳入学校发展规划，建立联席会议制度，推动与师资建设等核心工作协同，强化战略支撑效能。技术层面：推进数字化转型与创新应用。打造基于微服务架构的一体化数字档案平台，整合多部门信息系统实现全数据归集，建立分级授权服务闭环；应用区块链技术构建存证系统，保障数据可信与流转追溯，提升档案公信力；引入AI技术构建教师能力画像，开发智能检索与需求预测功能，推动档案管理向价值挖掘转型。管理层面：优化资源配置与协作机制。按标准完善档案库房等基础设施，配置专业数字化设备，构建立体化安全防护体系；实施人才专业化工程，通过内培外引建设复合型队伍，建立分层培训与职称倾斜机制；构建跨部门协同网络，制定信息共享办法，开发协同平台实现信息实时归档与联合审核，形成良性循环。教师层面：增强参与感与发展关联度。搭建个人档案服务门户与移动端平台，提供信息查询、利用追溯功能，提升服务透明度与效率；建立教师信息自主维护与异议申诉闭环机制，提升档案信息准确性；构建基于档案数据的发展支持体系，提供评审辅助、人岗匹配分析与个性化发展推荐，强化档案与职业发展的耦合。区域层面：促进中西部院校均衡发展。制定分阶段数字化转型路线图，建立进度评估与案例推广机制，缩小校际差距；

设立专项基金支持中西部院校硬件升级,实施结对帮扶计划提升信息化水平;搭建区域性档案协同共享平台,制定统一标准实现合规流通,开展联合编研,提升区域整体师资管理水平。

## 七、结语

高职院校人事档案作为教师职业发展的历史记录和重要凭证,其价值实现对师资队伍建设和教师职业发展具有关键支撑作用。通过构建“制度保障+技术赋能+协同机制+价值导向”的档案管理体系,可以充分发挥人事档案在教师职业发展、师资结构优化、教学能力提升等方面的赋能作用。未来,随着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的不断发展,高职院校人事档案管理将更加智能化、精准化和高效化。同时,随着职业教育改革的深入推进,人事档案的价值将更加多元,应用场景将更加广泛。高职院校应当顺应数字化转型趋势,不断创新档案管理办法,挖掘档案多维价值,为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 参考文献:

- [1]彭瑞良,尚玉梅.大数据背景下高职院校构建档案双渠道模式的问题与优化路径[J].内蒙古科技与经济,2025,(23):46-49.
- [2]王爽.高职院校档案利用服务效能提升路径研究[J].兰台内外,2025,(33):69-71.
- [3]张雪花.新时期高职院校档案管理人员职业能力提升策略研究[J].湖北成人教育学院学报,2025,31(06):42-46+101.DOI:10.16019/j.cnki.cn42-1578/g4.2025.06.011.
- [4]朱明福.高职院校干部人事档案专项审核研究[J].辽宁高职学报,2025,27(11):109-112.
- [5]顾天翼.新时代高职院校档案管理信息化建设路径探析[J].华东纸业,2025,55(11):153-155.
- [6]刘计虎.高职院校人事档案管理流程优化策略研究[J].办公室业务,2025,(20):124-126.
- [7]王莉.新时代高职院校干部人事档案数字化建设的困境与突破策略[J].兰台内外,2025,(28):22-24.

# Research on Empower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eaching Staff with the Value of Personnel Archives in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Zhang Haining<sup>1</sup>

<sup>1</sup>*Yantai Vocational College of Culture and Tourism, Yantai Shandong, China*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personnel files in vocational colleges serve as historical records and important vouchers for th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teachers, and their value realization plays a key supporting rol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teaching staff.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connot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personnel files in vocational colleges, explores their multidimensional value and application path in teacher team construction, reveals the problems in current file management, and proposes innovative application strategies based on digital transformation. Research has shown that personnel files are not only a fundamental tool for teacher management, but also an important carrier for promoting teacher career development, optimizing teacher structure, and enhancing teaching abilities. By constructing an archive management system that combines institutional safeguards, technological empowerment, collaborative mechanisms, and value orientation, the empowering role of personnel archive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teaching staff in vocational colleges can be fully utilized, providing strong support for the modernization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Keywords:** Vocational Colleges; Personnel Files; Construction of Teaching Staf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Dual Teacher Type Teacher

# 新质生产力视域下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研究 ——以土地资源管理专业为例

补蕙宇<sup>1</sup>

(1. 南宁师范大学, 广西 南宁 530100)

**摘要:** 新质生产力理论的提出, 给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带来了全新的分析框架及价值导向。本文选取土地资源管理专业当案例, 复盘了 2014 到 2024 年间, 研究生教育发展的宏观趋势, 同时也细致剖析了该专业招生规模的微观特征, 充分揭示出该专业研究生教育在规模不断扩张与结构逐步转型过程中的阶段性矛盾。经研究可以发现, 土地资源管理硕士生培养规模在这十年间大约增长了 70%-80% 左右, 然而增速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此外, 在治理模式、跨学科合作、产学研转化等方面, 也显露出诸多问题。新质生产力为土地资源管理赋予了三重属性: 技术赋能下的精准治理、生态资源的资产化和复杂系统的耦合治理, 这意味着学科逻辑在发生巨变, 从而促使过去更偏向传统公共行政管理模式朝着“算法治理”与“绿色发展”相融合的国土空间治理新模式靠拢。研究认为, 土地资源管理研究生教育应以新质生产力为引擎, 进行根本性转型, 从单纯的“知识传授”向“创新赋能”的转变, 为国土空间治理现代化培养出更多高素质的人才。

**关键词:** 新质生产力; 研究生教育; 土地资源管理; 学科建设; 人才培养

DOI: doi.org/10.70693/rwsk.v2i3.314

## 一、引言

20 世纪 80 年代, 我国学者在相关专著中提到新质生产力。2023 年, 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提出“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概念<sup>[1]</sup>, 强调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 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这番论断不仅为经济发展指明了方向, 也对高等教育特别是研究生教育提出了全新要求。新质生产力“不是传统生产力的局部优化与简单迭代, 而是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的当代先进生产力<sup>[2]</sup>”, 反映了以科技创新为核心驱动力, 以创新驱动促进高质量发展<sup>[3]</sup>, 以高素质人才为第一资源, 以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为主要载体, 其形成和发展根本上依赖于创新人才的培养质量。

研究生教育作为国民教育体系的顶端, 是科技第一生产力、人才第一资源、创新第一动力的关键结合点。2024 年《学位法》的通过, 明确了学术与专业学位的分类培养与评价, 为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

在新质生产力视域下审视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 核心问题在于: 现行研究生培养体系能否支撑新质生产力形成? 学科专业设置与知识生产模式是否需要深度调整? 人才培养规格与能力结构应当如何重构?

土地资源管理(以下简称“土管”)专业针对上述问题给出了相应回答。就自身属性而言, 该专业具有显著的多学科融合特点, 所涉领域涵盖土地利用规划、管理学、地理学、经济学及信息科学<sup>[4]</sup>等多方面; 从国家层面看, 国土空间治理朝向现代化发展、“双碳”战略稳步推行、乡村振兴等国家重大战略的实施, 都对人才培育提出了新要求。2025 年, 土地资源管理学科发展论坛的举办, 将“面向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土地资源管理创新”确立为主题, 充分体现学科界对该命题的高度关注。

本文对 2014-2024 年土管专业研究生教育的规模变化进行回顾与梳理, 分析其与新质生产力的适配性矛盾, 通过借鉴国际上的先进经验, 从而构建高质量发展路径, 希望为学科改革给予一些有益参考内容。

## 二、新质生产力与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理论逻辑

### 2.1 新质生产力的内涵特征: 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

**作者简介:** 补蕙宇(1993—), 女,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土地利用与区域发展。

高科技构成创新策源地：跟从前传统的资本投入或劳动力扩张的旧路径不同，新质生产力更侧重于原创性与颠覆性的科技突破。在研究生教育背景下，这一变化要求科研活动不再局限于“论文发表”，而应解决关键技术难题和基础科学瓶颈。随着高科技渗透生产力的方方面面，数据已然成为新型生产要素，而人工智能与量子计算等数字技术，则变为先进劳动工具，这直接要求研究型人才必须注重跨学科的数字化素养，并提升前沿技术的应用能力。

高效能实现形态的跃迁：高效能并非简单等同于生产速度的提升，更核心的是资源配置效率的根本性优化。随着数字化转型和绿色改造，新质生产力实现了从传统驱动模式向创新驱动的转变，从而使成本大幅降低。在教育体系中，这种转变主要通过深化产教融合来实现，通俗而言便是研究生教育培养，不应呆在象牙塔，而应将所学知识精准转化为社会生产力，从而减少因人才供需错配带来的“效能损失”。

高质量成就价值的归宿：高质量也就是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它告别了那种资源过度被消耗、环境持续破坏的粗放式发展，转而追求绿色、安全且高端化的产品及服务。就研究生教育领域而言，高质量不仅意味着评价体系的转变，同样使得教育目标不能再一味追求规模的扩大，而是更应注重培养具备社会责任感、国际竞争力，并能引领未来产业变革的复合型人才。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切实保障人才的供给，又与国家长远发展战略达成高度的契合。

## 2.2 土地资源管理专业的“新质”属性分析

技术赋能下的精准治理：从前依靠测绘与行政划拨等手段来开展工作的是传统的土地管理模式，这种手段较为单一。但现在，随着新质生产力的提出，RS、GIS、GPS也就是我们常说的3S技术，要跟大数据、区块链等高科技相互融合，进而构建起“数字孪生”系统，这种系统能实现对土地的实时监测，精度可达到厘米级。这种转变，意味着土地利用决策不再仅仅依赖经验，而是逐步向算法驱动方向发展，表现出明显的高科技属性与智能化特征。

生态资源资产化的价值：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土地的职能早就跳出单纯的生产载体这个旧框架，摇身一变成为了沉甸甸的生态资产。反映在学科内涵上，便是现在的土地资源管理已经将触角伸向了自然资源的确权、生态修复甚至于碳汇评价等诸多最前沿的领域。而它的这种“绿色”新质特征具体表现为：借助“三权分置”等相关制度创新来释放改革红利，进而让土地资源真正活起来。这些创举，不仅仅是简单的资源优化配置，更是在流动中实现了土地的保值增值。

复杂系统的耦合治理：说到底，土地问题从来不是孤立的，它本质就是人地矛盾最集中的火药桶。有了新质生产力的助推，土管专业对研究生的要求便随之增高，那便是学生要具备处理诸如城乡一体化发展、耕地红线保护还有城镇化进程与气候变化等一系列难题的能力。这种跨领域调控的特征，促使人才培养模式向“大土管”视野转变，也就是借助对生产要素展开重新组合的方式，从而激发国土空间当中蕴含的潜在生产力。

## 2.3 研究生教育质量提升的动力机制

知识生产模式的转型：研究生教育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其关键在于从原有的“学科导向”逐步变为“问题导向”，这不只是为了与新质生产力相契合，也是为了捅破学科之间所构建的壁垒。借助跨学科之间的协作，加上“研教一体”的科学实践，使得教育主体不仅能重新构建课程体系，还能调整评价标准，从而在实战中淬炼研究生的创新品格。

国家战略与产业耦合：研究生教育处于人才培养的最顶端，其相关动向会通过劳动力市场的需求，直接影响到教育供给侧。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口号下，产业与教育的深度融合变得尤为重要，推动了教育模式从传统的校园封闭式向着更具有经济活力的动态优化模式转变，从而促进教育供给与社会需求的同步发展。

数字技术与资源的转化：数字化技术是新质生产力的基础，同时也是推动教育变革的重要因素。在具体教学场景中，智慧教室与仿真实验室的应用，已经从根本上扭转了知识获取的方式。同时大数据技术让因材施教不再是空话，而是真真正正能让精准育人与个性化培养落到实处。通过把导师的学术积淀与科研投入更高效地转化为实打实的培养成果，以此来推动研究生教育向内涵式发展方向顺利跨越。

## 三、2014-2024年中国研究生教育发展态势

### 3.1 全国研究生招生规模变化

通过查找教育部的历年《全国教育事业统计公报》，数据背后的增长趋势十分直观。从2014年至2024年间，我国研究生招生规模翻了一番多，从2014年的62.13万人一路攀升至2024年的135.68万人，这十年间的涨幅达到惊人的118.4%，充分说明了我国高等教育对人才的需求日益扩大，也反映了国家在人才储备上的韧劲儿与潜力。



图 1: 2014-2024 年全国研究生招生人数统计 (单位: 万人)

数据来源: 教育部历年《全国教育事业统计公报》<sup>[5]</sup>

从图 1 的数据能清晰看出, 十年间的硕士与博士招生存在着细微差距。研究生招生规模从 2014 年的 54.87 万人一路涨到 2024 年的 118.57 万人, 算下来年均增长率稳在 8.0% 左右。相比之下, 博士研究生的扩招劲头更足, 从初始的 7.26 万人直接跳到 17.11 万人, 年均增速跑到了 9.0%。有意思的是, 硕士生招生依然占大头, 但占比却从 88.3% 小幅滑落到 87.4%, 这一升一降之间, 反映出国家对于博士培养力度的持续加大。

### 3.2 在学研究生规模变化

结合图 2 的数据来看, 在读研究生的整体盘子也跟着招生规模持续走高。到了 2024 年, 全国在读的研究生总数直接冲过了 400 万大关, 达到了惊人的 409.54 万人, 其中在读的硕士生人数有 341.92 万人, 博士生在读人数也达到了 67.62 万人, 这种人数的快速增长, 反映出我国研究生教育的蓬勃发展, 以及对高层次人才持续需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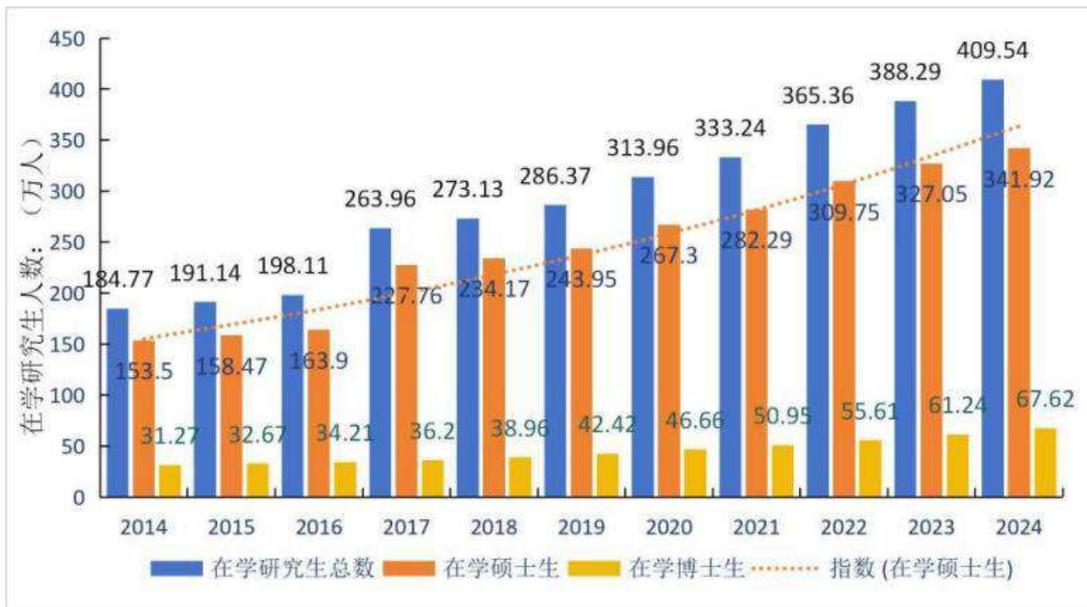


图 2: 2014-2024 年全国在学研究生招生人数统计 (单位: 万人)

从在读研究生的规模来看, 2024 年的数据相比于 10 年前来说增长了 121.7%, 其中硕士生规模翻了一倍不止, 增幅顶到了 122.7%。博士虽然门槛更高, 但在读人数也实实在在地涨到了 116.2%。在这段增长曲线中, 2020 年无

疑是一个重要节点，那一年我国的在读研究生人数首次突破 300 万大关，达到了 313.96 万人。

#### 四、土地资源管理硕士研究生招生规模分析

##### 4.1 土地资源管理硕士与全国研究生招生规模的对比分析

表 1 土地资源管理硕士招生与全国硕士招生增速对比

| 时间段       | 全国硕士年均增速 | 土管硕士年均增速 | 增速差异  |
|-----------|----------|----------|-------|
| 2014-2019 | 8.1%     | 6.5%     | -1.6% |
| 2019-2020 | 22.1%    | 15.0%    | -7.1% |
| 2020-2024 | 4.6%     | 3.5%     | -1.1% |

对照表 1 的数据来看，土地资源管理专业的硕士招生节奏明显慢半拍，增速始终没能达到全国平均水平，尤其是 2020 年，因为疫情进行扩招的时期，该专业的增速差异是比较明显的。这其实也说明了土管专业作为传统的二级学科，其扩招方面具有的弹性是相对有限的。

##### 4.2 土地资源管理硕士点院校类型分布

总的来讲，在土地资源管理硕士的培养上，不同院校有着各自的看家本领。例如农业类院校，像南京农业大学、华中农业大学、西北农林科技这些大学，基本围绕土地的生产属性，研究大多集中在土地利用、耕地保护、农村土地流转及土地生态这类田间地头问题上；财经类院校如浙江大学、南京大学、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等，则更习惯从经济与制度层面入手，对土地经济、房产经营及国土空间规划的钻研更深；相比之下，师范类院校如南宁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安徽师范大学、福建师范大学等，则擅长将土地研究与地理信息系统（GIS）捆绑在一起，强调区域性的规划与可持续发展。而理工或综合类院校，如中国地质大学、东华理工大学、河海大学、中南大学等，它们则明显更偏向于扎实的技术基础，在土地整治、矿山修复、测绘信息技术及土地工程等领域体现出极强的专业性。

#### 五、国内外研究生培养模式比较与借鉴

##### 5.1 国外典型培养模式分析

站在全球的视野上，研究生培养各有各的门道，大致可以分为三种：最讲究传承的是德国的“师徒制”，这种模式从中世纪源起，并在德国逐渐发展成熟。在这种模式下，导师不仅仅是学生科研上的引路人，更是学生职业人格与学术风骨的塑造者，师生之间具有深厚的情感链接；相比之下，美国的“专业化”培养模式更具有现代工业文明的特点，这种模式在现代大学中不断发展完善，靠着课程体系所具备的系统性与学分制应有的规范化，借助多元化的导师团队和密集的实验室协作，培养出来的学生通常具有高职业素养，并能迅速适应市场需求；再看比利时的那套“跨学科”模式就很有欧洲多元文化的交汇的特点，这种模式不主张学生死守一亩三分地，而是鼓励学生跳出单一学科的限制，强调知识的整合与复杂问题的解决，让学生能在法律、经济、生态及工程等领域多实践学习，从而培养出复杂问题的综合治理能力。

##### 5.2 土管研究生培养的现实困境与错位

最直观的问题是，传统经验管理与数字治理需求的脱节。当前的课堂教育更偏重于宏观的理论教授，而现代企业所需的“数字孪生”、“实景三维”等技能，与当前的培养内容存在很大的偏差。学生在现代数智化环境中存在明显的技术短板，这也导致众多毕业生在新质生产力要求的“实时感知、智能决策”等领域缺乏竞争力，使学生陷入空有理论，而难于实践的尴尬境地；第二重困境则是技术手段与制度逻辑的壁垒。技术人员一头扎进数据堆，忽视了土地背后的产权逻辑与社会公平。而政策实施人员则受到技术门槛的限制，不懂复杂的定量分析，使得政策建议难以精准落地。这种逻辑上的割裂，制约了学生在空间数字化呈现与制度合规化解读之间的协同创新能力；再就是高精尖复合型人才的供给不足。当前社会“论文至上”的评价标准，又与行业急需的“全域整治、生态修复”等实务环节是脱节的。产学研合作常常只是表面工程，缺乏实质性的深度融合。结果便是具备“懂政策、精技术、善统筹”的高端复合型人才稀缺，这种供给的不足，实实在在影响了国家战略实施及科技成果转化方面的效能。

## 六、新质生产力视域下土地资源管理研究生培养方案的优化路径

在新质生产力不断发展的背景之下，土地资源管理应打破传统的行政审批逻辑，逐步转向数智治理、绿色发展、空间优化的综合治理模式。为此，研究生培养方案也应打破学科界限，构建“技术—生态—法治”三位一体的培养体系。

### 6.1 定位重构：由“公共管理”向“国土空间治理”战略转型

在新形势下，研究生培养方案需进行转型，不能再重复过去单一的行政管理思路，应该确立以“国土空间治理”为核心的学科体系，把土地资源管理、城乡规划和生态监管等领域拧成一股绳。具体操作上，则通过“资源评价、智慧国土、生态安全、规划法治”四大核心板块的构建，实现学科从“静态登记”逐渐转向“动态感知与精准治理”的跨越。

### 6.2 课程体系革新：数智赋能与交叉学科深度融合

在课程设计上，也应该紧跟时代。将数智化技术引入课堂设计当中，面对海量时空数据之时，学校可以引入卷积神经网络（CNN）、遥感自动识别、区块链技术等课程，让学生不再拘泥于书本知识，而是能掌握“国土空间大脑”等技术实操能力。并且紧扣“双碳”目标，教会学生运用生态产品价值核算（GEP）、碳汇监测、生态修复工程学等前沿工具，将零散的生态资源变成可量化管理的绿色资产，才能让学生在今后的工作实践中真正看得懂，用得上。在方法论上，也不应只停留在传统的统计分析上，得加入强化空间计量、系统仿真及因果推断等训练，用来提升学生在复杂利益冲突中的决策能力。

### 6.3 培养模式创新：构建“政产学研”多元协同生态

培养模式创新方面，核心则是应打造一个多方参与的协作团体。首先是校企联合的项目制培养，紧盯行业龙头企业的技术需求，推行定制化培养方案。将企业在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智慧城市底座研发等方面的真实需求转化为研究生的科研课题，让学生在解决实际问题中积累宝贵经验。同时完善“多师制”指导模式，不仅仅是校内导师，还应加入行业专家与法律顾问的导师组，强化学生的法学功底与经济素养，以此来逐步攻克集体土地入市等复杂制度难题。并依托跨校协作平台，推进校际间师资互访与科研协作，将各家优势融合，构建优势互补的区域性研究生培养联合体。

### 6.4 评价体系改革：分类评价与过程赋能并重

评级系统的改革，应把“分类评价”与“过程赋能”抓实，不应用同一套标准来评价所有学生。首先，学硕与专硕应该进行差异化考核，允许专业型硕士通过调研报告、方案设计、软件著作权等形式申请学位，应侧重考察学生解决实际治理问题的实效。其次，打破“唯论文”论的评价标准，把专利授权、行业标准制定、学科竞赛获奖、高水平政策咨询报告等也纳入成果评价体系，突出学生的实践能力。更重要的则是建立过程性激励，完善优秀应用型论文评选制度，鼓励学生在空间效率优化和生态价值实现等国家战略方向上可以产出高水平原创成果。

## 七、地方院校的破局实践：南宁师范大学的“南师模式”

土地资源管理专业是土地科学学科的人才培养的具体化，旨在培养符合社会需求的应用型以及从事学科研究的研究型人才<sup>[6]</sup>。南宁师范大学（以下简称“南师大”）土管专业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形成了与区域发展紧密相连的学科优势。

### 7.1 战略定位：深耕八桂大地，构筑差异化科研标签

南师大土管专业在学科定位上很清醒，选择深耕八桂大地，打造具有本校特色的科研标签。没有去卷常规的平原研究赛道，而是选择广西特有“南方石山”与“边疆治理”这两块阵地。通过在石漠化治理、矿山修复及山地规划等领域的长线投入，掌握了某些不可替代的学术话语权。同时，该专业不是闭门造车，而是紧密融入了地方治理体系，凭借自然资源部创新平台，加上学院的土地规划甲级、测绘乙级的双重资质，南师大与广西自然资源厅形成了紧密的捆绑关系，科研便不再是纸上谈兵，而是直接服务于广西的山水之间。

### 7.2 模式创新：新工科赋能，实景三维与管理逻辑的深度植入

依托于新工科的建设思路，南师大土管专业在人才培养上玩了一套组合拳。核心是把技术训练与管理思维紧密结合。在校学生不仅要掌握“测、绘、规、估、表、籍”这六项核心技能，也要将工程技术与管理思维进行深度融合，培养出既懂管理又精测绘的复合型人才。更具前瞻性的是学院将实景三维（Real 3D）技术纳入核心课程，通过无人机遥感、点云建模等实战演练，学生们不再盯着几张二维平面图纸上谈兵，而是直接把问题放进三维时空中，进行实际的治理优化。

### 7.3 成效评价：双能驱动，高水平科研与行业认可的双赢

在学术竞争力这块，学校土管研究生能有学术成果，也能获得行业认可。他们在 *Land Use Policy*、《中国土地科学》等国内外权威期刊发文量不断增加，展现出很强的学术前瞻性与理论构建的深厚功力。再有的便是行业认可度，毕业生兼具政策分析与空间建模的双重硬实力，使得他们在华南、西南等地区的自然资源系统和测绘规划院所都有不错的行业口碑。

## 八、结论与建议

### 8.1 研究结论

本文立足于 2014-2024 年中国研究生教育发展的黄金十年，通过理论解析、数据实证与模式对比，深入探讨了新质生产力驱动下土地资源管理专业研究生教育的转型逻辑。核心结论如下：

首先，2014-2024 年间全国研究生招生规模从 62.13 万人增长至 135.68 万人，十年间增长 118.4%，翻了一倍多。而土地资源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招生规模从约 400-500 人增长至约 720-860 人，十年间仅增长 70%-80%，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这种增速差异说明该学科正处于从简单的“规模扩张”向“内涵转型”的阵痛期，传统的行政管理为主的人才培养模式已经难以满足社会对“数智化、绿色化、复合型”人才的迫切需求，归根结底，社会上存在较明显的供需结构性失衡的现状。

再者就是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将土地从单一的承载物转变为“数据-空间-生态”三方融合的复合生产要素。这样的变化，推动了学科的转型，使学科从传统的公共管理行政逻辑，向着以“算法治理”为核心、“绿色发展”为底色的全新国土空间治理新格局转变。

最后便是培养模式方面，既要注重本土化发展，又要遵循全球化视角。通过对比德国“师徒制”的精耕细作、美国“专业式”的规模优势和比利时“跨学科”的多元融合，可以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土管教育应坚持兼容并蓄、协同发展的路径。在实践层面，南宁师范大学的“南师模式”证明了地方院校深耕区域特色与技术赋能，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依然能实现跨越式发展，为全国同类院校提供了“差异化破局”的可行样本。

### 8.2 对策建议

第一，学科重构方向上，土管研究生的培养应从传统的碎片化交叉领域转向更为紧密的深度逻辑耦合。具体而言便是，将硬核技术嵌入学科目标当中，例如把 Python 空间建模、深度学习、遥感大数据处理列为学硕的必修课。同时考虑到绿色发展的需求，在课程中加入前沿模块，如土地碳汇、生态产品价值核算等。为了确保课程内容的系统性与实用性，在课程设计上应构建“制度逻辑+技术算法+实务场景”三位一体的学分体系。

第二，师资队伍转型上，核心应解决的是学术与工程脱节的问题，为此应构建一套双栖型评价体系，推行双导师制，并且把挂职锻炼落实，让中青年教师定期赴自然资源部门、规划院进行业务实践，确保研究能脚踏实地。同时打破“单打独斗”的带学生模式，尝试跨学科组团，把管理、地信、生态等多学科的导师拧成一股绳，让学生能从不同角度分析问题，从而培养他们的批判性思维。

第三，在国际化水平提升方面，应积极主动贡献“中国土地经验”，输出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中国方案。这不应是空谈口号，而应该实实在在总结我国在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耕地保护制度中的经验，向“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进行推广，开展人才联合培养。除此之外，还应该在国际标准制定上掌握一定话语权，利用国产卫星数据优势，深度参与全球土地监测等国际项目，从而提升中国在空间治理领域的话语权。

**结语：**土地资源管理的研究生教育正处在一个关键的历史转折点，我们不能固守着陈旧的培养模式，唯有以“新质生产力”为引擎，实施从人才培养目标到科研范式的全方位重塑，方能培养出支撑国土空间治理现代化的高层次创新人才，为强国建设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

参考文献：

- [1] 谢珍珠, 沈广旭. 新质生产力视域下高校高质量人才培养的策略选择[J]. 高科技与产业化, 2025, 31 (01): 103-105.
- [2] 李森. 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的中国道路[J]. 高校教育管理, 2024(01):1- 23.
- [3] 申国昌, 贺鹏丽. 新质生产力视域下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内生逻辑、规格要求与重要路径[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01):31-37.
- [4] 张佰林, 陈雪婷, 刘虹吾, 张欣瑜. 土地资源管理研究生培养方案优化——基于自然资源“两统一”视角[J]. 高教学刊, 2025, 11(32):162-165.
- [5] 教育部. 2024 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EB/OL]. 2024 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政府门户网站, 2025-06-11.
- [6] 费罗成. 技术型管理人才导向下的土地资源管理特色专业建设实践——以安徽师范大学土地资源管理专业为例[J]. 农村经济与科技, 2020, 31(12):270-273.

## **Research on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Graduate Edu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 Taking the Land Resource Management Major as an Example**

**Bu huiyu<sup>1</sup>**

<sup>1</sup> *Nanning Normal University, Guangxi, Nanning 530100, China*

**Abstract:** The proposition of the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has brought a brand-new analytical framework and value orientation to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postgraduate education. This paper takes the land resource management major as a case, reviews the macro trends of postgraduate education development from 2014 to 2024, and also meticulously analyzes the micro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nrollment scale of this major, fully revealing the phased contradictions in the process of continuous expansion and gradu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structure of postgraduate education in this major. Through research, it is found that the enrollment scale of master's students in land resource management has increased by approximately 70% to 80% in the past ten years, but the growth rate is still lower than the national average. In addition, there are also many problems in aspects such as governance models, interdisciplinary cooperation,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industry-university-research. The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endows land resource management with three attributes: precise governance enabled by technology, assetization of ecological resources, and coupled governance of complex systems, which means that the disciplinary logic is undergoing a major change, moving from a model that was more inclined towards traditional public administration in the past towards a new model of territorial space governance that integrates "algorithmic governance" and "green development". The research suggests that postgraduate education in land resource management should take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as the engine for fundamental transformation, shifting from simple "knowledge transmission" to "innovation empowerment", and cultivating more high-quality talents for the modernization of territorial space governance.

**Keywords:**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Graduate Education; Land Resource Management;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Talent Cultivation

# 新质战斗力视域下消防“数字电子技术基础”实验体系重构

刘玲<sup>1,2</sup>

(1.中国消防救援学院, 北京 102202, 2.无人机应急救援技术应急管理部重点实验室, 北京 102202)

**摘要:** 针对“全灾种、大应急”背景下消防救援队伍对“新质战斗力”生成的迫切需求, 传统“数字电子技术基础”实验教学存在内容滞后于数智化装备发展、教学梯度难以支撑系统创新素养培育的结构性矛盾。教学团队基于“平战教一体化”理念, 构建了以 OBE 成果导向为靶心、PBL 项目驱动为载体、CDIO 工程流程为路径的“三位一体”实验教学理论框架。依托“火灾报警与巡检技术”核心业务主线, 设计“基础认知-综合设计-创新探索”三层递进式实验架构, 构建了一条从底层逻辑门验证向复杂片上系统重构的能力演进链条。教学实践证明, 本次教学改革显著提升了学生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能力, 并有效打通了人才培养的工程链条。该模式为未来向消防行业输送具备底层原理认知与高阶实战素养的复合型数智人才奠定了坚实基础, 对提升应急救援新质战斗力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

**关键词:** 新质战斗力; 数字电子技术; 实验教学

**基金项目:** 中国消防救援学院 2025 年教育教学改革项目 2025JXMS06

DOI: doi.org/10.70693/rwsk.v2i3.307

## 1. 引言

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技术的快速发展, 消防救援现代化建设正全面迈向“全域感知、智能研判、精准协同”的新阶段。在这一宏观语境下, 《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所倡导的“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战略, 与《“十四五”国家应急体系规划》中“加快消防信息化建设”的迫切需求形成了深度共振<sup>[1]</sup>: 消防战斗力的生成模式正经历从“经验驱动”向“数据智能驱动”的范式转移。回顾重庆山火救援行动, 智能调度系统对数千名救援人员与数千台装备的毫秒级精准投送, 以及“消防救援一张图”对多维力量的可视化指挥<sup>[2]</sup>, 无不揭示着在“全灾种、大应急”任务需求下, 未来的消防指战员必须具备统筹常态化智慧防控与实战化应急救援的核心素养, 能够将数字技术转化为应急救援的“新质战斗力”。

“数字电子技术基础”课程作为电子信息类专业的专业基础课, 在构建“新质战斗力”这一任务中承载着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从技术支撑维度看, 它是智能监测预警与应急通信系统的“神经末梢”——无论是日常防火中感烟探测器信号的阈值比较, 还是应急联动中复杂逻辑的优先级编码, 其功能实现均建立在严谨的数字逻辑与电路拓扑之上。从思维培育维度看, 该课程是引导学生从“元器件认知”向“系统级思维”跃迁的关键载体<sup>[3]</sup>。课程固有的“自底向上”设计范式和模块化思想, 训练学生建立由局部构建整体、由静态映射动态的工程逻辑, 从而推动认知层次的实质性质变。

然而, 面对应急救援“新质战斗力”生成的迫切需求, 现有的实验教学却陷入了内容滞后与形式僵化的双重困境, 难以支撑学员从“基础验证”向“系统创新”的能力跃迁。针对这一结构性错位, 本文提出“平战教一体化”的教学改革理念。研究依据“基础认知-综合设计-创新探索”的能力演进逻辑, 以“火灾报警与巡检技术”为主线重构实验教学体系, 旨在通过将底层硬件原理与“平时防控、战时应急”双重场景深度耦合, 有效破解人才培养供给侧与实战需求侧的矛盾, 为培育复合型数智消防人才提供坚实的教改范式。

## 2. 课程教学现状与问题分析

### 2.1 实验内容与平战应用场景的结构性错位

当前, “数字电子技术基础”实验教学存在教学内容与平战应用场景脱节的问题, 使得学生“学”与“用”

**作者简介:** 刘玲(1995—), 女, 博士, 讲师, 研究方向为应急通信、高等工程教育。

**通讯作者:** 刘玲

出现明显错位, 学生能力难以满足“全灾种、大应急”任务背景下的岗位任职需求。具体而言, 验证性实验占比过高, 技术代际滞后于一线需求。当前实验内容多围绕门电路、触发器等基础单元电路展开, 实验过程停留在功能验证层面。具体实验内容包括利用 74LS138 译码器实现三人表决电路, 利用 74LS74 双 D 触发器控制发光二极管闪烁等通用案例。此类实验虽然能够帮助学生巩固理论基础, 但是由于缺乏真实、鲜活的行业工程背景, 学生难以将课堂所学知识与“常态化智慧防控”或“实战化应急救援”的平战场景建立有效关联<sup>[4-5]</sup>。此外, 现代智慧消防广泛以多传感器融合技术、物联网架构及边缘计算等新兴技术作为支撑, 且呈爆发式增长态势。而基于分立元件构建的传统电路架构算力有限、集成度低, 难以承载智能消防装备的复杂业务逻辑。当前实验教学没有充分引入现场可编程逻辑门阵列 (Field-programmable gate array, FPGA)、硬件描述语言等现代电子设计工具, 落后于技术迭代。学生因此对数智消防装备背后的核心硬件逻辑与底层支撑技术认知模糊, 这也进一步加剧了人才培养与行业需求之间的结构性矛盾。

## 2.2 教学形式与创新素养培育路径的结构性失衡

教学形式在难度梯度设置和课堂组织形式上存在明显短板, 对学生高阶能力的培养造成了较大阻碍。一方面, 实验任务的类型较为单一, 教学梯度设置扁平, 难以充分锻炼学生的工程思维和创新素养。高阶能力的培养应循序渐进, 实验任务的难度梯度应逐渐上升, 才能有效地为学生搭建从知识学习到系统创新的上升阶梯<sup>[5-6]</sup>。但目前基础验证层实验占比过大, 学生根据指导书依葫芦画瓢即可, 耗费过多精力在手工连线、检查连线等与工程能力培养无关的重复操作上; 综合设计层实验仅占实验课时的 25%, 学生进行由下向上逐层设计的训练时间较少, 深度思考的空间不足, 后续几乎无法进行创新探索实验。这种“重验证、轻设计、无创新”的梯度设置切断了转化理论到实践的路径, 难以培养出学生解决复杂实战问题的能力。另一方面, 由于线下课时有限、师生比失衡等客观限制, 课堂组织步调单一, 限制了学生的差异化发展。在时间有限且师资有限的情况下, 教师难以实施细颗粒度的全程监控与指导, 只能采用统一步调、统一标准的粗放模式。而事实上, 学生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能力存在显著的个体差异。观察课堂表现可以看到, 在综合设计环节, 仅有约 20% 的学生能够自主完成设计, 但是只要教师给予适当提示, 有大约 60%~70% 的学生可完成任务。这充分说明绝大部分学生只是缺乏差异化引导, 而非能力不足。这种僵化的教学形式加剧了学生能力的两极分化<sup>[7-8]</sup>。当跨度较大时, 基础薄弱的学生容易产生畏难情绪, 陷入“认知超载”的困境; 当跨度设置较小时, 能力突出的学生则因缺乏具有挑战性的任务而处于“认知饥渴”状态。教学供给与学生需求之间的错位, 既不能充分激活不同层次学生的潜能, 也削弱了学生主动探索的内驱力和创新自信。

## 3. 课程改革研究内容

### 3.1 实践教学理论构建

针对上述痛点, 课程教学团队重新构建了“三位一体”的实验教学理论体系。团队引入 OBE (Outcome-Based Education) 成果导向理念明确培养目标, 采用 PBL (Problem-Based Learning) 项目驱动组织教学内容, 并遵循 CDIO (Conceive-Design-Implement-Operate, 即构思-设计-实现-运行) 工程流程规范实施步骤, 旨在打通战、训、教一体化工程链条。

基于 OBE 理论锚定行业需求。针对“新质战斗力”生成需求, 教学团队实施成果导向的反向设计。将“全灾种、大应急”任务下对消防信息化建设人才的需求解构为可观测的实验教学产出指标, 并将响应时效性、系统鲁棒性等指标细化为实验任务的具体考核要点。这一环节解决了“学什么”的问题, 确保了课程内容的行业适配性。

依托 PBL 理论构建层次化框架。遵循认知负荷理论与能力进阶规律, 课程教学团队将消防信息化建设中的典型场景, 转化为难度递增的三阶项目库。基础认知层设置验证性项目, 夯实单元电路基础; 综合设计层设计“8 路火灾探测器巡检控制器”等综合性项目, 强化系统集成能力; 创新探索层开放“基于 FPGA 的多通道火灾报警控制器”等研究性课题, 激发高阶思维。这种设计利用问题的复杂度差异, 构筑了清晰的逻辑框架, 使学生在解决进阶问题的过程中实现能力的螺旋上升。

引入 CDIO 理论铺设能力培养路径。在上述分层框架内, 教学全程嵌入“构思-设计-实现-运作”的完整工程周期。构思阶段对接“平”、“战”痛点提出设计目标; 设计阶段完成原理图及测试方案; 实现阶段执行虚拟预研、实体验证、故障排查的混合流程; 运作阶段进行反思复盘与项目答辩这一流程弥补了学生只懂原理、不懂工程的短板, 确保其掌握从需求分析到系统落地的全链路方法论, 实现从知识内化到素质外化的实质性跃迁。

### 3.2 实践教学内容改革

教学团队以“火灾报警与巡检技术”为贯穿主线, 设计了如图 1 所示的“基础认知-综合设计-创新探索”三层递进式实验架构。该架构遵循任务增量原则, 由简至繁, 由点及面, 形成了一条从逻辑门到片上系统的能力演进链条。具体实验体系如表 1 所示。基础认知层聚焦组合逻辑应用, 解决单点、静态判定问题; 综合设计层引入

时序控制以解决多点动态巡检问题；创新探索层植入智能算法与可编程技术，解决实战高可靠组网难题。这三层框架层次递进，共同构筑了支撑数智消防装备研发的完整知识图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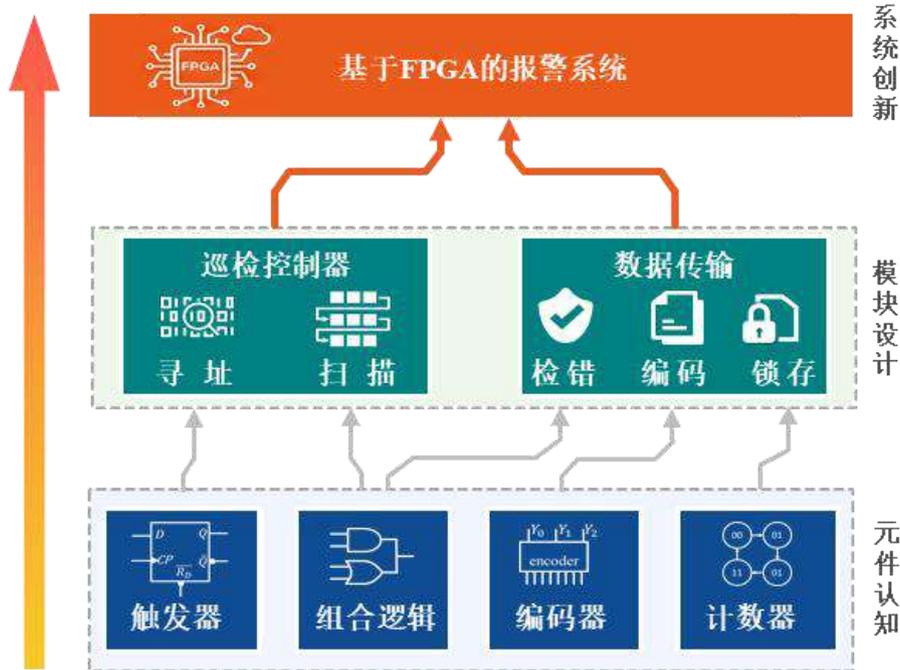


图1 三层递进式实验架构示意图

表1 基于平战教一体化的“火灾报警与巡检技术”主线实验教学体系设计

| 实验层级  | 代表性实验主题            | 消防情境映射                          |
|-------|--------------------|---------------------------------|
| 基础认知层 | 1.消防声光报警逻辑控制电路设计   | 报警信号的逻辑判断                       |
|       | 2.消防报警数据奇偶校验电路设计   | 火场强干扰下的数据传输检错                   |
|       | 3.多路消防报警信号优先编码电路设计 | 集群通信模式呼叫优先级的仲裁                  |
|       | 4.消防设备故障状态锁定电路设计   | 瞬态故障信号的捕捉与保持                    |
|       | 5.消防水泵启停计数监测电路设计   | 消防设施的常态化巡检记录                    |
| 综合设计层 | 1.8路火灾探测器巡检控制器     | 回路巡检中的时分多路复用技术                  |
|       | 2.带奇偶校验的抗干扰数据传输接口  | 恶劣环境下通信链路从检错、锁定、到报警的闭环          |
| 创新探索层 | 基于FPGA的多通道抗干扰报警系统  | 解决实战中大规模节点管理与高误报率痛点，实现智能化消防主机设计 |

(1) 第一层：基础认知层

本实验层是数字逻辑认知的起点，核心是使学生建立从信号输入、逻辑判定、到功能实现的映射。以实验1消防声光报警逻辑控制为例，要求学生利用74LS153或74LS00，处理感烟与感温信号，实现双重触发报警、单一触发报警预警的复合逻辑控制。在此基础上，课程同步设置了利用74LS86保障数据完整的奇偶校验实验、利用74LS148处理多路冲突的优先编码实验等内容。通过该层级实验，学生不仅能够掌握芯片级的工程应用，更能够深入理解业务规则转化为物理电路的过程。这些看似独立的实验，共同构成了后续实验的基石：在综合设计层中它们将被复用、重组、构成巡检与传输子系统，在创新探索层实验中其逻辑将被重构为FPGA核心算法，支撑着学生工程素养的螺旋式上升。

(2) 第二层：综合设计层

本层实验对基础层知识点进行深度重组,引导学生将零散的知识点串联成线,完成从单一节点的逻辑判定到系统整体架构设计的工程升级。

综合设计实验1要求学生构建一个时分复用系统。利用基础认知实验4相关知识,将计数器从单纯记录次数的模块演变为能生成000-111连续地址码的地址发生器,实现从“数数”到“寻址”的认知升级。利用基础认知实验1的相关知识,将数据选择器从静态通道选择模块演变为可依次扫描8路探测器状态的动态扫描模块,实现从静态到动态的认知升级。此外,通过引入负反馈逻辑,在发现火警时自动封锁时钟,实现故障通道的精准锁定。这一过程不仅复用了底层模块,还使学生深刻理解现代消防控制器以时间换空间的核心巡检原理。

针对信号传输过程中的完整性问题,课程并行设置了综合设计实验2,要求学生将基础认知层中孤立的优先编码器、奇偶检错电路和故障状态锁定电路有机串联,构建一条具备编码、检错、锁定功能的完整信息链条。这一过程进一步强化了学生将离散功能模块集成为特定功能子系统的工程综合能力。

### (3) 第三层:创新探索层

本层实验旨在实现从“连点成线”到“织线成面”的系统级重构。尽管综合设计层实现了巡检和传输两大功能子系统,但面向工程应用时,传统分立元件的方案暴露出扩展性差与抗干扰能力弱两大短板。因此,课程引入创新探索层实验“基于FPGA的多通道抗干扰报警系统”,引导学生利用现代电子设计技术进行系统重构与升级。

在本实验中,学生需基于FPGA平台,将综合层中孤立的巡检逻辑与通信接口进行深度融合。首先,利用FPGA编写模64以上的计数器逻辑,将扫描通道从8路扩展至64路以上,模拟大型单体建筑的报警主机,并同步完成从优先编码、奇偶校验到故障锁定的全流程并行处理。其次,针对火场电磁干扰,学生需摒弃传统的硬件RC去抖思维,转而设计可参数化的数字滤波器模块,通过统计信号连续N个时钟周期的稳定性来智能判定报警真伪。此外,通过设计三段式有限状态机,统筹管理巡检、判别、锁定、通信等复杂 workflows,实现对系统核心时序的精准调度。

上述软件定义硬件的重构过程,实质上是对学生工程创新素养的深度锻造。在广度上,学生不再局限于孤立子系统的设计,而是实现了从采集、处理到传输的完整信息链条,完成了系统级的逻辑闭环。在深度上,通过将74LS161重构为计数变量、将74LS151重构为数组索引逻辑,深度融合逆向工程思维训练,使学生深刻理解了硬件芯片内部的运行机理,填补了其底层硬件架构认知的空白。在维度上,通过引入数字信号处理算法,学生领悟如何通过FPGA的高速算力来弥补物理信号抖动与干扰的缺陷。这种三层递进的架构,最终实现了从验证知识到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能力跃迁,可有力支撑消防信息化人才对高阶创新素养的迫切需求。

## 4 改革成效

前述改革举措已依托中国消防救援学院飞行器控制与信息工程专业全面落地。教学团队选取改革前2022级(2024年实施, N=70)和改革后2023级(2025年实施, N=97)两个教学班级为样本,开展两轮对比追踪研究。如图2所示,改革组2023级实验成绩的平均分为89.42分,较对照组2022级提升了4.85分。进一步分析实验成绩的离散程度,可以看出成绩分布发生了结构性优化。改革后实验成绩的标准差从6.08收敛至3.83,表明学生的实验能力发展趋于均衡。79分以下分段人数大幅减少,印证三层递进式实验架构对基础薄弱学生实现了有效托底;同时,优秀率(实验成绩 $\geq 90$ 分)从27.14%显著攀升至45.36%。低分段消失、高分段涌现的现象表明,改革既夯实了全员核心技能,又通过高阶挑战成功激发了学生的工程潜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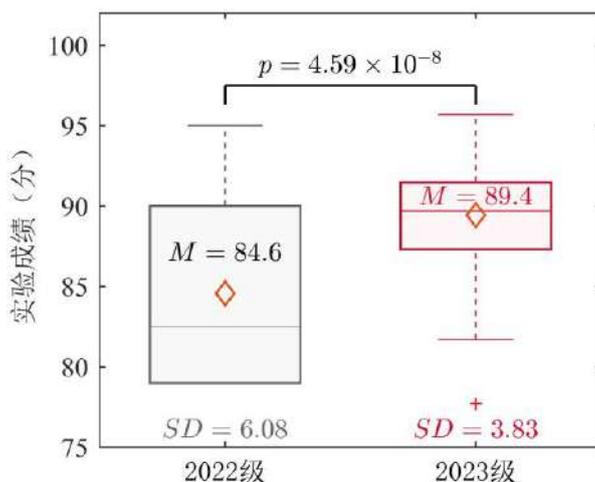


图2 实验成绩分析

成绩的提升与结构优化,源于学生认知动力的改变。2023级学生的课程调查问卷显示,场景化教学有效破解了“学”与“用”的断层问题,激活了学生的学习动机。如图3所示,学生对实验总体认同度高达93.42% (“同意”与“很同意”占比之和),对消防情境关联的认可度达89.47%,并且学生表示,对火灾探测与报警系统(63.9%)、数字化救援与战训装备(19.4%)和智能灭火与联动控制(16.7%)主题兴趣浓厚。从课堂观察来看,学生的学习状态发生了明显转变。学生不再被动地接受教师讲授的内容,也不再满足于简单的模仿,而是抱着“我要学”的探索精神,开始查阅数据手册,主动讨论、分析电路。这份主动探索的内驱力直接推动了2023级实验教学成效的提升。不仅如此,三层递进式实验架构为学生搭建了能力上升的阶梯,提升了学习自信。调查显示,92.1%的学生认为改革后的实验层次设计符合自身认知节奏,这与低分段人数显著减少的现象共同印证了改革后的实验教学梯度设置合理,它能保证基础薄弱的学生也能拾级而上,实现自我突破。再者,86.85%的学生认为自己明确掌握了数字电子技术在消防中的应用,89.48%的学生反馈实验过程增强了独立解决问题的信心。在面对突发电路故障时,学生不再茫然无措或第一时间向教师求助,而是自主利用示波器与逻辑分析仪等工具展开系统级排查,根据信号流向锁定故障点。这一变化标志着学生完成了从依赖外部的求助者到独立工程师的角色蜕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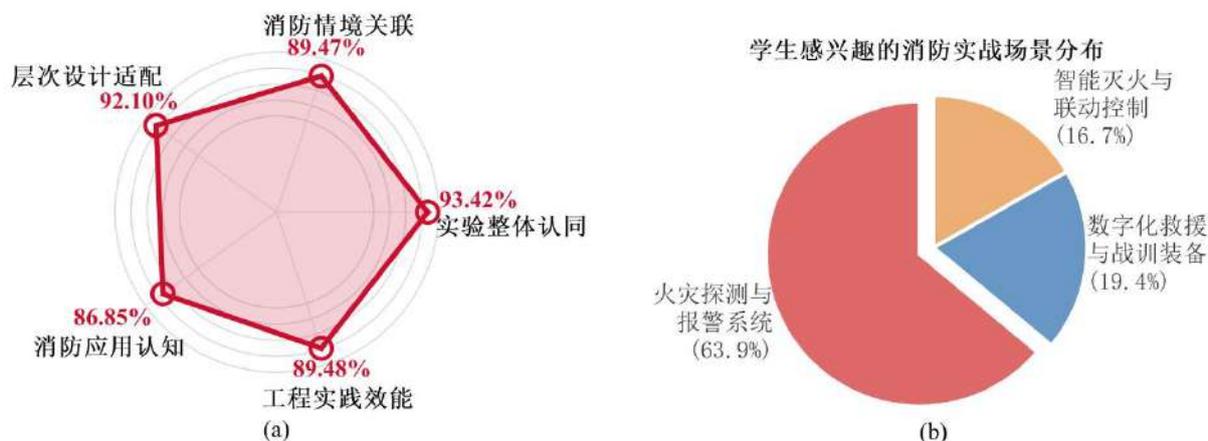


图3 实验教学改革效果问卷分析结果

(a) 课程核心指标评价, (b) 实验场景兴趣分布

## 5 总结

本文在“新质战斗力”视域下,探讨了消防院校“数字电子技术基础”实验教学改革和思考的具体实践。教学团队以“全灾种、大应急”任务需求为导向,将火灾报警与巡检核心业务贯穿始终,重构了“基础认知-综合设计-创新探索”三层递进式实验体系。实践证明,这种层层递进的培养模式有效打通了教学理论逻辑到工程实战的转化路径,并强化了学生解决复杂实战问题的工程思维与高阶能力。未来,该模式将持续输送“懂原理、能实战、会创新”的复合型数智人才,有力支撑应急救援事业的现代化转型。

##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国务院. 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 [EB/OL]. (2025-01-20)[2025-10-19]. [https://www.gov.cn/gongbao/2025/issue\\_11846/202502/content\\_7002799.html](https://www.gov.cn/gongbao/2025/issue_11846/202502/content_7002799.html).
- [2] 重庆日报. 机制创新强根基 数字赋能提质效——重庆探索超大城市安全韧性治理新路径[EB/OL]. [2025-12-02]. [https://admin.cq.gov.cn/zt/szzqjs/fngxnzl/yjgl/yjzhdd/202512/t20251202\\_15202454.html](https://admin.cq.gov.cn/zt/szzqjs/fngxnzl/yjgl/yjzhdd/202512/t20251202_15202454.html).
- [3] 何锋, 张有光, 李峭, 等. 新工科背景下“数字电路与系统”课程系统观实践[J]. 高等工程教育研究, 2025, (4): 61-67.
- [4] 陈曦, 于金鹏. 基于 OBE-CDIO 理念的“数字电子技术”实验教学设计[J]. 电气电子教学学报, 2023, 45(1): 200-203.
- [5] 孙艳丽, 李廷军, 张海波, 等. 军校数字电路课程教学改革探索[J]. 中国现代教育装备, 2023, (21): 153-156.
- [6] 郑江, 詹洪陈, 张志俭. 黑盒与逆向工程概念在数字电路基础实验教学中的应用[J]. 实验室研究与探索, 2024, 43(05): 106-110.
- [7] 朱雪秦, 王亚男, 胡秋琦, 等. “数字电子技术实验”的创新人才培养改革[J]. 电气电子教学学报, 2024, 46(04): 15-19.
- [8] 魏继增, 王建荣, 李幼萌, 等. 面向系统能力的数字逻辑与数字系统课程实践教学改革[J]. 实验室研究与探索, 2022, 41(10): 179-183, 190.

# Reconstruction of the Fundamentals of Digital Electronics Experiment Teaching in Fire Engineering: A New Quality Combat Capability Perspective

Liu Ling<sup>1,2</sup>

<sup>1</sup> *China Fire and Rescue Institute, Beijing, China;*

<sup>2</sup> *Key Laboratory of UAV Emergency Rescue Technology, Ministry of Emergency Management, Beijing, China*

**Abstract:** Within the paradigm of "all-hazard and comprehensive emergency", the new-quality combat capabilities are urgently required by China Comprehensive Fire and Rescue Force. However, traditional experimental teaching of Fundamentals of Digital Electronics exhibits structural limitations: the teaching content lags behind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and intelligent equipment, and the pedagogical hierarchy inadequately supports the cultivation of systematic innovation competencies. Therefore, a "three-in-one"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experimental teaching is proposed based on the "Peace-War-Teaching" integration. This framework adopts OBE as the orienting philosophy to anchor learning outcomes, employs PBL as the curricular vehicle to orchestrate instructional content, and institutes CDIO as the engineering pathway to standardize experimental workflows. In addition, a three-tier progressive experimental architecture anchored in the core mission of fire alarm and patrol technology is designed, featuring the basic cognition, comprehensive design, and innovative exploration layers. This framework establishes a capability evolution chain extending from fundamental logic gate verification to complex System-on-Chip reconstruction. The teaching practice proved that students' ability to solve complex engineering problems is significantly enhanced, thereby effectively bridging the engineering training chain for future professionals. This model establishes a closed-loop cultivation system that bridges theoretical cognition and practical combat literacy. It ensures the continuous supply of composite professionals equipped with digital intelligence, thereby underpinning the evolution of new quality combat capabilities required for complex emergency rescue tasks.

**Keywords:** New Quality Combat Capabilities; Digital Electronic Technology; Experimental Teaching

# 产教融合背景下高职教师数字化教学能力的内涵重构与培育路径研究 ——以重庆安全技术职业学院为例

李杰<sup>1</sup>

(1.重庆安全技术职业学院, 重庆 万州 404020)

**摘要:** 产教融合背景下, 高职教师传统数字化教学能力与产业真实场景需求存在脱节。以重庆安全技术职业学院产教融合实训基地为案例, 本文重构了以数据驱动教学设计、虚拟仿真应用、数字化协同指挥教学及过程性数据分析与反馈为核心的四维能力内涵。研究的核心贡献在于构建了一个“产业问题驱动的能力生成模型”, 该模型超越传统培训框架, 提出教师能力应在一个将产业真实问题系统性地转化为高价值教学资产的结构化流程中生成, 并为其体系化培育提供了包含组织保障、培育模式、课程体系和评价体系的可行路径。

**关键词:** 产教融合; 高职教师; 数字化教学能力; 内涵重构; 培育路径

**基金项目:** 万州区社会科学重点课题《万州区三峡移民红色文化基因融入职业教育体系的创造性转化研究》(项目编号:WZKT2025170); 重庆安全技术职业学院校级教学改革项目《大数据驱动的教师教学行为分析与专业能力提升研究》(AQJG24-17)

DOI: doi.org/10.70693/rwsk.v2i3.322

## 一 产教融合背景下高职教师数字化教学能力的时代内涵与重构必要性

### (一) 数字化教学能力的传统内涵及其局限

数字化教学能力在传统认知中, 主要指教师运用信息技术辅助教学活动的能力<sup>[1]</sup>。其内涵通常包含三个基本层面: 一是熟练操作计算机与多媒体设备; 二是有效获取并整合网络教学资源; 三是运用信息技术手段丰富课堂教学形式。这种能力在推动职业院校教学信息化基础建设、改进传统教学模式方面, 发挥了积极作用<sup>[2]</sup>。

然而, 随着国家对产教融合的推进力度不断加大, 这一传统能力内涵的局限性日益突出。2023年,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八部门联合印发《职业教育产教融合赋能提升行动实施方案(2023—2025年)》, 对产教融合提出了具体且深入的要求。该方案明确引导企业深度参与职业院校的教学设计、课程设置乃至实习实训全过程, 标志着产教融合进入了强调具体行动和深度赋能的新阶段<sup>[3]</sup>。在此基础上, 《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进一步将构建产教融合的职业教育体系上升为国家战略目标, 为职业教育的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sup>[4]</sup>。这一系列从具体行动到顶层战略的政策布局, 共同指向了将企业需求全面融入人才培养的核心任务, 而传统数字化教学能力恰恰难以支撑这一深层次的融合。其局限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 技术应用与产业实践脱节。传统数字化教学多将技术作为优化现有教学内容的辅助工具, 而非连接产业实践的桥梁。当企业带着真实的项目、数据和技术标准参与教学时, 教师若仅具备传统能力, 便难以将这些动态的产业元素转化为有效的数字化教学内容。技术应用因此停留在对既有知识的呈现层面, 未能实现与产业真实场景的有效对接。

第二, 能力标准与企业需求错位。传统数字化教学能力的培养和评价, 通常以教师对通用教育软件的掌握程度为标准, 其能力体系构建于校园内部。这与产教融合所要求的校企共通的能力标准存在偏差。教师若不熟悉行

**作者简介:** 李杰(1998—), 男, 工学硕士, 大数据技术专任教师, 研究方向为职业教育和人工智能。

**通讯作者:** 李杰

业专用的数字化工具与平台，便无法与企业技术人员在联合开发教材、共建课程等工作中进行有效协同，导致教学供给与企业实际需求不匹配。

第三，培养目标与岗位要求偏离。传统数字化教学活动侧重于知识点的传递与巩固，其目标在于提升教学效率。而产教融合的根本目标是培养能适应并服务于产业发展的技术技能人才。这意味着教学活动必须围绕学生综合职业能力的养成展开。仅利用数字技术进行简单的知识讲授或技能模拟，无法有效培养学生在真实数字化工作流程中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

综上所述，在国家政策强力推动产教融合向纵深发展的背景下，传统数字化教学能力因其固有的局限性，已无法满足新时代对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提出的更高要求。因此，有必要对其内涵进行重新审视与构建，以使其真正服务于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核心任务。

## （二）产教融合基地对能力重构提出的迫切需求

如果说传统数字化教学能力的局限性在理论层面已形成普遍共识，那么重庆安全技术职业学院与重庆安能共建的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巴南)的实体化运行，则从实践层面为这一能力的重构提出了具体而迫切的需求。该基地作为市域产教联合体的物理载体和功能核心，其运行模式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教学场域、技术环境与组织形态，从而对教师的能力提出了颠覆性的新要求。

首先，基地将教学场景从基于固定教材的知识复现，转变为基于产业真实数据的动态情境，对教师的数据驱动教学设计能力提出了迫切需求。传统教学内容是静态和预设的，而实训基地依托中国安能这一国家级应急救援力量，其教学案例将直接来源于真实的灾情侦测数据、救援过程记录和装备运行参数。这就要求教师不能再仅仅是既定知识的传递者，而必须具备实时获取、分析、处理非结构化产业数据的能力，并能迅速将这些动态数据转化为可实施的教学任务和应急演练方案。

其次，基地将技术环境从通用教育软件升级为行业专用的数字化系统，对教师的专业数字技术应用与开发能力提出了迫切需求。基地配备的 206 余台套特种工程作业装备及其配套的虚拟仿真与数字孪生系统，是行业专用的工业级数字平台，而非普适性的教育软件。这就要求教师的能力必须从通用软件的操作者，升级为能够熟练应用乃至参与设计行业专用数字教学资源开发者。教师若不具备这种能力，将无法有效利用基地的核心技术资源，导致高端设备闲置或浅层化应用。再次，基地将教学组织形式从指导个体技能操作，转变为组织多岗位协同的综合演练，对教师的数字化协同教学组织能力提出了迫切需求。基地可同时容纳 2000 人进行实习实训，其设计初衷是模拟大规模、跨岗位的综合应急救援。这就要求教师的角色必须从传统的技能教练，转变为能运用应急指挥平台等数字化手段来组织、调度、评估复杂综合演练的教学设计者与指导者。教师若缺乏这种宏观的组织能力，将无法有效驾驭基地提供的大规模、综合性教学条件。

该产教融合实训基地的建成运行，并非对现有教学条件的简单补充，而是构建了一个全新的、深度嵌入产业实践的教学新生态。在这个生态中，传统数字化教学能力已然失效。因此，对教师数字化教学能力的系统性重构，已不再是理论上的探讨，而是保障基地功能得以实现、确保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精准对接的、必须立即回应的现实课题。

## 二 重庆安全技术职业学院教师数字化教学能力的现状分析与核心挑战

### （一）现有基础与优势

作为国内应急安全教育领域的先行者，重庆安全技术职业学院在长期办学实践中，已为教师数字化教学能力的提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sup>[5]</sup>。该校作为国内率先设立救援技术专业的院校，其专业属性天然要求采用高仿真、沉浸式的教学手段来弥补真实训练的高成本和高风险。这种专业需求驱动，促使教师团队很早就开始探索并应用虚拟仿真（VR/AR）技术开展实训教学<sup>[6]</sup>。这种实践积累，使教师群体具备了将理论知识转化为高精度、强交互性数字实训资源的经验，为未来在产教融合基地使用更为复杂的数字孪生系统和行业专用仿真技术奠定了技术应用基础。

其次,该校已形成以实践为导向的教学文化与双师素质的教师队伍。该校教师团队在长期坚持准军事化管理、情景模拟、案例分析等实践育人模式的过程中,形成了高度重视将知识与场景相结合的教学思维。教师普遍持有相关行业资质证书,并积极参与国家级教学标准、教材编写及市级教学能力竞赛,其行业背景与专业深度,使得教师群体对新技术的学习意愿和转化能力较强<sup>[7]</sup>。这种内生驱动力是教师队伍能够快速适应产教融合基地带来的数字化技术变革的关键优势。

最后,该校在数字化教学资源建设与评价探索方面积累了有效经验。在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推动下,该校教师团队深度参与了国家级和市级专业教学资源库建设,并开发了多门在线精品课程。这些工作使教师熟悉了数字化资源的设计规范、共建共享流程以及数字化平台的使用。同时,在专业群建设中,学校已尝试构建职业岗位胜任力 AI 诊断模型,这标志着教师已开始初步探索利用数据技术对学生的综合职业能力进行数字化评估和画像,为未来在基地中应用过程性数据进行精准教学反馈奠定了数据应用基础。

## (二) 产教融合基地带来的核心挑战

尽管该校教师在数字化教学方面具备一定基础,但产教融合实训基地的实体化运行,以其深度嵌入产业实践的特性,对教师现有的能力体系构成了根本性的挑战。这些挑战集中体现在教师难以将产业界的数字要素有效转化为教学要素,具体如下:

**数据处理能力的挑战。**基地将引入重庆安能等合作企业在真实应急救援任务中产生的大量数据,这些数据通常具有海量、动态和非结构化的特征,如无人机航拍影像、物联网传感器读数和实时地理信息等。面对此类复杂的产业一线数据,教师普遍缺乏有效的数据分析与处理能力,难以将其清洗、建模并转化为可用于教学案例开发、情境构建和模拟推演的结构化教学资源。

**技术融合能力的挑战。**产教融合基地的建设目标之一,是引入与产业技术同步的虚拟仿真(VR/AR)与数字孪生系统。这类行业专用的数字化平台,其复杂性和专业性远超通用教育软件。多数教师对于类似系统的应用,目前多停留在操作已有模块的层面,普遍缺乏运用这些专业技术进行二次开发、定制教学场景以及将其与专业课程内容进行深度融合的能力,难以主导符合特定教学目标的数字化教学场景设计。

**教学组织能力的挑战。**基地旨在模拟可容纳大规模、多岗位协同的综合应急救援演练。这种教学形态要求教师的角色从传统的单兵教练,转变为数字化总指挥。然而,多数教师习惯于指导个体或小组进行单项技能训练的教学模式,缺乏运用数字化指挥平台进行多任务统筹、跨专业调度和临场决策的宏观教学组织能力。这使得他们在面对复杂、动态的综合性演练时,难以进行有效的组织与调控。

**教学评价能力的挑战。**数字化的实训过程能够产生海量的过程性数据,如学生的操作序列、决策时间和资源调用情况等。这些数据为实现精准、客观的教学评价提供了可能。然而,教师目前普遍缺乏利用这些数据进行分析建模,为学生进行精准能力画像并提供实时反馈的评价能力。教学评价方式仍较多依赖于演练结束后的结果评定和主观点评,未能充分利用过程性数据实现对学生学习过程的精准诊断与个性化指导。

## 三 基于产教融合基地的教师数字化教学能力重构与培育路径

### (一) 数字化教学能力重构的核心维度

面对产教融合基地带来的系列挑战,高职教师的数字化教学能力亟待超越传统范畴,进行系统性重构<sup>[8]</sup>。其核心在于围绕产业真实场景和人才培养目标,确立四个新的能力维度,这四个维度相互关联,共同构成一个服务于深度产教融合的有机整体。

**第一,数据驱动的教学设计能力。**这是指教师能够获取、分析并转化产业一线真实数据,并以此为基础进行教学活动设计的能力。其技术路径包括:首先,掌握通过应用程序接口(API)或专用数据平台,接入并获取重庆安能等合作企业提供的灾情普查、设备运行等动态数据的能力;其次,利用地理信息系统(GIS)软件、Python等数据分析工具,对非结构化的原始数据进行清洗、建模与可视化;最后,将处理后的数据转化为可导入教学平台的结构化案例、动态演练的边界条件和问题导向的学习任务。

**第二,虚拟仿真与数字孪生应用能力。**这项能力指教师能够深度应用乃至参与开发行业专用的高保真虚拟仿

真与数字孪生系统，以构建沉浸式教学环境。其技术路径涉及：熟练运用 Unity、Unreal Engine 等开发引擎的编辑器，对现有的虚拟仿真模块进行场景、参数和流程的二次开发与定制；能够将企业提供的设备三维模型、工艺流程数据导入仿真系统，构建与物理实体精准映射的数字孪生模型；最终主导开发出符合特定教学目标、可进行数据采集与评估的高保真实训项目。

第三，数字化协同指挥调度教学能力。这是指教师运用数字化指挥平台，组织和指导大规模、多岗位、跨专业的综合性实训演练的能力。其技术路径主要围绕应急指挥平台的深度应用展开：教师需熟练掌握平台内的资源管理、任务分配、实时通讯和态势标绘等功能模块；能够在演练前，根据教学目标在平台内预设灾情演进的脚本与事件触发点；在演练过程中，通过平台对不同专业的学生团队进行指令下达、信息通报和进程调控，从而实现复杂演练的宏观组织与指导。

第四，过程性数据分析与精准反馈能力。这项能力指教师能够采集、分析学生在数字化实训过程中的行为数据，并据此提供精准化、个性化教学指导的能力。其技术路径包括：首先，了解并配置实训系统后台的数据采集点，确保学生的关键操作、决策时间、资源消耗等过程性数据被有效记录；其次，运用学习分析 (LA) 技术、深度学习技术或平台自带的看板，对采集到的海量数据进行分析与可视化；最后，基于数据分析结果，形成对学生个人或团队的能力画像，并提供基于客观证据的即时反馈与针对性改进建议。

## (二) 体系化培育路径：构建“四位一体”的实践框架

为实现教师数字化教学能力的根本性重构，必须构建一个能够将产业实践系统性地、可持续地转化为教师教学能力的内在机制。为此，本文提出一个“产业问题驱动的能力生成模型”。如图 1 所示，该模型的核心思想是，教师能力的提升并非通过被动接受培训，而是在一个结构化的流程中，主动将产业界的真实问题解构、重构为教学资产，并在这一价值创造的过程中完成自身能力的跃迁。该模型包含四个相互关联、循环迭代的环节。



图 1 数字化教学能力培育的“四位一体”实践框架

第一，组织保障：建立产教协同数字化教学实验室。这是转化模型的运行中枢，需在产教融合基地内，成立一个由校企双方技术骨干与教学专家组成的数字化能力研究实验室。其根本职能是管理从产业问题到教学资产的

全生命周期。在技术栈上,可采用敏捷开发项目管理工具(如 Jira)来管理教学资源开发项目;利用协同知识库(如 Confluence)来沉淀和管理校企双方的技术文档与教学法知识;通过统一的通信平台确保校企人员的无缝协作,从而为整个转化过程提供组织与技术流程上的保障。

第二,培育模式:实施“工业问题解构与教学场景重构”。这是转化模型的核心环节,即教师能力的生成过程。该模式要求教师深度参与两个关键阶段。首先是工业问题解构,教师需以项目组成员身份,利用企业提供的数据接口(API)访问生产执行系统或设备监控与数据采集系统中的真实数据,并使用 Python、Power BI 等工具对这些工业数据进行分析,从而解构出一个真实生产问题的核心要素与逻辑。其次是教学场景重构,教师将解构后的问题,利用专业开发引擎(如 Unity/Unreal)或交互式内容制作工具(如 Articulate Storyline 3),重构为一个包含明确学习目标、交互逻辑和评价节点的数字化教学场景或高保真虚拟仿真实训项目。

第三,课程体系:打造基于版本控制的动态能力模块库。该环节是转化模型的知识与技能载体,课程体系不应是静态的,而应是一个动态更新的能力模块库。其核心在于引入版本控制理念。所有通过教学场景重构环节产生的数字化教学资源、教学案例和课程模块,都应作为独立的学习对象,纳入一个由 Git 等版本控制系统管理的资源库中。这意味着任何课程内容都可以像软件代码一样被迭代、分支和合并。这种技术路径确保了课程内容能够与产业技术的发展保持同步更新,教师的培训内容也因此从固定的“课程表”转变为一个可按需调用、持续演进的动态能力库。

第四,评价体系:建立“基于学习体验数据(xAPI)的能力认证”。这是对转化模型有效性的验证闭环,评价体系必须超越传统考核,实现对教师真实能力的精准度量。其技术核心在于全面部署学习体验应用程序接口(xAPI)。在教师主导的数字化教学实训中,通过 xAPI 采集学生与虚拟环境交互的每一个具体行为,形成海量的过程性数据。教师的能力评价,则聚焦于其是否能利用这些学习分析平台(LAP)中的数据,对教学效果进行深度分析、提出教学改进方案,并最终通过其指导的学生能否达成企业认可的数字能力画像。通过此认证,才标志着教师完成了从产业问题到有效教学的完整转化。

#### 四 结语

本文在深化产教融合的国家战略背景下,以重庆安全技术职业学院产教融合实训基地的实践探索为例,对高职教师数字化教学能力的内涵重构与体系化培育路径进行了系统性研究。研究认为,传统意义上的数字化教学能力已无法适应产业深度参与教学的新范式。为此,必须将教师的能力内涵从技术工具的应用者,重构为以数据驱动教学设计、虚拟仿真与数字孪生应用、数字化协同指挥调度教学以及过程性数据分析与精准反馈为核心维度的综合能力体系。

为实现这一目标,本文构建了一个“产业问题驱动的能力生成模型”。该模型的理论创新之处在于,它超越了对教师数字化教学能力的简单罗列与描述,而是提出了一套动态的、可循环的生成机制。其核心思想在于,教师能力的提升并非通过外部的、被动的培训,而是在一个结构化的价值创造流程中,主动将产业的真实问题转化为教学资产,并在这一过程中完成自身能力的内化与跃迁。在实践层面,该模型通过建立产教协同数字化教学实验室、实施工业问题解构与教学场景重构、打造基于版本控制的动态能力模块库以及建立基于学习体验数据的能力认证等四个环节,并嵌入具体的技术栈,为同类高职院校提供了可操作的蓝图和实践样本。

然而,本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模型主要基于安全应急这一特定行业的产教融合案例,在其他产业领域的普适性有待进一步验证与调整。其次,该模型的实施对院校的组织变革能力、企业方的深度参与意愿以及软硬件投入提出了较高要求,其大规模推广面临现实挑战。

展望未来,后续研究可从以下方面展开:一是对该模型进行长期的实证检验,通过纵向跟踪研究,量化评估其对教师能力提升与学生学习成效的实际影响;二是对该模型在不同产业领域的适应性进行比较研究,探索其差异化的实施路径与策略;三是从学生视角出发,研究教师数字化教学能力的提升如何最终作用于学生综合职业素养与数字能力的培养。

## 参考文献

- [1] 黄庆才. 数字化教学理念培养学生小学数学实践能力的应用研究[J]. 名师在线(中英文), 2025, 11(23): 90-92.
- [2] 汪云芬, 张锋, 陈桂军. 教育数字化转型背景下信息科技教师职能辨析、全新定位与能力要求研究[J]. 中国教育技术装备, 2025, (15): 72-75+83.
- [3] 王睿, 崔兰兰, 张丽峰. 《职业教育产教融合赋能提升行动实施方案(2023—2025年)》政策文本分析[J]. 南方职业教育学刊, 2024, 14(02): 53-61.
- [4] 王洪才, 温玲子. 教育强国建设: 目标·任务·方法——《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意义解读[J].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52(05): 135-141+205. DOI: 10.13734/j.cnki.1000-5315.2025.0515.
- [5] 李盟, 赵柏森. “新双高”背景下高职安全技术与管理专业群建设路径探索——以重庆安全技术职业学院为例[J]. 北京财贸职业学院学报, 2025, 41(01): 9-12.
- [6] 涂源原, 徐阳, 黄辉. 新质生产力驱动下应急文化基因的育人路径研究——以重庆安全技术职业学院为例[J]. 湖北应急管理, 2025, (10): 16-19.
- [7] 黄辉, 钱一诺, 何淼. 智慧应急产业学院建设及实施路径研究——以重庆安全技术职业学院为例[J]. 湖北应急管理, 2025, (10): 20-23.
- [8] 卢彩晨, 刘唱然. 《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颁布40年来我国产教融合的历史脉络、典型特征与基本经验[J/OL]. 职业技术教育, 1-8[2025-09-14]. <https://link.cnki.net/urlid/22.1019.G4.20250905.1041.002>.

## Research on the Conceptual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Pathways of Digital Teaching Competency among Vocational College Teacher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ndustry-Education Integration—A Case Study of Chongqing Vocational Institute of Safety Technology

Li Jie<sup>1</sup>

<sup>1</sup>Chongqing Vocational Institute of Safety Technology, Chongqing 404020, China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industry-education integration, there's a disconnect between traditional digital teaching capabilities of higher vocational teachers and the real-world demands of industry. Using the Chongqing Safety Technology Vocational College's industry-education integration training base as a case study, this paper reconstructs the four-dimensional competency structure centered on data-driven instructional design, virtual simulation applications, digital collaborative instruction, and process-based data analysis and feedback. The research's core contribution lie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an "industry-problem-driven competency development model." This model transcends traditional training frameworks and proposes that teacher competency should be developed within a structured process that systematically transforms real-world industry problems into high-value teaching assets. It also provides a feasible path for systematic development, encompassing organizational support, training models, curriculum, and evaluation systems.

**Keywords:** Industry-education Integration; Higher Vocational Teachers; Digital Teaching Ability; Connotation Reconstruction; Cultivation Path

# 数智技术赋能“大思政课”的表现、遵循与进路

梁舒乔<sup>1</sup> 訾扬州<sup>2</sup>

(1. 郑州升达经贸管理学院文法学院, 河南 郑州 451191, 2. 河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河南 新乡 453007)

**摘要:** 伴随智能时代来临, 以大数据、人工智能、虚拟现实这类数智技术正深度重塑社会生态与教育面貌, “大思政课”作为落实立德树人这一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 其建设及发展迫切需与数智技术深度融合。从教学内容体现动态化、教学场景形成沉浸化、教学评价达到精准化、教学管理做到协同化四个方面, 分析数智技术为“大思政课”赋能的主要体现, 确定赋能过程需坚守的原则要求, 包括坚持实现价值引领与技术赋能相统一、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相平衡、数智驱动与人文关怀相结合、技术应用和伦理规制相协调。最终提出促进数智技术赋能“大思政课”的实践路径: 创建智慧化教学平台、开发立体式数字资源库、提高教师数智化专业素养、完善数据化评价模式、建立常态化融合模式, 意在为新时代“大思政课”的创新发展提供理论参考以及实践上的指引。

**关键词:** 数智技术; 大思政课; 教育数字化; 技术赋能; 教育伦理

**基金项目:** 郑州升达经贸管理学院校级课题—学校相关专业的一般研究课题“教育现代化背景下民办本科学前教育专业转型发展的机制研究”(SD-YB2025049)

DOI: doi.org/10.70693/rwsk.v2i3.335

“大思政课”是新时代背景下思政理论课改革创新的重要理念与实践路径, 强调必须“把思政小课堂跟社会大课堂搭连起来”, 其核心之处是打破传统课堂的时空局限, 做到教学资源的广泛集成、教学内容的贴合时代、教学形式的生动新颖, 我们此刻正处于以数字化、智能化为特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浪潮里, 数智技术作为一股具有颠覆性的力量, 已渗透进社会的各个角落。恰如教育技术学家祝智庭教授讲的: “教育信息化正从‘工具性’阶段朝着‘生态性’阶段发展, 技术不再是辅助的方式, 而是重构教育生态的核心要素。”(祝智庭, 2019) 所言的背景, 探讨数智技术赋能“大思政课”的途径, 不仅是对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的实际反馈, 更是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根据事情变化、时代发展、形势趋势而革新的必然要求。然而, 技术赋能并非只是简单的技术堆叠, 而是一项关乎理念升级、模式重构、伦理优化的复杂系统工程, 同样存在把技术当作“万能药”的盲目乐观状态, 也存在守着传统、排斥革新的保守情形, 哲学家海德格尔曾警告现代技术大概会带来的“座架”危险, 令人们受困于技术的“促逼”之中(海德格尔, 1977)。如何科学把控数智技术赋能“大思政课”的内在逻辑、外在表现, 怎样在赋能阶段坚守育人初心、遵循基本的规律要求, 并基于此去探索切实有效的实践路径, 成为急需深入探究的课题, 本文试图依托马克思主义的科技观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 结合教育学、伦理学、技术哲学等诸多学科的视角, 对上述问题进行系统梳理, 以带动“大思政课”在数智时代实现高质量发展。

## 一、数智技术赋能“大思政课”的主要表现

数智化手段赋能“大思政课”, 从本质上看, 是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虚拟现实/增强现实、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开展, 对“大思政课”教学要素、教学实施过程、教学环境进行系统性的重塑与智能化升级, 具体呈现的表现主要包含以下四个方面:

### (一) 教学内容从静态预设走向动态生成与精准供给

传统思政课的教学内容多把教材、大纲当作蓝本, 呈现出一定的滞后及同质化倾向, 数智技术采用实时采集、分析与挖掘的方式处理海量社会数据, 可动态捕获社会热点、理论前沿与学生的思想上的疑难, 让教学内容即刻实现更新、丰富和拓展, 凭借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开展网络舆情的分析, 可精准把握学生普遍关注的社会现象以及思想动态, 从而在教学中达成“顺势疏导”。顾建军指出, 智慧教育环境里的学习资源, 应具有自适应、自进化、

**作者简介:** 梁舒乔(1999—), 女, 硕士, 郑州升达经贸管理学院文法学院助教, 研究方向为学前教育社会学;

訾扬州(1998—), 男, 河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博士生, 研究方向为教育学原理。

**通讯作者:** 訾扬州

泛在化等特性，（顾建军，2020）凭借数智技术赋能的“大思政课”内容，正朝着依照学生认知特征和兴趣喜好的“精准滴灌”模式去转变，达成了从“千篇一律”到“量身打造”的个性化内容推送与组建。

## （二）教学场景从物理课堂走向虚实融合与沉浸体验

“大思政课”倡导联通课堂内外、校内校外、线上线下，尤其是虚拟现实、增强现实、混合现实这几种技术，可冲破物理空间的障碍，为学生创设高度逼真的历史情形、社会环境或未来图景，学生可“亲身走进”红色纪念馆、重大历史事件现场，或“前往”现代化工厂、乡村振兴工作一线，在沉浸式体验中增强理论认知与情感认同。赵勇等学者于研究中发觉，沉浸式虚拟环境可极大提升学习者的情境兴趣与知识迁移能力（赵勇等，2021年）依靠5G、云计算等技术的远程同步课堂、全息投影教学，促使不同地区、不同学校的优质思政教学资源实现即时共享，切实打破了教育领域的时空壁垒，扩大了“社会大课堂”的范畴。

## （三）教学评价从结果单一走向过程多元与数据驱动

传统思政课评价多依靠像期末考试、课程论文这样的终结性评价，不易全面、客观地反映出学生思想成长经过，数智技术借助对学生学习过程数据的全链条搜集，搭建多维度的学生数字画像，采用学习分析技术，可对学生参与度、思维深度及情感态度的变化状况加以评估，实现对学生思想政治素养发展阶段的形成性评价与诊断性处理。黄荣怀教授郑重强调：“数据作为智慧教育关键生产要素，基于数据所做的决策与评价将更科学、更精确，”（黄荣怀，2018）这种借数据驱动的评价模式，不只看重“知”的掌握状况，更关切“信”的坚稳与“行”的自觉主动，推动评价体系往综合性、发展性方面转变。

## （四）教学管理从经验决策走向智慧协同与高效治理

“大思政课”的建设牵扯到多部门、多主体、多资源的协调合作，数智技术凭借搭建一体化、智能化的思政教学管理服务云平台，能达成对教学资源、教学活动、教师队伍、学生状态的全面认知、智能调度及协同管理，凭借区块链技术分布式、不可篡改的属性，可设置学生思政素养成长档案，记录其参与不同思政实践活动的踪迹与成效，为综合评价提供可当作依据的可靠内容。大数据分析也能为教学管理者给予学情预警、资源优化配置、教学效果评估等决策相关支持，提高“大思政课”建设的整体效率与治理层次，这体现出曼纽尔·卡斯特谈到的“网络社会”里，信息流组织对社会结构跟实践的重塑效应（卡斯特，2000）。

## 二、数智技术赋能“大思政课”的原则遵循

数智技术的赋能效果并非自动生成，其在教育领域开展运用，要依照教育基本规律和思想政治工作特殊要求，为让数智技术赋能“大思政课”平稳推进，一定要坚守下面的基本原则：

### （一）坚持价值引领与技术赋能相统一

“大思政课”的根本属性表现为意识形态性和价值导向性，数智技术的应用得为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服务，绝不能只是为了技术而采用技术，甚至让技术逻辑跑到育人逻辑前面，鲁洁教授曾尖锐指出：“教育是把价值传承和意义建构作为核心的文化活动。”（鲁洁，2001），在技术发挥赋能作用的全部阶段里，肯定要紧紧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技术设计、资源开发以及教学实施的各个方面，要让数智技术成为传播主流价值、坚定“四个自信”的得力工具，而不是价值中立的冰冷器具或价值缺失的“麻烦源头”。

### （二）坚持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相平衡

数智技术本身内藏着强大的工具理性，力求高效、精准与可控，而“大思政课”牵扯着人的精神世界与价值塑造，可归为典型的价值理性范畴，哲学家马克斯·韦伯对工具理性肆意膨胀的忧惧，在教育领域同样要对其警惕（韦伯，1922年），实施赋能操作中，应防止掉进“数据主义”或“技术决定论”的陷阱里，防止把复杂的育人过程简化为数据聚集和算法运算。需一直明白，技术归为“器”一类，育人可谓“基础之道”，技术的运用目的是更好地把握学生、启迪思路、培育情操，最终实现人的自由全面成长，促成工具理性跟价值理性的融洽契合。

### （三）坚持数智驱动与人文关怀相结合

数智技术可给出精确的分析与高效的方案，但教育的温暖体验、思想的碰撞融合、情感的沟通联系始终是思政课的靈魂要点，雅斯贝尔斯把教育描述成“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雅斯贝尔斯，1977）在利用数智技术做个性化推送、自动化评价的时候，必须留存且强化师生间、生生间面对面的深度交谈、情感交互和精神共鸣。需警惕技术也许带来的“去身体化”与情感隔阂，保障数智赋能的“大思政课”始终洋溢人文温度，关切学生的精神渴求与生命成长。

### （四）坚持技术应用与伦理规制相协调

数智技术应用期间,伴随着数据隐私、算法偏见、数字鸿沟等相关伦理风险,在“大思政课”这个高度敏感的范畴,这些风险大概会被放大,一定要构建完善相关的伦理规范与监管机制,在数据的采集与使用方面,需依照最小必要与知情同意这两个原则,守卫学生的隐私空间。在实施算法设计的阶段,需奋力实现透明、公平,杜绝因数据或模型偏差引发对特定学生群体的歧视,要留意技术应用可能引发的数字鸿沟矛盾,保障数智赋能惠及全体学生,促进教育公平达成,这要求我们依据尤尔根·哈贝马斯所推崇的“商谈伦理”精神,针对技术开发者、教育者、管理者、学生等多方主体建立对话机制,共同制定且依照技术应用的伦理底线(哈贝马斯,1983)。

### 三、数智技术赋能“大思政课”的实践进路

基于上述表现剖析与原则遵循,带动数智技术深度为“大思政课”赋能,应在平台、资源、师资、评价、机制等多个维度共同发力,查找系统化的实践路径。

#### (一) 构建集成开放的智慧化教学平台

建设一个将教学管理、资源聚集、数据分析和交互体验整合的“大思政课”智慧云平台是基础工程,该平台理应具备以下功能:其一为资源整合中心,归拢优质课程视频、案例库、虚拟仿真实验、红色数字场馆等多元资源;二是实现教学交互的空间,支持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模式、小组协作配合、实时研讨探讨;三是数据的监测与分析系统,可以在不引起察觉的情况下采集教学过程数据,接着开展学情分析及预警活动;四是实践安排调度系统,跟校外实践基地建立对接,达成实践活动的线上预定、过程操持和成果鉴定,平台搭建应依照开放接口规范,有利于跟现存的教务系统、校园平台以及未来新技术做无缝对接。

#### (二) 开发情境驱动的立体化数字资源

数字资源是数智赋能的核心支撑载体,应迈过简单的文本、视频数字化门槛,全力开发具有深度交互性及情境沉浸感的资源类型,重点包括:其一为虚拟仿真思政课程,以“四史”教育、国情观察、道德法治等主题为核心,开发一系列高品质的VR/AR体验项目。其二是动态的案例库,采用大数据手段,建立跟社会发展同步更新、可智能化检索的鲜活案例库,其三为数据叙事相关产品,将抽象的理论跟宏大的叙事,采用数据可视化、交互图表等形式手段,变成易于理解、能引起共鸣的“数据故事”,资源开发可鼓励跨学科联合,引入计算机科学、设计学、新闻传播学等专业的相关力量,拔高资源的技术水平及教育艺术性。

#### (三) 提升教师人机协同的数智化素养

教师作为数智技术跟“大思政课”融合的关键执行者与引导人,必须下大力气提升思政课程教师的数智化素养,使其拥有落实“数智育人”的能力,具体而言:其一为技术运用能力,能熟练运用智慧教学平台与工具开展教学活动,二是掌握数据解读的能力,可以领会学情分析报告要点,并按照此情况调整教学策略。三是人与机器携手协作的能力,擅长凭借技术处理常规性、分析性工作,进而把更多精力花费在有创造性的教学设计、深度思想引导以及人文关怀上,教育管理部门和高校要把数智素养纳入教师培训范畴,开办专项研讨项目,进而建立奖励机制,激励教师主动探索技术赋能的创新教学样式。

#### (四) 完善聚焦发展的数据化评价体系

改变传统评价途径,搭建基于大数据、以推动学生思想政治素质不断发展为导向的综合评价体系,此体系应展现:其一为过程属性,全程记录学生在课堂学习、网络研讨、社会实践等多样场景里的表现;其二是展现出多维属性,评价指标涉及知识掌握、能力发展、情感态度以及价值观念等多个维度;其三体现出诊断性,依靠数据分析,识别学生在思想上的困惑与成长的瓶颈点,给出符合个性的反馈及辅导;其四显示出增值属性,留意学生在一定时间段里的进步与成长,而不只是单纯开展横向的对照,务必要保证评价的透明度及解释权,防止“算法黑箱”让学生面临不公正局面。

#### (五) 建立常态长效的融合保障机制

数智技术与“大思政课”的深度融合不是一朝一夕能成的,需要稳定的制度支撑,其一为组织领导相关机制,构建以校领导掌管的团队,宣传、教务、学工、信息技术中心、马克思主义学院等多部门协同合作的工作专班,统筹谋划与推动,其二为经费投入的机制,筹备专项经费,保障平台建设、资源开发、师资培训和研究能一直有投入。其三是产学研合作机制,提高跟高水平科技企业、研究机构的合作紧密度,一起努力攻克关键技术,实现前沿成果转化,四是动态评估跟迭代革新机制,按周期对融合效果进行评估,依照技术进展和教育需求的转变,迅速调整策略,保证赋能工作的持续开展与领先水平。

### 四、结论

数智技术的兴起为“大思政课”的创新性发展提供了历史性契机,它凭借重新塑造教学内容、场景、评价及管

理,有力延伸了思政教育的广度、深度及成效,技术赋能的征程并非一路坦途,必须深刻认识到其背后藏有的价值异化、伦理失范等风险。唯有坚守价值引领、平衡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融合数智驱动及人文关怀、协调技术应用与伦理规制,才能保障赋能方向不出差错,依靠设立智慧平台、挖掘立体资源价值、提高教师综合素养水平、优化数据评价流程、建立长效融合机制等系统化实践路径,数智技术肯定会在遵循思想政治教育规律这个基础上,从更深层面激活“大思政课”的生机与活力,为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给予有力支撑。我们所追寻的是“诗与思”这般的技术融入境界,让数智技术像春雨一样悄然滋润,在守护着育人初心之际,开辟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的全新格局。

参考文献:

- [1]祝智庭.智慧教育新发展:从翻转课堂到智慧课堂及智慧学习空间[J].开放教育研究,2016,22(01):18-26+49.
- [2]海德格尔.技术的追问[M].海德格尔选集.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77.
- [3]鲁洁.教育的返本归真——德育之根基所在[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1,(04):1-6+65.
- [4]马克思·韦伯.学术与政治[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 [5]雅斯贝尔斯, K.什么是教育[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
- [6]哈贝马斯, J.交往行动理论[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4.
- [7]赵小兰,杨辉.“大思政课”视域下馆校协同育人的价值意蕴、现实困境与优化路径[J].思想教育研究,2025,(10):111-116.
- [8]董旖旎,李国娟.高校“大思政课”协同育人机制构建的实践路径[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25,(19):67-71.
- [9]刘国庚.新时代“大思政课”建设的四重向度[J].河南社会科学,2025,33(10):118-124.
- [10]李利芳,傅锁根.系统观视域下推进“大思政课”建设的路径探析[J/OL].系统科学学报,2026,(02):1-7[2025-11-28].
- [11]吴潜涛,杜思睿.“大思政课”的科学内涵、建设成就与创新发展[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5,(07):113-125.

## The performance, compliance and approach of Digit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empowering “Gr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ShuqiaoLiang<sup>1</sup>, YangzhouZi<sup>2</sup>

<sup>1</sup> Zhengzhou Shengda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Trade Management, Zhengzhou, China;

<sup>2</sup> Henan Normal University, Xinxiang,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advent of the intelligent era, digit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ies such as big data,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virtual reality are deeply reshaping the social ecosystem and educational landscape. As a key course for implementing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fostering virtue and nurturing talent,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gr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urgently need to be deeply integrated with digit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ie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main manifestations of digit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empowering "gr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from four aspects: dynamic presentation of teaching content, immersive formation of teaching scenarios, precise teaching evaluation, and collaborative teaching management, and determines the principle requirements that need to be adhered to in the empowerment process. This includes adhering to the unity of value guidance and technological empowerment, the balance between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and value rationality, the combination of digital intelligence-driven and humanistic care, and the coordination of technological application and ethical regulation. Ultimately, a practical path to promote the empowerment of "gr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by digital and intelligent technologies is proposed: creating an intelligent teaching platform, developing a three-dimensional digital resource library, enhancing teachers' professional digital and intelligent qualities, improving the data-based evaluation model, and establishing a regular integration model. The aim is to provide theoretical references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gr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in the new era.

**Keywords:** Digital Technology; Comprehensiv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Course; Education Digitalization; Technology Empowerment; Education Ethics

# 课程建设与科研素养的融合：优质课程驱动下药学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模式研究——以药物化学选论教学为例

王玉青<sup>1</sup> 吴文浩<sup>1</sup> 季红<sup>1</sup> 易伟<sup>1</sup> 张超<sup>1, 2</sup>

(1.广州医科大学 药学院, 广东 广州, 511436; 2.广州南方学院 中医药健康学院, 广东 广州, 510970)

**摘要:**为破解药学研究生课程中知识传授与创新能力培养脱节的困境,以广州医科大学药物化学选论课程为载体,探索优质课程驱动下的创新能力培养新模式。课程基于建构主义与OBE理念,从内涵重构、内容创新和教学方式三个维度进行改革:将课程定位从“知识容器”重塑为“科研启蒙平台”,实现与生产实践、科研方向及前沿热点的“五个结合”,并引入探究式学习与多元化考核,提升研究生的创新思维、创新能力和创新成果,达到培养高端药学专业人才培养的目标。

**关键词:**药物化学选论; 研究生教育; 创新能力培养; 课程改革

**基金项目:**广东省教育厅2023年广东省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项目“药物化学选论”,(项目编号:2023SFKC-051);广东省教育厅2023年度广东省本科高校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建设项目“以胜任力为导向的药物化学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模式的应用研究”,(项目编号:粤教高函[2024]9号-922);广州医科大学2023年度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建设项目“以胜任力为导向的《药物化学》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模式的应用研究”,(项目编号:2023JXGG001);2024年学习型社会建设重点任务(高等继续教育领域)培育建设名单“药学继续教育‘五融合五重塑’人才培养模式创新探索与实践”;2024年度广东省学习型社会建设(继续教育)质量提升工程项目“以岗位胜任力为导向的‘五融合五重塑’的药学成人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研究”(项目编号:JXJYGC2024G337);广州医科大学2024年度全科医学与继续医学教育项目“以岗位胜任力为导向的‘五融合五重塑’的药学成人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研究”;2023年度广东省教育科学规划项目“基于OBE理念‘AI虚实三结合、科教思政双融合’式药物化学实验数智化课程建设与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编号:2024GXJK426)

DOI: doi.org/10.70693/rwsk.v2i3.327

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五五规划里,有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要求,研究生教育作为药学领域人才培养的最高层次,它承担着为行业培养领军人才的使命。传统的研究生课程体系,知识传授占主导,教学模式比较固定,很少把学科前沿和创新思维方法融入其中,理论学习与实践应用之间存在脱节。这就导致部分研究生难以将课堂理论知识转化为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创新能力,这限制了他们科研潜力的发挥以及科研成果的产出。推动优质研究生课程的建设,把课程教学内容和科研素养深度融合起来,开展研究生创新能力的新培养模式改革,成为了深化药学研究生教育的关键突破口。

“药物化学选论”是面向广州医科大学药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开设的一门重要的专业选修课,它以聚焦药物研发核心环节、紧跟学科发展前沿、丰富的科学探究案例为特点,核心目标是提升药学研究生的创新能力。本研究以我校“药物化学选论”教学为例,深入探索如何通过系统性、创新性的课程重构,融合提升学生科研素养的培养目标,为研究生创新能力的有效提升提供可行的理论模式与实践路径,为我国药学研究生教育的质量提升提供参考。

**作者简介:**王玉青(1989—),女,博士,广州医科大学副教授,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研究;  
吴文浩(1983—),男,博士,广州医科大学副教授,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研究;  
季红(1978—),女,博士,广州医科大学教授,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研究;  
易伟(1983—),男,博士,广州医科大学教授,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研究;  
张超(1964—),男,硕士,广州医科大学教授,广州南方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研究。

**通讯作者:**王玉青

## 一、药学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的现状与课程改革的紧迫性

### 1.1 药学研究生培养现状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而科技发展的核心在于创新,研究生创新能力的培养与提升依然是当今药学专业研究生教育的首要任务。在大学生就业困难与研究生扩招的双重背景下,研究生在入学之初存在着基础知识、实验技能和科研素养等方面的明显差异,当前研究生课程的集中培养模式,难以满足不同学生的个性化需求。研究生的学习背景不同,需要考虑本科、专升本、多年工作经验后再读研的不同学生的学习能力,学生急需通过本门课程完成基础知识巩固与前沿知识学习的多重需要,对课程内容的设置要求越来越高。大部分研究生依然习惯于本科阶段的“灌输式”课堂教学模式,创新意识薄弱,学术热情不高,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不足。部分学生把学历提升作为未来就业的跳板,没有深刻认识到创新能力的培养对自身能力培养的重要性。

### 1.2 传统研究生课程教学的局限

传统的研究生课堂往往是本科相关知识延伸,课程体系以体系化的知识灌输为核心目标,注重知识的继承性与完整性,却很少将学科前沿动态、学科未决难题和应用研发挑战等引入课堂。课堂多以教师为中心的知识讲授为重点,学生被动接受知识,缺乏探究式或问题驱动式的教学方法,导致学生难以将知识转化为发现、分析和解决复杂科学问题的能力。考核多以标准化考试或综述论文为主,不能有效评估学生的创新性思维、实验设计能力等核心科研素养。这种教学局限源于仍将研究生教育视为本科教育的简单延伸,而非以培养创新为目标的学术训练起点。因此,打破原有教学局限,推动研究生课程教学从知识传递向思维启迪与能力建构转型,已成为深化研究生教育改革、服务国家创新发展战略的重要任务。

## 二、优质课程驱动药学研究生的创新能力培养

“药物化学选论”作为广州医科大学药学及相关专业研究生教育的专业课程,该课程教学目标如下:(1)使研究生学会运用生物学、化学等多方面的知识来理解药物化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通过药物化学知识的学习提高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2)通过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的进行,使得不同知识基础、不同学科背景、从事不同研究方向的研究生都能学到切实有用的药物化学知识技术,应用于实际科研和工作中。(3)通过课外专题活动的开展使学生学会应用生物化学基本理论知识理解和分析现代药学领域中的热点问题,提高学生把握学科动态、综合运用知识和创新思维和理念的能力。

### 2.1 “优质课程”的内涵重构:从知识容器到科研启蒙平台

在内容上实行知识模块化、系统化,突出新药研发特色,以区别于本科“药物化学”。在充分吸收相关教材亮点的基础上,综合考虑专业学科方向、主讲教师的研究领域及学生将来可能的研究方向,创新课程内容。主要内容设置有药物化学基础、先导化合物的发现与优化、中枢神经类药物研发、抗菌药物研发、抗肿瘤药物研发、心血管药物研发、计算机辅助药物设计、药物基因组学、新药筛选与评价等。其中先导化合物的发现与优化、抗菌药物研发、抗肿瘤药物研发、心血管药物研发、新药筛选与评价等主题属于主讲教师的研究领域,可以保证内容的深度与教学效果。

本课程在理论教学的基础上深入开展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组织学生进行科研实验能力提升的培训,开展与学科相关的小型实验技术交流会,引导学生直接参与讨论并与教师交流实验心得,强化药物化学基础与科研能力的无缝衔接;参与指导研究生的课题申请书的组织与撰写,为研究生学位论文的设计、实施与完成奠定较扎实的基础。

### 2.2 科研素养的要素解构:内容创新实行“五个结合”

本课程内容的改革做到如下“五个结合”,以达到集理论知识学习、操作能力和科研能力训练于一体,培养学生独立思考与创新性研究的能力。

(1)与药物生产实践相结合。在课程建设过程中,内容上除了构建全面科学的理论体系之外,力争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如青霉素G钾易溶于水,在水中 $\beta$ -内酰胺环易裂解为无活性的青霉酸和青霉噻唑酸,并降低水溶液的pH值,进一步加速青霉素的水解,水解速率随温度升高而加快,因此不可能将青霉素G钾(钠)制成注射液。引导学生在怎样生产存储药品、怎样评估其安全性、具体的分子作用机制等问题进行思考,提高其科学思维与创新水平,使他们具备一定的探究能力。

(2)与团队科研方向相结合。本团队在科研上以化合物的发现与优化、抗菌药物研发、抗肿瘤药物研发、心血管药物研发、新药筛选与评价等研究见长,在国内具有一定影响力。及时将团队的研究成果,如基于核受体

蛋白(GR 与 PPAR  $\gamma$ )的高效安全的靶向创新药物设计、合成与发现, 靶向 c-myc 基因的先导化合物发现与优化、基于肿瘤化疗联合用药的基础与转化研究、基于神经炎症的抗阿尔茨海默病新药 AD16 (哌达甲酮) 的发现等成果, 恰当地引入课堂教学中, 除了让学生及时掌握本团队研究情况之外, 还可以扩大学生视野, 提升对本课程与学科方向的钻研能力。技术赋能, 利用分子模拟软件、数据库等进行虚拟筛选与药物设计实践。

(3) 与区域性研究相结合。广州市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城市之一, 生物医药产业蓬勃发展, 产业链条完整, 生物产业规模优势日益呈现, 创新成果丰硕, 研发投入全国领先, 医药制造业发达, 医疗资源总量多, 金融优势明显, 制度创新有助于生物医药产业发展, 广州市国际化进程领先, 利于持续促进对外合作。在课堂上与研究生强调产业的发展离不开先进扎实的药学技术, 以提升学生对产业的兴趣, 培养当地产业所需求的专门人才。

(4) 与学科研究热点相结合。近年来新冠病毒肆虐全球, 恶性肿瘤的发病率逐年提高, 细菌的耐药性威胁人类健康等成为学科研究热点, 在授课中我们也将这些研究热点的最新进展融入课堂教学, 让学生掌握新药研发的基本研究方法, 并思考应该如何对相应的疾病进行有效防控。

(5) 与国际前沿研究相结合。众所周知药物学现已全面进入多组学时代, 生物医药产业未来是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直接驱动的高科技产业, 抗肿瘤、基因治疗、再生医学、脑疾病和类脑智能等方向是目前国际研究的前沿, 将这些内容在课堂教学中向学生介绍, 同时引导学生思考。加深学生对生物医药行业重要性的认识, 激发他们对此继续探究的兴趣, 并保持一定的科研热情。

### 2.3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与成果导向教育(OBE)理念在研究生教育的整合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是在行为主义学习理论和认知主义学习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而来的, 它更多的是强调教师充分利用情境、协作、会话、意义建构要素, 积极发挥学生的积极、主动性和创造力。在药物化学选论的教学中所构建的学习情景与现实科研工作或企业生产的真实情景相近, 将课程知识隐含于情景当中, 教师不再是单纯灌输课本知识, 而是通过课题讨论、组会汇报、合作研究等社会化协作形式, 引导研究生对药物化学研究前沿进行深度解读与知识共享。在学生观的构建层面上, 要求研究生突破对知识的机械记忆, 从被动学习转变为主动探索, 引导研究生完成文献研读、实验方案自主设计、复杂数据解析与科研矛盾解决等一系列完整的研究过程, 使研究生能够掌握药物设计、合成与作用机制等核心知识。

在教学实践中, 若仅开展建构主义的教学过程缺乏明确的能力产出导向, 容易使研究生陷入学习目标模糊、学习过程松散的局面, 难以形成系统可迁移的创新素养, 因此我们将“成果导向教育(Outcome-Based Education, OBE)”理念与建构主义学习理论融合。OBE以预期创新成果为导向, 即首先判定研究生应具备的核心创新能力, 再系统规划课程内容、教学策略与评价体系。在药物化学选论课程中, OBE所定义的创新成果是超越教科书中的知识掌握教学目标, 更多的是对研究生高阶创新能力的培养, 例如: 能独立检索并批判性评估药物化学前沿文献; 能基于多样化知识(药物靶点结构、病理学、ADMET性质)提出有理有据的新型药物分子结构设计方案; 能优化化学小分子药物的合成路线, 并评估其经济性与绿色化学价值等。OBE框架以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为目标, 为课程体系与教学实施提供了清晰的能力发展图谱与精准的评价标尺。

### 三、创新能力培养评价与创新成效

为了评价广州医科大学药物化学选论课程建设与科研素养融合对药学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的成效, 我们构建了一套多元化、灵活性的考核评价方式。学生的课程总评成绩由三部分构成: 课堂参与度和表现(30%)、学生自主选题讲解(30%)和专题调研论文(40%)。其中, 课堂参与不仅包括出勤情况, 更是通过在线学习软件统计学生的课堂讨论、案例分析及学生对前沿问题的思考和互动。学生自主选题讲解这一环节, 要求研究生提炼药物化学领域的研究热点, 并根据自己拟定的题目做文献调研与汇报, 以此锻炼研究生的学术表达能力与创新思维。专题调研论文则采用多样化选题, 如药物合成路线设计、AI辅助药物设计、天然产物结构修饰与改造、新药物靶点机制探究等, 目的是考察学生综合运用知识的能力以及科研创新潜力。通过这种多维度的考核模式, 我们能够全面、客观地评价学生的学习效果, 确保达到预期的教学目标。

为了评价教学改革对学生创新能力培养的效果, 我们通过发表科研论文数量、毕业生所签工作岗位, 以及师生对专业的满意度进行统计和分析这几个层面对我校2023届、2024届和2025届研究生开展调研。调研结果表明, 随着药物化学选论课程教学改革的深入, 我校药学研究生发表科研论文总数逐年增加, 尤其是SCI论文的总影响因子逐年增加。在毕业生所签工作岗位方面, 2023届毕业生从事专业技术或科技工作的比例约60%, 2024届和2025届毕业生从事专业技术或科技工作的比例持续上升增加到近80%, 且攻读博士研究生的比例逐年增加。师生对专业满意度的调查问卷分析结果表明, 从2023届至2025届, 药专业研究生对本专业的满意度由95%提升至99%, 导师对研究生创新能力提升的满意度为100%, 因此师生对创新培养成效皆高度满意。

### 四、结语

本研究以广州医科大学药物化学选论课程改革为例,把优质课程建设和科研素养深度融合起来,系统的探究的药学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研究表明,要打破传统研究生课程教学中知识传授和创新能力培养“二元分离”的状况,关键在于推动研究生课程从“知识传递”向“思维启迪与能力建构”的转变。在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与OBE理念相结合的教学理念下,我们通过重构药物化学选论课程的教学目标、采用“五个结合”实施课程内容创新,构建多元化考核评价体系,成功实现了将药物化学选论课程教学从“知识容器”向“科研启蒙平台”的转变,为药学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提供了有效范例。

参考文献:

- [1] 石丹妮,江胜强.“双一流”背景下医学研究生创新教育教学模式探索[J].创新创业理论研究与实践,2024,(1):103-105.
- [2] 阎惠丽.高校创新教育与创业教育耦合的实践路径——评《新时代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理论与实践》[J].中国教育学刊,2021,(11):10044-10044.
- [3] 郭金华.区域整体推进创新教育的时代意蕴与实现路径[J].上海教育科研,2023,(9):37-43.
- [4] 葛利,谢集照.药学研究生专利课程教学实践[J].高教学刊,2025,11(15):130-133
- [5] 姚倩,胡一冰,付强,等.全面提升药学研究生综合素质的教学实践探讨[J].海峡药学,2023,35(4):44-46.
- [6] 赵大伟,易加斌.建构主义学习理论视角下研究生“五位一体”课程思政体系研究[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23,39(6):79-86.

## **Integration of Curriculum Construction and Research Literacy: A Study on the Cultivation Model of Innovative Ability of Pharmaceutical Graduate Students Driven by High-Quality Course——Taking the Teaching of Selected Topics on Medicinal Chemistry as an Example**

Wang Yuqing<sup>1</sup>, Wu Wenhao<sup>1</sup>, Ji Hong<sup>1</sup>, Yi Wei<sup>1</sup>, Zhang Chao<sup>1,2</sup>

<sup>1</sup> School of Pharmacy, Guangzhou Medical University, Guangdong, Guangzhou 511436, China

<sup>2</sup> School of Chinese Medicine and Health, Guangzhou Nanfang College, Guangdong, Guangzhou 510970, China

**Abstract:** To address the persistent disconnect between knowledge transmission and innovation capacity cultivation in pharmaceutical graduate education, this study employs the Selected Topics in Medicinal Chemistry course at Guangzhou Medical University as an example to explore a novel teaching model. Based on constructivism learning theory and the Outcome-Based Education (OBE), the course teaching reform was performed across three interconnected dimensions: epistemological reconstruction, content innovation, and pedagogical optimization. Specifically, the course orientation was changed from "knowledge storage" to "research incubation platform". Furthermore, inquiry-based pedagogical approaches coupled and diversified assessment mechanisms were introduced to systematically enhance students' innovative thinking patterns, practical innovation capabilities, and tangible innovative outputs. This reform advanced the cultivation of high-caliber pharmaceutical professionals equipped with strong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ability.

**Keywords:** Selected Topics on Medicinal Chemistry; Graduate Education; Innovation Ability Cultivation; Course Teaching Reform

# 课程思政视域下《基础日语》教学改革路径探析

张修志<sup>1</sup>

(1.哈尔滨师范大学,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25)

**摘要:**随着高校课程思政建设的持续深化,如何在专业基础课程中实现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与价值塑造的协同统一,已成为日语教学改革的重要议题。《基础日语》作为日语专业低年级核心课程,既承载语言知识启蒙和技能训练任务,也是学生形成专业认知、树立文化态度与价值观念的关键环节。本文结合《基础日语》的课程属性与《新编日语》第二册(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重排本)的特点,以“单元二复习”中的“メーデー(五一劳动节)”和“四川大地震—生死の瀬際の同胞愛(四川大地震——生死攸关的同胞爱)”为切入点,探讨任务设计、课堂活动和评价反馈等环节中的课程思政教学思路。研究认为,《基础日语》课程思政教学的关键不在于附加式灌输,而在于围绕语言训练主线,依托生活化、情境化和情感化的文本,将劳动观念、家国情怀等价值要素自然融入语言训练中,从而实现语言能力与价值引领的有机统一。

**关键词:**课程思政; 基础日语; 教学改革; 价值引领; 新编日语

**基金项目:**哈尔滨师范大学高等教育教学改革工程重点项目“日语专业课程思政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编号: XJGZ2023001)

DOI: doi.org/10.70693/rwsk.v2i3.332

## 一、引言

课程思政教学强调在专业课程教学中实现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与价值塑造的统一。对于外语专业而言,这一理念具有特殊意义。外语课程不仅承担语言训练任务,也是学生接触异域文化、形成跨文化认知与价值判断的重要场域。日语专业课程尤其如此。学生在学习日语的过程中,不仅要掌握语言知识和交际技能,还需要在文化理解、立场意识和社会责任层面获得引导。因此,如何在日语教学中实现语言训练与价值引领的有机融合,已成为当前课程改革的重要问题。

《基础日语》作为日语专业低年级阶段的必修核心课程,在专业课程体系中发挥着基础性、支撑性作用,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已有研究表明,《基础日语》作为日语专业核心课程,在所有相关课程中起着重要支撑作用,也是开展课程思政教学的有效途径<sup>[1]</sup>;而且入门阶段的《基础日语》课时量大、授课教师与学生接触最为频繁,因此理应成为课程思政实施的重要渠道<sup>[2]</sup>。然而,长期以来,《基础日语》教学往往侧重于词汇、语法、句型及会话等语言教学,存在“重知识传授、轻价值引领”的倾向。在部分教学实践环节中,对文化内涵与思想价值挖掘不够。事实上,《基础日语》教材内容非常贴近学生日常生活、涉及的主题丰富,很容易潜移默化地实现价值观的引导与塑造。因此,如何依托《基础日语》课程内容,挖掘其中的思政元素,探索语言学习与价值引领有机融合的教学路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与实践价值。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新编日语》(重排本,以下略)第二册“单元二复习”中,“メーデー(五一劳动节,以下略)”和“四川大地震—生死の瀬際の同胞愛(四川大地震——生死攸关的同胞爱,以下略)”<sup>[3]</sup>分别围绕五一劳动节出行安排和汶川地震中的同胞互助展开叙述,兼具语言训练功能与思政教育价值。前者可以延伸出劳动观念、公共安全和规则意识等主题,后者则有助于引导学生理解同胞情怀、责任意识和生命价值。因此,以这两篇文本为依托开展课程思政分析,既有助于揭示《基础日语》教材的育人潜力,也有助于探索基础阶段日语课程思政的可行路径。

基于此,本文以《基础日语》课程为研究对象,以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新编日语》第二册为主要文

**作者简介:**张修志(1980—),男,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日语教育,地域文化研究,日语翻译。

**通讯作者:**张修志

本依据,重点围绕“单元二复习”中的课文“メーカー”和“四川大地震一死の瀬際の同胞愛”展开分析,探讨课程思政在《基础日语》中的实施逻辑、融入路径与教学成效。文章旨在说明,基础阶段日语教学完全可以在不削弱语言训练目标的前提下,实现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与价值塑造的协同统一。

## 二、《基础日语》课程思政的理论基础与课程契合性

课程思政的核心不在于为专业课程附加外在的思想政治内容,而在于立足课程本身,挖掘其中蕴含的价值教育资源,并通过恰当的教学设计实现价值引导的自然融入。对于外语课程而言,这种融入具有鲜明的现实必要性。外语学习本身就是跨文化接触过程,学生在学习语言的同时,也在接受文化信息、形成文化判断并建构交际立场。如果外语教学只关注目的语文化而忽视本国文化表达与价值辨析,就容易导致学生在文化认知中出现失衡。因此,外语课程不仅要培养语言能力,更应主动承担文化引导和价值塑造功能<sup>[4]</sup>。

从已有研究看,《基础日语》课程思政目标不仅包括知识目标和能力目标,也应包括明确的育人目标,即在教学过程中培养学生正确的价值导向、家国情怀、文化自信与跨文化理解能力<sup>[5]</sup>。课程思政包含价值塑造、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三大要素,其中居于首位的是价值塑造。而《基础日语》课程能够与政治认同教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个人道德修养教育以及专业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等多种课程思政元素相结合,是一座思政教育的“富矿”<sup>[6]</sup>。这一判断实际上揭示了《基础日语》课程思政建设的内在逻辑:课程思政并不是改变课程属性,而是在语言教学中实现德育功能的激活。《基础日语》作为日语专业低年级核心课程,其课程与思政理念具有适配性,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课程特点方面:该课程作为日语专业核心课程,具有基础性与普遍性。《基础日语》面向1-2年级学生开设,此时学生的专业认知尚处于初步阶段,人生观、价值观也具有较强的可塑性。因此,在这一时期开展课程思政教学,将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贯穿于语言学习的全过程,为学生后续的专业发展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

课程内容方面:课程内容贴近生活,蕴含丰富的思政元素。《新编日语》第二册内容涵盖节日习俗、旅行体验、家庭关系、公共安全、社会现象等话题。这些内容与现实生活很贴近,有助于激发学生的表达欲望与情感共鸣。教师可以引导学生从跨文化视角审视中日文化异同,增强文化自信与国家认同,在语言学习中实现情感认同与价值认同的有机统一。

教学方法方面:依托任务驱动教学,实现思政教育的自然融入。教师采用任务驱动、情境模拟、小组合作、短文写作等方式,加强听、说、读、写等语言技能训练的同时,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责任、集体意识等内容自然融入到教学实践活动中,使学生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接受价值引导,实现知识传授与价值塑造的协同统一。

## 三、《新编日语》教材中的思政元素挖掘

从教材编写的角度来看,《新编日语》在会话、阅读理解以及课后练习之间构建了较为连贯的知识链条,确保了语言知识在输入与输出环节之间的有效衔接。通过文本不仅能够提升语言技能,还能了解社会文化及日常生活常识。特别值得关注的是,部分单元围绕现实社会生活或具体的人物经历展开叙述,内容贴近学生认知,为课程思政教学提供了天然的素材。

已有研究也指出,在《基础日语》教材中,课程标题的设置、会话主题的选择、语法例句的编排以及社会文化常识的介绍,均可成为挖掘课程思政元素的重要入口<sup>[7]</sup>。教师可以从这些素材中提炼思政资源,将其有机融入教学过程,实现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的统一。

以《新编日语》第二册“单元二复习”中的“メーカー”和“四川大地震一死の瀬際の同胞愛”为例,可以看出教材在人物设定、生活情境及社会叙事中,潜移默化地融入了较为丰富的思政教育元素。因此,教师可以打破传统教学视角,从文本主题、文化内涵等层面进行解读,引导学生树立正确价值观,增强社会责任感与家国情怀。以下两个案例为“单元二复习”中思政元素的具体融入实践。

### (一) 生活会话中的劳动观念、规则意识与家庭责任

“メーカー”作为《新编日语》第二册“单元二复习”中的课文,主要围绕五一假期出行安排展开,涉及地点选择、交通方式、便当准备和礼物购买等内容。从语言教学的角度来看,学生通过该课文需要掌握的是提出建议、表示赞成或反对、说明其理由以及安排计划等方面的日语表达。但从课程思政的角度出发,其价值内涵远不止于节日背景。

首先,“メーカー”即“五一劳动节”,这一节日本身就具有劳动教育意义。教师可以从节日导入入手,引导学生认识劳动节并不仅是休息与游玩的节日,也体现了社会对劳动者的尊重以及对劳动价值的认同。其次,课文

中关于骑自行车出行、担心交叉路口危险、重新选择交通方式等情节，可自然延伸到“规则意识”和“公共安全教育”。例如，围绕“哪种交通方式更安全”“为什么必须遵守交通规则”等问题展开讨论，能够使语言学习与现实认知相联系。再次，课文中涉及给妹妹买礼物、准备便当和考虑消费成本等内容，也可进一步引导学生思考“家庭责任”“亲情关怀”与“节约意识”等价值观念。

由此可见，生活会话不只是语言训练的重要载体，其中的生活选择、交往方式与行为判断，更是绝佳的课程思政切入点。对于1-2年级学生而言，这类贴近现实生活的文本更容易唤起其参与兴趣，也更有助于实现价值引领与语言训练的自然统一。

## （二）灾难叙事中的同胞情怀与责任意识

“四川大地震—生死の瀬際の同胞愛”是《新编日语》第二册“单元二复习”中的阅读文。该文通过对汶川地震灾情、救援行动和教师舍己救人事迹的描写，展现了灾难中的同胞互助与责任担当，适合进行情感教育和责任教育。

文章中关于谭老师用身体保护学生、救援人员争分夺秒实施救助、家属悲痛回忆逝者的描写，不仅能够训练学生对文本的理解能力，也能够引导学生思考“为什么这些行为令人感动”“何为同胞爱”“在灾难面前个体与集体分别承担怎样的责任”等问题。对于1-2年级学生而言，这种以具体人物和事件为依托的文本更具感染力。因此，在阅读理解教学环节中，教师不仅要引导学生准确理解文本中的词汇、句式与篇章结构，还应通过精心设计任务，帮助学生从语言认知走向情感共鸣与价值认同。与传统的阅读训练相比，这类文本解读方法更能彰显出课程思政“以情动人、以理服人”的教学理念。

## 四、《基础日语》课程思政教学实践

课程思政在《基础日语》中的融入，关键在于教学设计是否真正实现了价值引导与语言训练的同向同行。若思政内容脱离语言目标，容易流于空泛；若仅停留于语言形式训练，又难以发挥课程育人功能。因此，课程思政的实践必须围绕“以语言训练为主线、以价值引导为暗线”的原则展开。

### （一）关于“メーカー”单元的任务化教学设计

在“メーカー”单元教学中，语言教学目标主要包括：掌握提出建议、表示赞成与反对、说明理由和安排计划等日语表达。思政教学目标则聚焦于：劳动观念、规则意识、文明出行和理性消费等价值引导。教学导入阶段，教师可以从“五一劳动节的意义”切入，引导学生将节日与劳动价值联系起来。进入文本讲解后，再结合“自転車で行こう（骑自行车出行）”“交差点で危ない（交叉路口危险）”“弁当を持って行こう（带便当去）”等具体表达，引导学生理解“出行安全”“文明选择”和“节约意识”。

在实践教学环节中，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围绕“设计一次安全、文明、节约的劳动节出游计划”展开讨论并进行汇报。教师要求学生用日语说明出游的目的地、交通方式、预算安排、安全注意事项以及活动的意义。学生通过该教学活动，不仅能掌握语言技能，还能通过真实语境实现价值判断与生活选择。通过该教学环节，能够自然的将思政教育融入语言教学。这种以“输出—反思—再输出”为主线的学习方式，与当前《基础日语》课程思政实践中倡导的“任务驱动”和“产出导向”教学理念高度契合，体现了语言学习与价值引领的深度融合。

从课堂组织角度来看，这种以任务为导向的设计，有助于贯通“课文理解”与“口头表达”，实现二者之间的有效衔接与深度融合。学生能够基于真实具体的情境，筛选、重组与再造所学内容。在这一过程中，学生用日语呈现课文中的价值观、情感态度。换言之，在任务推进过程中，思政教育元素以课程任务设计的形态，被有机融合到了学生的语言实践活动中。这种设计方式，能够增强思政内容与语言学习之间的内在联系，潜移默化地完成价值认同与情感共鸣的建构。

### （二）关于“汶川地震”文章的情感化教学设计

在“四川大地震—生死の瀬際の同胞愛”一课的教学设计中，语言学习目标主要包括：掌握与灾难叙述相关的日语词汇和表达方式、理解文章的整体结构并能够基于阅读内容进行口头或书面的表达与交流。思政教育目标则聚焦于：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珍视生命的态度以及对祖国同胞之间深厚情感的认同。在具体教学实施过程中，教师可以在课前布置任务，让学生查阅关于2008年四川汶川地震的背景资料；课堂上通过引导学生对课文进行精细阅读，从文本细节中梳理出事件发展的脉络、人物关系以及在灾后情境中所展现出的情感互动，进而在语言学习的同时，激发学生对同胞之间守望相助精神的深入思考。

在此基础上，可围绕“哪一处情节最打动你”“为什么谭老师的行为值得铭记”“如果向日本朋友介绍这篇文章，你会如何表达”等问题组织课堂讨论。课后布置简短写作任务，如“我从这篇文章中理解到的责任与担当”。通过

这种“精读—讨论—表达”的教学链条，有助于推动学生从语言理解走向情感认同，再走向较为明确的价值表达。

与一般说明性阅读理解课程相比，这种设计更强调文本情感力量的教学转化。学生在阅读中不仅关注事实信息和词句理解，也开始进入对人物行为动机和精神价值的思考之中。因此，课程思政不再停留于“读后总结”层面，而是嵌入阅读理解与表达训练的全过程。在基础日语课程思政实践中，这样通过课前驱动、课堂促成和课后反思构建教学闭环，有助于实现“学用一体”的教学效果。

### （三）从课堂活动到评价反馈的延伸

课程思政要真正落地生根，发挥育人实效，就不能仅仅停留在实践环节上，而应通过系统性的评价与反思机制加以巩固和深化。在《基础日语》课程中，可以通过多元化的过程性评价体系，将思政教育有机融入日常教学环节之中。具体可借助课堂表现、小组讨论、角色扮演及小作文等形式，引导学生在语言学习过程中不断深化对思政主题的理解与内化。

在评价维度上，打破以语言准确性为唯一标准的局限，适度拓展至学生的主题理解深度、表达内容的价值观念导向以及在团队合作中的参与度和责任感等方面。这种综合性的评价方式，有助于将思政教育从“说教式”的知识传递转变为“浸润式”的素养养成，使学生在反复的思考与实践过程中，真正将价值理念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由此，课程思政得以从一次性的课堂活动，逐步转化为贯穿学习全过程的持续体验与成长路径。

尤其是在基础阶段，过程性评价比单纯终结性评价更能反映学生在认知、情感和表达层面的真实变化。若能在语言考核之外适当纳入课堂参与、讨论质量和写作反思等评价维度，就更有利于推动课程思政从“课堂设计”走向“学习过程”。《基础日语》课程思政不应局限于单一环节，而应贯穿导入、词汇、课文、语法、作业和课堂反馈等全过程。这一思路对于提升《基础日语》课程思政的系统性具有较强启发意义<sup>[8]</sup>。

## 五、教学成效与反思

从教学实践来看，《基础日语》教学中融入课程思政之后得到了以下几方面的教学成效。

课堂参与度方面：有效提升了学生的课堂参与度。相较于单纯的词汇和语法练习，围绕“劳动节出行”“安全选择”“灾难互助”等现实话题展开的语言活动，更容易引发学生的实际联想和情感共鸣。在任务讨论、口头汇报和读后表达环节，学生的参与积极性和表达意愿明显增强。

阅读理解方面：有助于拓展学生对文本的理解层次。学生不仅停留于对语言形式的把握，而是逐步尝试理解文本背后蕴含的情感态度和社会价值。以“四川大地震—生死の瀬際の同胞愛”一课的教学为例，学生对“同胞爱”“责任”“舍己救人”等概念的理解，已超越一般阅读训练中的信息获取层面，显示出价值引导对提升阅读理解深度的积极作用。

语言表达方面：有助于提升表达内容的充实度。课堂任务有效激发了学生的表达欲望，使学生在口头与书面表达中更容易形成自己的观点和立场，表达内容也因此变得更加丰富。从课堂反馈和作业表现来看，学生在讨论“安全”“责任”“劳动”“互助”等主题时，已逐渐展现出较明确的价值判断意识。

当然，课程思政在《基础日语》课程中的实施仍面临若干亟待解决的问题。一是教师对教材中蕴含的思政元素的挖掘深度与转化能力方面。如果教师对相关内容的理解不够深入，缺乏系统性解读，容易使思政教育流于表面，难以实现价值引领所预期的目标。二是1-2年级学生的日语语言能力尚处于初级水平，语言表达和理解能力有限，这决定了思政内容的融入必须注意难度控制，避免加重学生负担。三是现有的课程评价体系仍以语言知识掌握情况为主要考核内容，对学生在价值观表达、团队合作参与度、以及思维反思深度等方面的表现，尚缺乏清晰有效的评价标准和体系。

从教学反思的角度来看，《基础日语》课程思政的推进，其关键并不在于课堂上增加了多少显性的思政元素，而在于是否真正做到了“语言训练主线不削弱，价值引导暗线不断裂”。换言之，课程思政要想真正落地生根，必须立足于对教材内容的深入挖掘、对学生学情的精准把握，以及对教学环节的精心设计。只有当价值引导有机融入语言学习的全过程，而非游离于课文讲解之外成为附加说明时，课程思政才能真正从理念转化为课堂实效。

## 六、结语

《基础日语》是日语专业低年级阶段的一门核心课程，其任务不仅在于讲授语言基础知识和开展基本技能训练，还承载着引导学生专业入门、增进文化理解以及塑造价值观念的重要功能。从课程思政的角度重新审视该课程的教学，有助于打破传统外语基础课“重语言传授、轻育人导向”的局限，推动课程从单一的知识教学向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与价值塑造协同发展的方向转型。

本文以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新编日语》第二册为主要教材，重点围绕“单元二复习”中的“メーカー”

与“四川大地震—生死の瀬際の同胞愛”展开分析。文章探讨了在《基础日语》课程中可挖掘的思政教育元素，并结合教材解读、教学任务设计、课堂互动环节及评价反馈机制，系统阐述了课程思政在日语教学中的可行路径。研究表明，《基础日语》课程思政的关键并非是在语言教学之外添加抽象的思想政治内容，而在于依托语言技能训练的主线，将劳动观念、规则意识、社会责任感、同胞情谊以及文化认同等价值要素有机融入日常教学之中。通过引导学生深入理解课文、参与表达实践，课程能够在不脱离语言教学本质的前提下，使学生在语言能力提升的过程中，逐步形成更加明确的价值判断和文化主体意识。

未来，《基础日语》课程思政建设仍需在教材开发、教师能力提升、评价机制完善和课程衔接等方面进一步完善。基础日语课程思政只有在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式和评价反馈等环节形成整体设计时，才能真正实现从“思政元素悬浮”到“价值引领落地”的转变。对于日语专业人才培养而言，这种改革不仅有助于学生学好一门外语，更有助于其在跨文化交往中形成理性、自信而有责任感的表达能力。

参考文献:

- [1] 洪洁,陈琳.高等院校日语专业《基础日语》课程思政教学研究[J].语言与文化研究,2022(4):69-71.
- [2] 李岩.高校基础日语教学中的课程思政思考[J].成才之路,2021(29):36-37.
- [3] 周平,陈晓芬.新编日语:重排本第2册[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5.
- [4] 秦晓丽.跨文化语境下基础日语教材探析——以《新编日语》为例[J].科教导刊(电子版),2023(17):87-89.
- [5] 黄赛芳.基础日语1课程思政的思考与探究[J].现代商贸工业,2024(14):49-51.
- [6] 李斌.课程思政与基础日语课程建设[J].外国语文研究——现实与再现,2022(4):182-189.
- [7] 佟占新.高校基础日语课程思政元素的挖掘与实施路径研究——以《新经典日本语基础教程》为例[J].现代商贸工业,2023,44(11):49-52.
- [8] 徐宁馨.课程思政视域下《基础日语》课程教学改革构想[J].才智,2023(5):69-72.

## An Exploration of Teaching Reform Paths for “Basic Japanes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Zhang Xiuzhi<sup>1</sup>

<sup>1</sup>Harbin Normal University, Heilongjiang, Harbin 150025,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deepening of the construc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 curricula, how to realize the coordinated integration of knowledge imparting, ability cultivation and value shaping in basic professional courses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issue in the reform of Japanese language teaching. As a core course for lower-grade students majoring in Japanese, “Basic Japanese” not only undertakes the tasks of language knowledge enlightenment and skill training, but also serves as a key link for students to form professional cognition, establish cultural awareness and shape correct values. Based on the curriculum attributes of “Basic Japanese”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New Japanese Volume 2 (Revised Edition,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this paper takes “May Day” and “The Sichuan Earthquake — Compassion for Compatriots at the Moment of Life and Death” in “Unit 2 Review” as the entry points, and explores the instructional design approache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links of task design, classroom activities and evaluation feedback. The study holds that the key to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Basic Japanese” teaching lies not in additive indoctrination, but in centering on the main line of language training, relying on life-oriented, situational and emotional texts, and naturally integrating value elements such as labor consciousness and patriotic feelings into language practice, so as to realize the organic unity of language competence and value guidance.

**Keyword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Basic Japanese; teaching reform; value guidance; New Japanese

# 数智技术驱动下推普助力乡村振兴的差异化实践路径探索 ——基于新疆疏勒与山东济宁的对比案例研究

商冰洁<sup>1</sup>

(1.聊城大学外国语学院 山东 聊城 252000)

**摘要:**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攻坚和质量提升中,持续推进语言文字数智化建设,以数字化赋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具有重要意义。研究发现,东西部因地域环境、经济发展、文化丰富度等差异导致普通话普及程度不同,本文选取新疆疏勒与山东济宁为双试点,重点分析两地在数智技术驱动下推普助力乡村振兴的差异及成因,提炼针对性的实践经验,为全国不同类型乡村提供可复制的数智推普解决方案,助力推普与乡村振兴深度融合。

**关键词:**数智技术;普通话推广;乡村振兴;实践路径

**基金项目:**聊城大学2025年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推普新‘丝’路,数智助振兴‘语言+产业+文化’赋能乡村振兴的多模态实践”(项目编号:Cxcy2025227)

DOI: doi.org/10.70693/rwsk.v2i3.304

## 一、引言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法理和事实上的中华民族共同语,更是关乎中华民族认同的标志性文化符号。在数智化时代背景下,大数据分析、自然语言处理、生成式人工智能等技术的迅猛发展,给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普及攻坚和质量提升带来了新路径和新方法,推动推普从传统单一语言技能向多模态赋能实践转变,“语言+产业+文化”的协同发展理念,让普通话普及成为衔接产业升级、文化传承与基层发展的关键载体。

新疆疏勒县位于新疆西南部,属于边疆多民族聚居区,语言互通是民族团结与基础产业发展的重要前提,山东济宁市位于鲁西南地区,作为东部农耕文明核心区,普通话的产业场景化应用是乡村产业升级的重要支撑。两地在民族构成、文化禀赋、数字基础与发展需求上的显著差异,为数字推普的差异化实践提供了典型样本。本研究依托聊城大学“推普新‘丝’路,数智助振兴——‘语言+产业+文化’赋能乡村振兴的多模态实践”省级大创项目实践积累,以疏勒县、济宁市为对比案例,探索数字技术驱动下推普助力乡村振兴的差异化实践路径,兼具重要的实践价值与战略意义。

## 二、疏勒县与济宁市推普基础条件对比

### (一)语言生态与文化资源

疏勒县作为多民族聚居区,全县维吾尔族人口占比超90%,维吾尔族364688人,汉族16587人,比例为22:1,形成了“维吾尔语为主、普通话为辅”的双语生态,其中维吾尔语舌根音(如/q/)对普通话声母的同化效应显著,成为推普核心难点。根据调研发现,疏勒县平均普通话能力介于听说和听说读之间,即较多的人会听和说普通话,而较少的人能达到会读写普通话的能力。文化方面,疏勒县作为古丝绸之路要冲,留存有土陶制作、十二木卡姆等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通过文化传承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认同来融合增强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济宁市以汉族聚居为主,鲁西南方言特征明显,唇齿音偏误、平仄声调混淆是普通话学习的主要障碍,普通话普及率达75%以上,瓶颈主要集中于场景化应用与产业文化融合,鲁西南的方言惯性影响,使得电商、文旅、非遗等产业场景中,普通话标准化表达偏误问题难以根治,且现有推普内容多为通用模板,无法从根源有效解决实际表达问题;推普资源过度向产业从业者倾斜,老年群体、低技能劳动力等弱势群体成为覆盖盲区,普惠性不

**作者简介:**商冰洁(2005—),女,汉族,山东淄博人,本科在读;

**通讯作者:**商冰洁

足等问题亟待解决。文化方面, 济宁作为京杭大运河枢纽, 运河文化、鲁锦技艺、柳编工艺等非遗资源富集, 农耕文明底蕴深厚, 推普与产业升级、文化活化的结合需求更为迫切。

## (二) 数字基础设施与技术应用水平

新疆疏勒县依托对口援疆政策红利, 数字基建实现基础覆盖突破, 已完成乡镇级网络全域覆盖, 行政村光纤通达率达 100%, 但整体基建仍以基础通信网络搭建为主, AI、VR/AR、区块链等数字技术的场景化应用尚未普及, 仅在智慧养殖等少数产业领域开展试点探索。当地居民数字技能仍处于基础应用阶段, 以日常手机通讯、基础信息浏览为主, 针对普通话学习类 APP、电商直播类平台的主动使用率不足 30%, 数字技术与普通话普及、地方特色产业发展的融合深度不足, 尚未形成技术赋能的规模化效应。

山东省济宁市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更为成熟完善, 据济宁移动乡村数智建设相关数据显示, 全市农村 5G 基站累计建设超 2200 座, 行政村 5G 网络覆盖率达 99.65%, 乡镇光网络均具备千兆开通能力, 县域层面 5G 网络覆盖率达 98%, 且配套建成电商产业园、直播基地等数智产业载体, 数字基建与产业发展的衔接性较强。当地乡村从业者数字技能适配性更高, 普遍掌握基础电商运营、直播带货等实操能力, 抖音、拼多多等电商及直播平台的实际使用率超 60%, 数字技术已在农产品线上销售、运河文化文旅推广、非遗工艺数字化传播等领域形成规模化应用效应, 为产业导向的数字推普工作搭建了完善的技术应用与产业实践基础, 实现了数字基建、产业发展与语言普及的协同赋能。

## (三) 乡村振兴核心需求与推普导向

根据《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提升工程和推普助力乡村振兴计划实施方案》要求, 明确语言文字聚焦农村地区, 助力乡村产业振兴, 巩固推普脱贫攻坚成果。疏勒县与济宁市因发展基础、产业资源禀赋存在显著差异, 形成了不同的乡村振兴需求结构, 也决定了两地推普导向的本质区别。

疏勒县作为南疆多民族聚居区, 乡村振兴的核心需求聚焦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基础就业增收与民族文化遗产三个方面。东营援疆工作指挥部的实践数据印证, 疏勒县乡村产业尚处于基础培育阶段, 渔业养殖, 土陶、特色农产品等本土特色产品虽具备资源优势, 却因汉维双语沟通壁垒陷入“有产品无市场、有文化无传播”的发展困境, 难以有效对接外部消费市场与产业资源; 同时, 多民族群众日常交往、文化互鉴的现实需求, 对普通话基础沟通能力提出了硬性要求。基于此, 疏勒县将普通话普及作为促进民族团结的纽带、推动基础产业对接的实用工具, 同时兼顾民族文化遗产与普通话传播的双向融合, 契合民族地区推普攻坚的工作要求。

济宁市在推动产业升级与文化赋能融合方面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具体表现为文旅产业的体系化发展与乡村电商的规模化扩张, 这标志着其发展重心已从突破基础产业瓶颈, 转向延伸产业链条、挖掘非遗资源价值、以及塑造区域文化 IP 等更高层次的目标。然而, 在这一转型升级过程中, 对于一些相关产业从业者, 其普通话在特定商业与文化传播场景中的应用能力短板日益突显。该问题不仅直接关系到服务品质与用户体验, 更深层地反映出, 标准化的产业语言表达体系缺失, 正制约着文化资源向经济价值有效转化。因此, 济宁市将普通话场景化应用能力培育与产业发展、文化 IP 构建深度结合, 以语言能力提升赋能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 符合东部地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高质量普及的工作目标。

## 三、数智技术驱动下两地推普助力乡村振兴的实践路径对比

### (一) 疏勒县等西部民族地区: 以语言为基础, 夯实发展根基

以新疆疏勒县为代表的西部民族地区, 推普实践最终要达到“稳定、团结、筑基”的成果。首先,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推广也主要围绕“聚焦重点, 全面普及”展开, 即以聚焦重点区域为抓手, 利用大数据分析技术分析统计民族地区群众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普及程度, 精准提升推普效果, 有效保障薄弱地区和群体各方面的资源支持, 打破内部交际的壁垒、促进社会整合与文化互信。其次, 利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 精准分析当地学习者在听、说、读、写中的发音偏误、词汇错用等薄弱点, 从字、词、句到语篇全面考察语言掌握程度, 还可通过智能语言交流平台实时纠正发音、规范文本, 助力当地师生从“会说会写”提升到“说好写好”, 解决偏远民族地区教师普通话达标难等问题。再次, 要特别注重与当地民族语言文化背景的有机结合, 使语言学习过程自然融入社区公共生活与文化遗产实践, 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契合当地文化风俗的优质学习资源, 让学习更贴合本地习惯, 推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向精准化、人性化持续升级。最后, 该实践路径的根本目标, 不仅在于提升居民的基础语言交际能力, 更在于通过增强国家通用语言的共通性, 发挥其社会纽带功能, 从而深化文化认同, 增进社会凝聚力, 为地区经济社会长远发展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与人力资本基础。

### (二) 济宁市等东部高质量推普地区: 以语言为杠杆, 驱动价值增值

以山东济宁为代表的东部产业较发达地区, 推普实践重在围绕“升级、增效、增值”的发展导向。首先, 将标准的普通话应用能力视作一种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与市场竞争优势的关键要素, 依托大数据与云计算技术搭建语言资源数据库, 整合产业相关的语言培训资料与行业术语, 实现全市范围内的资源高效共享与利用; 其次, 推

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快速成长为数据要素流通与应用、新质生产力与新兴产业培育的知识载体,借助自然语言处理技术构建智能问答系统,为产业工人、经营主体等提供“职业技能+普通话”教育培训,助力提升其沟通表达能力;再次,基于数智技术搭建的远程协作平台与视频会议系统,可加强各区县、产业园区间的沟通协作,推动产业信息与语言服务资源的高效流通,而在产业应急场景下,智能翻译技术能够快速生成适合各类人群的应急信息与服务指南,为农业生产、企业运营等提供及时准确的语言支持,从而为产业稳定运行筑牢保障。最后,该实践路径的核心目标,在于推动语言技能培育与产业价值链环节的融合,使规范、得体的普通话表达成为增强产品市场传播力、优化服务供给体验、塑造区域产业品牌、传播地方文化内涵的重要支撑,进而直接驱动产业附加值提升与区域经济内生性增长。

#### 四、优化策略和实践启示

##### (一) 针对西部民族地区的优化策略

1. 强化数字基建与互通普惠。生活在民族地区的少数民族群体由于居住区域、年龄、职业、受教育程度等的不同,导致其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应用能力和水平参差不齐,这就要求在保障网络全域覆盖的基础上,打破时空限制,推动5G、移动互联网向自然村、农户延伸,降低流量资费,提升网络质量。同时,重点面向基层干部、青年教师、产业带头人等关键群体开展“数字扫盲”工作,提升其数字推普工具应用能力,将语言技能活化为语言习惯。

2. 研发智学资源与平台。依托自然语言处理与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针对少数民族语言母语者的发音、语法难点,开发双语对照、沉浸式情景模拟等智能化学习模块,学习内容深度融合当地民族文化元素,实现“学普”与文化遗产双向促进。此外,语料库语言学、数理统计语言学、计算机语言学等交叉学科兴起,通过搭建以学习者为中心的课程教学体系,形成个性化、智能化的学习支持系统,为语言实践教学提供了方便和契机。

3. 深化共同体意识融入机制。依托历史文化遗产丰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学习情境,鼓励围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语言叙事和数字焕活。在数智推普平台与活动中有机嵌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民族团结故事等内容,利用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数字人等技术打造沉浸式学习场景,帮助学习者促进对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主动性探索和创造性使用,产生对中华语言文化的情感共鸣,使普通话成为增进“五个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动实践。

##### (二) 针对东部较发达地区的优化策略

1. 推动推普内容向“场景化、专业化”升级。突破通用模板的限制,克服传统资源开发中的盲目性与同质化问题,联合行业专家、语言学研究者,基于大数据分析针对电商直播、文旅讲解、非遗传承等产业场景,开发标准化表达手册、智能纠错工具及VR模拟实训系统,提升资源内容的实用性与文化适切性。

2. 扩大数智推普覆盖范围。优化资源配置,开发适配老年群体的简易语音交互程序、面向低技能劳动力的“边工边学”移动微课,将数智推普服务延伸至银发群体、留守劳动力等弱势群体,在克服方言影响的基础上加大普通话的应用程度,同时利用社区智慧屏、乡村广播数字化系统等载体,营造全方位普通话使用环境。

3. 构建跨区域语言服务协同平台。利用云计算与远程协作技术,搭建连接东部人才、技术资源与西部需求地区的推普协作云平台,推动东部优秀讲师、技术团队为西部提供远程培训、资源对接,形成“东技西送”“东智西援”的良性互动机制,既能加速优质语言服务资源的跨区域流动,又能促进东西部在数智推普实践中的经验互鉴,推动全国数智推普工作形成协同推进、整体提升的良好格局。

##### (三) 对全国数智推普的普适性实践启示

1. 坚持需求导向,实施精准分类。各地规划数智推普路径时,需要深入调研本地语言生态、产业阶段、数字基础与核心需求,明确自身是“筑基型”还是“增值型”发展需求,避免模式照搬带来不良后果。疏勒、甘孜、长顺等西部民族地区,立足普通话基础薄弱、产业处于萌芽阶段的实际,将数智推普聚焦于基础语言能力提升与民族融合,提高普及程度;济宁等东部较发达地区,依托普通话普及度高、产业升级需求迫切的优势,推动数智推普推动语言数据价值化升级,提高普及质量。

2. 强化技术针对性,避免“一刀切”。数智技术的应用应注重“用得上、有效果”,而非盲目追求“高精尖”,西部优先解决的是数字推普工具的“有无”和普惠问题,东部则侧重实现技术与产业、文化的深度融合,鼓励开发轻量化、低门槛、易推广的技术解决方案。

3. 注重多方协同,构建长效机制。建立健全“政府主导、语委统筹、部门协同、社会参与、技术支撑”的工作机制,引导高校、科研机构、科技企业、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参与,在资源开发、平台建设、效果评估等方面形成合力,保障数智推普的可持续性与创新活力。疏勒“政府+企业+学校”、济宁“校地+政企+行业”的协同模式,语文出版社与腾讯联合开发的多方协作模式,均为全国数智推普的主体协同提供了可复制的经验。

#### 五、结论

数智化的发展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普及注入了新的活力,也为推普工作与乡村振兴的融合开拓了多样化途径。本研究通过对新疆疏勒与山东济宁的案例比较发现,两地之所以形成差异化的数智推普路径,根本在于地域环境、经济基础、文化资源以及乡村振兴核心需求的不同。在西部民族地区,以疏勒县为例,当地立足多民族聚居、普通话基础相对薄弱、产业尚处起步阶段的现实,形成了“以语言为基础,夯实发展根基”为特点的推普路径。数智技术在此主要发挥打破语言沟通障碍、促进民族团结的作用,为地区长远发展夯实语言与社会基础。而在东部较发达地区,以济宁市为代表,凭借较高的普通话普及程度、较为完善的数字基础设施以及迫切的产业升级需要,构建了“以语言为杠杆,驱动价值增值”为导向的推普路径,数智技术侧重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在具体场景和专业领域的应用,助力将语言能力转化为产业优势与文化影响力。

#### 参考文献

- [1]李曼丽,徐梦真,李加赟.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的政策演进、时代转型与教育使命[J].西藏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46(01):83-90+156.
- [2]范琼燕.数字新疆建设迸发强劲动能[N].新疆日报(汉),2026-01-26(005).
- [3]只尊富.济宁移动拓展“三农”数智应用场景 持续推动乡村振兴[N].人民邮电报.2025-07-25
- [4]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提升工程和推普助力乡村振兴计划实施方案[C]//广州大学,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华中师范大学,商务印书馆,中国教育电视台.语言生活皮书——中国语言文字事业发展报告(2022).教育部;国家乡村振兴局;国家语委,;2022:135-140.赵妍.用好数字技术,加快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N].光明日报 2025-09-28(5)
- [5]毛艺萌,刘韵华.数智时代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现状与策略研讨[J].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学与研究,2025,(01):22-24.
- [6]庞治辉.数字时代民族地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的路径研究[J].现代商贸工业,2024,45(02):95-98.

## Exploring the Differentiated Practical Paths of Mandarin Popularization Boosting Rural Vitalization Driven by Digital and Intelligent Technology-A Comparative Case Study Based on Shule in Xinjiang and Jining in Shandong

Shang Bingjie<sup>1</sup>

<sup>1</sup>*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Liaocheng University, Shandong, Liaocheng 252000, China*

**Abstract:** In the critical campaign for advancing and enhancing the popularization of the national standard spoken and written Chinese, the continuous promotion of its digital and intelligent development and the empowerment of its popularization through digitalization hold profound significance. Studies have revealed disparities in the popularization level of Mandarin between eastern and western China arising from differences in geographical conditions, economic development, cultural diversity and other factors. This paper selects Shule County in Xinjiang and Jining City in Shandong as dual pilot areas, focusing on analyzing the disparities and their underlying causes in the role of digital and intelligent technology-driven Mandarin popularization in boosting rural vitalization between the two regions. It further refines targeted practical experience and formulates replicable digital and intelligent solutions for Mandarin popularization for different types of rural areas across the country, thereby facilitating the in-depth integration of Mandarin popularization and rural vitalization.

**Keywords:** Digital and intelligent technology; Mandarin popularization; Rural vitalization; Practical path

# “人民治黄”模式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生成与运行逻辑

赵光辉<sup>1</sup>

(1.杭州师范大学, 浙江 杭州 311121)

**摘要:** 黄河治理是衡量国家治理效能的重要指标。1946年中共治黄机构的建立, 实现了由传统治水向“人民治黄”范式的转换。本文运用组织行为与公共治理理论, 深入剖析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治黄机构的运行机制。研究发现, “人民治黄”是一套专业化机构与地方行政体系深度嵌入、协同联动的治理范式。其在党政引领、群众参与和技术赋能方面的整合经验, 为当代流域治理及复杂公共事务的条块协同治理提供了逻辑借鉴。

**关键词:** 人民治黄; 根治黄河; 治黄理念

DOI: doi.org/10.70693/rwsk.v2i3.300

2019年9月18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 他指出: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同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一样, 是重大国家战略。”<sup>[1]</sup>随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列为重大国家战略, 黄河治理进入新阶段, 被赋予了更高的要求。“人民治黄”模式奠基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成效斐然, 一直延续到建国后, 影响至今。深掘该时期的中共治黄史, 进而勾勒“人民治黄”模式的原初图景, 以镜鉴黄河治理新阶段, 此时尤为必要。

## 一、分权制下中共治黄机构的柔性治理逻辑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中共治黄机构的建立并未采取高度集权的科层模式, 而是形成了一种以分权为核心特征的治理形态。这一方面源于中共各根据地独立发展的历史背景, 另一方面则是为了适应战时环境下复杂多变的治理需求。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中共的治黄事权呈现出明显的地域分权与层级简化特征。该时期中国共产党黄河治理的事权未统一, 由冀鲁豫黄河水利委员会与山东省河务局分而治之。其中, 冀鲁豫黄委会分为会、处、段三级管理体制, 而山东省河务局则为局、处两级。具体到上述两个治黄机构中, 各层级的职能部门均仍处在雏形阶段: 部门少、专业化程度低, 因此有利于集中同一层级的决策权, 同时也减少了对下一层级机构的约束。

分权制逻辑下的组织运作往往依赖于非制度化的动员与规范, 使得革命时期的中共治黄机构在运作中呈现诸多特色。

其一、分权体制下的非正式制度激励。在分权制架构下, 中共治黄机构并不依赖繁复的刚性规章, 而是通过“运动式治理”这一非正式制度激励来提供治理动力。中共治黄机构的“规章制度”较少, 各种“运动”为中共治黄机构提供了替代性制度, 兼具激励和管理功能, 而宣传教育则具有日常“非制度”性规范和思想动员的性质。“立功表模”运动较为典型。先由各级治黄组织发起“加强政治动员工作, 开展立功竞赛运动”<sup>[2]</sup>的通知, 其后经劳动竞赛并评选劳模, 再经冀鲁豫黄委会或山东省河务局集中评定劳模等级, 随后召开“立功表模”大会。通过物质奖励与提高其社会地位, 劳模们很好地起到了带头作用。此外, 在中共的治黄报告中还可常见防汛护堤运动、精简节约运动、夺匾保匾运动、献砖献石运动、夺旗运动、大堤植树运动等各类治黄相关的运动。

其二、分权架构下的经验扩散与横向协同。分权体系下的组织进化依托于“典型”引领的经验驱动模式, 使行政指令转化为横向的经验交流。中共治黄机构的内部会议, 其目的往往并不在于寻求上级机构帮助解决问题, 而在于经验交流, 由各层级机构总结经验得失以供借鉴。“典型”二字, 是中共治黄机构各类报告与总结中的高频词汇。以中共渤海区为例, 中共渤海区黄河防总在其1949年秋汛工作纲要中, “要求各县掌握重点创造典型经验”。<sup>[3]</sup>由此, “抓典型”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治黄的一大工作传统。

中共治黄机构在未形成统一事权的情况下, 通过创造典型经验并加以快速复制与扩散, 实现了在分散治权背

**作者简介:** 赵光辉, 男, 博士, 讲师, 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中共党史、黄河史研究。

**通讯作者:** 赵光辉

景下治理效能的均衡化。这种以典型引路的管理逻辑，确保了各分权单元在灵活自主的同时，能够保持治理方向与效能的一致性。

## 二、基于利益耦合与激励兼容的社会动员机制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治黄不仅是一项技术工程，更是一场深度的社会动员。其成功之处在于通过“群众路线”实现了治理目标与群众利益的精准对接，并通过灵活的组织设计，将治黄职能深度嵌入乡村社会。

1. 治黄参与成本的社会对冲机制。农事繁忙季节的劳力征调，必须及时解决上堤民夫的家内劳动问题。中共治黄机构联合地方政府，以支差的形式，调派附近民众帮助治黄民夫的家内农事，“凡赴工民夫，其家中麦收锄苗，概由各该村组织代收代锄，使其安心做工”。<sup>[5]</sup>如此，中共通过行政力量组织村社劳动力解决民夫的后顾之忧，有效抵消了民夫参与治黄的机会成本。这种利益激励相容的设计，使民夫在安心做工的同时，也将治黄工作内化为受群众拥护的集体契约，降低了行政动员的制度阻力。

2. 物质保障与非物质激励的协同。治黄多在汛期，情势严峻，民夫紧张忙碌，他们的身心健康关涉治黄进度，需予特别关注。冀鲁豫黄委会与山东省河务局多次下文，要求切实保障治黄民夫的粮、柴、食、住、医药等供应，并在随后跟进监督执行。同时，将宣教内容以教材、快报和地方戏等形式，在民夫劳动的休息间隙予以诵读或演出。以东阿修防段为例，其利用当地戏曲形式莲花乐，创作了具有教育意义的治黄莲花落发给上堤民夫，“教育材料有治黄莲花乐，每小队一本。识字的单发一本，使其明了后扩大宣传”<sup>[6]</sup>。这种寓教于乐的方式不仅是心理补偿，更是通过软性治理手段将政策目标转化为民夫的行为自觉，实现了治理目标的可接受性与认同感。

3. 从行政摊派向契约激励的制度转型。治黄效率的飞跃源于动员模式从行政指令下的义务劳动（支差），向绩效导向的契约逻辑（包工）的范式转换。中共治黄机构早期采取“支差”形式，缺乏个体激励，易导致组织低效。随后调整为“包工”方式，引入了量化考核与利益挂钩的机制，通过明确报酬与工作量的对应关系，极大地激发了民夫的劳动积极性。“执行结果，以自雇包工制效率为高，征工制效率最低。明年要求除工资逐渐争取一致外，自雇包工制应尽量推行”<sup>[7]</sup>，“包工”制度由此常态化。这种由强动员向强激励的制度调整，标志着中共治黄机构成功利用利益耦合机制，实现了从“强制性动员”向“诱导性参与”的逻辑转变。

## 三、技术匮乏背景下的知识集成机制

在接手黄河治理之前，中共治水经验不多，对大江大河的治理无疑是一个重大挑战。然而，中共治黄机构并未受困于专业人才的匮乏，而是通过构建知识集成与技术赋能机制，实现了治理知识的系统性整合与治理力量的规模化再造，在短期内显著提升了治黄的整体技术能级。

1. 经验萃取与扩散机制。治黄效能的飞跃源于对基层创新经验的快速识别与标准化推广。各级治黄机构实行首长负责制，定期汇报工作总结，上级治黄机构则将典型经验加以推广。治黄工作中涌现出的各类劳模，对其事迹与经验加以适当总结，给予宣传和推广。锥探法由发明到全河推广的事例最为典型。靳钊是封丘黄河修防段的工程队员，他的锥探经验在1949年黄河大汛期间大显身手，该技术很快被推广开来。1955年，《人民日报》刊文评价称：“历史上许多次决口，都是隐患造成的，所谓‘千里金堤，溃于一穴’。过去认为隐患是没法解决的问题。为了消灭隐患，巩固大堤，河南封邱段工人靳钊和原阳段的一些民工先后创造钢锥锥探大堤的办法，几年来经过大规模锥探，黄河大堤隐患已大大减少”。<sup>[4]</sup>靳钊等一线劳模创造的“锥探法”，不仅是单点技术突破，更在组织推动下由个体经验上升为全河普适的治理规范。这种从“一线发明”到“全局覆盖”的过程，体现了分权体制下高效率的知识萃取与扩散能力，化解了堤防隐患这一历史性治理难题。

2. 存量知识的制度化吸纳。除了对基层创新经验的即时萃取，中共治黄机构同样重视对既有技术存量的保护与转化。面对成立之初的技术真空，中共治黄机构通过对留存解放区的老河工给予政治地位、薪粮保障等优渥待遇，成功实现了存量治理知识的平稳过渡与整合。民国末年，国民党已设立治黄机构二十余年，许多供职于该机构且经验丰富的老河工，因避战乱而留在解放区。中共治黄机构极为重视这些老河工，“大量吸收老河工人员，作为技术骨干，组成了工程队”<sup>[8]</sup>，并崇其地位，所给薪、粮也较一般河工人员优渥。因此，老河工对传授治黄经验态度积极。这些老河工及其承载的“本地化知识”被吸纳进专业工程队，作为技术骨干发挥了“传帮带”作用。这种对非正式技术权威的制度化吸纳，弥补了机构初创期的技术短板。

3. 治理人才的社会化培育。中共治黄机构初创，即面临治黄技术人员严重匮乏的局面。为解决人才短缺的刚性约束，中共治黄机构通过创办各类治黄技术学校，如山东省河务局测绘训练班、黄河水利工程专科学校等教育机构，以低成本、高激励的准入门槛大量吸纳并培养急需人才。以测绘训练班为例，1946年9月，为“培养河工水利人才，大量开展解放区建设事业”<sup>[9]</sup>，山东省河务局开办测绘训练班，为吸纳优秀人才就读，测绘训练班免除食宿费、学费，待毕业时视能力给予各级教员待遇，并安排相应工作。各类治黄技术学校为治黄工作迅速构建

起一支专业技术干部队伍，为实现黄河长期安澜提供了坚实的专业人才增量支撑。

#### 四、专业化机构与地方行政体系的条块协同机制

中共治黄机构初创时，仰赖地方政府之处尤多。从治黄人员组成、民夫征调，再到治黄物资筹措，几乎事事均需地方政府参与其间。尤其对于沿黄河各县来说，治黄甚至超过了战争，成为当时最重要的政治任务。中共治黄机构通过建立跨部门协调机制，有效地解决了专业治黄（条条）对属地行政（块块）的依赖梗阻，实现了条块资源的无缝对接。

1.条块利益捆绑机制。为了化解条块分割带来的协调困境，中共治黄机构采取了“高位统筹”与“交叉任职”的组织策略。其一、组建联合机构，统一调度治黄机构与地方政府。由中共治黄机构与地方政府联合组成修治黄河工程总指挥部，而由该地方政府的上级机关负责人担任该指挥部的总指挥。以渤海区修治黄河指挥部为例，该指挥部“由李主任人凤任总指挥，宜之及高兴华任副指挥，每县设县指挥部，由治河县份之县长为正指挥。参加修工之邻县负责干部为副指挥”<sup>[10]</sup>。李人凤是渤海区行政公署主任，而王宜之和高兴华则是黄河河务局的领导，而各县指挥部亦由县长担任正指挥，以便于协调治黄机构与地方政府的工作。

其二、由地方政府负责人兼职治黄工作。中共治黄机构的不少职能部门，如河防队、防汛指挥部等，其工作开展主要依托地方政府进行。此类部门，则由地方政府负责人兼任同级该部门的负责人。以中共渤海区为例，在1946年渤海区成立黄河河务局之初，其组织架构即采取了行政部门负责人兼职的办法。渤海区行署要求，新组建的黄河河务局在所辖十县设立沿河办事处，“各县县长兼任主任，军区分区及县设立指挥部，由行政负责人兼任指挥，进行动员民夫”。<sup>[11]</sup>这种“职能重合”的安排，将原本属于“条条”的专业事务转化为“块块”的行政本职，从而在组织内部消解了协调成本。

2.借助行政力量实现职能延伸与社会整合。如果说条块捆绑解决了宏观决策层面的阻力，那么职能向基层的延伸则解决了微观执行层面的成本问题。面对黄河治理漫长的空间跨度与细碎的维护任务，单靠科层制内部的专业力量面临极高的管理成本与治理半径限制。为此，中共并未采取扩张行政编制的逻辑，而是通过职能向下延伸，借力地方基层组织实现了社会资源的深度整合。地方政府在沿河村落组建“护堤委员会”与“防汛队”，通过吸纳村干与积极分子，将治黄职能嵌入了乡村的原有社会结构中。

以护堤委员会为例，中共治黄机构组建的护堤委员会成立于1948年，“护堤委员会由村干及护堤积极分子组成，会下设护堤小组，分设植柳和护堤，会组人数根据具体情况确定”<sup>[12]</sup>，其主要职责是修堤植柳，以保护黄河大堤的安全。此外，地方政府还发动群众，掀起献砖献石、夺匾保匾、创模选模等非正式制度的动员响应，由此形成了一套独具特色的群众性治黄制度。这种治理权力的社会化延伸，不仅实现了獾洞检查、植柳种草等治理任务的低成本全覆盖，更通过“献砖献石”等群众性动员，将专业化的防灾需求转化为全社会的集体行动，形成了条块互动、干群协作的条块结合多中心协同网络，极大地增强了流域治理的组织韧性与动员深度。

#### 结语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人民治黄”模式的生成并非偶然，它是中国共产党在资源匮乏、技术薄弱及战时环境压力下，通过组织创新实现公共治理目标的成功实践。对该时期治黄运行机制的深度解构，有助于厘清“人民治黄”模式的生成逻辑，并从中提炼出具有普适意义的公共治理经验：

1.组织资本对物质资本的有效替代。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治黄经验的本质，在于通过制度创新与组织赋能，实现了“组织资本”对“物质资本”的有效替代。在财政与技术资源双重约束下，中共并未陷入治理陷阱，而是通过分权制释放组织灵活性，利用运动式治理补齐正式制度短板，并依托知识集成机制实现了技术能级的快速跃升。这种模式证明，在重大公共事务治理中，优化的组织逻辑与动员机制能够产生超越物质投入的治理效能。

2.激励兼容是实现社会动员可持续性的核心。“人民治黄”成功的关键在于将宏大的国家治理目标转化为可感知的个体利益诉求。通过构建参与成本的社会对冲机制（如代耕）与绩效导向的分配转型（如包工制），中共实现了公共目标与个体利益的深度耦合。这种激励兼容的设计，将强制性的行政动员转化为自发性的群体参与，为复杂公共工程中的大规模社会动员提供了可持续的制度样本。

3.条块协同机制重塑了流域治理的组织韧性。黄河治理的成效得益于专业化机构与地方行政体系的深度嵌入与协同联动。通过“高位统筹”与“交叉任职”的条块利益捆绑，中共解决了专业部门在资源调度上的“有责无权”困境。同时，通过职能向乡村末梢的社会化延伸，实现了治理半径的最大化覆盖。这种条块结合的多中心协同网络，不仅提升了行政资源的整合效率，更极大地增强了流域防灾减灾的组织韧性。

4.政治统领与科学指引的辩证统一。“人民治黄”范式体现了政治统领全局与尊崇科学规律的互动协作。中共通过政治动员将治黄上升为核心政治任务，同时又通过吸纳老河工、创办技术学校等方式确保了治理的科学性

与专业性。这种将政党政治优势转化为公共治理优势的路径，为当代处理流域生态保护中的政府、社会与技术关系提供了深刻的逻辑借鉴。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 [J]. 中国水利, 2019 (20) : 1-3.
- [2] 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 (第三辑) 文献部分 (下) [M]. 济南: 山东大学出版社, 1989: 490.
- [3] 山东省府、军区、渤海黄河防总指一九四九年汛期工作的紧急指示、决定及秋汛工作纲要 [A]. 黄河水利委员会档案馆藏, 1-GL2-1949-0236Y: 11.
- [4] 渤海行署、山东局一九四六年关于加强黄河修防工作的指示、训令、通知 [A]. 黄河水利委员会档案馆藏, 1-GL2-1946-0007Y: 4.
- [5] 东阿修防段一九四六年修堤总结 [A]. 黄河水利委员会档案馆藏, 1-GL2-1946-0009Y: 19.
- [6] 王化云. 王化云治河文集 [M]. 北京: 黄河水利出版社, 1994: 20.
- [7] 人民有力量征服黄河——“治理黄河展览会”参观记 [N]. 人民日报, 1955-10-09 (2).
- [8] 冀鲁豫黄委会、第三、四修防处、张秋、昆山、东阿段一九四七年献石、整险工作的指示、情况报告 [A]. 黄河水利委员会档案馆藏, 1-GL2-1947-0023Y: 4.
- [9] 山东局一九四六年关于开办测绘训练班的公函招生广告和预算表 [A]. 黄河水利委员会档案馆藏, 1-GL10-1946-0001Y: 2.
- [10] 渤海黄总、山东局一九四六年关于治黄工作的指示及黄河放水注意事项 [A]. 黄河水利委员会档案馆藏, 1-GL2-1946-0006Y: 14.
- [11] 渤海区成立黄河河务局 [N]. 解放日报, 1946-06-08 (2).
- [12] 一九四八年治黄工作总结与一九四九年的任务 [A]. 黄河水利委员会档案馆藏, 1-GL1-1948-0023Y: 20.

## The Formation and Operational Logic of the “People-Centered Yellow River Governance” Model during the New Democratic Revolution

Zhao Guanghui<sup>1</sup>

<sup>1</sup>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Zhejiang, Hangzhou 311121, China

**Abstract:** The governance of the Yellow River constitutes a crucial indicator of state governing capacity. With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Yellow River governance institutions in 1946, a paradigmatic shift occurred from traditional hydraulic management toward a “people-centered” model of river governance. Drawing on theories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public governance, this article provides an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operational mechanisms of the CCP’s Yellow River governance institutions during the New Democratic Revolution. The study demonstrates that “people-centered Yellow River governance” represented a distinctive governance paradigm characterized by the deep embedding and coordinated interaction of specialized professional agencies with local administrative systems. Its integrative practices—combining party-state leadership, mass participation, and technical empowerment—offer valuable analytical insights for contemporary river-basin governance and for the coordination of territorial and functional systems in the management of complex public affairs.

**Keywords:** People-centered Yellow River Governance; Yellow River Harnessing; River Governance Paradigm

# 开源情报与公共外交作用的机制、效应与边界

刘成昊<sup>1</sup>

(1.同济大学, 上海 200092)

**摘要:** 平台化传播重塑了国际舆论结构, 公共外交由政府主导的单向传播转向多主体参与的网络竞争。开源情报(OSINT)以公开信息为基础, 通过核验、推理与可视化呈现形成证据链叙事, 并在跨平台扩散与媒体/智库引用过程中进入公共议程, 影响国际受众对责任归因与能力评估等关键问题的解释框架。本文在公共外交概念演进与“声誉安全”视角下, 选取MH17事件中的Bellingcat调查与俄乌冲突中ORYX可视化战损统计为案例, 分析开源情报影响公共外交的机制与边界。研究发现: 开源情报的作用不在于简单替代官方叙事, 而在于改变叙事竞争的起点——以证据可见性提升解释优势, 进而对国家形象与声誉安全产生外溢影响; 同时, 开源情报亦面临可得性偏差、平台算法放大与工具化的风险。

**关键词:** 开源情报; 公共外交; 数字传播; 国家形象; 声誉安全

DOI: doi.org/10.70693/rwsk.v2i3.301

## 一、研究缘起

开源情报(OSINT), 也就是 Open Source Intelligence。其特点是信息获取的低成本与公开性, 特点是可以公开获取, 即所谓的“可公开获取”或者“在公共领域的非机密信息来源”。<sup>1</sup>其特点是依托一切公众可以接触到的信息, 例如报纸、广播节目、公开演讲、商业卫星图像、论文、社交媒体、博客、各类网站, 以及越来越多的其他新鲜事物(如区块链)。这些曾经都基于新闻自由和公民新闻传统。<sup>2</sup>在传统传播结构中, 重大国际事件的“事实呈现—解释框架—舆论走向”往往由政府部门与主流媒体主导, 公共外交亦主要依赖官方话语、国际传播机构与外交渠道来塑造国家形象。然而, 互联网平台与社交媒体降低了信息获取与再生产门槛, 公开影像、商业卫星、数据库与社交媒体文本等材料迅速增量, 使得事实核验与叙事竞争呈现去中心化趋势。公共外交由此面临两项变化: 其一, 议程设置主体多元化, 非国家行为体在舆论场中获得更大可见度; 其二, 叙事竞争的核心从把控主流媒体与分发渠道转向提供素材与社交媒体的自发传播。

在此背景下, 开源情报逐步从情报领域的工作方法扩展为公共舆论中的知识生产形态。与一般舆论表达不同, OSINT 强调以公开来源材料构建可复核的证据链, 并以图像定位、时间线比对、来源核验等方式给出可传播的结论。这种“方法透明—证据可见”的呈现方式, 容易在跨国传播中形成较强说服力, 并被媒体、研究机构和政策讨论引用, 从而对公共外交效果产生外溢影响。

现有研究中, 关于 OSINT 的讨论多聚焦其技术路径与安全治理, 关于公共外交的研究则集中于软实力、国家形象与数字外交工具。相对而言, OSINT 如何通过证据链叙事改变国际受众认知框架, 并进一步影响国家形象与公共外议程, 仍需更具操作性的机制分析。基于此, 本文提出研究问题: OSINT 通过何种机制影响公共外交? 这种机制在重大国际事件中如何发挥作用? 其潜在风险何在?

## 二、开源情报与公共外交的历史与融合路径

### (一) 公共外交概念的不断发展

传统的公共外交被定义为政府对非政府的宣传与互动, 例如爱德华·R·爱默在被任命为美国新闻署署长时对“公共外交”的定义为“不同于传统外交, 不但包括与政府间的互动, 而且包括主要是与非政府的个人和组织之间的互动。”<sup>3</sup>这些 20 世纪官员眼中的公共外交是一国政府主导的对另一个主权国家行为体及其内部非主权国家行为体的政治宣传。学界通常认为公共外交这一概念, 即“public diplomacy”一词在 20 世纪 60 年代由埃德蒙·古里昂(Edmund Gullion) 提出并与默罗公共外交中心的设立相关, 其核心意涵是: 国家(以及与之相关的社会力量)

**作者简介:** 刘成昊(1998—), 男,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国际安全。

**通讯作者:** 刘成昊

如何通过对外传播、公众互动与社会联系来影响海外公众对本国政策与形象的理解。<sup>4</sup>这一早期界定的优点是抓住了公共外交的对象——“外国公众”；但它也造成了一个长期争论：公共外交究竟是外交的延伸，还是包装后的宣传，抑或是一种更强调沟通与关系的治理方式。

此外，公共外交主体也在变化。正如时代的发展使得大量非国家行为体逐步走上国际关系舞台，对于公共外交的施动者与主体也有了更多的讨论。公共外交一直以来对其主语有不同的观点，部分学者认为，当代新公共外交的对象和执行者都不一定必须为政府机构。正如外交学者保罗·夏普指出：“我们仍不确定‘人民’‘民众’具体指代谁，尤其不清楚‘公共外交中的公众’究竟是谁？”<sup>5</sup>欧洲学者克里斯蒂娜·拉库尔（Christina la Cour）通过分析了威尔逊、哈罗德·尼科尔森、基辛格与约瑟夫·奈的外交著作，分析指出外交文献中“公众”概念的内涵范围总体呈扩展趋势，而公共外交的指涉也从“公开外交行为”演变为外交官直接面向外国公众开展的特殊外交活动形态。<sup>6</sup>

为了避免把公共外交简化为“对外宣传”的同义词，后续研究逐渐把它拆解为可操作的组成部分。较有影响力的一种划分将公共外交概括为五类实践：倾听（收集并理解海外公众意见）、倡导（阐释政策立场）、文化外交、交流项目与国际广播。<sup>7</sup>这一分类背后隐含一个判断：公共外交的有效性不仅取决于“说什么”，也取决于“是否理解对方、能否形成长期信任”。因此，学界对传统公共外交的批评往往集中在两点：一是过度强调单向输出与短期动员，容易滑向宣传；二是忽视倾听与反馈，导致话语与受众经验脱节，从而损耗可信度。

如果说公共外交在 20 世纪是“独自/广播模式”，那么互联网时代的 21 世纪则是“对话/网络模式”。公众不再是被动的信息接收者，同样是信息的生产者和建构者，“数字化公共外交”的概念应运而生——外交机构、民间组织或个人开展的以对象国的公众互联为抓手，以对话、参与和关系建构为目标的对外传播获得。但是由于公众不再是单方面被灌输，他们可以在评论区进行补充、赞成、反对甚至是辟谣，因此新时代的数字化公共外交更注重对受众意见的尊重和反馈，以构建“长效关系”，奉行“客体本位，多元阐释、分布式”的后现代主义逻辑，蕴含解构主义与消解权威的意义。<sup>8</sup>

## （二）开源情报的缘起与进入公共外交

开源情报的发展与传媒的发展息息相关，因为开源情报的核心在于利用海量的公开数据来生成有价值的情报。传媒的发展让信息流通的成本不断降低，规模不断扩大，成为了情报的来源；而传媒培养出的公民意识则是开源情报的中坚力量。最初，克里米亚战争，又被称作“第一次电报直播战争”。因为电报让新闻能在数日之内从克里米亚半岛传回伦敦，公众可以通过记者获得大量前线报道，了解到了前线的各类不满与官方宣传的矛盾之处，从而推动了英国的国内政治变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尽管信息的传输速度并未显著加快，但是照片资料和影像资料的极大丰富为开源情报提供了素材，而公民识字率的普遍提高则为开源情报分析提供了足够的土壤。特别是在总体战的背景下，各国政府的安全需求催生了庞大的情报需求，而汇总公开数据并进行分析则是最直接的情报手段。在这一时期，1939 年英国政府委托 BBC 成立的 BBC 监控部门（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Monitoring Service, BBCMS）可以视作最早的有官方支持的开源情报机构。主要通过监听翻译外国广播并制作简报《每日文摘》（Daily Digest）并上报外交部、战争部、MI7、MI9 和美国政府等部门。<sup>9</sup>除此之外，我国的《参考消息》与其 1931 年 11 月开始创刊的前身《无线电材料》（1932 年夏更名为《无线电日讯》）也是采取类似的操作，通过收集到的公开新闻加以编印作为情报资料。

但是这种传统上的基于开源情报的分析并不参与公开传播，无法做到了对社交媒体的再影响。这也是在互联网之前，这些所谓的开源情报与传统的情报研究无法拉开较大差距的原因，甚至正因为模糊的定位，学术界难以对他们进行有针对性的讨论。此外，尽管伊拉克战争被视作第一次电视直播的战争，但直到此时战场信息的披露仍然是高度依赖政府渠道、政府有权或者有能力限制记者的采编，因此实际上仍然是一种“宣传”而非可互动的“传媒”。

互联网特别是移动互联网对这种政府主导的传播结构产生了冲击，即使战场也不例外。此外，大量廉价的“灰色情报”，如商业卫星图像，也使得情报分析的门槛进一步降低。在这个背景下，民间的爱好者通过自身的专业知识与互联网，就可以极大的填补那些政府主导的机构兴趣之外的空白。开源情报机构也因此应运而生。

传统的情报机构，其服务对象为本国政府部门，本身并不承担信息宣传功能，受本国政府影响，定位是辅助决策的功能。但新时期的开源情报机构特别是民间开源情报机构往往发起者出自兴趣，相对独立，其研究目的也并非干扰决策而是在互联网上进行信息传播，因此天然类似于宣传中的发起者地位。对于这些新一代的开源情报机构而言，其服务对象是互联网平台的支持者与观众，更类似自媒体角色，从而削弱了国家在情报领域与对外宣传中的垄断地位。在这一转向中，“可信度”成为比“声量”更稀缺的资源：谁的解释更能经受质疑、谁更能提供可核验的依据，往往比谁更善于表达立场更重要。

## 三、开源情报影响公共外交的案例

基于上述历史脉络，本文提出一个可被案例检验的观点：开源情报在公共外交中作为非国家行为体提供了与主权国家宣传例外的可信度，通过公开证据链影响国际受众对事件的解释框架，从而改变国家形象竞争的起点与边界。这一角色带来双重后果：其一，开源情报可能削弱官方叙事的垄断性，使公共外交更难依赖单向话语维持

一致解释,也意味政府部门面临更强的信息核实压力,更倾向于适度公开来争取民主与盟友支持;<sup>10</sup>其二,开源情报机构的“第三方”也可能被国家行为体所利用,——当国家力量通过信息投放、资源支持或议程引导介入其中时,开源情报可能被工具化,反而成为更隐蔽的影响渠道。

### (一) MH-17 事件中开源情报机构如何破坏俄罗斯宣传

在 2014 年 MH-17 航班被击落后,俄罗斯官方媒体最初宣布击落的为乌克兰空军 AN-26 运输机,但很快又改称该民航客机为乌克兰空军战斗机击落<sup>11</sup>,并让自媒体宣称“目睹了有乌克兰战斗机”。在同一年成立的民间开源情报机构 Bellingcat 则在 MH-17 事件中第一次展示了开源情报机构对国际关系的影响。Bellingcat 是 2014 年 7 月英国记者希金斯召集化学武器专家丹·卡泽塔、彼得·朱克斯以及克里斯·布雷斯组成的私营情报调查机构,是一个分工明确、专家云集的核心业务团队、一个依托互联网、保持高热度的信息发布平台和一个规模精干、结构多元的基金会。<sup>12</sup>该组织依托当时俄罗斯媒体暴跌、当地人在社交媒体发布的视频、公开的商业卫星照片,通过对比后确认 MH-17 为被地面射出的防空导弹击落。随后在社交媒体上发起“众筹”式情报征集,带动大量专业人士和热心网友参与,并借助大量收集到的线索信息提出了亲俄武装使用“山毛榉”防空导弹击落的假设,在事件第二天便在官网公布了其初步调查结论。在随后的跟踪报导中逐步锁定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文件中的事实漏洞。<sup>13</sup>此次事件中 Bellingcat 通过迅速响应并在互联网平台依据开源情报与社区形成互动,占据了宣传优势,破坏了俄罗斯媒体对欧洲的公共外交。

### (二) ORYX 在俄乌冲突中的可视化战损统计

在 2022 年至今的俄乌冲突中,开源情报机构则一度以其开放、即时、可追溯成为了各国媒体的引用来源,甚至成为了部分国家政府的参考。这主要原因在于,战争本身作为一种高度不透明且复杂的活动,所有参与方都天然的有隐瞒自身和夸大对手损失的利益,交战国自身都很难准确把握前线战损的情况下,更不用说作为第三方的其他国家——从这个角度来说,各国政府内部的智库与民间机构一样,主要信息来源都是基于开源信息。在本次俄乌冲突中,最为知名的开源情报机构则是 ORYX,该组织创始人 Stijn Mitzer 和 Joost Oliemans 曾为 Bellingcat 工作过。该组织自叙利亚战争开始便尝试以交战双方基础士兵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战果视频为依据,结合其他信源,统计各类装备的损失情况。该组织在俄乌冲突期间建立了著名的俄乌双方战损数据库,精确到每一架飞机、每一辆坦克与每一门火炮的损失情况,并依据损失等级分为受损 (damaged)、全损 (destroyed)、放弃 (abandoned) 和被俘 (captured),并附有相关图像作为损失证据。<sup>14</sup>该组织的统计不仅在 2022 年年初扭转了外界对于俄军的过高估计的刻板印象,还成为了欧洲大部分媒体乃至政府智库评估俄罗斯损失的参考数据。美国 CSIS 智库指出,ORYX 的所有损失数据都附有影像资料,可以视作双方损失的“下限”。<sup>15</sup>

从公共外交的角度来说,ORYX 为代表的开源情报机构在全球互联网时代提供了超越交战国的第三方视角。通过对开源信息的有效利用,国家可以更好地理解外国公众的舆论和情绪,评估自身传播策略的效果,并据此调整公共外交的叙事和重点;反之,那些缺乏事实依据的宣传则可能因为被揭穿而对当事国的公共外交产生负面影响,特别是对“声誉安全”而言。部分研究指出,国家拥有更正向、更可见的国际声誉,会在危机中更容易获得外部同情/支持与韧性。<sup>16</sup>在这个框架下,开源情报机构对公共外交的影响不仅仅是为各国民众提供了第三方叙事,更关键的在于,通过改变了为外部受众对于一国声誉的判断,从而在深层次上对他国的“声誉安全”产生威胁。

不过,ORYX 为代表的开源情报组织也面临另外的问题:如果作为信息来源的社交平台被政府机构有意大规模投放虚假信息时,准确性和即时性是否会受影响?此外,战场存在不同情况的信息管制,这就使得大多数战果的发布并不及时,因此其研究价值会受到一定限制;开源情报更是只能推测“已损失”,而对未损失部分则难以进行推测。<sup>17</sup>

### (三) 对开源情报机构的削弱与利用

开源情报机构对公共外交的影响也体现在信息战和国家信誉等领域。在当前大国竞争背景下,开源情报机构已成为信息战和影响力操作的重要工具。战争的本质决定了没有人能完全了解当前局势,因为相关方可能不希望公众了解其行动,且事件的复杂性使得实时追踪所有信息变得不可能,这就是所谓的“战争迷雾”。<sup>18</sup>因此,当政府部门发起信息污染或直接参与开源情报机构工作时,开源情报机构参与的公共外交又回到了政府主导的传统公共外交范畴。

在政府主导的开源情报机构中,俄罗斯的 Rybar 最具有代表性,也是政府部门伪装性第三方的代表案例。Rybar 频道在 Telegram 上有 110 多万订阅,并被其他媒体广泛引用转发。其创始人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兹文丘克(俄语:МихаилСергеевич Звинчук),曾在俄罗斯国防部新闻处工作,他一直隐瞒自己的身份直到被俄罗斯独立新闻媒体《贝尔》(The Bell)揭露。事实上,rybar 表面是一个私人的开源情报分析者,但其实有约 40 名雇员并收到瓦格纳控制者普里戈津的资金支持。<sup>19</sup>

政府部门还可以在不参与开源情报机构运作的情况下利用它们,当政府的宣传策略与开源情报组织的判断基本吻合时,开源情报组织就是政府组织的天然盟友。这种支持并非简单的用来进行舆论宣传,有的时候还负有“泄

露机密”的责任来避免政府部门暴露自身情报来源。官方自己的私密情报可靠性更高但更加敏感，而开源情报机构有助于避免政府陷入“披露困境”和权衡。在第三方和受影响的利益相关者（如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和社交媒体公司）的帮助下，政府可以在秘密情报的指导下更容易地利用经过验证的开源情报机构来揭露对手的军事、网络和信息安全行动。<sup>20</sup>

有的时候政府可以利用开源情报的研判逻辑，在源头上故意披露部分信息来产生宣传效果。例如 2025 年美军空袭伊朗核设施的“午夜之锤”行动中，就使用大批机群经美国本土从美国西侧进入太平洋，通过民众在互联网平台讨论与开源情报机构分析，营造出美军将从“太平洋-印度洋”进入对伊朗威慑/打击的航线的假象，实际的打击机群则悄无声息的从美国东侧进入大西洋执行打击任务。在开源信息与开源情报机构的作用下，军事行动会把“公众可见的开源信号”纳入欺骗设计：通过诱饵航迹与信息披露节奏管理，既影响对手的态势判断，也影响国际舆论对行动的预期。

## 结语

本文围绕“开源情报如何影响公共外交”这一问题，梳理了公共外交从政府主导的单向传播向平台化、多主体互动竞争的结构转型。与传统意义上以权威背书为主的对外叙事不同，开源情报机构以公开来源信息为材料，通过定位、核验与链条化的证据型叙事，从而在责任归因与能力评估等关键议题上影响国际受众的解释框架。公共外交竞争因此不再仅取决于传播渠道与话语技巧，更取决于能否在公开环境中提供经得起对照的证据资源与一致解释。

以 MH17 事件与俄乌冲突为例可以看到，OSINT 的影响并不主要表现为替代官方叙事，而更常表现为改变叙事竞争的起点：在责任议题上，通过公开证据链推动责任框架趋于固化；在战争态势议题上，通过可视化战损清单与规则化统计提供事实核查与战损证据的事实基准，不仅影响外界对交战双方实际军事实力的评估，更深刻影响到当事国的声誉安全。这种基于证据可见性的认知变化，会进一步回流到国家形象与声誉安全层面，为政府主导的公共外交带来深刻影响。

同时，本文指出开源情报机构并非等于客观事实，其“第三方”的地位是一种叙事的信誉，既可能削弱官方叙事的垄断性，也可能被国家行为体通过资源支持、议程引导或信息投放加以工具化；在行动层面，国家亦可能主动把可观察的开源信号纳入欺骗与保密设计，以制造噪声、延缓对手判断并塑造公众预期。加之公开信息存在可得性偏差与平台算法放大，开源情报机构在提升核验水平的同时，也可能引入新的误导路径。因此，相关分析不宜停留在技术层面，更需要把它放回平台化传播结构与可信度政治之中加以理解。

面向数字公共外交实践，本文的启示在于：其一，应强化对开源情报生态与证据链叙事的研判能力，将跨源核验、可视化呈现与解释一致性纳入对外传播准备；其二，应提升公共外交的“证据表达”能力，在公开环境中以可核验方式回应争议议题，降低单向声明被再解构的空间；其三，应建立对伪装性第三方与信息污染的识别机制，关注开源信号被操纵的可能，以减少声誉风险的长期积累。受限于篇幅，本文未能对不同平台的扩散机制与受众分层接受进行系统比较，后续研究可进一步从跨平台引用链条、受众分群与政策反馈机制等方向深化。

## 参考文献：

- [1] Hatfield J M. 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open source intelligence[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lligence and CounterIntelligence*, 2024, 37(2): 397-418.
- [2] Hatfield J M. Intelligence under democracy and authoritarianism: a philosophical analysis[J]. *Intelligence and National Security*, 2022, 37(6): 903-919.
- [3] 仇朝兵.美国“公共外交”及若干相关概念辨析[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2021, 43(5):7.
- [4] Cull N J. Public diplomacy before Gullion: The evolution of a phrase[M]//*Routledge handbook of public diplomacy*. Routledge, 2008: 39-43.
- [5] Sharp P. *Diplomatic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 [6] La Cour C. The evolution of the ‘public’ in Diplomacy [J]. *Place Branding and Public Diplomacy*, 2018, 14(1): 22-35.
- [7] Cull N J. Public diplomacy: Taxonomies and histories[J].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2008, 616(1): 31-54.
- [8] 史安斌,张耀钟.数字化公共外交:理念,实践与策略的演进[J].*青年记者*, 2020(7):4.
- [9] 郑一卉.BBC的外媒监测及其启示[J].*对外传播*, 2015(5):3.DOI:CNKI:SUN:DWDC.0.2015-05-032.
- [10] Office of the Director of National Intelligence;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The IC OSINT Strategy 2024-2026*
- [11] Катастрофа MH17: как менялись версии российских СМИ <https://www.bbc.com/russian/features-37496581>, 访问时间 2025 年 11 月 18 日。
- [12] 李景龙,周伟.基于网络的开源情报调查方法创新与应用——以英国私营情报调查机构“摇铃猫”为例[J].*情报杂志*, 2023, 42(2):5.

- Bradbury D. In plain view: Open source Intelligence [J]. *Computer Fraud & Security*, 2011, 2011(4): 5–9.
- [13] Das russische Verteidigungsministerium legt neue Beweise vor, die belegen, dass ihre früheren Beweise gefälscht waren  
<https://www.bellingcat.com/news/uk-and-europe/2016/09/27/das-russische-verteidigungsministerium-legt-neue-beweise-vor-die-belegen-dass-ihre-fruheren-beweise-gefalscht-waren/> 访问时间 2025 年 12 月 26 日。
- [14] Attack On Europe: Documenting Russian Equipment Losses During The Russian Invasion Of Ukraine  
<https://www.oryxspioenkop.com/2022/02/attack-on-europe-documenting-equipment.html> 访问时间 2023 年 11 月 19 日。
- Ayhan K J. The boundaries of public diplomacy and nonstate actors: A taxonomy of perspectives[J]. *International Studies Perspectives*, 2019, 20(1): 63-83.
- [15] Bergmann M, Snegovaya M, Dolbaia T, et al. Out of Stock?: Assessing the Impact of Sanctions on Russia's Defense Industry[M]. Center for Strategic & International Studies, 2023.
- [16] Sukhorolskyi P, Sukhorolska I M. The public diplomacy of Ukraine in wartime: a path to reputational security [J]. *Eastern Journal of European Studies*, 2024, 15(Special Issue): 268–291.
- [17] Teagan J. Forecasting Russian Equipment Losses Using Time Series and Deep Learning Models [Z]. arXiv, 2025(2025).
- [18] Niu J, Stillman M, Seeberger P, et al. A dataset of Open Source Intelligence (OSINT) Tweets about the Russo-Ukrainian war[J]. arXiv preprint arXiv:2409.01052, 2024.
- [19] Ирина Панкратова.“ Создатель «Рыбаря». Продолжение расследования The Bell “  
<https://thebell.io/sozdatel-rybarya-prodolzhenie-rassledovaniya-the-bell> 访问时间 2025 年 12 月 29 日。
- [20] Dylan H, Maguire T J. Secret intelligence and public diplomacy in the Ukraine war[M]//*Survival: August-September 2022*. Routledge, 2023: 33-74.

## The Mechanisms, Effects, and Boundaries of Open-Source Intelligence and Public Diplomacy

Liu Chenghao<sup>1</sup>

<sup>1</sup> *Tongj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92, China*

**Abstract:** Platform-based communication has reshaped the production and diffusion of international public opinion, pushing public diplomacy from state-centered one-way messaging toward a competitive, multi-actor networked arena. In this context, open-source intelligence (OSINT) leverages publicly available information to produce evidence-based narratives through searching, verification, and chain-of-evidence presentation. Once amplified through cross-platform circulation and repeated citation by media and think tanks, such narratives can enter the public agenda and affect how international audiences interpret key issues such as attribution of responsibility and assessments of military capability. Drawing on the evolution of public diplomacy and the perspective of reputational security, this article examines two cases—the Bellingcat investigation of the MH17 incident and Oryx’s visualized equipment-loss database in the Russia–Ukraine war—to analyze the mechanisms and boundaries of OSINT’s influence on public diplomacy. The findings suggest that OSINT does not simply replace official narratives; rather, it changes the starting point of narrative competition by increasing explanatory advantage through evidential visibility, thereby generating spillover effects on national image and reputational security. Meanwhile, OSINT is constrained by availability bias, algorithmic amplification, and the risk that its “third-party” appearance may be instrumentalized. The article concludes with practical implications for evidence-based communication, cross-source verification, and risk identification in digital public diplomacy.

**Keywords:** OSINT; Public Diplomacy; Platform-based Communication; National Image; Reputational Security

# 习近平文化思想生成逻辑的多维阐释研究

左苑均<sup>1</sup>

(1.西南科技大学, 四川 绵阳 620100)

**摘要:**习近平文化思想开启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章,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在当代中国的生动实践,其生成逻辑由理论逻辑、实践逻辑和主观逻辑这三个方面构成,论证了文化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守正创新、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沃土的推陈出新和习近平地方工作时文化建设的经验累积中生长出来的科学理论。

**关键词:**习近平文化思想;生成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主观逻辑

**基金项目:**西南科技大学研究生创新基金资助项目:习近平文化思想生成逻辑的多维阐释研究(编号:25ycx1161)

DOI: doi.org/10.70693/rwsk.v2i3.328

## 一、理论逻辑: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守正创新

任何思想都不是凭空产生,它有来路,没有理论根基支撑的思想就如同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同样,习近平文化思想也有其理论来源,是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继承。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对“文化”一词的使用频率较低,但并不代表其在思想层面认识的“缺失”,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文化”的认识大多采用思想、道德、意识形态、宗教等词语来表达。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揭示了文化的一般本质和基本特征,阐释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探讨了文化的相关概念,比如“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人化的自然”等。为习近平文化思想在精神文明方面的认识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石。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对历史唯物主义文化观的继承与发展。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通过对德意志意识形态和一般意识形态的深入批判与剖析,系统地阐发了与之相对应的历史唯物主义文化观,深刻揭示了文化在历史演进进程中的本质、地位与作用机制,为理解社会文化现象提供了全新的、基于唯物史观的理论范式与分析框架,强调“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sup>[1]</sup>认为社会存在是文化发展的前提条件,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要基于唯物主义的观点。马克思认为,文化产生于人类的生产实践,劳动是文化产生的物质基础,也就是“劳动”创造了“文化”,在实践和劳动中人们逐渐学会使用、制造工具,加大了对自然界的改造和利用,是一个“人化”的过程,“人化”即“文化”,是人的本质力量作用于自然的对象化。在基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的实践中,自然由人改造,自然会无可避免地烙印上人的痕迹,也就是“人化自然”,同时,人也身处自然,自然会反作用于人,也就是“自然化人”“文化”就是在“人化自然”与“自然化人”辩证统一关系过程中的产物。依据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马克思精准界定了传统文化于整个社会有机结构中的所处地位,深刻阐释了传统文化的内在本质。即传统文化作为一种特定的“上层建筑”形式,乃是构建并矗立在相应的经济基础之上,且与经济基础之间存在着复杂而紧密的相互作用关系,

**作者简介:**左苑均(2001—),女,硕士在读,研究方向为习近平文化思想。

**通讯作者:**左苑均

这种关系深刻影响着社会结构的稳定、变迁以及文化自身的传承与发展轨迹，从而在宏观的社会历史演进进程中发挥着独特且不可替代的作用。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对以人民为中心文化观念的继承与发展。马克思认为，人民群众是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创造者，同时也是历史的创造者、文化的创造者。人民于实践中创造的无产阶级文化，也会反过来服务人民，最终促进人民群众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列宁提出文化应当“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sup>[2]</sup>，同时也提出“文化领导权”的理论，他认为要发挥文化的“唤醒”作用和“振作”功能，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灌输”为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构建起无产阶级人民的文化意识，在文化建设的主体上，为无产阶级群众提供丰富多样、根植于本民族传统的优秀文化。<sup>[4]</sup>文化作为上层建筑，也就是思想意识，只能存在于人脑中，而发展文化最终的落脚点又在于人民，也就是说文化本身就内在包含着人民性。

## 二、实践逻辑：中国共产党百年文化建设的积淀发展

中国共产党百年来的奋斗史既是一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建立史，同时也是一部文化思想的形成史。党在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与发展的伟大历史进程中，所孕育生成的独具特质的革命文化以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乃是涵盖物质层面与精神层面丰富内涵的综合性文化成果体系，构成了文明的“细胞”。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提出并非凭空产生、一蹴而就，而是来自共产党百年来文化建设经验的累积。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文化建设层面的探索未曾止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思想，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形成奠定了深厚的理论基础和伟大实践。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同志首次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出要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改革开放时期，邓小平同志指出，要把各种意见表达出来，进行争辩，才能真正发展马克思主义，发展辩证唯物主义<sup>[3]</sup>。其后江泽民同志又指出，“我们要保护和发扬一切有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积极思想和精神，一切有利于人民团结、社会进步的积极思想和精神。”改革开放，随即打开的是“思想国门”，要始终坚持把文化建设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地位，始终坚持和发展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面对这些思想文化，如何做到开放包容、兼收并蓄，先决条件就是要维护好中华文化的根脉，维护好社会主义思潮文化的底色，在与各种思潮交相辉映、相得益彰的同时更要牢守其“本”，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文化养分。此后胡锦涛同志提出“国家软实力”的概念，也就是“对内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对外增强国家亲和力和影响力”<sup>[4]</sup>。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已然成为我们党和国家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进入新时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新的历史机遇，习近平同志秉承百年来共产党人坚守的文化建设理念，继而建立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立足“魂”与“根”、着眼“往”与“来”、聚焦“内”与“外”，深刻回答了“什么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这一重大时代课题<sup>[5]</sup>。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总体规划、战略布局、价值理念和奋斗目标。

## 三、主观逻辑：习近平地方工作时文化工作的经验累积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文化建设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新时代的目标使命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发展也提出了新的要求。习近平同志是“党中央的核心”，也是“全党的核心”，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形成同习近平同志自身的阅历经验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

重视精神文明建设。早在正定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大力抓精神文明建设，提出要把“两个文明”一起抓，

老百姓“钱袋子”要鼓起来，精神也要健康起来。在福建沿海欠发达的宁德地区工作期间，习近平在带领闽东人民摆脱贫困、精准扶贫的过程中，也提出要把“思想道德教育和科学文化建设”贯穿其中，树立“弱鸟先飞”的意识和发扬“滴水穿石”的精神。

重视文化产业发展。在正定工作期间，基于其历史文化古城的特色，对全县文物进行大普查，编写《正定古今》，让正定古城更好走出去、传开来。在宁德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十分重视当地的文化传统，将之比作“闽东之光”，大力宣传闽东的红土地文化、畲族文化。在浙江工作期间，为加快建设文化大省、发展文化经济，习近平也多次做过系统性阐释，积极探索文化和经济交融共兴的实现路径，以文兴业，赋予经济社会发展以文化内涵、价值引领和精神力量，探索文化与城市发展、生态保护融合共兴。他指出，“既关注经济硬实力，又关注文化软实力；既修复自然生态，又修复人文生态。”在他看来，“人的发展以精神文化为内核”，要进一步推动文化大省的建设，把浙江作为文化体制改革的综合试点省，要抓好公益性文化事业的改革和发展，抓好经营性文化产业改革和发展，抓好文化管理体制的改革。在上海工作期间，习近平对其文化层面的建设也做了前瞻性部署，认为“经济是血肉，文化是灵魂”，提出要建设国际文化大都市，让文化自信自强在国际文化大都市建设中融合互动、相互赋能。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地方工作历程中，涉及精神文明建设和文化产业发展，从当地文化建设的实际情况出发，在实践中不断摸索前行、累积经验，使其文化建设的探索呈现出动态的、系统的、持续演进的特征，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形成提供了丰富的素材、独特的视角和扎实的根基，成为其发展中不可或缺的必要准备环节。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2] 列宁文化观研究[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 [3] 邓小平文选（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 [4] 胡锦涛文选（第二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 [5] 王永贵,许川川.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生成逻辑、精髓要义与践行路径[J].宁夏社会科学,2024,(01):5-11.

## A Multi-dimensional Interpretation Study on the Generative Logic of Xi Jinping Thought on Culture

Zuo Yuanjun<sup>1</sup>

<sup>1</sup>Southwest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ichuan, Mianyang 620100, China

**Abstract:** Xi Jinping Thought on Culture has opened up the cultural chapter of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It is a vivid practice of Marxist cultural theory in contemporary China. Its generative logic consists of three aspects: theoretical logic, practical logic, and subjective logic. It demonstrates that this thought is a scientific theory that has grown out of the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of Marxist classics, the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fertile soil of fin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d the accumulation of experience in cultural construction during Xi Jinping's local work.

**Keywords:** Xi Jinping Thought on Culture; Generative Logic; Theoretical Logic; Practical Logic; Subjective logic

#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域下公安工作在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中的作用研究

王啸千<sup>1</sup>

(1.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03)

**摘要:**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视角出发,探讨公安在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以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实践性、发展性等理论为指导,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具体国情和社会发展实际相结合,以及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公安工作现代化的辩证统一,分析公安机关作为维护社会稳定的核心力量,在保障人民利益、践行群众路线、推动社会治理创新等方面的重要职能。在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大背景下,公安机关作为维护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在实现更加安全、舒适的生活环境中扮演着关键角色。深入研究公安的作用,对于提升社会治理效能、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具有深远意义。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公安; 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

DOI: doi.org/10.70693/rwsk.v2i3.337

## 一、引言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推动理论创新和实践发展的过程。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作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环节。公安机关作为党和人民手中掌握的“刀把子”,在社会治理体系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习近平明确指出,要“确保刀把子牢牢掌握在党和人民手中<sup>[1]</sup>”。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视角深入研究公安在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公安工作的本质与使命,为公安工作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推动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迈向新台阶。

步入新时代,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愈发强烈,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诸多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民众不再仅仅满足于物质生活的富足,更期望在社会生活中充分享有各项权利,获得全方位的保障。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是新时代的重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和人民幸福安康<sup>[2]</sup>。这一论断与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一脉相承,精准界定了社会治理在国家治理架构中的重要地位。与此同时,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深刻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人民主体地位,以及人民至上的价值追求。

新的社会发展阶段,社会治理对象呈现出结构更加多元、利益关系更加复杂、风险形态更加交织的显著特征。传统以行政管理和治安管控为主导的治理方式,已难以完全适应新时代社会运行方式和群众公共安全需求的深刻变化。特别是在城镇化快速推进、人口流动持续加速、网络空间深度嵌入社会生活的背景下,社会治理由单一维度向系统治理、协同治理和智能治理转型已成为必然趋势。在这一进程中,公安机关既是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动治理理念更新、治理方式转型和治理能力升级的重要实践主体。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视角出发,系统分析公安工作在新时代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中的角色定位与实践路径,对于进一步深化对国家治理现代化内涵的理解,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作者简介:**王啸千(2000—),女,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通讯作者:**王啸千

##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对公安工作的指导意义

### (一) 马克思主义人民性理论与公安工作宗旨

马克思主义始终将人民群众置于历史发展的核心地位,强调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力量,其理论内核围绕人民至上,致力于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种人民性理论深刻影响着公安工作宗旨的确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国家性质决定了公安机关的阶级属性是人民民主专政的重要工具,必须坚持对人民实行民主,保护人民利益;对危害国家、危害人民利益的敌对势力、敌对分子实行专政<sup>[3]</sup>。自公安机关成立以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便被确立为根本宗旨,这与马克思主义人民性理论高度契合。在实际工作中,无论是开展打击违法犯罪活动以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还是优化公共服务以满足人民多样化生活需求,公安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始终是人民。在案件办理过程中,秉持公正原则,严格依法办事,确保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得到充分伸张,这些实践充分体现了公安工作对马克思主义人民性的切实践行。

### (二) 马克思主义实践性理论与公安工作方法

马克思主义认为实践是认识的来源、目的和发展动力,强调理论必须与实践紧密结合。公安工作具有鲜明的实践性特征,其工作成效直接体现在维护社会稳定、保障人民安全的具体实践活动中。从侦查破案到治安防控,从交通管理到应急处置,每一项公安工作都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和总结经验。以打击新型网络犯罪为例,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网络犯罪手段不断翻新,公安机关通过不断实践,积极探索利用大数据分析、电子取证等新方法、新技术,有效提升了打击犯罪的能力。在治安防控体系建设方面,通过实地调研、试点推广等实践活动,根据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逐步构建起具有针对性和实效性的防控网络,这充分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实践性理论对公安工作方法的科学指导作用。同时需要看到,公安工作的实践性不仅体现在具体业务操作层面,更体现在对社会运行实际问题的持续回应和动态调整之中。面对社会结构变化、治理环境复杂化以及风险形态多样化的现实情境,公安机关在实践中不断完善警务运行机制、警力配置方式和执法流程设计,使公安工作更加贴近社会治理需求本身。这种以现实问题为导向、以实践反馈为依据、以机制优化为抓手的工作方式,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强调从实际出发、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理论的基本方法论,有力推动了公安工作由经验型向制度化、规范化和专业化方向转变。

### (三) 马克思主义发展性理论与公安工作创新

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会随着时代的发展、实践的深入不断丰富和完善。公安工作同样需要遵循这一发展性理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社会环境下,持续创新工作理念、方法和机制。公安机关要树立数字化理念,培育大数据思维,将互联网信息技术有机融入各项公安业务工作,积极构建智慧警务,优化勤务机制。从传统的人力巡逻模式到现代科技支撑下的智慧警务,从单一部门执法到多元主体协同治理,公安工作的创新发展始终与时代步伐保持一致。例如,“互联网+公安政务服务”的推行,借助互联网技术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让群众通过网络即可办理多项业务,极大地提高了办事效率;警务大数据平台的建设,实现了信息的共享和智能分析,为精准打击犯罪、科学决策提供了有力支持,这些成果都是马克思主义发展性理论在公安工作中生动体现的典型。公安工作的创新已经由单纯技术工具层面的更新,逐步转向以治理模式重构和治理流程再造为核心的系统性创新。通过推动数据资源整合、警务要素融合以及业务流程再造,公安机关不断强化跨部门、跨层级协同能力,促进警务运行方式与社会治理结构的深度衔接。这种从整体治理结构出发推进警务创新的实践路径,进一步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发展性理论在公共治理领域的现实适用空间。

## 三、公安在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中的核心作用体现

### (一) 维护社会稳定,筑牢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安全基石

马克思主义理论明确指出,稳定是社会发展的前提条件,没有稳定的社会环境,一切发展都无从谈起。公安机关作为维护社会稳定的主力军,通过打击违法犯罪、防范风险隐患等工作,为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创造安全稳定的环境。在打击犯罪方面,公安机关对各类刑事犯罪始终保持高压态势,无论是传统的暴力犯罪,还是新型的网络犯罪,都坚决依法予以打击。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公安机关充分发挥职能作用,以雷霆之势铲除黑恶势力及其背后的“保护伞”,在打防并举、标本兼治上下真功夫、细功夫,确保取得实效、长效<sup>[4]</sup>,有力维护了社会公平正义和公共安全。在防范风险方面,公安机关积极排查化解各类社会矛盾,针对劳资纠纷、征地拆迁、环境污染等易引发矛盾的领域,提前介入、主动调解,将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有效预防群体性事件和公共安全事故

的发生,为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筑牢坚实的安全基石。

## (二) 践行群众路线,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群众路线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理论成果,其核心内容为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公安机关在社会治理工作中积极践行群众路线,通过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构建起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枫桥经验”是基层社会治理和贯彻群众路线的生动体现。在社会治理现代化视野下,“枫桥经验”始终以依靠和组织群众预防、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为第一要务,与警察公共关系的目标追求和观念创新具有一致性<sup>[5]</sup>。公安机关鼓励群众参与社会治安防控,积极组建治安志愿者队伍、发动群众提供线索等,充分调动社会力量参与治安治理的积极性,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治安治理的良好氛围。例如,北京的“朝阳群众”、“西城大妈”等群防群治力量,在协助公安机关打击违法犯罪、维护社区治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群众路线在公安工作中成功实践的典范,推动社会治理从“政府主导”向“多元共治”的转变。

## (三) 创新治理模式,提升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效能

基于马克思主义发展性理论,公安机关不断创新社会治理模式,提升治理效能。2022年,公安部部长在《新时代公安工作的历史性成就和变革》中强调指出,要“大力推进‘情报、指挥、行动’一体化和市县公安机关扁平化、实战化、合成化运行机制改革”。基于此,“情指行”一体化实战运行机制由各地公安机关“自选动作”转为全国范围的“规定动作”,“情指行”一体化实战体系初步搭建形成<sup>[6]</sup>。“情指行”一体化实战运行机制是公安治理模式创新的重要体现,全方位、全天候、最大限度掌握涉及影响社会治安稳定的深层次、内幕性、预警性的情报信息,通过分析研判,及时预警不安定因素。在情报研判的基础上,通过高效协同的指挥调度、布控堵截等方式,全力支撑基层打防管控建等各项工作。对警情、事情、案情、舆情等常态化或突发性事件,进行警力布防和处置,把违法犯罪行为的苗头扼杀在摇篮中。提高应对复杂治安问题的能力,推动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向更高水平发展。

在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不断深入推进的背景下,公安机关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功能定位正由传统意义上的“治安管理部门”,逐步向综合性、系统性、协同性社会治理主体转变。这一转变,本质上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关于国家治理形态与社会结构变迁相适应的理论要求,也体现了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对公共安全治理方式提出的客观需要。

首先,社会治理的内涵已经由以治安问题为核心的“风险处置型治理”,拓展为涵盖公共安全、社会心理、网络空间秩序、基层社会稳定、社会组织运行等多领域的综合治理体系。公安机关在实践中不仅承担着打击违法犯罪、维护治安秩序的职能,同时也深度嵌入社会治理前端,在矛盾风险预警、社会态势研判、重点群体服务管理、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等方面发挥着基础性支撑作用。公安工作由“事后处置”向“事前预防”转型,正是对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和发展观在治理领域的具体运用。从治理方式看,社会治理现代化更加突出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和源头治理。公安机关在推动治理方式转型过程中,不断强化以法治为引领的治理理念,将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作为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前提。通过健全执法责任体系、完善执法监督机制、强化执法全过程记录和案件质量评查,持续提升执法透明度和公信力,使公安权力运行更加规范化、制度化。这种以法治方式保障社会秩序、以制度手段规范治理行为的实践,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权力必须服务于人民根本利益、并接受社会监督的基本立场。

在基层治理层面,公安机关逐步由单一执法主体向基层社会治理协同枢纽转变。在社区警务实践中,通过推进社区民警常态化下沉、警格与网格深度融合、警务资源与社区资源统筹配置,实现公安力量与基层党组织、社区居委会、社会组织之间的协同联动。这种以基层单元为治理重心的组织模式,有效推动了治理资源向社区一线集聚,使公共安全治理更加贴近群众生活实际,有助于提升治理响应速度和治理精准度,也有利于将马克思主义群众路线具体落实到基层治理结构之中。

## 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公安工作现代化的辩证统一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既是理论创新的过程,也是实践变革的过程。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核心目标之一,而社会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分支,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要达成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就必须大力提升社会治理的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智能化水平,积极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崭新格局。在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语境下,公安工作需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框架中把握“守正”与“创新”的辩证关系,实现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系统性提升。

### (一) 守正: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指导地位

“守正”的核心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确保公安工作的正确政治方向。2015年1月,习近平

就政法工作作出指示,要求“不断提高政法队伍思想政治素质和履职能力,培育造就一支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法律的政法队伍<sup>[7]</sup>。”在政治建警方面,公安机关需始终坚持党对公安工作的绝对领导,将“两个维护”贯穿于治理实践的各领域、全过程。习近平明确指出:“在坚持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这样的大是大非面前,一定要保持政治清醒和政治自觉,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有丝毫动摇<sup>[8]</sup>。”在法治建设领域,“守正”体现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正确处理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的关系。公安机关在执法实践中,既严格依法办事,又注重实现政治效果、社会效果、法律效果的有机统一。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既体现在政治方向和价值立场的坚定性上,也体现在具体治理实践中对制度优势和治理规律的自觉运用上。公安机关通过不断完善权责清晰、运行规范、监督有力的执法制度体系,使公安执法活动更加符合现代治理对程序正义与权利保障的要求。这不仅有助于提升公安工作的社会认同度和公信力,也有助于在更高层面上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中安全治理与法治治理的有机融合。

## (二) 创新:推进马克思主义治理理论的时代化发展

“创新”的本质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解决新时代治理难题,推动理论与实践的与时俱进。在科技治理领域,公安机关以马克思主义关于“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为指导,构建“智慧公安”新生态。上海、深圳等地试点的“AI警察”“无人巡逻车”等智能装备,不仅提升了治安防控的精准度,更探索出“人机协同”的治理新范式。这种将马克思主义科技观与现代信息技术相结合的创新实践,标志着公安工作从“人力密集型”向“科技驱动型”的跨越。

需要强调的是,智慧公安建设并非单纯依赖技术工具的叠加,而是以治理理念重塑和治理能力提升为核心的系统工程。公安机关在推进智能化应用的过程中,更加注重数据治理规则、业务流程重构与组织运行机制的协同优化,通过完善数据共享机制、强化跨部门协同应用和统一技术标准建设,推动信息资源由分散化向集约化转变、由静态管理向动态治理转变。在坚持依法用权、规范用数和保障公民合法权益的前提下,逐步形成以科技赋能决策、以智能支撑执法、以平台促进协同的新型警务运行模式,使技术进步真正服务于社会治理效能提升和人民安全需求,更加充分体现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在新时代治理实践中的现实价值。

## (三) 辩证统一:在“守正创新”中实现治理现代化

“守正”与“创新”是辩证统一的整体,“守正”是“创新”的根基,“创新”是“守正”的升华。例如,在推进“情指行”一体化改革中,既坚持“全国公安一盘棋”的政治原则(守正),又通过技术创新实现指挥体系的扁平化、实战化(创新)。近年来,公安部党委多次部署推进警务体制改革,要求各地公安机关完善一体化实战化警务运行机制。坚持以大数据为支撑,以现代科技为引领,积极推进“情指行”一体化运行机制改革,是贯彻落实公安部党委决策部署的具体要求,也是推进警务战略由线下向线上、从传统向科技、从粗犷向精细转型升级的必然选择<sup>[9]</sup>。这种“守正创新”的治理逻辑,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精髓,为公安工作现代化提供了科学方法论。“守正创新”的统一还体现在公安机关在坚持统一领导、统一指挥、统一规范的前提下,积极探索符合地方治理实际的警务运行机制和社会治理协同模式。通过在不同地区开展差异化探索与分层推进改革,既保证了国家治理体系整体运行的一致性,又充分释放了基层治理创新的活力。这种在统一框架下推进多样化实践的治理路径,有效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在当代中国社会治理实践中的现实运用。

## 五、总结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百年历程,既是一部理论创新史,也是一部实践探索史。公安工作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始终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成果为指导,在“人民性、实践性、发展性”的有机统一中把握治理规律,在“守正与创新”的辩证运动中开拓前进。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公安机关需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转化为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实践力量。通过深化科技赋能、强化法治保障、锻造过硬队伍,不断提升治理体系的科学性、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公安领域的生动实践,也是新时代公安机关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应有的使命担当。

更长远的发展视角看,公安工作现代化并不是一个单一部门的改革命题,而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整体进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安机关只有持续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指导下,把公共安全治理放置于国家治理体系和社会治理结构整体框架中统筹谋划,才能在治理目标、治理方式和治理能力上实现系统性提升。通过不断深化制度供给、技术赋能和协同治理机制建设,公安机关将在推动社会治理由碎片化向整体化、由经验化向科学化转型过程中发挥更加基础性和战略性作用。

从嘉兴南湖的“红船精神”到新时代的“平安中国”建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始终指引着公安工作的前进方向。在未来的征程中，公安机关唯有始终坚守“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公安实践的深度融合，才能在时代变革中交出无愧于党和人民的治理答卷。

参考文献:

- [1]《习近平关于全面依法治国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118 页。
- [2]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2.
- [3]隋从容.做好新时代公安工作的几个着力点——学习习近平关于公安工作的重要论述[J].党的文献,2019,(03):30-36.
- [4]《人民日报》2019 年 1 月 17 日。
- [5]赵康睿,韩春梅,赵闯.“枫桥经验”在警察公共关系中的应用研究[J].山西警察学院学报,2021,29(02):51-58.
- [6]黄旭.“情指行”一体化运行机制的生成机理与运作逻辑[J].中国人民警察大学学报,2023,39(11):81-88.
- [7]《人民日报》2015 年 1 月 21 日。
- [8]《习近平关于全面依法治国论述摘编》，第 20 页。
- [9]龙铁军.建立完善新型警务运行模式提升公安机关新质战斗力的实践与思考——以湖南省张家界市公安局为例[J].公安教育,2025,(01):16-19.

## **Research on the Role of Public Security Work in the Modernization of Social Governance Syste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Wang Xiaoqian<sup>1</sup>**

<sup>1</sup> North China University of Water Resources and Electric Power, Henan, Zhengzhou 450003, China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role of public security in the process of modernizing the social governance system. Guided by Marxist theories such as the people-centered nature, practicality and developmentalism, it combines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with China's specific national conditions and the reality of social development, and studies the dialectical unity between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and the modernization of public security work. It further analyzes the important functions of public security organs—as the core force for maintaining social stability—in safeguarding people's interests, implementing the mass line, and promoting the innovation of social governance.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social governance system, public security organs, as an important force for safeguarding national security and social stability, play a key role in creating a safer and more comfortable living environment. An in-depth study of the role of public security is of far-reaching significance for improving the efficiency of social governance and building a social governance pattern featuring joint construction, joint governance and shared benefits.

**Keywords:**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Public Security; Modernization of the Social Governance System

# 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出口韧性的影响机制研究

冯珂涵<sup>1</sup> 朱梦奇<sup>1</sup>

(1.南华大学, 湖南 衡阳 421001)

**摘要:** 在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剧、贸易环境复杂多变的背景下, 提升企业出口韧性成为保障外贸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议题。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加速, 为破解出口风险抵御难题提供了新路径。本文基于理论研究视角, 系统界定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出口韧性的核心内涵, 梳理资源基础理论、交易成本理论等核心支撑理论, 深入剖析数字化转型影响企业出口韧性的内在逻辑与作用机制, 并结合企业异质性特征探讨转型效应的差异化表现, 最后提出针对性的理论启示与实践导向。研究表明, 数字化转型通过出口多样化、产品质量升级、贸易成本节约和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四大核心路径赋能企业出口韧性, 且这一影响效应受企业产权性质、规模、研发强度的调节。本文希望可以为企业、政府等主体提供一些理论参考。

**关键词:** 数字化转型; 出口韧性; 影响机制; 理论分析; 企业异质性

**基金项目:** 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 (202510555132)

DOI: doi.org/10.70693/rwsk.v2i3.308

## 引言

当前, 全球经济处于深度调整时期, 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地缘政治冲突持续、供应链重构进程加快等多重外部冲击交织叠加, 我国企业出口面临的不确定性显著上升。海关数据显示, 近年来我国出口市场波动幅度明显加大, 部分行业和企业面临出口订单下滑、市场准入门槛提高、贸易成本上升等诸多挑战。在此背景下, 单纯追求出口规模扩张已难以适应外贸发展新形势, 如何提升企业出口韧性, 即企业抵御外部冲击、维持出口稳定并实现动态调整的能力, 成为学术界与实务界共同关注的核心问题。

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与广泛应用催生了新质生产力, 数字化转型已成为企业突破发展瓶颈、增强核心竞争力的必然选择。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云计算等数字技术与企业生产经营、贸易活动的深度融合<sup>[1]</sup>, 不仅改变了企业的生产方式与管理模式, 更重塑了企业参与国际分工的路径与格局。实践表明, 数字化转型能够帮助企业打破信息壁垒、优化资源配置、提升响应效率, 在应对外部贸易风险时展现出独特优势。然而, 数字化转型究竟如何从理论层面影响企业出口韧性? 其内在的作用逻辑与传导路径是什么? 不同特征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对出口韧性的影响是否存在理论差异? 对这些问题的系统性解答, 有助于构建数字化转型与出口韧性关联的理论框架, 为企业应对出口风险提供理论指引。

现有文献多围绕实证检验展开, 对两者关联的理论基础、内在机制的系统性梳理较为欠缺。本文通过界定核心概念、梳理支撑理论、剖析作用机制与异质性影响, 构建了完整的理论分析框架, 丰富了数字经济与国际贸易韧性领域的理论成果。同时, 本文的分析结论具有重要的实践导向价值。对企业而言, 明确数字化转型影响出口韧性的理论逻辑与核心路径, 能够帮助企业精准把握转型重点, 制定差异化的数字化战略与出口风险应对策略, 提升出口抗风险能力; 对政府而言, 基于理论分析提出的政策启示, 可为制定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稳定外贸基本盘的政策措施提供理论依据, 助力构建更具韧性的开放型经济体系。

## 1 文献综述

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理论内涵源于数字经济理论, 其核心是企业利用数字技术对生产、经营、管理、贸易等全流程进行全方位、深层次改造, 实现数据要素的深度挖掘与高效利用, 推动企业运营效率提升、商业模式创新与核心竞争力增强。从理论本质来看, 数字化转型是企业资源配置方式的根本性变革, 通过将数字技术转化为核心

**作者简介:** 冯珂涵(2005—), 女, 本科在读, 经济学专业;

朱梦奇(2004—), 男, 本科在读, 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

生产要素，打破传统资源配置的时空限制与效率瓶颈，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与高效利用。

现有文献从多个理论视角阐释了数字化转型的核心价值：基于资源基础理论，数字化转型能够为企业积累实质性数字资源，形成独特的竞争优势；基于交易成本理论，数字技术的应用能够降低企业信息不对称程度，减少交易过程中的搜寻成本、谈判成本与履约成本；基于创新理论，数字化转型能够激发企业的技术创新、产品创新与模式创新，推动企业持续提升核心竞争力。这些理论视角为解析数字化转型的核心价值提供了重要支撑，也为探讨数字化转型与出口韧性的关联奠定了理论基础。

出口韧性的概念源于“经济韧性”理论，最早由 Holling (1973) 提出的生态韧性概念延伸而来，后续经学者们不断拓展，逐渐形成了适用于国际贸易领域的理论内涵。现有文献对出口韧性的界定主要围绕“抵御冲击—适应调整—恢复发展”三个核心维度展开，认为出口韧性是出口主体在面临外部不确定性冲击时，维持出口规模稳定、抵御出口下滑，并通过自身调整实现恢复增长甚至提质升级的综合能力<sup>[2][3]</sup>。从理论演进来看，出口韧性理论经历了从宏观层面向微观层面的延伸，早期研究多聚焦国家或区域出口韧性的衡量与影响因素，近年来，随着微观企业数据的可得性提升，学者们开始关注企业层面出口韧性的形成机制与提升路径，认为企业作为出口活动的核心主体，其自身特征与经营决策是影响出口韧性的关键因素。

在出口韧性的理论支撑方面，现有研究主要依托韧性理论、比较优势理论与全球价值链理论。韧性理论为出口韧性的核心内涵与衡量维度提供了基础框架；比较优势理论认为企业通过提升产品竞争力、优化产品结构可增强出口韧性；全球价值链理论则强调企业深度参与全球价值链、优化价值链布局，能够提升应对外部冲击的能力，进而增强出口韧性。

近年来，学者们开始关注数字化转型与出口韧性的理论关联，初步形成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张鹏杨、刘伟刚等 (2023) 从成本节约与效率提升视角出发，认为数字化转型通过降低企业贸易成本、提升运营效率，增强企业应对外部冲击的能力，进而提升出口韧性；魏昀妍、龚星宇等 (2022) 基于创新驱动视角，提出数字化转型能够推动企业产品创新与质量升级，优化出口产品结构，增强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从而提升出口韧性；戴翔、曾令涵等 (2023) 从市场拓展视角指出，数字化转型通过跨境电商等数字贸易平台，帮助企业突破地理限制，拓展新兴出口市场，实现出口市场多样化，进而分散出口风险，提升出口韧性。

现有文献为本文的理论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但仍存在进一步拓展的空间。综合来看，现有研究在出口韧性的内涵界定、数字化转型的核心价值等方面形成了较为一致的认知，但在数字化转型与出口韧性关联的理论框架构建、作用机制剖析、异质性影响分析等方面仍有待深化。本文将基于现有研究成果，系统梳理核心支撑理论，深入剖析数字化转型影响企业出口韧性的内在机制，探讨企业异质性特征的调节作用，构建完整的理论分析体系，弥补现有研究的理论短板。

## 2 核心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2.1 核心概念界定

结合现有理论研究成果，本文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和出口韧性的概念进行了界定。

企业数字化转型是指企业以数字技术为核心支撑，以数据要素为关键生产资料，对生产制造、经营管理、市场开拓、贸易往来等全流程进行全方位、深层次改造与优化的动态过程。其目标是实现数据驱动决策、效率提升、模式创新与竞争力增强，本质是企业资源配置方式、生产经营模式与价值创造路径的根本性变革。

从理论维度来看，企业数字化转型可分为三个核心层面：一是基础层转型，即企业对数字基础设施的投入与建设，包括硬件设备、软件系统的部署与应用，为数字化转型奠定基础；二是应用层转型，即数字技术与企业具体业务流程的深度融合，包括数字化生产、数字化管理、数字化营销、数字化贸易等，实现业务流程的优化与效率提升；三是战略层转型，即企业将数字化理念融入发展战略，以数字化驱动商业模式创新与核心竞争力提升，实现企业可持续发展。这三个层面相互关联、层层递进，共同构成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完整体系。

企业出口韧性是指企业在面临外部不确定性冲击时，能够维持出口规模相对稳定、抵御出口下滑风险，并通过自身调整优化实现快速恢复甚至出口提质升级的综合能力。从理论构成来看，企业出口韧性主要包含三个核心维度：一是风险抵御能力，即企业在外部冲击发生时，维持出口业务稳定、减少出口损失的能力，核心体现为出口规模的稳定性与抗波动性；二是适应调整能力，即企业在面临外部冲击时，快速调整出口策略、优化产品结构与市场布局、适应外部环境变化的能力；三是恢复发展能力，即企业在冲击过后，快速恢复出口规模，并借助冲击带来的转型契机实现出口提质升级、增强长期竞争力的能力。这三个维度相互支撑、有机统一，共同构成企业出口韧性的完整理论内涵。

### 2.2 核心理论基础

资源基础理论由 Wernerfelt (1984) 提出, 该理论认为企业的竞争优势来源于其拥有的异质性资源与核心能力, 企业通过积累与配置独特的资源与能力, 能够在市场竞争中获得持续的竞争优势。资源基础理论为解析数字化转型影响企业出口韧性提供了核心理论支撑: 数字化转型能够帮助企业积累异质性数字资源, 包括数据资源、数字技术资源、数字平台资源等, 这些数字资源具有非竞争性、可重复利用性、边际成本递减等特征, 是企业形成独特竞争优势的重要基础。

从出口韧性视角来看, 企业通过数字化转型积累的数字资源能够转化为核心能力: 一方面, 数据资源的深度挖掘与利用能够帮助企业精准研判国际市场动态, 提前预判外部风险, 提升风险抵御能力; 另一方面, 数字技术资源与平台资源能够帮助企业优化生产运营与贸易流程, 提升适应调整能力与恢复发展能力。因此, 基于资源基础理论, 数字化转型通过为企业积累异质性数字资源、培育核心能力, 进而提升企业出口韧性。

交易成本理论由 Coase (1937) 提出, 该理论认为市场交易过程中存在信息搜寻成本、谈判成本、履约成本、监督成本等各类交易成本, 企业的存在本质上是为了降低市场交易成本。数字技术的发展与应用为降低企业交易成本提供了新的路径, 也为解析数字化转型与出口韧性的关联提供了重要理论视角。

在国际贸易活动中, 企业面临的交易成本更高, 信息不对称、地理距离遥远、制度环境差异等因素均会导致交易成本上升, 进而影响企业出口稳定性。数字化转型通过以下路径降低企业出口交易成本: 一是数字技术能够打破信息壁垒, 降低企业信息搜寻成本, 帮助企业快速匹配国际市场需求; 二是数字化贸易平台能够简化交易流程, 降低谈判成本与履约成本; 三是物联网、区块链等技术能够提升交易过程的透明度与可追溯性, 降低监督成本与违约风险。交易成本的降低能够帮助企业优化出口决策、拓展出口市场、稳定出口业务, 进而提升出口韧性。

创新理论由 Schumpeter (1912) 提出, 该理论认为创新是企业持续发展的核心动力, 企业通过技术创新、产品创新、模式创新等方式, 能够突破发展瓶颈, 获得持续的竞争优势。数字化转型本质上是一种全方位的创新过程, 能够激发企业的各类创新活动, 进而影响企业出口韧性。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新的驱动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数字技术为企业创新提供了新的工具与手段, 如人工智能、大数据能够帮助企业快速挖掘市场需求, 提升创新的精准度; 二是数字化转型推动企业组织模式创新, 扁平化、柔性化的组织架构能够提升创新决策效率, 激发创新活力; 三是数据要素的积累与利用能够为企业创新提供新的素材与思路, 推动技术创新与产品创新。企业通过创新提升出口产品质量与技术复杂度, 优化出口产品结构, 增强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进而在面临外部冲击时能够维持市场份额、快速恢复出口, 提升出口韧性。

韧性理论最早源于生态学领域, 后逐渐延伸至经济学、社会学等多个领域, 其核心内涵是系统在面临外部冲击时, 维持自身稳定、抵御冲击并实现恢复发展的能力。韧性理论为出口韧性的内涵界定、维度划分与影响因素分析提供了直接的理论支撑, 也是解析数字化转型与出口韧性关联的核心理论基础。

从韧性理论视角来看, 企业出口系统是一个复杂的动态系统, 外部冲击是影响系统稳定的重要外部因素, 而数字化转型则是提升系统韧性的重要内部驱动因素。数字化转型通过优化企业出口系统的结构与功能, 提升系统的灵活性、适应性与抗干扰能力: 一方面, 数字化转型能够提升企业出口系统的信息传递效率, 帮助企业快速响应外部冲击; 另一方面, 数字化转型能够推动企业出口系统的多元化发展, 降低系统对单一要素的依赖, 提升系统的抗风险能力; 此外, 数字化转型能够提升企业出口系统的自我修复能力, 帮助企业在冲击过后快速恢复正常运营并实现升级发展。

### 3 数字化转型影响企业出口韧性的作用机制分析

基于上述理论基础, 本文从出口多样化、产品质量升级、贸易成本节约和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四个核心维度, 系统剖析数字化转型影响企业出口韧性的内在作用机制。这四大机制相互关联、协同作用, 共同构成数字化转型赋能企业出口韧性的完整理论逻辑体系。

#### 3.1 出口多样化机制

数字化转型是促进企业出口多样化的重要动力来源<sup>[4]</sup>。出口多样化是指企业通过拓展出口市场范围、优化出口产品结构, 降低对单一市场或单一产品的依赖, 进而分散出口风险的过程。数字化转型通过降低企业拓展新市场、开发新产品的成本与门槛, 推动出口多样化, 进而提升企业出口韧性, 该机制的逻辑可从以下两方面展开:

从市场多样化来看, 传统出口模式下, 企业拓展国际市场面临地理距离遥远、信息不对称、渠道建设成本高、准入门槛高等诸多限制, 导致企业多依赖少数核心市场, 出口风险集中度高。数字化转型通过跨境电商平台、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 为企业拓展国际市场提供了新的路径: 一是数字贸易平台打破了地理空间限制, 企业无需搭建线下渠道即可触达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客户, 显著降低了市场拓展的渠道建设成本; 二是大数据技术能够帮助企业精准挖掘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市场需求特征、消费偏好与准入规则, 降低信息搜寻成本与市场调研

成本,提升市场拓展的精准度;三是数字化营销工具能够帮助企业快速提升品牌知名度,降低市场进入门槛。企业通过数字化转型实现出口市场多样化,当某一市场面临外部冲击时,可通过其他市场的出口增长弥补损失,维持整体出口稳定,提升出口韧性。

从产品多样化来看,传统生产模式下,企业产品研发周期长、成本高,难以快速响应国际市场多样化、个性化的需求,导致出口产品结构单一,抗风险能力弱。数字化转型通过推动柔性生产、提升研发效率,为企业开发多样化产品提供了支撑:一是物联网、工业互联网等技术能够实现生产设备的智能化升级,推动柔性制造,企业可根据市场需求快速调整生产计划,生产多样化、个性化的产品;二是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能够帮助企业快速捕捉国际市场需求变化趋势,为产品研发提供精准的市场导向,缩短研发周期、降低研发成本;三是数字化协同研发平台能够整合企业内部与外部研发资源,提升研发创新能力,推动产品迭代升级。企业通过数字化转型实现出口产品多样化,当某一类产品面临外部冲击时,可通过其他产品出口弥补损失,增强出口稳定性与抗风险能力。

### 3.2 产品质量升级机制

数字技术作为关键的生产要素对提升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产生了积极的影响<sup>[5]</sup>。产品质量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体现,也是影响企业出口稳定性的关键因素。在面临外部冲击时,高质量产品更易获得国际市场认可,维持市场份额,帮助企业快速恢复出口。数字化转型通过优化生产流程、强化质量管控、推动技术创新,实现产品质量升级,进而提升企业出口韧性,这一机制的理论逻辑如下:

首先,数字化转型优化生产流程,提升产品生产的稳定性与一致性。传统生产模式下,生产过程依赖人工操作,易出现生产误差,影响产品质量稳定性。数字化转型通过引入工业机器人、智能生产线、物联网等数字技术,实现生产过程的自动化、智能化与精准化:工业机器人能够替代人工完成重复性、高精度的生产工序,降低人为误差;智能生产线能够实现生产过程的实时监测与动态调整,及时发现并解决生产过程中的质量问题;物联网技术能够实现生产要素的全程追溯,确保生产流程的规范性。生产流程的优化能够显著提升产品质量的稳定性与一致性,增强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

其次,数字化转型强化质量管控,提升产品质量的可靠性。数字化转型通过构建全流程质量管控体系,实现对产品设计、生产、检验、物流等各个环节的质量监测与管控:在产品设计环节,通过数字化仿真技术对产品质量进行预判,提前规避质量风险;在生产环节,通过实时监测系统对生产过程中的关键质量指标进行动态跟踪,及时预警质量问题;在检验环节,通过智能检测设备提升检验效率与精准度,确保不合格产品不流入市场;在物流环节,通过物联网技术对产品运输过程进行全程监控,保障产品运输质量。全流程质量管控体系的构建能够显著提升产品质量的可靠性,增强国际市场客户的信任度与粘性。

最后,数字化转型推动技术创新,提升产品的技术含量与附加值。数字化转型为企业技术创新提供新的工具与思路,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能够帮助企业挖掘技术创新点,提升创新效率;数字化转型积累的海量数据能够为技术创新提供新的素材与支撑,推动核心技术突破;此外,数字化转型能够促进企业与上下游企业、科研机构的协同创新,整合创新资源,提升创新能力。技术创新能够推动产品技术含量与附加值提升,使企业在国际市场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在面临外部冲击时能够凭借产品竞争力维持市场份额,快速恢复出口,提升出口韧性。

### 3.3 贸易成本节约机制

数字化转型有效降低了贸易成本,促进了贸易<sup>[6]</sup>。贸易成本是影响企业出口决策与出口稳定性的重要因素,过高的贸易成本会降低企业出口竞争力,增加出口风险。数字化转型通过降低企业信息搜寻成本、交易成本、生产运营成本等各类贸易相关成本,减轻企业运营负担,提升出口竞争力与稳定性,进而增强出口韧性,这一机制的理论逻辑可从以下三方面展开:

一是降低信息搜寻成本。在国际贸易活动中,信息不对称是导致信息搜寻成本高的核心原因,企业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与资金收集国际市场需求、价格、准入规则等信息。数字化转型通过大数据、跨境电商平台、信息服务平台等数字技术与平台,打破信息壁垒,实现信息的快速传递与共享:企业通过跨境电商平台能够快速获取全球市场的产品需求信息、价格信息与客户信息;通过大数据技术能够对市场信息进行深度挖掘与分析,精准研判市场动态与竞争对手情况;通过政府搭建的数字信息服务平台能够快速获取贸易政策、准入规则等官方信息。信息搜寻成本的降低能够帮助企业精准把握国际市场动态,优化出口决策,减少因信息不对称导致的出口风险。

二是降低交易成本。传统国际贸易交易流程繁琐,涉及合同签订、报关报检、货款结算等多个环节,每个环节都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与资金,导致交易成本居高不下。数字化转型通过简化交易流程、提升交易效率,显著降低交易成本:跨境电商平台整合了交易、报关、报检、物流、结算等多个环节,实现了国际贸易的“一站式”服务,简化了交易流程;电子合同、电子报关、在线结算等数字化工具能够替代传统纸质流程,提升交易效率,降

低谈判成本、履约成本与结算成本；区块链技术能够实现交易信息的不可篡改与全程追溯，提升交易的安全性与透明度，降低违约风险与监督成本。交易成本的降低能够提升企业出口竞争力，帮助企业在面临外部冲击时，通过成本优势维持出口稳定。

三是降低生产运营成本。生产运营成本是企业出口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降低生产运营成本能够提升企业出口盈利能力与抗风险能力。数字化转型通过优化生产运营流程、提升资源利用效率，降低生产运营成本：智能生产系统能够实现生产资源的优化配置，减少资源浪费，提升生产效率；数字化管理系统能够优化企业人力资源、财务管理、供应链管理等流程，提升管理效率，降低管理成本；物联网技术能够实现设备的实时监测与维护，降低设备故障率与维修成本。生产运营成本的降低能够提升企业出口盈利能力，增强企业应对外部冲击的能力，进而提升出口韧性。

### 3.4 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机制

数字化转型可以显著提高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sup>[7]</sup>。全要素生产率是衡量企业生产效率与核心竞争力的核心指标，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能够增强企业的内生发展动力，帮助企业在面临外部冲击时快速恢复生产与出口，进而提升出口韧性。数字化转型通过技术进步、效率提升、资源优化配置等路径，推动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这一机制的理论逻辑如下：

首先，数字化转型推动技术进步，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数字技术本身是一种突破性技术，其与企业生产经营的深度融合能够推动企业技术创新与技术升级：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能够帮助企业突破传统技术瓶颈，推动核心技术创新；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技术能够实现生产设备的智能化升级，提升生产技术水平；数字化协同创新平台能够整合外部技术资源，推动企业技术引进与消化吸收，提升技术创新能力。技术进步是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核心动力，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生产效率与核心竞争力。

其次，数字化转型提升运营效率，推动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数字化转型通过优化企业生产、管理、贸易等各个环节的流程，提升整体运营效率：在生产环节，智能生产线、工业机器人等数字技术能够提升生产效率，缩短生产周期；在管理环节，数字化管理系统能够实现管理流程的优化与标准化，提升管理效率；在贸易环节，数字化贸易工具能够提升出口流程效率，缩短订单交付周期。运营效率的提升能够推动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增强企业的内生发展动力。

最后，数字化转型优化资源配置，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传统资源配置模式下，企业资源配置效率较低，存在资源闲置、配置不合理等问题。数字化转型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实现资源的精准配置：通过大数据技术能够精准挖掘企业内部资源的利用情况，优化资源配置，减少资源闲置；通过人工智能技术能够对市场需求进行精准预判，优化生产资源配置，提升资源利用效率；通过数字平台能够整合外部资源，实现资源的协同共享与优化配置。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能够推动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增强企业应对外部冲击的能力。

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能够增强企业的内生发展动力与核心竞争力，在面临外部冲击时，企业能够凭借较高的生产效率与盈利能力，快速调整生产经营策略，恢复生产与出口，进而提升出口韧性。同时，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还能够推动企业出口提质升级，实现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提升的转变，增强出口韧性的可持续性。

## 4 数字化转型影响企业出口韧性的异质性分析

### 4.1 基于企业产权性质的异质性分析

企业产权性质不同，其数字化转型的资源禀赋、决策效率与风险承担能力存在显著差异，进而导致数字化转型对出口韧性的影响效应存在理论差异，主要体现在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两个维度：

国有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具有明显的资源优势：一方面，国有企业能够获得更多的政策支持与资金扶持，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数字技术研发与应用等方面的投入更有保障；另一方面，国有企业规模较大，产业链整合能力较强，能够更好地推动数字技术与全产业链的深度融合，实现全方位的数字化转型。此外，国有企业的风险承担能力较强，在面临外部冲击时，能够凭借自身资源优势与政策支持，快速调整出口策略，维持出口稳定。因此，从理论来看，数字化转型对国有企业出口韧性的提升效应更为显著。

非国有企业具有决策效率高、市场适应性强的优势，能够快速响应国际市场变化与数字化转型趋势，灵活调整数字化转型策略与出口策略。但非国有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面临更多的资源约束，资金短缺、技术人才不足等问题制约了其数字化转型的深度与广度<sup>[8]</sup>；同时，非国有企业的风险承担能力较弱，在面临外部冲击时，出口业务受影响更大。因此，尽管非国有企业的数字化转型能够提升出口韧性，但受资源约束与风险承担能力的限制，其提升效应弱于国有企业。

## 4.2 基于企业规模的异质性分析

企业规模是影响数字化转型效果与出口韧性的的重要因素，不同规模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基础、资源整合能力与抗风险能力存在显著差异，进而导致数字化转型对出口韧性的影响效应存在理论差异：

大规模企业在数字化转型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一是大规模企业资金实力雄厚，能够投入大量资金用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数字技术研发与应用、数字化人才培养等方面，为数字化转型奠定坚实基础；二是大规模企业产业链布局完善，能够实现数字技术与生产、管理、贸易、供应链等各个环节的深度融合，发挥数字化转型的协同效应；三是大规模企业出口市场覆盖面广、产品结构多元化，抗风险能力较强，数字化转型能够进一步优化其市场布局与产品结构，提升出口韧性。因此，从理论来看，数字化转型对大规模企业出口韧性的提升效应更为显著。

小规模企业具有灵活性高、转型成本低的优势，能够快速推进局部环节的数字化转型，提升出口效率与抗风险能力。但小规模企业面临资金短缺、技术人才不足、资源整合能力弱等问题，难以实现全方位、深层次的数字化转型；同时，小规模企业出口市场相对集中、产品结构单一，抗风险能力较弱，数字化转型对其出口韧性的提升效应受到一定限制。因此，数字化转型对小规模企业出口韧性的提升效应弱于大规模企业。

## 4.3 基于研发强度的异质性分析

研发强度反映了企业的创新能力与技术水平，不同研发强度企业的数字化转型适配性与创新驱动能力存在显著差异，进而导致数字化转型对出口韧性的影响效应存在理论差异：

高研发强度企业的创新能力与技术水平较高，能够更好地适配数字化转型需求：一方面，高研发强度企业能够快速吸收与应用数字技术，推动数字技术与核心技术的深度融合，实现技术创新与数字化转型的协同发展；另一方面，高研发强度企业能够通过数字化转型进一步提升研发效率，推动产品创新与质量升级，增强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此外，高研发强度企业的适应调整能力较强，在面临外部冲击时，能够通过技术创新与产品迭代快速适应市场变化，维持出口稳定。因此，从理论来看，数字化转型对高研发强度企业出口韧性的提升效应更为显著。

低研发强度企业的创新能力与技术水平较低，难以快速吸收与应用数字技术，数字化转型多局限于基础环节，难以实现深层次的转型与创新；同时，低研发强度企业的产品技术含量与附加值较低，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较弱，面临外部冲击时，难以通过产品创新维持市场份额。因此，数字化转型对低研发强度企业出口韧性的提升效应弱于高研发强度企业。

## 5 理论启示与实践导向

### 5.1 企业层面的实践导向

明确数字化转型战略定位，推进全方位、深层次转型。企业应将数字化转型纳入长期发展战略，结合自身业务特征与出口需求，制定差异化的数字化转型方案。不仅要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与基础环节的数字化应用，更要推动数字技术与核心业务的深度融合，实现全方位、深层次的数字化转型，充分发挥数字化转型对出口韧性的提升作用。

聚焦核心作用机制，提升出口抗风险能力。企业应聚焦出口多样化、产品质量升级、贸易成本节约与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四大核心机制，精准推进数字化转型：通过数字化工具拓展新兴出口市场、开发多样化产品，实现出口市场与产品多元化；通过数字化生产与质量管控体系，提升出口产品质量与技术附加值；通过数字化贸易平台与工具，降低贸易成本与运营负担；通过数字化驱动创新，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与核心竞争力。

结合自身异质性特征，制定差异化转型策略。不同特征企业应结合自身产权性质、规模、研发强度与所在区域数字基础设施水平，制定差异化的数字化转型策略：国有企业应充分发挥资源优势，推动全产业链数字化转型，发挥示范引领作用<sup>[9]</sup>；小规模企业可聚焦核心环节，逐步推进数字化转型；高研发强度企业应推动数字技术与技术创新的协同发展，提升产品竞争力；数字基础设施薄弱地区的企业可加强与数字服务提供商的合作，降低数字化转型成本。

加强数字化人才培养与储备，夯实转型基础。数字化人才是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核心支撑，企业应加强数字化人才的培养与储备：一方面，通过内部培训、外部引进等方式，培养一批兼具数字技术与国际贸易知识的复合型人才；另一方面，建立完善的人才激励机制，激发数字化人才的创新活力，为数字化转型提供人才保障<sup>[10]</sup>。

### 5.2 政府层面的政策启示

加大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优化数字化转型环境。政府应加大对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尤其是加强中西部地区、中小城市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网络覆盖范围与传输效率，构建全国一体化的数字基础设施体系。

同时,完善数字贸易生态,加强跨境电商平台、数字物流配送体系、数字金融服务体系建设,为企业数字化转型与数字化贸易提供良好的环境支撑。

出台差异化扶持政策,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政府应结合企业异质性特征,出台差异化的扶持政策:对国有企业,鼓励其发挥资源优势,推进全产业链数字化转型,打造数字化转型示范企业;对中小民营企业,加大资金扶持与税收优惠力度,缓解其数字化转型的资金压力,提供数字化转型培训与指导服务;对高研发强度企业,支持其开展数字技术与核心技术融合创新的研发项目;对数字基础设施薄弱地区,加大政策倾斜与资金投入,提升区域数字基础设施水平。

加强数字技术创新与推广,提升产业数字化水平。政府应加大对数字技术研发的支持力度,鼓励科研机构与企业开展数字技术核心技术攻关,突破技术瓶颈。同时,建立数字技术推广平台,推动成熟数字技术在制造业企业中的应用,提升产业整体数字化水平。此外,加强数字技术标准体系建设,规范企业数字化转型行为,保障数字化转型的质量与安全。

完善数字贸易政策与监管体系,保障企业出口稳定。政府应完善数字贸易相关政策,简化数字化贸易流程,降低数字贸易壁垒,为企业数字化出口提供政策保障。同时,加强数字贸易监管体系建设,规范数字贸易市场秩序,防范数字贸易风险,保障企业数字化出口的安全与稳定。

#### 参考文献:

- [1]李培根,李阳.企业数字化转型对股价信息含量的影响[J].新乡学院学报,2024,41(11):13-20.
- [2]贺灿飞,陈韬.外部需求冲击、相关多样化与出口韧性[J].中国工业经济,2019,(07):61-80.
- [3]刘慧,綦建红.外需冲击下多元化策略如何影响企业出口韧性[J].国际经贸探索,2021,37(12):4-19.
- [4]王墨林,宋渊洋,阎海峰,等.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国际化广度的影响研究:动态能力的中介作用[J].外国经济与管理,2022,44(05):33-47.
- [5]裴长洪,刘斌.中国对外贸易的动能转换与国际竞争新优势的形成[J].经济研究,2019,54(05):4-15.
- [6]张鹏杨,刘维刚,唐宜红.贸易摩擦下企业出口韧性提升:数字化转型的作用[J].中国工业经济,2023,(05):155-173.
- [7]赵宸宇,王文春,李雪松.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J].财贸经济,2021,42(07):114-129.
- [8]申志轩,祝树金,文茜,等.政府数字采购与企业数字化转型[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24,41(05):71-91
- [9]师路岩.数字化转型、人力资本结构与涉农企业高质量发展[D].西北农林科技大学,2025.
- [10]顾宁.数字化转型背景下集团企业资金管控问题研究——以Z集团为例[J].企业改革与管理,2025,(08):128-130.

## Research on the Impact Mechanism of Enterpris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n Export Resilience

Kehan Feng<sup>1</sup>, Mengqi Zhu<sup>1</sup>

<sup>1</sup>*School of Economics, Management and Law, University Of South China, Hunan, Hengyang 421001, China*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increasing global economic uncertainties and a complex, volatile trade environment, enhancing the resilience of enterprises' exports has become a core issue in ensur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foreign trade.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the digital economy and the real economy has accelerated corporat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fering a new pathway to address challenges in resisting export risks. From a theoretical research perspective,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defines the core connotations of corporat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export resilience, reviews key supporting theories such as resource-based theory and transaction cost theory, and provides an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underlying logic and mechanisms through which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ffects export resilience. Furthermore, it explores the differential effects of such transformation based on firms' heterogeneous characteristics, and finally proposes targeted theoretical insights and practical guidance. The study shows that digital transformation enhances export resilience through four core pathways: export diversification, product quality upgrading, trade cost reduction, and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improvement. This effect is moderated by firms' ownership structure, scale, and R&D intensity. This paper aims to provide theoretical references for enterprises, governments, and other relevant stakeholders.

**Keywords:** Digital Transformation; Export Resilience; Influence Mechanism; Theoretical Analysis; Firm Heterogeneity

# 湖南湘江新区科技服务业发展路径研究：创新生态系统视角

陈艳<sup>1</sup> 高晓晓<sup>1</sup> 吴霞<sup>1\*</sup>

(1.湖南大科城博士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 长沙 410200)

**摘要:** 随着全球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迅速演化, 科技服务产业已成为赋能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驱动力量。结合创新生态系统理论, 研究选取湖南湘江新区作为研究对象, 旨在厘清湘江新区创新生态系统构建的形成机理, 同时探讨创新生态系统赋能区域科技服务产业发展的提升路径。此外, 研究基于上述分析, 就发展提升策略及其政策建议进行了提炼与讨论。这不仅拓宽了创新生态系统理论的应用情景与研究边界, 还为区域科技服务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理论依据与管理借鉴。

**关键词:** 创新生态系统; 区域科技服务产业; 发展路径; 湖南湘江新区

DOI: doi.org/10.70693/rwsk.v2i3.323

## 一、引言

在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的时代背景下, 科技创新已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科技服务产业作为连接科技创新与经济转化的重要环节, 是支撑国家创新体系建设、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和区域协同发展的关键力量。它通过提供技术研发、成果转化、知识产权、检验检测、创业孵化、科技金融等多元化服务, 构建起从前沿技术研发到产业化管理实践的关键桥梁, 成为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增长的新引擎<sup>[1]</sup>。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我国具备产业体系完整、创新资源丰富、市场空间广阔等显著特征。这能够激发科技服务产业的发展潜力, 其在优化国家产业结构、加快经济转型升级方面具有重大意义。目前, 我国科技服务产业仍处于由起步向成熟演进的阶段, 其面临着创新资源配置效率不高、专业化水平不足、产学研融合度不够、政策体系和金融支持机制亟待完善等关键问题。因此, 如何系统构建区域科技服务产业的发展路径已成为学术界与实践界的共同关注。创新生态系统理论为科技服务产业发展提供了系统化分析的可能。该理论认为, 创新并非单一主体的孤立活动, 而是由企业、政府、科研机构、高校、金融机构及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在复杂网络中通过资源共享、协同创新和价值共创所共同推动的动态过程<sup>[2]</sup>。创新生态系统的构建有助于促进科技资源的高效流动和要素的优化组合, 从而提升区域科技创新能力和科技服务产业整体竞争力。

作为国家级新区, 湖南湘江新区是湖南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推进科技体制改革的重要试验区。近年来, 新区在政策引导、创新平台建设、科技金融协同和产学研融合等方面取得显著进展, 初步形成了以创新资源集聚、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服务体系完善为特征的区域创新生态。然而, 在科技服务产业高质量发展过程中, 仍存在产业链条协同不够、科技成果转化效率偏低、核心技术创新能力不足等问题。

综上所述, 本文选取湖南湘江新区作为典型案例, 结合创新生态系统理论, 从区域创新生态构建与产业发展互动关系出发, 系统分析其科技服务产业的发展现状及其问题, 并探讨创新生态系统赋能区域科技服务产业的高质量发展路径, 同时提出相应的发展提升策略与政策建议。研究旨在提出相应的发展提升策略与政策建议, 并为区域科技服务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依据与管理借鉴。

## 二、相关研究概要

### (一) 创新生态系统理论

创新生态系统理论是用来描述创新过程中的各种要素及其相互关系的理论框架, 它强调创新并非孤立发生,

**作者简介:** 陈艳(1988—), 女, 硕士, 助理研究员, 研究方向为科技咨询与管理;

高晓晓(1994—), 女, 硕士, 助理研究员, 研究方向为科技服务;

吴霞(1993—), 女, 硕士, 助理研究员, 研究方向为科技服务。

**通讯作者:** 吴霞

而是通过多种要素的协同作用、互动和相互支持在一个复杂的网络中进行<sup>[3]</sup>。该理论来源于生态学的概念，并将其应用到创新活动中，形成了一个包含企业、政府、科研机构、市场等各类主体的互动网络<sup>[4]</sup>。

创新生态系统可以被理解为一个由不同创新主体（如企业、科研机构、政府、资本市场等）以及支持这些主体的资源和机制组成的动态网络<sup>[5]</sup>。这些主体通过相互合作、互动、竞争等多种方式促进创新的产生和扩散。与生态系统中物种间的相互依存类似，创新生态系统中的各个要素也彼此依赖，共同推动创新的演进<sup>[6]</sup>。

创新生态系统的核心要素主要包括创新主体、创新资源、互动协同与制度环境<sup>[7]</sup>。其中，创新主体主要包括企业、大学和科研机构、政府、金融机构等，每个创新主体都在生态系统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sup>[8]</sup>。例如，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和商业化，政府提供政策支持和资源配置，科研机构进行基础研究等。创新资源包括资金、技术、人才、知识、信息等，资源的流动性和有效配置是创新生态系统能够顺利运作的基础<sup>[9]</sup>。互动协同指的是创新生态系统中的不同主体之间并非孤立运作，而是通过知识共享、合作研究、联合开发等多种方式进行协同创新<sup>[10]</sup>。互动和协同是创新生态系统高效运作的核心。而制度环境指的是政府、法律、政策等对创新活动的支持和引导，包括知识产权保护、科技政策、金融支持政策等<sup>[11]</sup>。创新生态系统的健康发展离不开良好的制度保障。

已有研究表明，创新生态系统具有动态性，即它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时间推移不断演化和调整<sup>[12]</sup>。这种动态性主要体现在资源流动、相互依存与反馈机制、开放性与包容性等特征。首先，创新生态系统高水平的动态能力，能够驱动创新要素（如资金、技术、人才等）在不同创新主体之间迅速流动，以推动整个系统的持续发展和进步。其次，创新生态系统中的各个要素相互依存，一方的变化会对其他要素产生影响。AMINULLAH 等便指出，官方政策变化可能会影响企业研发投资，而企业创新成果又能够反馈给科研机构以推动更深入的技术突破<sup>[13]</sup>。此外，创新生态系统不仅具备开放性，而且具备相当程度的包容性。一方面，高水平的开放性能够帮助创新生态系统吸引外部主体及其资源参与（如跨地区、跨国合作），以实现对本地创新资源的补充<sup>[14]</sup>；另一方面，创新生态系统能够包容不同类型的创新主体，从而推动多个主体共同促进区域创新发展<sup>[15]</sup>。

## （二）科技服务产业

科技服务产业是指在知识经济背景下，科技创新服务商运用现代科技知识、技术、分析研究方法，以及经验、信息等要素，提供智力服务的新兴高端服务业，主要包括研究开发及其服务、技术转移服务、检验检测认证服务、创业孵化服务、知识产权服务、科技信息服务、科技金融服务等<sup>[16]</sup>。当前，科技服务产业呈现出知识密集型、高附加值、辐射带动性强、裂变效应巨大等四大显著特征<sup>[1]</sup>。作为高新技术导向的战略新兴产业，科技服务产业已成为科技创新发展的主要驱动力。

首先，科技服务业的发展将不断催生新的业态。发达国家和地区拥有丰厚的科技创新资源，技术进步和变革促进了各创新要素的重组和对接，从而更容易产生新的服务业态和模式<sup>[17]</sup>。大型跨国企业为了降低成本，将一部分业务外包，造就了研发外包、生物 CRO、检测服务等专业领域的市场空间。2009 年以来在国外率先出现众筹的天使投资模式，集众人的资金、能力和渠道，为小企业或个人进行某项活动或项目等提供资金援助。未来还将进一步催生众包、创客、科技博客、创业苗圃等新型商业模式的业态。

其次，科技服务业专业化和集成化并存的趋势越发明显。一方面，科技服务不断向专业化方向发展。近年来，在移动互联、生物医药、节能环保和新材料领域，研发设计、技术转移、创业孵化、知识产权等服务环节出现了一大批专业的新型研发组织和机构，通过整合行业资源，构建专业服务团队，向社会提供专业化的第三方服务<sup>[18]</sup>。另一方面，集成化服务模式是科技服务业发展的重要形态。当前我国科技服务向整个“创新链”拓展，从技术咨询、技术转移、信息服务等单一服务发展到技术熟化、创新创业等综合性服务<sup>[19]</sup>。一部分综合实力较强的科技服务机构围绕产业集群开展研发外包、产品设计、技术交易、创业孵化、科技金融等综合服务为区域经济与科技发展提供集成化的“一站式服务”。

从全球产业发展情况来看，发达国家科技创新的发展离不开科技服务业的繁荣，其科技服务业起步于 19 世纪，至今已有 200 余年历史，科技服务产业作为知识技术密集、增值高、消耗少的新型高端服务业态，发展受到高度重视，现已成为美国等发达国家的主要产业和经济增长点。我国科技服务业总体处于起步阶段，并呈现出较快的增长态势。一方面，国家对科技服务行业的重视程度逐渐提高，相关部门近年来相继出台了支持科技服务业发展的指导性政策。另一方面，社会上已出现一批专业化的科技服务机构，为各行各业提供了更多不同种类的科技服务。因此，下一步发展科技服务业，关键在于改革和创新，要在支持政策方面解放思想、大胆突破，通过思路创新、制度创新和方法创新，摸索出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发展科技服务产业路径。

## 三、湖南湘江新区科技服务产业发展现状

### （一）新区发展现状

湖南湘江新区的成立可追溯至 2008 年前后，随着长株潭城市群的获批以及长沙大河西先导区的设立，这不仅为探讨因地制宜的区域改革路径与创新发展模式提供了试点方案，而且为后续湘江新区的设立奠定了基本条件。2015 年 4 月 8 日，湖南湘江新区正式挂牌成立并投入运行。2022 年，湘江新区、长沙高新区与岳麓区实现“三区合一”行政化管理，同时明确了湘江新区的行政机构与功能定位。作为湖南省唯一的国家级新区，湘江新区不仅能够实现区域协同效应与政策整合能力的有效提升，而且能够深度赋能未来产业技术攻关与地区科技服务产业发展，并为地区打造面向未来全球研发高地奠定坚实的基础。

湖南湘江新区采纳以“区政合一”与“多区域协同”为核心的运营模式，通过设立新区管理委员会就新区的行政、经济与社会事务进行统一管理，以有效地推动区域内政策、资源与发展目标的高度协调。在经济发展方面，自 2019 年起，新区 GDP 持续攀升、稳步增速，并于 2024 年达到 5008.6 亿元，经济总量稳居国家级新区第六位（见图 1）。值得注意的是，湘江新区地区生产总值于 2022 至 2023 年间呈现出陡增变化趋势，其原因是新区发展受到了 2022 年末“三区合一”政策实施的重大影响。这一举措不仅促进了区域经济发展，而且有效形成了区域资源集聚效应，湘江新区亦逐渐成为推动湖南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驱动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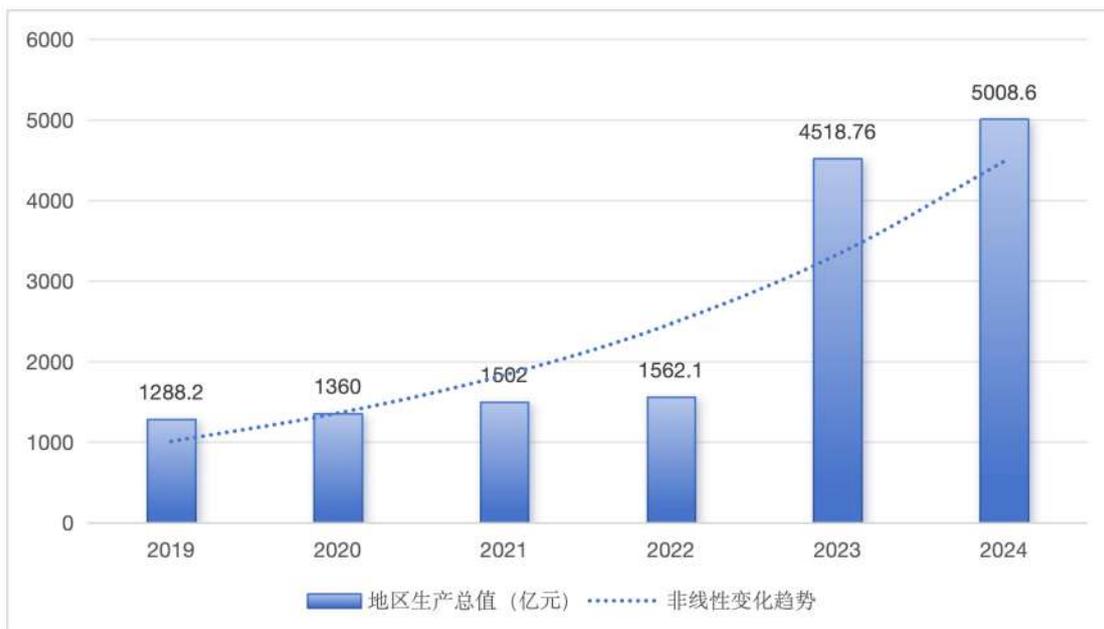


图 1 2019-2024 年湖南湘江新区地区生产总值变化趋势图（单位：亿元）

## （二）新区科技服务产业发展现状

湖南湘江新区不断吸引着科技创新的“源头活水”，科技创新高地建设卓有成效，2021 年实现全年高新技术产业产值比上年增长 14.0%，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增长 12.3%，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为 38%；全年新增高新技术企业 704 家，总数达 2662 家，新入库科技型中小企业 2289 家。此外，新区已包含国家级创新平台 80 余个、省级创新平台 500 余个，新区 2022 年全年完成技术交易合同 3500 余件、交易额超 130 亿元，当年获批全国首批国家级双创示范基地。近年来，依托湖南湘江新区的基础条件，新区在超级计算机、超级工程机械等诸多战略性优势领域取得了显著成果。新一代超级计算机“天河 3 号”的研发进展顺利，国产最大直径盾构机“京华号”投入使用，全球最大吨位起重机、全球最大风电动臂塔机等新产品相继下线，展示了地区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方面的突破。

此外，湘江新区在推动科技创新的同时，着力发展科技服务产业。一方面，湘江新区通过上、中、下游的产业链布局，推动科技服务产业协同发展。在上游，湘江新区注重科技研发和创新成果的转化，依托区域内的高校、科研院所和创新平台，加速科研成果的孵化与产业化；中游则重点建设创新平台和技术攻关基地，为企业提供技术支撑和服务，推动高新技术企业的成长；而在下游，新区则通过发展科技服务平台，推动技术的市场化应用，提供包括技术转移、知识产权服务、科技金融等在内的综合服务，确保科技成果能够在市场上快速落地并产生实际效益。通过这种全方位的产业链布局，湘江新区不仅促进了科技创新的全程支撑，也推动了科技服务产业的集聚和发展。另一方面，新区通过一系列政策支持来加速科技服务产业的创新和发展。2021 年，湘江新区出台了

《关于推进科技创新高地建设的若干政策》，从创新基地建设、科技平台搭建、技术攻关、知识产权服务、科技人才交流等方面给予全方位支持，推动科技服务产业的持续发展。此外，新区还通过知识产权证券化试点和科技金融结合试点园区，推动科技金融与产业发展的深度融合，从而助力企业科技创新和技术成果的转化。通过强力的政策组合与制度支持，不仅能够有效提升新区的科技服务产业竞争力，也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 四、基于创新生态系统驱动的湖南湘江新区科技服务产业发展路径

##### （一）来自湖南湘江新区的创新生态系统构建

创新生态系统理论强调，创新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性过程，不仅需要单一主体的努力，而是依赖于多个主体的协作与互动，包括企业、科研机构、政府、金融机构以及其他社会资源的共同作用<sup>[15][16]</sup>。湘江新区的创新生态系统构建不仅是物理设施建设与积极政策引导，而且是基于多主体交互的资源流动、信息共享和协同创新，其旨在推动区域整体创新能力的有效提升。因此，本文旨在以湘江新区作为典型案例，通过政策牵引、产学研融合、科技金融协同、创新平台建设与创新文化培育等五个方面全面剖析区域创新生态系统的形成。

在政策牵引方面，政府作为创新生态系统的重要参与者之一，在湘江新区的创新生态系统中发挥着引领作用。一方面，政府通过制定一系列支持创新发展的政策文件（如关于加快建设国家科技创新中心的实施意见、强省会战略支持长沙市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等），为新区科技创新提供了坚实且稳定的制度保障。另一方面，政府通过创建科技创新高地、建设创新服务平台等措施，积极推动产业和科研机构的合作，为企业提供创新所需的政策支持 and 资源保障。在创新生态系统中，政府不仅为企业和科研机构提供了政策环境，还通过资金扶持、税收优惠、知识产权保护等措施，构建了一个有利于创新的外部环境。

在产学研融合方面，湘江新区致力于推动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与企业之间的深度合作，以锻造科技创新的源头。科研机构不仅进行基础研究，还积极参与技术的应用研究与转化，推动科研成果进入市场。目前，湖南大学、中南大学等高校通过校企联合项目合作，不断地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为湘江新区的科技服务产业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创新动力。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推动，不仅能够实现科研成果的快速转化，还能够加速技术应用的迭代更新，并为湘江新区创新生态系统注入持续的生命力。

在科技金融协同方面，湘江新区通过建设科技金融服务平台，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与金融资本的深度融合。首先，湘江新区通过设立创新投资基金、科技创新基金等方式，为高科技企业提供融资支持，为其研发和产业化提供资金保障。其次，金融机构还为企业提供股权融资、债务融资等多元化金融服务，以支持企业全生命周期成长与发展。此外，湘江新区还开展了知识产权证券化试点、风险投资支持等措施，其旨在进一步拓宽高科技企业的融资渠道，从而大力促进科技服务产业的积极发展。

在创新平台建设方面，湘江新区高度重视创新载体与服务体系的协同发展，着力打造结构完善、功能互补的创新服务网络。一方面，新区通过系统布局各类科技园区、创新孵化器、重点实验室和技术转移中心，形成了集科研、孵化、转化、应用于一体的创新空间体系。这些创新平台不仅为企业提供研发支撑、技术转移、市场推广等多维服务，还在项目培育、资本对接、品牌建设等方面发挥了综合作用。另一方面，新区致力于打造积极且完善的创新服务体系，其围绕技术支持、人才引进、产业对接、市场开拓等关键环节，建立了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科技服务网络。通过创新平台的系统化建设与功能深化，湘江新区逐渐形成创新资源高效流动、创新要素深度融合的良性生态。

在创新文化培育方面，湘江新区始终将文化建设和高层次人才引进作为创新生态系统的重要支撑。一方面，湘江新区通过举办创新创业大赛、科技论坛、技术交流会等活动，鼓励企业和科研人员勇于探索、敢于创新，其旨在营造开放包容、协同共享的创新环境与良好氛围。另一方面，湘江新区高度重视人才引育并举，通过颁布多项人才支持政策，从科研经费、住房保障、职业发展等方面提供全方位服务，以吸引高端人才集聚。同时，新区依托高校、科研院所和龙头企业，构建了多层次、跨领域的创新人才培养体系，为科技创新持续注入智力动力。

##### （二）创新生态系统赋能区域科技服务产业的提升路径

创新生态系统作为区域创新发展的核心支撑机制，其本质在于构建一个以多主体互动、资源要素流动和价值共创为特征的开放系统。作为推动地区科技发展的重要驱动力量，湘江新区旨在通过政府引导、平台支撑、金融赋能、文化滋养等多维度协同，为区域科技服务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持续动能。在此过程中，湘江新区的科技服务产业呈现出从上游（研究开发和设计服务产业、科技信息服务产业）到中游（技术转移服务产业、知识产权服务产业），再到下游（科技金融服务产业、创业孵化服务产业、检验检测认证服务产业）的产业链条式全方位推动（详情见图2）。

(1) 科技资源集聚与协同创新驱动。湘江新区通过建立多个创新平台以实现大量创新资源的集聚效应。这些平台不仅为科研机构、企业和创新人才提供了协作空间，而且促进了技术、资本、知识和人才的高效流动。创新生态系统的构建会促进区域创新资源实现更为有效的协同创新，并推动科研成果的快速转化与产业化应用，从而助力科技服务产业发展。此外，湘江新区创新平台不仅能够集研发、设计与技术转移为一体，而且能够推动研发和设计服务产业、技术转移产业间的紧密结合。在此过程中，技术转移服务产业能够通过科技信息服务产业的协同发展，以驱动技术研发成果得以快速实现市场化、产品化，从而为区域科技服务产业的应用奠定市场基础。

(2) 推动区域产学研深度融合。湘江新区注重构建产学研紧密合作的创新体系，通过推动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的跨界合作，以推动科技成果的快速转化。企业能够通过与合作伙伴的合作，获取最新的技术研究成果；反之，这也促进科研机构快速实现研究成果的市场化与产业化。这种深度融合不仅能够有效提高技术转化效率，而且得以推动科技服务产业的整体发展。例如，在大数据智能技术研发与应用方面，湘江新区凭借坚实的产学研体系，旨在积极推动区域科技信息服务产业的智能化转型，并运用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以提升科技服务产业的需求匹配与服务效率。此外，对于技术转移和知识产权服务而言，大数据分析技术亦有助于其实现企业技术成果的产权管理优化。这不仅能够促进先进技术的快速研发、应用与流动，而且能够提升科研成果的市场应用效率，从而提升全区域科技服务产业战略的核心竞争力。

(3) 科技金融协同的深度嵌入。创新生态系统通过进一步强化科技金融协同，以推动科技金融与创新生态的深度融合。湘江新区通过建立科技金融服务平台，整合创新投资基金、科技创新基金等金融工具，为科技型企业提供全生命周期的财务支持，以缓解企业在技术研发、市场拓展等方面的融资困境。对于创业孵化服务产业而言，科技金融平台及其工具便能够有效缩短企业技术研发到产品市场应用的运转周期，从而全面提升产业链的整体创新能力。同时，湘江新区旨在强化金融与科技成果转化相结合，利用科技金融推动产业的技术升级和结构调整。这不仅助力企业提升技术创新能力，还促进了科技服务产业的可持续发展，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4) 政策效力增强与创新环境优化。湘江新区通过强化政策支持和优化创新环境，为科技服务产业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在政策层面，湘江新区通过实施一系列创新政策措施（如税收优惠、研发资金支持等），旨在激励企业加大科技投入，推动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对于科技金融服务产业，湘江新区创新生态系统旨在通过加强金融产品创新和完善科技成果转化政策机制，以推动下游创业孵化服务产业的发展。这一系列政策优化，不仅为企业提供了财务与市场支持，还增强了产业链上下游间的协同互动。与此同时，新区注重创新环境的优化，通过简化行政审批流程、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市场监管，以创造更高效的创新生态。这不仅能够有效提升科技服务产业的创新能力，而且为企业可持续发展与区域整体竞争力提升注入了活力。



图2 创新生态系统赋能湖南湘江新区科技服务产业的提升路径

## 五、区域科技服务产业发展的提升策略与政策建议

为进一步推动湖南湘江新区科技服务产业高质量发展，构建高效、开放、协同的区域创新生态体系，新区需对接工信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加快推进科技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在创新驱动、产业集聚、人才引领和政策保障等方面形成系统化提升路径与政策体系。

(1) 强化创新驱动, 完善科技服务产业创新体系。湘江新区应紧密对接《实施意见》的要求, 以创新驱动为核心, 构建高效的科技服务创新生态系统。新区应加快建设国家级创新平台、重点实验室和科研基地, 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 强化高校、科研机构与企业之间的技术协同创新, 促进科技成果转化。鼓励科技服务企业设立研发中心和创新工作室, 在关键技术和前沿领域持续投入研发。同时, 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兴技术, 推动知识产权服务、检验检测服务、科技金融服务等行业的数字化、智能化转型, 形成创新链、产业链和价值链深度融合的科技服务产业体系。新区需深入实施技术创新和科技服务业的智能化、绿色化发展, 助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2) 构建产业集群, 形成科技服务业协同发展格局。根据《实施意见》, 湘江新区应推动科技服务业形成全链条、集群化的发展格局, 注重优化技术市场政策环境和完善服务主体培育。新区应建立健全的科技服务业培育库, 将高校、科研院所、企业和社会机构纳入统一管理与扶持体系, 推动它们在政府项目招标和技术平台建设中成为优先合作对象。围绕知识产权、科技金融、技术转移等核心环节, 强化“龙头企业-专业机构-中小创新主体”的协同创新模式, 促进资源共享、互补发展。同时, 要优化科技园区与大学科技城的协作机制, 支持岳麓山大学科技城、湘江科创基地等重点载体联动发展, 打造多层次、互为支撑的科技服务产业集聚区, 形成集研发、转化、孵化、服务于一体的创新空间网络。

(3) 突出人才引领, 完善创新型人才支撑体系。《实施意见》强调建设专业化科技服务人才队伍, 湘江新区应实施系统化的人才引育计划, 围绕科技管理、知识产权、技术转移、科技金融等领域, 联合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培养专业服务型人才。新区旨在建立多层次、结构化的人才培养体系, 推动区域内科技服务人才的引进、使用、培养和激励机制的优化, 形成动态的管理机制。此外, 通过建设科技服务人才数据库, 新区得以进一步提升区域创新能力与竞争力, 为新区科技服务产业的持续创新注入坚实的人力资本支撑。

(4) 完善科技金融体系, 强化政策激励与风险保障。科技金融是推动科技服务业创新的重要支撑。根据《实施意见》, 湘江新区应拓宽科技型企业的融资渠道, 完善科技成果转化基金、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等金融工具, 增强科技成果转化的资本驱动能力。一方面, 新区通过设立科技服务业发展专项基金, 实施“政府引导+社会资本参与”的投入机制, 重点支持早期创新项目的孵化及科技服务机构的能力建设。另一方面, 新区通过建立科技企业投融资风险补偿机制, 给予种子期、初创期企业创新活动风险补助与政策容忍度, 降低企业创新风险, 激发社会资本进入科技服务领域的积极性。

(5) 优化政策环境, 健全科技服务产业治理体系。湘江新区旨在构建更加科学、透明和高效的科技服务产业治理体系, 以制度创新逻辑推动《实施意见》的实践应用。一方面, 新区通过建立科技服务业发展监测与评估机制, 定期发布产业发展指数和政策绩效报告, 为政府决策提供依据。另一方面, 新区通过完善科技成果转化和知识产权保护制度, 优化政府采购、财政补助与科技项目管理流程, 形成公平、透明的市场环境。这能够有效推动“互联网+政务服务”在科技服务领域的深入应用, 实现行政审批流程的简化与政策执行效率的提升。此外, 新区可以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后补助、税收优惠等方式, 增强政策的可及性与持续性, 为科技服务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

## 参考文献

- [1]徐雨森. 社会知识活动系统中的科技服务产业[J]. 中国科技论坛, 2023, (03): 3.
- [2] PETCHENKO M, TELNOVA H, YAKUSHEV O & KUZMINOVA O. The evolution of the theory of innovation ecosystems in the context of strategisation[J]. Economics Ecology Socium, 2024, 8: 85-97.
- [3]王京, 魏子喻, 高长元. 创新生态系统研究的脉络与展望[J]. 科技与管理, 2021, 23(05): 49-62.
- [4] SHAKIBA H & BELITSKI M. A game theory analysis of regional innovation ecosystems[J]. Journal of Technology Transfer, 2025, 50: 797-820.
- [5] 武建龙, 董阔, 杨仲基, 等. 场景驱动企业颠覆性创新的作用机制研究: 基于创新生态系统视角的双案例分析[J]. 中国软科学, 2024(10): 164-174.
- [6] CHEN W, WANG S & WU X. Concept refinement, factor symbiosis, and innovation activity efficiency analysis of innovation ecosystem[J]. 2022: 1942026.
- [7]洪帅, 吕荣胜. 中国产业创新生态系统研究综述[J]. 经济问题探索, 2017, (05): 38-44+50.
- [8]战睿, 王海军, 孟翔飞. 企业创新生态系统的研究回顾与展望[J].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2020, 41(05): 179-197.
- [9] ADNER R. Match your innovation strategy to your innovation ecosystem[J].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2006, 84(4): 98.

- [10]徐莹莹,孙晖,吕希琛.平台型创新生态系统下多主体知识共享行为演化模式研究[J].科技与管理,2022,24(04):41-55.
- [11] LI Y & HUANG X. Research on the impact of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FDI and net export on international entrepreneurship[J]. Finance Research Letters, 2023, 53: 103653.
- [12] WANG P. Connecting the parts with the whole: Toward an information ecology theory of digital innovation ecosystems[J]. MIS Quarterly, 2021, 45(1): 397-422.
- [13] AMINULLAH E. STI policy and R&D governance for the attainment of SDGs: Envisioning the Indonesia's future[J]. Asian Journal of Technology Innovation, 2020, 28(2): 204-233.
- [14] XIONG B, KUAN L E T, TAN C, et al. Towards an evolutionary view of innovation diffusion in open innovation ecosystems[J]. Industrial Management & Data Systems, 2022, 122(8): 1757-1786.
- [15] WU R, WANG Z & SHI Q. Increment of heterogeneous knowledge in enterprise innovation ecosystem: An agent-based simulation framework[J]. Complexity, 2021: 9550232.
- [16]王吉发,敖海燕,陈航.基于创新链的科技服务业链式结构及价值实现机理研究[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5,32(15):59-63.
- [17] SUN S L & LEE R P. Enhancing innovation through international joint venture portfolios: From the emerging firm perspective[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arketing, 2013, 21(3): 1-21.
- [18]李焯,张广海.一二产业升级的现实出路——基于与科技服务产业深度融合研究[J].科学管理研究,2018,36(02):39-42.
- [19]郑莹,程美逸.科技服务空间扩散对本地产业演化的影响——基于我国专利代理行业的证据[J].科技管理研究,2025,45(01):136-145.

## 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Path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ervice Industry in Xiangjiang New Area, Hunan Provi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novation Ecosystem

Yan Chen<sup>1</sup>, Xiaoxiao Gao<sup>1</sup>, Xia Wu<sup>1\*</sup>

<sup>1</sup>Hunan Universit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ity Doctor-Technology Co., Ltd., Changsha 410200,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evolution of the global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ervice industry has become a key driving force for empowering regional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Combining the theory of innovation ecosystem, this study selects Xiangjiang New Area in Hunan Province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iming to clarify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the innovation ecosystem's construction in Xiangjiang New Area, and at the same time explore the improvement path for the innovation ecosystem to empower the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ervice industries. In addition, based on the above analysis, this study has refined and discussed the improvement strategies as well as their policy recommendations. These results not only broaden the application scenarios and research boundaries of the innovation ecosystem theory, but also provide valuable theoretical basis and management reference for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ervice industries.

**Keywords:** Innovation Ecosystem; Reg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ervice Industry; Development Path; Xiangjiang New

# 利己与利他的双重驱动：体育迷的价值共创公民行为测度 ——以中国排球超级联赛为例

杨佳宇<sup>1</sup> 潘峰<sup>1</sup>

(1.广州体育学院, 广东 广州 510500)

**摘要:** 随着体育赛事日益依赖体育迷的深度参与互动, 体育迷已成为赛事品牌价值共创的重要主体。基于利己与利他动机的双重驱动视角, 本研究运用文献研究与问卷调查方法, 对中国排球超级联赛球迷的价值共创公民行为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 (1) 体育迷的公民行为受到利己与利他动机的共同驱动, 且利他动机水平显著高于利己动机; (2) 在四类公民行为中, 反馈、帮助与包容三类行为表现更为突出, 明显优于宣传行为; (3) 两种动机对帮助行为均具有最大影响效应, 呈现出动机-行为匹配的显著特征; (4) 总体而言, 利他动机对各类公民行为的影响效应均高于利己动机。本研究通过揭示动机驱动下的行为分异规律, 拓展了价值共创研究在体育情境中的适用边界, 为体育赛事管理者实施动机识别与行为引导策略提供了新的实证依据。

**关键词:** 体育迷; 品牌价值共创; 利己动机; 利他动机; 公民行为

DOI: doi.org/10.70693/rwsk.v2i3.329

## 1 引言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发展体育竞赛表演产业的指导意见》中提出体育竞赛表演产业是体育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积极推进体育竞赛表演产业专业化、品牌化、融合化发展<sup>[1]</sup>。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驱动下, 体育赛事品牌价值的生成机制正由企业主导的单向传递, 向利益相关者深度参与的价值共创体系演进。作为赛事核心利益相关者, 体育迷的角色逐渐从被动消费者转变为主动价值共创者, 其参与行为既包含满足个体需求的利己动机, 也隐含着支持社群、推动体育文化发展的利他倾向。

然而, 现有研究多聚焦于商业品牌领域的价值共创, 对体育赛事场景下利己与利他双重逻辑的交互作用及其对行为的影响机制仍缺乏系统性探讨。随着社交媒体等数字平台的兴起, 赋予了普通体育迷参与体育赛事品牌建设、实现品牌价值共创的可能。中国排球超级联赛(CVL)作为国内顶级职业排球赛事, 近年来面临品牌价值提升与球迷黏性不足的双重挑战, 为探究这一议题提供了典型样本。基于此, 本文拟构建一个包含利己与利他动机双重驱动的分析框架, 从反馈、宣传、帮助与包容四个维度测度体育迷的价值共创公民行为, 探讨动机结构与行为表现之间的匹配关系。研究旨在回答以下三个核心问题: 体育迷参与赛事品牌价值共创的行为主要受到何种动机的驱动, 利己与利他动机是否存在显著差异? 在价值共创的不同维度中, 体育迷的行为表现有何特征, 是否存在优先偏好与参与差异? 利己与利他动机如何分别影响不同类型的共创行为, 是否存在动机-行为之间的匹配关系? 这些问题亟待理论与实践的回应。

## 2 文献回顾

### 2.1 价值共创理论的演化进程

品牌价值共创(Value Co-Creation)作为品牌管理领域的前沿议题, 其理论演进经历了从理念萌芽到体系构建的范式转型。学界围绕价值共创的核心要义展开多维视角的探索, 逐步形成具有解释力的理论框架。其中, Prahalad与Ramaswamy(2004)突破传统企业中心论, 在战略管理层面首创顾客体验导向的价值共创理论<sup>[2]</sup>, 这

**作者简介:** 杨佳宇(2002—), 男,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体育教育训练学;

潘峰(1974—), 男, 博士, 副教授, 研究方向为体育教育训练学。

**通讯作者:** 潘峰

一范式创新标志着价值创造主体由企业主导向多元协同的重要转变,由此开启价值共创研究的理论觉醒期。

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理论突破来自 Vargo 和 Lusch (2004) 提出的服务主导逻辑 (Service-Dominant Logic), 该理论系统重构了价值创造的基本范式: 其一, 解构传统商品主导逻辑, 揭示价值本质的动态共创属性; 其二, 确立顾客作为“操作性资源” (Operant Resources) 的主体地位, 颠覆被动接受者的角色预设; 其三, 构建“企业-顾客”协同价值网络, 阐明互动、体验与情境在价值生成中的核心作用<sup>[3]</sup>。这一理论体系不仅为品牌价值共创研究奠定本体论基础, 更推动学术研究从价值传递到价值共生的认知跃迁, 引发全球学界对品牌价值生成机制的持续性理论探索与方法论革新。

## 2.2 体育赛事与价值共创研究进展

### 2.2.1 体育赛事品牌的价值共创

体育赛事作为体育产业的核心构成要素, 其营销价值研究始终是体育管理领域的重点议题。在价值共创理论视角下, 国外学界较早展开系统性探索并取得突破性成果。Woratschek 等 (2014) 开创性地将服务主导逻辑 (S-D logic) 引入体育研究场域, 构建的体育价值框架 (SVF) 为解析体育领域的价值共创机制提供了重要理论工具<sup>[4]</sup>。Grohs 等 (2020) 突破性地指出, 体育赛事本身并不直接创造价值, 而是通过构建参与者网络整合资源的基础平台来实现价值共创<sup>[5]</sup>。这一论断将研究视角从赛事本体转向关系网络, 显著拓宽了理论边界。

相较于国外较为成熟的学术积淀, 国内相关研究呈现差异化发展特征。根据中国知网 (CNKI) 文献数据库检索结果显示, 现有成果多聚焦体育旅游服务场景, 针对体育赛事品牌的价值共创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段艳玲等 (2018) 从资源整合视角切入, 建构了本土体育品牌资产培育模型, 创新性地论证了品牌价值共创过程中多元主体协同运作的内在机理<sup>[6]</sup>。李鑫等 (2024) 的最新研究则突破传统分析框架, 运用价值共创理论解构中国排球超级联赛各利益主体的博弈关系<sup>[7]</sup>, 为职业赛事治理提供了新的方法论启示。

### 2.2.2 体育迷的价值共创行为

体育迷作为赛事价值共创的核心主体, 其在价值共创中的行为也受到了广泛关注。Kolyperas 等 (2019) 则通过案例揭示球迷作为“同化者”、“适应者”和“认证者”的多元角色及自主创造价值的行为<sup>[8]</sup>。Kim 等 (2020) 的实证研究更具创新性, 在体育场景中同时验证了顾客间互动 (C2C) 的价值共创与共灭效应, 进一步拓展了 S-D 逻辑的应用维度<sup>[9]</sup>。

国内关于体育迷的价值共创行为的研究虽起步较晚, 但肖婧莹和周良君 (2021) 对体育服务情境下的价值共创进行综述, 基于客户的价值共创行为 (Yi 和 Gong, 2013), 提出在观赏型体育活动中, 球迷的仪式化行为 (如助威、服饰展示) 和公民行为 (如口碑推荐、互助互动) 是价值共创的重要形式<sup>[10,11]</sup>。随后, 王文龙等 (2025) 以 CBA 俱乐部为例, 聚焦虚拟品牌社区, 发现球迷通过互动、内容创作和情感投入与俱乐部共同创造价值, 提升品牌亲和力与商业价值<sup>[12]</sup>。然而, 现有成果对体育迷参与动机的探讨仍显不足, 尤其缺乏对利己与利他动机双重驱动机制的系统性分析。

## 2.3 价值共创行为的利己与利他动机研究

个体参与价值共创的动机机制是学界关注的核心命题。个体行为通常受到多种动机的驱动, 其中利己动机和利他动机是最常见的两种动机类型。前者指向个体通过参与行为满足自身需求的功利性目标, 后者则强调以促进他人或群体利益为导向的公益性目标。然而, 学界对这两种动机在价值共创情境中的具体作用机制仍缺乏系统性研究。

在理论建构方面, Saha 等人 (2021) 主张采用自我决定理论解释价值共创动机的形成机理<sup>[13]</sup>。该理论框架强调内在心理需求的满足是驱动个体持续参与的核心要素<sup>[14]</sup>。Meyer 和 Gagen (2008) 的实证研究为此提供了佐证: 当消费者的基本心理需求 (自主性、胜任力和归属感) 与自我利益 (经济回报或技能提升) 实现协同满足时, 其参与价值共创的积极性显著提升<sup>[15]</sup>。这实质上揭示了利己动机在价值共创中的基础性作用。早期研究已揭示动机类型的场景特异性特征。Roberts 等 (2014) 针对游戏产业的开创性研究发现, 消费者在独立创新 (开发者主导的功利性共创) 与社区协作 (玩家驱动的公益性共创) 两类场景中, 分别呈现出显著的利己与利他动机分化<sup>[16]</sup>。这种二元分类机制为后续研究提供了重要启示。在此基础之上, Bettiga 等 (2018) 通过 MOA (动机-机会-能力) 框架对虚拟社群的延伸分析发现, 数字环境中的利他动机对持续参与行为的预测效力, 较传统利己动机具有显著优势<sup>[17]</sup>。上述研究多聚焦非体育领域, 体育迷参与赛事价值共创的动机机制, 尚未形成成熟理论框架, 国内针对排球等特定赛事类型的实证研究更属空白。

### 2.3 文献述评

现有文献虽为体育赛事品牌价值共创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石与局部经验,但存在以下方面的局限性:其一,国内赛事品牌价值共创研究仍处于理论移植阶段,缺乏本土化理论建构;其二,体育迷参与动机的研究尚未突破单一维度驱动范式,对利己与利他动机的协同效应及情境依赖性缺乏深入阐释,且对体育迷共创行为的分类测度与差异分析仍显不足;其三,针对排球等非篮球、足球主流项目的研究严重不足,难以覆盖中国体育赛事的多元生态。本研究以中国排球超级联赛为切入点,构建利己与利他双重驱动的行为测度模型,既回应学界对体育场景动机机制的探索需求,亦为小众赛事的品牌价值提升提供差异化解决方案,兼具理论拓新与实践指导意义。

### 3 研究方法

#### 3.1 被试

本研究选取中国排球超级联赛球迷进行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 218 份,回收问卷 218 份,剔除无效问卷 16 份,最终有效问卷 202 份,有效率为 93%。有效样本量中,男性 104 人 (51%),女性 98 人 (49%)。

#### 3.2 研究工具

##### 3.2.1 利己与利他动机量表

基于 Siem B 和 Stürmer S 的编制的利己与利他动机的量表<sup>[18]</sup>,结合本研究,测量球迷支持中国排球超级联赛的利己与利他动机水平。问卷共 8 个题项,包含利己和利他题项各 4 个。采用五级计分,其中 4 个正向计分题项:1 代表非常不同意,5 代表非常同意;4 个反向计分题项:1 代表非常同意,5 代表非常不同意。得分越高,表明利己或利他动机的水平越高。本研究利己量表的 Cronbach's  $\alpha$  系数为 0.673,利他量表的 Cronbach's  $\alpha$  系数为 0.656。

##### 3.2.2 体育迷的公民行为量表

体育迷的公民行为量表改编自 Yi 和 Gong 的客户价值共创行为量表中的公民行为部分<sup>[11]</sup>,包含 4 个维度,分别为反馈 (Feedback)、宣传 (Advocacy)、帮助 (Helping) 和包容 (Tolerance),共计 13 个题项。采用五级计分,均为正向计分,哪个维度得分越高,则代表体育迷该种公民行为表现越强。本研究该量表四个维度的 Cronbach's  $\alpha$  系数分别为:反馈 0.7,宣传 0.799,帮助 0.655,包容 0.732。

### 4 结果与分析

#### 4.1 共同方法偏差

由于本研究使用的数据均来源于被试的自我报告,可能存在共同方法偏差。为了控制可能存在的共同方法偏差,在调查中,问卷部分项目采用反向表述,问卷匿名填写。通过 Harman 单因子检验法检验,未旋转情况下,第一个因子解释了总方差变异的 35.289%,远小于 40%的检验标准。因此,本研究不存在共同方法偏差。

#### 4.2 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

Pearson 相关分析结果发现(见表 1),体育迷的利己动机、利他动机、反馈行为、宣传行为、帮助行为及包容行为均存在显著正相关。对体育迷的利己动机和利他动机进行配对样本 T 检验,得出两种动机之间存在非常显著性差异,并且利他动机水平显著高于利己动机水平。

重复测量方差分析显示,行为意向在四种行为(反馈、宣传、帮助和包容)之间存在显著差异。由于 Mauchly 球形度检验显著 ( $W=0.835, p < .001$ ),说明球形度假设不成立,因此使用 Greenhouse-Geisser 校正 ( $\epsilon=.893$ )。校正后,差异仍显著,  $F(2.68, 538.42) = 8.60, p < .001$ 。对体育迷群体在反馈、宣传、帮助和包容四种行为的平均得分进行事后成对比较分析,结果显示反馈行为的得分显著高于宣传和包容行为 ( $p < .01$ ),但与帮助行为无显著差异 ( $p=.287$ )。帮助行为与包容行为得分差异不显著 ( $p=.522$ ),但均显著高于宣传行为 ( $p < .01$ )。宣传行为得分显著低于其他三种行为。综上,体育迷在四种行为上的表现顺序为反馈 ~ 包容 ~ 帮助 > 宣传,表明他们在宣传行为上的表现相对最差,在其他三项都有着更突出的表现。

表 1 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结果 (n=202)

| 变量     | <i>M</i> ± <i>SD</i> | 1       | 2       | 3       | 4       | 5       | 6 |
|--------|----------------------|---------|---------|---------|---------|---------|---|
| 1.利己动机 | 3.14 ± 0.72          | —       |         |         |         |         |   |
| 2.利他动机 | 4.25 ± 0.47          | 0.401** | —       |         |         |         |   |
| 3.反馈行为 | 4.14 ± 0.59          | 0.322** | 0.489** | —       |         |         |   |
| 4.宣传行为 | 3.96 ± 0.71          | 0.377** | 0.623** | 0.603** | —       |         |   |
| 5.帮助行为 | 4.08 ± 0.58          | 0.413** | 0.656** | 0.623** | 0.739** | —       |   |
| 6.包容行为 | 4.10 ± 0.58          | 0.305** | 0.445** | 0.591** | 0.506** | 0.610** | — |

注: *M* 为平均值, *SD* 为标准差; \*:  $p < 0.05$ ; \*\*:  $p < 0.01$ , \*\*\*:  $p < 0.001$ , 下同。

### 4.3 利己和利他动机与公民行为各维度的路径分析

采用 AMOS22.0 统计软件对体育迷的利己、利他动机与其公民行为各维度的路径分析, 得出  $CMIN/DF = 21.582$ ;  $GFI = 0.939$ 、 $NFI = 0.924$ 、 $IFI = 0.927$ 、 $CFI = 0.926$ , 四项指数均大于 0.9, 综合这些指标, 可以认为模型的拟合效果良好。检验结果 (图 1) 为最终显示模型, 实线代表显著路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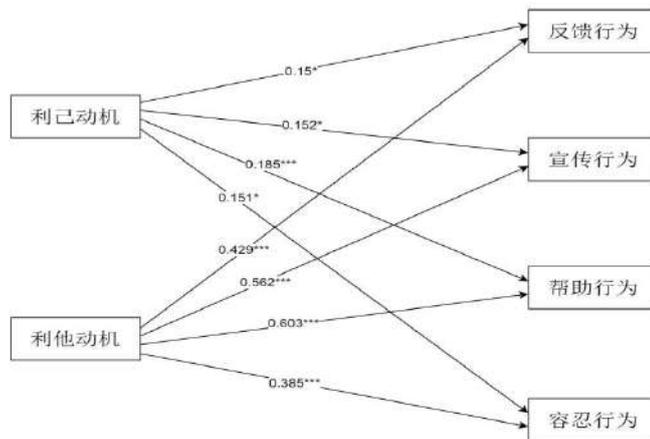


图 1 体育迷利己与利他动机对公民行为影响模型路径图

根据模型各变量及测量项之间的影响系数 (表 2), 参照标准化系数和显著性, 利己动机和利他动机对四种行为均有显著正向影响。其中利己动机对帮助行为的影响效应最大 (标准化系数为 0.185), 利他动机也对帮助行为的影响效应最大 (标准化系数为 0.603)。体育迷基于 Bootstrap 方法检验两种动机对同种行为的效应是否具有显著性差异, 设置 Bootstrap 次数为 5000, 置信区间为 95%。结果发现 (表 3), 利他动机对四种行为的影响都显著大于利己动机。

表 2 模型各变量及测量项之间的影响系数

| 自变量  | 因变量  | <i>Estimate</i> | <i>S.E.</i> | <i>C.R.</i> | <i>P</i> | 标准化系数 |
|------|------|-----------------|-------------|-------------|----------|-------|
| 利己动机 | 反馈行为 | 0.123           | 0.054       | 2.262       | 0.024    | 0.15  |
|      | 宣传行为 | 0.149           | 0.058       | 2.56        | 0.01     | 0.152 |
|      | 帮助行为 | 0.145           | 0.043       | 3.35        | <0.001   | 0.185 |
|      | 包容行为 | 0.121           | 0.055       | 2.211       | 0.027    | 0.151 |
| 利他动机 | 反馈行为 | 0.531           | 0.082       | 6.472       | <0.001   | 0.429 |
|      | 宣传行为 | 0.835           | 0.088       | 9.47        | <0.001   | 0.562 |
|      | 帮助行为 | 0.717           | 0.066       | 10.945      | <0.001   | 0.603 |
|      | 包容行为 | 0.469           | 0.083       | 5.65        | <0.001   | 0.385 |

表 3 路径系数差异的 Bootstrap 检验结果 (N=5000)

| 路径对比           | Estimate | Bootstrap 95% CI |        | p      |
|----------------|----------|------------------|--------|--------|
|                |          | Lower            | Upper  |        |
| 利己→反馈 vs 利他→反馈 | -0.409   | -0.662           | -0.12  | <0.001 |
| 利己→宣传 vs 利他→宣传 | -0.686   | -0.927           | -0.415 | <0.001 |
| 利己→帮助 vs 利他→帮助 | -0.572   | -0.762           | -0.37  | <0.001 |
| 利己→包容 vs 利他→包容 | -0.348   | -0.552           | -0.123 | <0.001 |

## 5 结论与讨论

### 5.1 结论

本研究通过对 202 名中国排球超级联赛球迷的问卷调研, 数据分析发现: (1) 体育赛事品牌价值共创存在双重驱动机制: 体育迷的参与行为同时受到利己动机与利他动机的显著影响, 但体育迷的利他动机水平显著高于利己动机水平; (2) 体育迷的四种价值共创公民行为中, 反馈、帮助和包容三类行为表现突出且水平相当, 都明显优于宣传行为的实践表现; (3) 利己动机对帮助行为的标准化效应值最大, 利他动机同样以帮助行为为最高影响靶点, 二者均呈现动机-行为匹配的层次性特征。 (4) 利他动机对四类公民行为的影响效应显著高于利己动机。

### 5.2 讨论

本研究在揭示体育迷价值共创行为的双重动机驱动机制基础上, 进一步丰富了体育赛事品牌共创领域的理论构建, 并对未来的赛事运营管理提供了可行的路径建议。以下从三个维度进行深入讨论: 双重动机的社会文化根源、公民行为的层级表现与匹配路径, 以及品牌共创策略的优化路径。

#### 5.2.1 双重动机的社会文化根源

利他动机在本研究中表现出显著优势, 体现出体育迷在品牌共创中更倾向于基于情感连接与社会责任进行行为投入。这一现象可从中国文化背景与体育社群结构中找到解释。中国文化长期受到集体主义和儒家伦理的深刻影响, 强调个体对群体的责任与义务。在这种价值观主导下, 体育迷更容易将自身行为与集体利益联系起来, 将支持球队、维护赛事品牌视为一种社会性承诺。另一方面, 随着中国排球超级联赛职业化程度提升, 球队与球迷之间形成了稳定的关系网络和共鸣机制, 进一步增强了球迷的社群归属感和品牌认同度。

此外, 当前中国社会正处于从“物质消费”向“精神消费”转型的阶段<sup>[19]</sup>, 越来越多的个体寻求通过参与体育、文化等活动来实现意义型消费。在此背景下, 体育迷在品牌共创中表现出更强的利他取向, 实质上是一种意义追求的体现。这种动机的转变对未来的体育营销策略提出了更高要求, 即如何将品牌叙事与社群文化深度融合, 激发粉丝的道德共鸣与文化自豪感。

#### 5.2.2 公民行为的层级表现与匹配路径

本研究指出反馈、帮助、包容三类行为水平显著高于宣传行为, 反映出体育迷更倾向于在内部互动与关系维护中发挥作用。这一行为层次差异提示我们, 球迷行为并非单一维度的反应, 而是具有多层次、递进性和匹配性的社会性行为体系。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 帮助行为成为动机-行为匹配性最强的共创形式。这表明, 帮助行为在利己与利他动机之间构建了某种桥梁功能——既可满足球迷自我价值实现的心理需求, 也体现了对社群的责任与支持。因此, 赛事组织者可将帮助行为作为品牌共创的突破口, 打造具有强参与感和可见贡献感的互动机制, 如球迷志愿者计划、运营共建平台等, 从而提升共创的深度与粘性。

此外, 宣传行为的相对滞后表现则反映出当前赛事品牌在内容传播与外向激励方面存在不足。多数球迷尚未形成将赛事品牌主动扩散至其社交圈层的积极性, 这既可能源于传播内容吸引力不强, 也可能反映了球迷缺乏外向行为的激励机制。因此, 应优化宣传行为的情境嵌入方式与奖励机制, 如通过社交平台打卡、内容共创挑战赛、粉丝传播积分制度等形式, 提升球迷参与外向表达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 5.2.3 品牌共创的管理启示与优化路径

基于研究结论, 以下几方面是值得赛事组织者重点考虑的策略方向:

## (1) 激发利他情感, 强化品牌文化建构

利他动机是推动体育迷参与共创的核心驱动力, 应通过深化品牌文化、社群仪式感与情感叙事等方式, 不断强化体育迷的情感绑定与道德认同, 提升球迷的集体承诺感。例如, 可围绕俱乐部历史、地域情怀、球员成长故事、等元素构建品牌叙事, 强化“与球队共同成长”的归属感与荣誉感。

## (2) 提升利己回报, 构建差异化激励机制

尽管利己动机水平相对较低, 但其对部分行为仍具关键驱动作用。赛事组织者可引入更为精细化的激励制度, 如积分兑换、定制化周边、专属权益等, 满足不同球迷的个性化需求, 为球迷提供即时的情感或物质回报, 促进长期参与动能的积累, 实现利己与利他动机的协同驱动。

## (3) 深化共创场景设计, 优化行为引导路径

针对球迷在不同类型公民行为中的参与倾向, 应开发层次分明、形式多样的共创参与场景。例如, 为反馈行为搭建官方互动平台、为包容行为设置规则调解机制、为宣传行为提供内容共创工具与传播激励等, 最大限度激发球迷在不同层面的参与潜力。

## 5.3 结语

本研究以中国排球超级联赛球迷为例, 系统分析了体育迷在赛事品牌价值共创中的动机差异与行为表现, 指出了“利己-利他”双重动机驱动下的行为匹配路径, 并对四类价值共创公民行为的差异性提供了实证支持。研究不仅深化了价值共创理论在体育管理领域的本土化应用, 也为赛事组织者优化品牌建设策略提供了理论依据与实践指南。

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扩展研究对象与场景变量, 比较不同类型体育项目(如足球、篮球、电子竞技等)中体育迷的动机结构异同、职业化程度、地域文化背景等变量对价值共创机制的影响, 以丰富体育品牌建设的理论体系与实践策略。同时也可引入纵向追踪或行为观察方法, 探索体育迷价值共创行为的演化机制与持续参与的影响因素, 从而推动体育赛事品牌价值共创研究迈向更深层次的理论建构与实践指导。

## 参考文献:

- [1] 中国政府网.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体育竞赛表演产业的指导意见[EB/OL]. (2018-12-11)[2025-04-16]. [https://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8-12/21/content\\_5350734.htm](https://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8-12/21/content_5350734.htm).
- [2] Prahalad C K, Ramaswamy V. The future of competition: Co-creating unique value with customers [M]. Harvard Business Press, 2004.
- [3] Vargo S L, Lusch R F. Service-dominant logic: continuing the evolution[J]. Journal of the Academy of marketing Science, 2008, 36: 1-10.
- [4] Woratschek H, Horbel C, Popp B. The sport value framework – a new fundamental logic for analyses in sport management[J]. European Sport Management Quarterly, 2014, 14(1): 6-24.
- [5] Grohs R, Wieser V E, Pristach M. Value cocreation at sport events[J]. European Sport Management Quarterly, 2020, 20(1): 69-87.
- [6] 段艳玲, 何燕. 基于资源整合视角的我国体育品牌资产构建研究[J]. 沈阳体育学院学报, 2018, 37(04): 29-33.
- [7] 李鑫, 崔英敏, 刘漪, 等. 价值共创视角下中国排球超级联赛利益主体的博弈研究[J]. 天津体育学院学报, 2024, 39(02): 211-216.
- [8] Kolyperas D, Maglaras G, Sparks L. Sport fans' roles in value co-creation[J]. European Sport Management Quarterly, 2019, 19(2): 201-220.
- [9] Kim K, Byon K K, Baek W. Customer-to-customer value co-creation and co-destruction in sporting events[J]. The Service Industries Journal, 2020, 40(9-10): 633-655.
- [10] 肖婧莹, 周良君. 体育服务情境下的价值共创研究进展及展望[J]. 体育学刊, 2021, 28(03): 84-90.
- [11] Yi Y, Gong T. Customer value co-creation behavior: Scale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J].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2013, 66(9): 1279-1284.
- [12] 王文龙, 崔佳琦, 邢金明, 等. 数字化转型背景下 CBA 俱乐部虚拟品牌社区建设的价值意蕴、现实困境及实践进路[J]. 山东体育学院学报, 2025, 41(02): 64-73.
- [13] Saha V, Goyal P, Jebarajakirthy C. Value co-creation: a review of literature and future research agenda[J]. Journal of Business & Industrial Marketing, 2022, 37(3): 612-628.
- [14] Deci E L, Ryan R M. The empirical exploration of intrinsic motivational processes[M]//Advances in e

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Academic Press, 1980, 13: 39-80.

[15] Meyer J P, Gagne M. Employee engagement from a 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perspective[J]. Industrial and organizational psychology, 2008, 1(1): 60-62.

[16] Roberts D, Hughes M, Kertbo K. Exploring consumers' motivations to engage in innovation through co-creation activities[J]. European Journal of Marketing, 2014, 48(1/2): 147-169.

[17] Bettiga D, Lamberti L, Noci G. Investigating social motivations, opportunity and ability to participate in communities of virtual co-creation[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nsumer studies, 2018, 42(1): 155-163.

[18] Siem B, Stürmer S. Attribution of egoistic versus altruistic motives to acts of helping[J]. Social Psychology, 2018.

[19] 朱高林.从不平衡到平衡:发挥消费基础性作用的路径分析[J].社会科学,2019,(01):44-54.

## **The Dual Drive of Egoism and Altruism: Measurement of Value Co-Creation**

### **Citizenship Behavior of Sports Fans— A Case Study of the China Volleyball**

#### **League**

**Yang Jiayu<sup>1</sup>, Pan Feng<sup>1</sup>**

*<sup>1</sup>Guangzhou Sport University, Guangdong, Guangzhou 510500, China*

**Abstract:** As sports events increasingly rely on the deep participation and interaction of sports fans, sports fans have become an important subject of co-creation of event brand value. Based on the dual driving perspective of egoistic and altruistic motivation, this study uses literature review and questionnaire survey methods to conduct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value co-creation civic behavior of fans of the China Volleyball League. The study found that: (1) the civic behavior of sports fans is driven by both egoistic and altruistic motivation, and the level of altruistic motivation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egoistic; (2) among the four types of civic behavior, feedback, helping and inclusive behaviors are more prominent and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publicity behaviors; (3) both motivations have the greatest impact on helping behaviors, showing a significant characteristic of motivation-behavior matching; (4) overall, the impact of altruistic motivation on all types of civic behavior is higher than that of egoistic. This study expands the applicable boundaries of value co-creation research in sports contexts by revealing the behavioral differentiation patterns driven by motivation, and provides new empirical evidence for sports event managers to implement motivation identification and behavior guidance strategies.

**Keywords:** Sports fans; Brand value co-creation; Egoistic motives; Altruistic motives; Civic behavior

# 球队认同与体育赛事消费意愿的关系重构： 基本心理需求的中介作用

蒋柏瑞<sup>1</sup> 吴晓龙<sup>1</sup> 张象<sup>1\*</sup>

(1.成都大学, 四川 成都 610106)

**摘要:** 体育消费意愿是促进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 本文通过 CNKI 查阅、阅读社会认同, 了解认同理论基本原理, 梳理基本心理需求三个维度, 采用文献法、数理分析法等研究方法, 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并研究了球队认同怎样与体育赛事消费意愿构成关系并做何影响。从心理学角度, 构建了以基本心理需求为中介的结构方程模型。通过分析得出结论: 球队认同能够正向预测球迷的基本心理需求。基本心理需求能够正向预测球迷的体育赛事消费意愿。球队认同能够正向预测球迷的体育赛事消费意愿。基本心理需求在球队认同与体育赛事消费意愿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

**关键词:** 球队认同; 体育赛事消费意愿; 基本心理需求; 中介

DOI: doi.org/10.70693/rwsk.v2i3.331

## 1 问题的提出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2024)强调:“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目前, 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作为我国新时代经济发展的新动能, 预计到 2035 年, 体育产业将成为我国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城镇居民是拉动我国体育消费的重要力量, “球迷”这一群体更是拉动促进体育消费的重中之重。据调查, 党的十八大以来, 消费逐渐成为了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着力点。体育消费作为体育产业与居民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 能够有效促进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体育赛事消费是体育消费的重要内容, 体育赛事能够有效的激发出居民体育消费潜力。在体育产业蓬勃发展的当下, 体育赛事消费市场日益繁荣, 观众的消费行为不仅支撑着赛事的商业运营, 更反映出深层次的社会与心理现象。球队认同作为球迷与球队之间情感纽带的关键体现, 一直被视作影响体育赛事消费意愿的重要因素。球队认同(Team Identification)是一种情感连接, 将球迷与球队相连。球迷会以追随者的身份支持、关心、信任该球队的竞赛表现与比赛成绩。消费意愿是指消费者在一定的条件下, 愿意并准备将自己的收入用于购买商品或服务的心理与倾向, 本质上看是消费者的一种内心互动。故赛事消费意愿即特指消费者为了某一赛事活动, 以及该赛事活动的周边产品进行支付的心理倾向。现有研究中认为, 球队认同直接驱动着球迷对赛事的消费意愿<sup>[1]</sup>。球队通过球迷对他们的心理需要而产生经济效益与商业价值<sup>[2]</sup>。球队一定程度上成为了球迷自我认同的延伸, 支持球队的消费行为可以表达出自己的忠诚度, 同时也能获得归属感。但随着体育消费市场的不断演变以及消费者心理研究的深入, 这种直接关联的解释逐渐显露出一定的局限性, 随着消费市场的改革, 球迷的需求在此基础上不断提升, 需求已形成多样化, 因此基本心理需求理论为重新审视两者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Deci 和 Ryan 认为, 基本心理需求是一种包括自主需求、胜任需求和情感需求的普遍性需求<sup>[3]</sup>。而在体育赛事情景之中, 基本心理需求与球队认同、消费意愿等是否存在一定的影响关系, 仍有待深入进行挖掘。鉴于以上基础, 本研究通过线下、线上两种调查方式发放问卷并回收数据, 从心理学、需求学的角度探究球迷的消费意愿及消费行为, 为推动我国体育产业的发展提供参考与助力。

**作者简介:** 蒋柏瑞 (2001—), 男,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体育赛事与管理;

吴晓龙 (2000—), 男,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体育心理;

张象 (1978—), 男, 教授, 硕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为学校体育。

**通讯作者:** 张象

## 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 2.1 文献资料法

通过 CNKI 查阅、阅读社会认同,了解认同理论基本原理,梳理基本心理需求三个维度,并以球队认同、体育赛事、消费行为、等关键词进行检索,为本文提供理论基础及科学的研究方法,为后文打下基础。

### 2.2 数理统计法

运用 SPSS27.0 对四川丰谷酒业(篮球)、成都蓉城(足球)、重庆铜梁龙(足球)等球类俱乐部的球迷进行发放,将回收的问卷数据进行归档与整理,剔除具有缺失值等的无效数据和规律性数据进行描述统计。采用 AMOS23.0 软件构建结构方程模型,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等统计方法,分别检验模型中各变量之间的关系,从而验证前文提出的假设是否成立。

### 2.3 数据来源

本研究的问卷增加了判断性问题如下:“请问您是否有自己支持的球队?”用于识别被调查者是否符合本研究需要。本研究共发放两轮问卷。第一轮问卷共回收 240 份用于对问卷和模型进行信效度检验,为确保数据来源的准确性,筛选并剔除具有缺失值和具有规律性的无效数据,得到有效问卷 214 份。统计出有效回收率为 89%。第二轮问卷基于上述结果进行发放,用于对本研究的结果进行分析,发放 340 份问卷,共计回收了 300 份有效问卷,有效回收率为 88%。

## 3 研究假设与测量工具

### 3.1 社会认同理论

社会认同理论是归属于心理学范畴的一个理论,社会学家亨利·泰费尔对社会认同理论进行了定义:一个人能否明确知道自己属于某个特定的社会群体,并且“他/她”所获得的群体资格会赋予“他/她”某种特定的价值和情感<sup>[4]</sup>。这个概念因为具有通用性的特点,与不同学科范畴都建立了紧密的联系。在体育学领域中,这个理论也较为广泛被运用。潘丽霞等众多基于认同理论的视角,对“女子职业体育赛事”的媒体方面消费状况及影响因素进行探讨,结果表明:球队认同能够积极预测 2023 年第九届女足世界杯媒体消费<sup>[5]</sup>。李广周等学者通过社会认同去透析了球迷暴力行为的深层领域逻辑,研究发现球迷的暴力行为是一种其实现社会认同的方式,对于球迷来说暴力行为具有特殊的情感意义<sup>[6]</sup>。此外,在赛事品牌消费的研究中,有学者提出赛事消费认同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促进球迷的各种基本心理需求。

基于此提出假设 1: 球队认同能够正向预测球迷的基本心理需求。

### 3.2 基本心理需求理论

基本需求理论是属于自我决定理论的分支理论之一,基本心理需求理论着重强调自主、能力以及情感(关系)三种基本需要的满足在人类心理中是否发挥作用以及怎样发挥作用。在体育赛事情境中,球迷的这些三种基本心理需求可能在球队认同与消费意愿之间发挥着关键的中介作用。当球迷对某球队产生认同后,球队所营造的环境、展现的成绩以及团队氛围等,会影响球迷基本心理需求的满足程度,球迷赛事认同和基本心理需要同样可能对消费意愿和行为产生正向影响。郑嘉昕等学者研究了 CBA 赛事体验和消费行为之间的关系,其发现 CBA 赛事体验及赛事认同均能正向预测观众的消费意愿,而赛事体验与球迷的基本心理需求的满足也直接相关<sup>[7]</sup>。

基于此提出假设 2: 基本心理需求能够正向预测球迷的体育赛事消费意愿。

### 3.3 消费价值理论

消费价值理论实际上是一种理论模型,用于评价消费者在做出消费决策过程中的价值感知,消费价值理论从认识、情感、社会、功能、条件五个维度解释了消费者做出消费所产生的原因。据统计,2024 年巴黎奥运会共售出约 950 万张门票,这说明现在相当一部分观众愿意为体育赛事买单。究其原因无非是消费者认为花钱购票观赛具有一定的价值,不同消费者购买门票的动机不同,但总的来说这次赛事成功地激发了消费者的购买意愿和消费决策。当前,国内外针对消费价值理论的研究已经趋于成熟,在体育领域也有了许多研究成果,岳贤锋等基于此理论在体育旅游方面进行了研究,其认为旅游者的出游动机受到出游前自身对旅游的期望的影响,通过对旅游目的地等多方面多维度进行投入与完善,能够使游客产生更为强烈的出游动机,激发游客出游次数,从而促进游客消费<sup>[8]</sup>。王恒利对冰雪体育旅游进行了探讨,结果发现冰雪体育旅游消费行为的发生是以冰雪体育旅游资源的吸引力为前提,进而产生消费动机。也就是说,当游客认同该旅游资源,则会产生一定的消费动机,从而促进

消费<sup>[9]</sup>。同理在体育产业其他板块是否适用仍有待考证。基于此提出：

假设 3：球队认同能够正向预测球迷的体育赛事消费意愿。

假设 4：基本心理需求在球队认同和体育赛事消费意愿中起中介作用。

根据以上假设提出模型概念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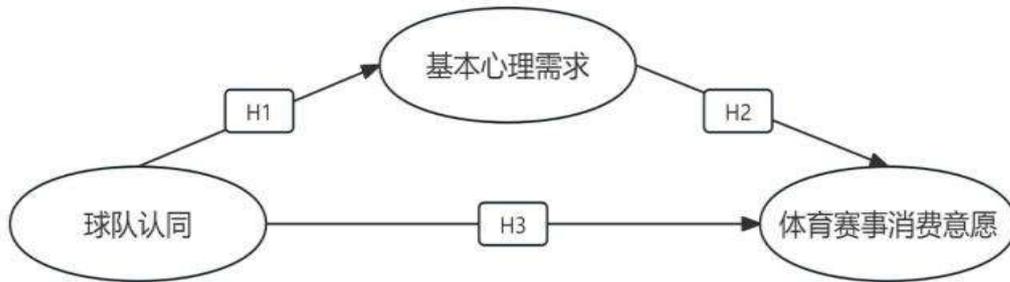


图 1 研究概念模型

### 3.4 测量工具

BOL-LEN 在他对于结构方程模型的研究中提出各维度题数不少于 3 个，并且其保证每题只属于一个维度的分析原则。因此，本研究通过已有的研究成果结合实地访谈，筛选出能反映本研究需要的 3 个维度的题项，共计 9 项观测题项，每个维度各 3 个题项。（见表 1）

表 1 问卷维度及题项分析

| 维度       | 题序  | 内容                        |
|----------|-----|---------------------------|
| 球队认同     | RT1 | 我认为我是该球队的球迷。              |
|          | RT2 | 该球队的胜利于我而言很重要。            |
|          | RT3 | 我与该球队有着较强的情感联系。           |
| 体育赛事消费意愿 | XF1 | 我愿意为观看该球队的比赛而购票。          |
|          | XF2 | 我愿意购买与该球队有关的周边商品。         |
|          | XF3 | 我愿意为该球队做宣传并引导他人购买。        |
| 基本心理需求   | XQ1 | 我愿意选择从事该球队所代表的运动项目。       |
|          | XQ2 | 我能够适应此运动并且通过参与该运动获得健康的身体。 |
|          | XQ3 | 作为该球队的观众我能够获得幸福感与满足感。     |

### 3.5 测量模型分析

针对所回收的数据采用验证性因子分析对其进行效度检验。通过平均方差抽取量观察其收敛效度。本数据平均方差抽取量介于 0.584 至 0.657 之间；同时 CR 值介于 0.808 至 0.852 之间，当该值高于 0.70 时表示该潜变量具有较好的建构信度<sup>[10]</sup>。根据任意两个潜在变量间的相关系数来检定观测变量区别效度的标准，可以说明本研究所选取的变量具有良好的区别效度。

表 2 测量模型效度检验表

| 维度       | AVE   | CR    | 球队认同 | 体育赛事消费意愿 | 基本心理需求 |
|----------|-------|-------|------|----------|--------|
| 球队认同     | 0.854 | 0.808 | 1    |          |        |
| 体育赛事消费意愿 | 0.657 | 0.852 | ***  | 1        |        |
| 基本心理需求   | 0.586 | 0.809 | ***  | ***      | 1      |

注：\*\*\*、\*\*、\*分别代表 1%、5%、10%的显著性水平

在进行假设检验之前，首先对数据进行信度检验。克隆巴赫 Alpha 系数值为 0.934 可以说明该样本数据具有良好的信度。通常来说，载荷系数大于 0.55 即为良好；组合信度 CR 值介于 0.808 至 0.852 之间，> 0.60，说明各变量的内部一致性较高。鉴于以上，本研究所选取的观测变量具有较好的稳定性与内部一致性。

表 3 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一览表

| 维度           | 指标  | 非标准<br>载荷系数 | 标准<br>载荷系数 | Z      | P   | CR    | 克隆巴赫<br>Alpha |
|--------------|-----|-------------|------------|--------|-----|-------|---------------|
| 球队认同         | RT1 | 1           | 0.808      | -      |     |       |               |
|              | RT2 | 0.997       | 0.78       | 14.622 | *** | 0.808 |               |
|              | RT3 | 0.886       | 0.701      | 12.814 | *** |       |               |
| 体育赛事<br>消费意愿 | XF1 | 1           | 0.784      | -      |     |       |               |
|              | XF2 | 1.079       | 0.821      | 12.502 | *** | 0.852 | 0.934         |
|              | XF3 | 0.983       | 0.828      | 12.618 | *** |       |               |
| 基本心理需求       | XQ1 | 1           | 0.814      | -      |     |       |               |
|              | XQ2 | 1.006       | 0.791      | 14.985 | *** | 0.809 |               |
|              | XQ3 | 0.865       | 0.688      | 12.571 | *** |       |               |

注:\*\*\*、\*\*、\*分别代表 1%、5%、10%的显著性水平

#### 4 研究结果与分析

##### 4.1 结构方程模型检验

本研究所运用的 AMOS23.0 软件建立结构方程模型,采用最大似然估计法对假设路径进行分析,所得路径分析结果如图 2<sup>[10]</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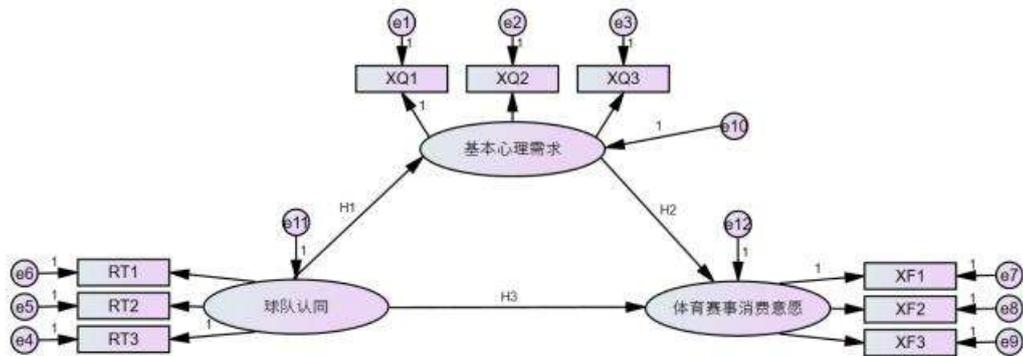


图 2 结构方程模型路径图

##### 4.1.1 假设模型适配度检验

模型适配度检验可以验证本研究模型和回收的数据是否匹配与合理。本研究模型的适配度检验中,若  $\chi^2/df < 3$ ,则说明适配度优秀,数值越低则适配度越好。本研究中,  $\chi^2/df=1.351$ ,适配度表现优秀,GFI 指数越大表示适配度越好。本研究中,GFI=0.977,整体适配度较好;RMSEA 数值越小表示模型适配度越好。本研究 RMSEA=0.034,模型适配度很良好,IFI=0.992,表示模型适配度较高(见表 4)。

表 4 模型适配度检验表

| 指数 | $\chi^2/df$ | CFI   | RMSEA  | IFI   |
|----|-------------|-------|--------|-------|
| 标准 | < 3         | > 0.9 | < 0.08 | > 0.9 |
| 模型 | 1.351       | 0.977 | 0.034  | 0.992 |

##### 4.1.2 假设模型路径关系检验

通过 SEM 分析,假设模型路径的检定结果见表 5。

表 5 各假设路径关系验证表

| 假设路径                | 标准化估计值 | 标准误差  | T 值   | P   | 结果 |
|---------------------|--------|-------|-------|-----|----|
| 球队认同→体育赛事消费意愿 (H3)  | 0.289  | 0.069 | 4.167 | *** | 成立 |
| 球队认同→基本心理需求(H1)     | 0.261  | 0.062 | 4.182 | *** | 成立 |
| 基本心理需求→体育赛事消费意愿(H2) | 0.362  | 0.073 | 4.973 | *** | 成立 |

在整个理论假设模型中,共 3 条直接假设路径。从表 5 的研究结果可知:(H3:P < 0.01)、(H1: P < 0.01)、(H2: P < 0.01),三条路径均具有显著性,即球队认同对体育赛事消费意愿、球队认同对基本心理需要及基本心理需求对体育赛事消费意愿均有正向影响。因此说明以上研究假设 H1、H2、H3 均成立。

## 4.1.3 基本心理需求的中介效应检验

中介效应检验的方法包括逐步检验法与系数乘法。本研究采用系数乘积法的 BoostStrap 抽样方法检验基本心理需求的中介效应。根据中介效应检验程序,通常认为要验证其中介效应存在,则在 95%置信区间的上下限不包含 0,则说明中介效应存在。通过分析表明,基本心理需求在球队认同对体育赛事消费意愿的影响中发挥显著中介作用。在间接效应检验中,95%置信区间为 (0.053, 0.181) 不包含 0,且  $P < 0.05$ ,证明了间接效果存在。直接效应检验中,95%置信区间为 (0.133, 0.418) 不包含 0,且  $P < 0.05$ ,说明直接效应同样存在。在理论模型中,间接效应和直接效应同时存在,因此说明基本心理需求在球队认同对体育赛事消费意愿的影响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

表 6 各中介效果检验一览表

| 假设<br>路径                  | 中介<br>效果 | 点估<br>计值 | Bootstrapping          |       |     |                    |       |     |
|---------------------------|----------|----------|------------------------|-------|-----|--------------------|-------|-----|
|                           |          |          | Bias Corrected 95 % CI |       |     | Percentile 95 % CI |       |     |
|                           |          |          | lower                  | upper | P   | lower              | upper | P   |
| 球队认同<br>↓<br>体育赛事<br>消费意愿 | 间接效应     | 0.104    | 0.053                  | 0.181 | *** | 0.048              | 0.174 | *** |
|                           | 直接效应     | 0.261    | 0.133                  | 0.418 | *** | 0.128              | 0.413 | *** |
|                           | 总效应      | 0.365    | 0.269                  | 0.529 | *** | 0.223              | 0.523 | *** |

## 5 分析与讨论

## 5.1 球队认同、基本心理需求与体育赛事消费意愿的关系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预计 2025 年中国体育产业总产出约为 40893 亿元。从市场细分结构来看,体育服务业总产出 21046 亿元,约占比 57.3%,这说明在时代的洪流下,我国消费者的消费行为正发生显著的变化。我国消费者对于体育的消费占比越来越多,体育的消费需求也越来越旺盛。在我国,足球、篮球等团队运动因其地域属性较强,很容易形成独特的球迷文化,从而加深球迷对球队的认同感。球迷认同是球迷对去对的情感依恋和身份归属。

有研究表明,球迷的认同感可以满足球迷自身的自主需求、胜任需求和关系需求<sup>[11]</sup>。可以清楚表明,球队认同将球迷与球队、球迷社群之间相连接。加入球迷俱乐部,参与线下社群互动等可以加强球迷的群体归属,满足其关系需求。通过深度参与球队相关活动,从而获得专业认同和自我效能感,如参与球队公益活动,最佳球员投票等,增强球迷的胜任感。此外,球迷认同并非被动接受,而是球迷主动选择和自我表达的结果,自愿消费、自愿选择观赛方式、自愿认同球迷文化并且内化为个人信念等都有助于满足球迷自主需求。

也有研究结果表明,高认同度的球迷倾向通过购买各种周边或订阅赛事转播等来支持球队,甚至表现出价格不敏感行为,这种消费不仅源于实际的需求,同时也是一种情感的表达和社会身份强化。这类消费者会因自身是所支持球队的球迷身份而感到骄傲与自豪,从而提升赛事消费意愿,为球队买单<sup>[12]</sup>。

## 5.2 基本心理需求在球队认同与体育赛事消费意愿中的中介效应分析

鉴于上述研究,基本心理需求在球队认同对体育赛事消费意愿的影响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球队认同作为一种社会心理联结,可以通过满足个体深层次心理动机需求,转化为具体的消费行为意向,这种中介机制符合心理学中“认知-情感-行为”的心理学作用路径。

## 5.2.1 情感联结的动机转化机制

球队认同建立的情感需要通过需求的满足才能转化为消费的动力。高认同度球迷对球队的归属感、观赛的体验感与掌控感以及自主选择如何支持的方式共同构成了球迷消费行为心理动机基础,对应着球迷基本心理需求的情感(关系)需求、胜任需求与自主需求。研究显示,当三项需求均得到满足时,消费意愿提升幅度可达单纯认同影响的约 3 倍<sup>[13]</sup>。

## 5.2.2 需求满足的行为强化机制

人类的行为受三大基本心理需求驱动,鉴于上文所提的自主需求、胜任需求和情感(关系)需求<sup>[14]</sup>。情感(关系)需求通过群体归属强化消费粘性,球迷俱乐部的社交互动使消费行为具有强化作用。胜任需求通过提升专业认同提升消费价值,认同感越高的球迷越为优质观赛体验买单。自主需求通过选择自由强化球迷的消费愉悦感,个性化服务提升付费转化。

## 5.2.3 心理补偿的动力维持机制

当球队表现不佳或者处于低估,基本需求的满足也能维持球迷的消费意愿。具有球队认同的球迷,情感(关系)需求的满足可以提供情感支持,如:我们一起度过难关;胜任需求可以转化为建设性批评,如球队征集球迷意见,球迷积极参与等;自主需求保障持续选择的权力,如哪怕你在低估,我仍然选择支持。

## 6 结论

本研究通过对球类项目的球迷进行调查。通过心理学视角对球迷认同与体育赛事消费意愿之间的关系和影响机制进行重新审视,并构建了和验证球迷认同、基本心理需求与体育赛事消费意愿的关系模型。研究表明:球队认同能够正向预测球迷的基本心理需求。基本心理需求能够正向预测球迷的体育赛事消费意愿。球队认同能够正向预测球迷体育赛事消费意愿。基本心理需求在球队认同与体育赛事消费意愿中起中介作用。

参考文献:

- [1]王敏坚.球迷对球队认同的研究——以中超球迷为例[J].四川体育科学,2015,34(05):84-88.
- [2]马潇曼,胡冰洋.球迷视角下 CBA 球队商业价值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14,37(12):106-111.
- [3]Deci E L, Ryan R M. The " what " and " why " of goal pursuits: Human needs and the self-determination of behavior[J]. Psychological inquiry, 2000, 11(4): 227-268.
- [4]王建.球迷赛事认同与消费行为关系的重构——基本心理需要的中介效应[J].体育研究与教育,2018,33(04):91-96.
- [5]潘丽霞,刘少敏,庄识氏,等.认同理论视角下国际女子职业体育赛事的媒体消费影响因素研究[J].西安体育学院学报,2024,41(02):235-246.
- [6]李广周,王永.基于社会认同的球迷暴力行为研究[J].体育与科学,2012,33(05):93-95.
- [7]郑嘉昕,黄涛,徐建华,等.CBA 赛事体验对观众消费意愿的影响:赛事认同的中介作用[J].福建体育科技,2023,42(03):18-23.
- [8]岳贤锋.旅游期望理论对体育旅游消费动机的影响[J].西安体育学院学报,2014,31(06):679-682.
- [9]王恒利,李凌,周文静,等.体验经济视域下冰雪体育产业发展策略研究[J].冰雪运动,2018,40(04):72-77.
- [10]结构方程模型——AMOS 的操作与应用 [M]. 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9:1-2.
- [11]荣思军.我国职业体育俱乐部社会责任对球迷忠诚度的影响——基于球迷认同和满意的中介作用[J].山东体育科技,2020,42(03):13-19.
- [12]马淑琼,陈锡尧,刘雷.中超职业足球俱乐部球迷认同及其购买行为分析[J].体育文化导刊,2014,(03):122-125.
- [13]许苏苏,袁素红.户外旅游者的消费行为特征及营销策略优化——基于安徽省几个典型城市的调查与分析[J].营销界,2024,(20):38-40.
- [14]吴才智, 荣硕, 朱芳婷等. 基本心理需要及其满足[J].心理科学进展, 2018, 26(6):117-127.

## Reconstruct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am identification and willingness to consume sports events: the mediating role of basic psychological needs

Jiang Borui<sup>1</sup>, Wu Xiaolong<sup>1</sup>, Zhang Xiang<sup>1\*</sup>

<sup>1</sup> Chengdu University, Sichuan, Chengdu 610106, China

**Abstract:** Sports consumption willingness is an important factor to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sports industry, this paper through CNKI access, read social identity, understand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identity theory, combing the basic psychological needs of the three dimensions, the use of literature method, mathematical analysis and other research methods, the use of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to analyze and study how the team's identity and the willingness to consume sports events constitute a relationship and how to do what influe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sychology, the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mediated by basic psychological needs was constructed. The analysis concludes that team identity can positively predict fans' basic psychological needs. Basic psychological needs can positively predict fans' willingness to consume sports events. Team identification can positively predict fans' willingness to consume sports events. Basic psychological needs play a partial mediating role between team identification and willingness to consume sports events.

**Keywords:** Team Identification; Willingness to Consume Sporting Events; Basic; Psychological Needs; Mediating Effects

# 元宇宙背景下壮族元素在餐饮品牌 IP 视觉设计中的应用探析

杨舒帆<sup>1</sup> 刘春仪<sup>1</sup> 陈文兰<sup>1</sup> 胡佳莹<sup>1\*</sup>

(1. 南宁师范大学, 广西 南宁 530000)

**摘要:** 本研究立足于元宇宙兴起的时代背景, 探讨壮族文化元素在餐饮品牌 IP 视觉设计中的应用价值。研究聚焦于广西横县鱼生品牌形象的设计实践, 通过文献分析、设计过程及成果展示, 系统呈现了品牌形象从文化提取到视觉转化的设计流程, 诠释了 IP 形象在餐饮类品牌形象设计中的重要性。在设计风格上, 本研究聚焦“国潮”美学, 探索其在连接传统壮族文化与消费语境之间的表达路径。通过最终设计成果的呈现, 将壮族元素置于元宇宙所预示的沉浸式、交互性体验框架中进行 IP 构建, 不仅能有效提升餐饮品牌的文化辨识度与情感链接, 也为传统文化的当代活化与数字转译提供了可借鉴的策略与范式。

**关键词:** 壮族元素; IP 视觉设计; 品牌形象设计; 国潮风格; 横县鱼生

**基金项目:** 2023 年度广西高校中青年教师科研基础能力提升项目 (2023KY0385); 2025 年度广西高等教育本科教学改革工程项目 (2025JGB298); 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 (202510603717); 2023 年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 (202310603078); 2025 年度广西高等教育本科教学改革工程项目 (2025JGB481); 2025 年度南宁师范大学本科教学改革项目 (2025JGX002); 2025 年度广西高等教育本科教学改革工程项目 (2025JGA266)

DOI: doi.org/10.70693/rwsk.v2i3.221

## 一、引言

### (一) 研究背景及意义

#### 1. 研究背景

在品牌营销方式持续演进与元宇宙概念兴起的双重背景下, 品牌形象设计日益成为企业构建差异化认知、提升情感联结的重要途径。IP 形象具有辨识度高、富有创意、易于传播和亲和力强的特点, 能够快速吸引消费者的目光和情感共鸣, 在餐饮类品牌建设中逐渐展现出独特价值。如何通过系统性的视觉设计, 将地域元素转化为符合现代审美的 IP 形象, 成为值得深入探讨的课题。

壮族作为我国重要的少数民族, 蕴藏着丰富的视觉与文化资源, 其服饰纹样、色彩体系与图腾符号等元素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横县鱼生品牌根植于壮族文化区域, 具有鲜明的区域饮食特色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属性, 将壮族元素融入品牌 IP 形象设计, 有助于传递地域文化特征, 增强品牌识别度与消费认同。然而, 国内鱼生消费市场局限于两广地区, 存在显著的地域集中性, 异地市场认知度低, 这一现状为相关饮食文化的非遗保护与推广带来了客观阻力。鱼生品牌尚未建立系统性的品牌视觉体系与专属 IP 形象, 导致其在同类产品中辨识度不足, 同质化竞争现象突出, 在整体上制约了品牌的差异化发展与市场影响力的提升。因此, 本研究以横县鱼生为例, 围绕元宇宙语境下沉浸体验与交互传播的需求, 探索壮族文化元素在 IP 视觉设计中的创新方法, 为地方餐饮品牌构建具有特色文化属性的 IP 形象提供理论参照与实践启示。

#### 2. 研究意义

本研究在理论与实践层面均具有显著意义。在理论层面, 通过探索壮族文化元素与元宇宙语境下 IP 设计的融合路径, 拓展了民族艺术在数字媒介中的表现维度, 总结出一套将传统文化转为现代设计语言的方法, 为保护

**作者简介:** 杨舒帆 (2004—), 女, 学士, 研究方向为视觉传达设计;

刘春仪 (2003—), 女, 硕士, 研究方向为职业技术教育;

陈文兰 (1998—), 女, 研究方向为视觉传达设计;

胡佳莹 (1993—), 女, 博士, 副教授, 硕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为人工智能艺术设计, 艺术教育。

**通讯作者:** 胡佳莹

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了新思路。在实践层面,研究立足于餐饮品牌建设需求,设计了既有文化内涵又能与消费者产生情感共鸣的IP形象,有效增强了品牌识别度与消费者认同感,助力地方特色餐饮企业突破地域限制,实现品牌价值提升。同时,这一探索也为民族地区文旅融合发展提供了可借鉴的思路,研究成果对促进地域文化传播、推动民族元素在数字时代的创新应用具有积极价值。

## (二) 文献综述

### 1. 国内研究综述

聚焦于元宇宙背景下的视觉设计研究,本研究对国内相关文献进行了梳理。元宇宙是整合区块链、拓展现实、数字孪生等前沿技术所形成的新型虚实相融的生态。在这一背景下视觉设计的范式正发生显著转变。有研究系统阐述了元宇宙推动视觉传达从平面、静态向立体化、沉浸式演进的过程,指出设计的关键在于运用数字技术构建立体空间视感,通过视觉语言的立体化塑造实现沉浸式视觉空间的构建<sup>[1]</sup>。以品牌形象传播为切入点,在元宇宙中,品牌视觉的构建核心在于三维数字虚拟场景的与以用户为中心的沉浸式交互体验,品牌通过构建拟真化的虚拟社区,能够使用户以数字身份全方位感知品牌文化与价值,从而极大地提升品牌形象的传播度与用户粘性<sup>[2]</sup>。与此同时,视觉设计的表现语言也在元宇宙中得以极大地拓展。有研究强调了动态视觉与数字艺术在构建广告视觉想象空间中的核心作用,可以突破物理世界的限制,为观者打造更具吸引力和代入感的叙事场景<sup>[3]</sup>。从技术保障与艺术形式创新的角度,分析NFT与区块链技术如何为数字艺术作品的版权确认、价值实现提供支持,并催生了去中心化、多元化且具有独特数字美学的视觉表达形式,为品牌IP的资产化和市场化提供了新的可能<sup>[4]</sup>。

在卡通形象与IP设计方面,卡通形象在品牌设计中具有提高辨识度、增强亲和力、促进传播与拓展品牌延伸空间的优势,成功的IP形象应具备鲜明的个性、情感共鸣能力与文化融合性<sup>[5]</sup>。在民族文化与视觉符号研究方面,有研究用壮族蛙纹系统阐释了民族元素在“形、色、意、美”四个维度的艺术特征,为民族元素的现代转化提供理论依据<sup>[6]</sup>。“化繁为简、匠心独具、妙趣横生”三大设计原则也为传统元素在现代设计中的创新应用提供了具体方法论指导,强调在保留文化内核的同时,应注重形象的趣味性与现代审美的融合<sup>[7]</sup>。从品牌差异化战略角度出发,通过聚焦特定朝代、款式、工艺强调品牌特性,可以避免同质化竞争<sup>[8]</sup>。在品牌IP构建方面,品牌IP形象需要突出企业特色、适应新媒体环境、注重创新性和传播性,通过多元化、情感化、互动化、社会化策略实现品牌在新媒体时代的传播和推广,建立与受众的深度连接<sup>[9]</sup>。

动态海报视觉设计的相关成果也为本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动态海报在新媒体环境下的技术支撑与表现优势强调了其在信息传递与情感叙事中的有效性,动态化设计通过引入时间维度,能够实现信息的层次化传递和情感的有效表达<sup>[10]</sup>。动态设计原则中的连锁性原则可以确保视觉叙事的流畅性,整体性原则维护了视觉元素的和谐统一,简洁化原则提醒信息的传递效率,明快化原则可以强化视觉冲击力,这些原则为视觉元素的节奏控制与信息层级建构提供了方法论指导<sup>[11]</sup>。视觉形象在不同平台中的适配性与统一性也至关重要,“核心基因+平台特征”的视觉管理体系对构建跨平台的文化IP视觉系统具有重要参考价值<sup>[12]</sup>。同时,通过对三维空间运动、循环叙事与交互设计的深入研究可以为传统视觉元素在数字空间的中的创新表达提供技术路径<sup>[13]</sup>。

### 2. 国外研究综述

有研究基于波兰国家文化中心关于新兴技术对艺术影响的前瞻性研究,深入探讨了元宇宙在视觉艺术领域的创造性潜力,元宇宙的沉浸式多感官体验、实时渲染交互、永久化虚拟改变及数据连续性等特性,为视觉艺术创造了全新空间,艺术家可以突破物理时空的限制,打造如“悬浮雕塑”等创新艺术形式,增强观众与艺术作品的沉浸式互动<sup>[14]</sup>。元宇宙是由VR、AR、MR等技术构建的持久、互联、沉浸的3D虚拟空间网络,具有空间自由、动态交互的特征,可以让创作者通过动态交互设计让作品随观众输入实时演变<sup>[15]</sup>。这些研究为餐饮品牌IP视觉设计提供了一种全新思路,可以借助元宇宙将壮族元素通过3D建模、AI生成等技术融入餐饮品牌的虚拟IP形象和包装设计中,吸引年轻消费群体,推动民族文化与商业品牌协同发展,为民族元素与餐饮品牌IP视觉设计在元宇宙场景的融合提供了关键理论支撑与实践路径参考。

在视觉传达设计领域,民族文化元素的融入已成为提升设计内涵与文化认同的重要路径。民族元素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具有独特的艺术价值与东方美学特征,不仅能够丰富设计语言,还能增强文化传播的感染力与认同感,在当前信息技术高度发展的背景下,视觉传达正经历从静态到动态、平面到多维的转型,民族文化的动态呈现与创新表达成为新的研究方向<sup>[16]</sup>。有研究提出视觉传达设计的核心在于对“图形、色彩、文字”三大元素的综合运用。图形是设计的基础,通过点、线、面的构成传递信息。色彩是设计的灵魂,可以引发观众的情感共鸣。文字兼具释义与审美功能,尤其是中国书法,可以极大提升设计作品的文化内涵。以吉祥图腾、茶文化、书法等具体的元素为例,论证了民族文化符号与设计融合的方法,强调需在理解文化内涵的基础上进行“分解、重构、简化与替代”<sup>[17]</sup>。文化因素对设计效果的影响也至关重要。视觉传达本质上是一种通过视觉元素传递信息的

过程, 而这一过程受目标受众文化背景的制约。根据文化分析、概念确立、测试评估与修订完善这四阶段流程, 设计者可以深入理解目标受众的价值观、语言、传统习俗、宗教信仰等文化要素, 同时注意相同的色彩、符号和图像在不同文化中的含义, 避免文化误读导致的传播障碍, 设计出符合文化认同又具有传播效果的作品<sup>[18]</sup>。

在 IP 形象设计领域, 视觉表达与情感连接已成为塑造品牌价值的关键。“POP MART”通过鲜明的色彩、可爱的造型与亲和材质, 成功塑造了具有高辨识度与情感黏性的 IP 形象, 以“POP MART”为例, 有研究引入了情感化设计三层次理论, 提出 IP 形象设计应从本能层、行为层、反思层三个维度系统构建。本能层强调通过色彩、造型与材质构建鲜明的视觉系统, 行为层注重功能的实用性与产品的可拓展性, 反思层则致力于通过视觉元素唤起用户的情感共鸣与价值认同<sup>[19]</sup>。该研究为 IP 形象的多层次设计提供了参考依据。以故宫博物馆为例探讨文化 IP 在视觉转化与传播中的应用, 博物馆 IP 的视觉元素来源于自身建筑、馆藏物与区域文化, 通过创意产品、跨媒介创作、主题展览等多种形式, 构建了一个立体的、跨媒体的 IP 传播矩阵, 将厚重的历史文脉转化为符合当代审美的“生活美学”<sup>[20]</sup>。该研究则强调文化 IP 在连接传统与现代, 增强品牌文化内涵的重要作用。壮族元素作为宝贵的文化资源, 其视觉元素的挖掘则可以借鉴故宫的模式, 思考如何在元宇宙这一新的“跨媒介”平台上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在设计教育领域, 有研究基于 SECI 模型, 构建了面向设计专业的混合知识共享活动模型, 该模型融合线上线下“Ba”空间, 强调社会化、外化、组化、内化四个知识转化阶段在设计教学中的循环推进。有效的提升了设计专业学生的学习成果与创造力, 在跨媒体、跨平台的知识整合与创新表达方面具有显著成果<sup>[21]</sup>。SECI 模型中的“外化”与“组合”阶段, 适用于将隐形文化知识转化为可传播的设计语言, 进而通过数字化平台实现跨文化传播与价值再生, 该研究为民族文化符合在现代设计中的创新应用提供了理论路径。学习效能感作为设计学术内在驱动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直接影响其创意表达的自信与持续创新能力, 社交媒体的互动性、开放性与传播性能够增强学生的学习动机、环境感知与控制能力, 进而提升学生的学习自我效能<sup>[22]</sup>。这一研究则强调了技术媒体在设计教学中的积极作用, 尤其在激发学生兴趣、促进作品传播与反馈机制建立方面的价值, 为探索元宇宙平台作为新型传播与设计实践载体提供了实证依据。这两项研究共同为壮族元素在当代餐饮品牌 IP 视觉设计中的创新转化与价值再生奠定了理论基础。

现有研究在动态视觉表达、品牌 IP 构建与跨媒体传播方面积累了丰富成果, 为在新型数字背景下探索民族文化的创新表达提供了方法论借鉴, 也为元宇宙背景下的视觉设计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与方法支持。然而这些研究多聚焦与技术路径、通用策略与表现形式, 缺少壮族文化在餐饮品牌 IP 这一垂直领域的设计实践, 对于如何将民族传统文化元素系统性地融入元宇宙语境下的餐饮品牌 IP 设计缺乏深入探讨, 因此, 本研究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 结合动态视觉设计与元宇宙沉浸体验, 重点探索壮族文化在餐饮品牌 IP 构建中的视觉表达策略, 以弥补当前研究的不足。

## 二、横县鱼生品牌形象设计过程

### (一) 横县鱼生品牌形象 IP 设计灵感

IP 形象作为品牌传播的重要载体, 其价值在于通过具象化的视觉表现来传递品牌的文化内涵和情感温度, 建立与消费者之间的深度联结。在本次品牌形象设计研究中, 如何将地方特色饮食文化有效转化为具有当代感的 IP 视觉符号, 成为设计实践的核心课题。

在元宇宙发展背景下, 探索将壮族文化元素转化为适合传播的餐饮品牌 IP 形象, 设计灵感的形成主要经历以下过程。首先, 从壮族的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 通过研究壮族服饰纹样, 生活器具和民俗活动, 提取具有代表性的视觉符号, 将其转化为适合现代审美的设计语言。其次, 结合餐饮特色, 将食材特质、制作工艺的动态元素融入设计, 使 IP 形象既能体现饮食文化特点, 又具备鲜明的特征。最后, 结合元宇宙场景的交互需求, 为 IP 形象设定丰富的表情系统, 增强 IP 形象的故事感和叙事力。最终形成的 IP 形象, 既保留了壮族文化的精髓, 又通过简约现代的造型语言, 跨越地域限制, 为传统文化在元宇宙时代的创新传播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 (二) 横县鱼生品牌形象设计定位及设计构思

在元宇宙发展背景下, 本研究基于广西横县餐饮文化特点, 确定了品牌形象设计的核心定位与构思方向。品牌定位聚焦于中高端餐饮市场, 致力于满足当代消费者对品质、文化内涵与沉浸式体验的综合需求。将壮族文化作为品牌形象设计的重要元素, 彰显横县鱼生的地域特色和文化底蕴。设计构思从三个维度展开, 从饮食制作工艺入手, 提取视觉元素, 将独特的刀工技法与食材形态转化为具有辨识度的视觉符号。融入壮族文化特征, 通过对壮族铜鼓、头巾、纹样等文化特征进行创意转化, 构建品牌的文化识别体系, 设计出具有文化内涵的品牌形象。结合元宇宙场景的应用需求, 运用现代设计手法, 如扁平化设计、线条简洁等, 来打造出现代感强、简洁明了的

品牌形象。这一设计策略既保持了传统文化的精髓，又借助现代设计和数字技术，有效连接了实体消费与虚拟体验，为传统餐饮品牌在元宇宙时代的发展探索了新路径。

### （三）横县鱼生品牌形象设计风格

横县鱼生品牌采用国潮风格设计，巧妙融合壮族传统文化与现代审美元素，具有浓郁的中国传统文化底蕴和时尚感、艺术感，同时也提高了品牌的辨识度和美誉度。该风格主要体现在三个核心维度：

1.色彩体系：选用中国红为主色调，搭配帝王黄、靛蓝等传统色调，凸显品牌文化基因，彰显民族文化底蕴，营造出鲜明的视觉冲击力。

2.图案设计：融入鱼纹、铜鼓、壮锦及壮族头巾等壮族代表性元素，通过现代手法创作，强化地域文化识别度，既保留了传统韵味，又符合当代审美。

3.字体表现：运用篆书变体与仿古字体，传递传统书法的美学特质，确保信息的清晰可读。

这种设计风格既保留了壮族文化精髓，又通过国潮风格的表现形式增强了品牌的时尚感与亲和力，成功塑造了差异化品牌形象，使品牌在传承传统文化的同时，更好地融入现代消费市场。

### （四）横县鱼生品牌形象相关草图设计

IP 吉祥物设计以猫作为基础造型，通过猫与鱼类的天然关联，暗示产品的鲜美特质。将猫塑造成技艺精湛的“刀工武者”形象，凸显食材处理工艺的精湛。猫的头部佩戴壮族纹样图案的方巾，展现民族特色，身着含有铜鼓图案的红色衣服，强化文化识别度，通过墨镜配饰和双臂交叉的姿态，塑造专业自信的品牌气质(图 1)。

为增强 IP 形象的延展性，同步设计了系列表情包。通过生动有趣的表情变化，增强品牌在数字传播中的亲和力和沟通效果(图 2)。



图 1 IP 形象吉祥物设计草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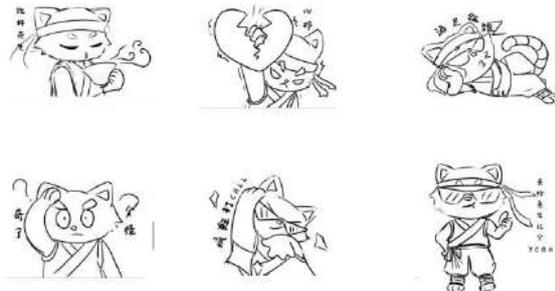


图 2 IP 形象表情包设计草图

海报设计方案将 IP 形象与品牌核心信息结合，通过直观的视觉呈现提升品牌识别度。海报设计充分考虑了目标受众的审美偏好，确保在不同传播渠道中都能有效传递统一的品牌形象(图 3)。



图 3 海报设计草图

## 三、横县鱼生品牌形象 IP 设计及相关设计成果部分展示

### （一）横县鱼生 IP 吉祥物展示

在品牌形象设计中，IP 吉祥物作为连接品牌与消费者的重要视觉载体，其设计需兼顾文化内涵与传播效果。基于前期的构思基础，本研究确定以“刀工武者猫”为核心概念的吉祥物形象。设计选用猫作为原型，暗含了食材的特性，易于建立与消费者的情感连接。形象塑造以姿态设计展现专业自信的武者气质，服饰融入壮族传统纹

样与色彩元素。经过多轮草图绘制与方案优化，最终确定的吉祥物形象保持了民族文化的辨识度，同时具备现代审美特质。该形象将作为品牌在各类传播渠道中的统一视觉符号，特别是在元宇宙应用场景中，为后续的立体化、互动化呈现预留创作空间（图4）。



图4 横县鱼生 IP 吉祥物展示

## （二）横县鱼生 IP 形象表情包设计

在 IP 吉祥物形象的基础上，本研究进一步开发了系列表情包，以增强品牌在社交媒体中的传播效果。表情包延续了 IP 形象的核心特征，并赋予其更丰富的情感表达。设计保持简洁的手绘风格，运用鲜明的色彩搭配，融入壮族传统服饰纹样等文化元素，设计多种日常交流场景表情。既保持了品牌的专业形象，又能使消费者与品牌形象产生紧密联系，拉近了品牌和消费者的距离，增强了品牌的亲和力和影响力，同时也为品牌在元宇宙社交场景中的应用奠定基础（图5）。



图5 横县鱼生 IP 形象表情包设计

## （三）横县鱼生动态海报展示

动态海报作为品牌传播的重要载体，通过融合动态元素有效增强了品牌形象的视觉吸引力。本海报设计方案延续了国潮风格，将传统绘画与现代动效技术结合，形成独特的视觉表达。海报设计以动态形式展现食材处理的关键过程，直观的传达了产品特色。运用协调的色彩搭配，保持品牌视觉的统一性。采用传统中国画风格，结合适量的动画和音乐等元素，构建沉浸式的观看体验。生动形象地展示了横县鱼生的品牌形象和产品特色，进一步提升了品牌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动态海报通过生动直观的视觉叙事，强化品牌形象记忆点，为传统元素在当代传播中的创新应用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图6）。



图6 横县鱼生动态海报展示

## （四）横县鱼生三折页展示

为配合品牌推广，本研究设计了系列三折页宣传册。三折页具有结构化的叙事能力、高效的信息整合、强大的行动号召力等优点，便于用户携带，是多功能的“门面设计”，通过巧妙地折叠将信息分块，引导读者逐步阅读，直观呈现品牌核心信息与文化内涵。三折页设计延续统一的国潮风格，封面设计突出展示品牌标志、IP 形象

及宣传语,为消费者建立鲜明的第一印象。内页布局图文结合,系列介绍产品特点与品牌文化。视觉呈现保持简洁明快的设计风格,确保信息传达的清晰度。三折页作为实体宣传材料,通过精心的内容编排强化品牌形象,将传统宣传形式与现代设计结合,为消费者了解品牌提供了直观的渠道,体现了品牌在多元文化传播渠道中的整体性考量(图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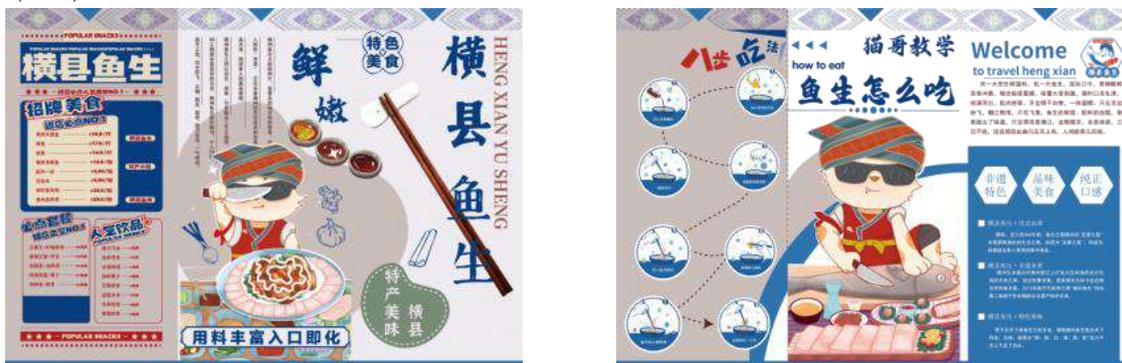


图7 横县鱼生三折页展示

### (五) 横县鱼生衍生品设计

在IP形象设计基础上,本研究开发了系列实体衍生品,衍生品设计主要包含服饰类和文创类。服饰类以T恤为代表,采用鲜明的品牌色彩和标志性的IP形象。文创类包括手办、水杯、手机壳等日常用品。这些衍生品既保持了品牌视觉的统一性,又通过实用功能拉近了与消费者的距离。在丰富品牌内涵的同时也拓展了商业价值,为品牌在元宇宙时代的实体延伸提供了更多可能性(图8)。



图8 横县鱼生衍生品设计

## 四、结论

本研究以横县鱼生品牌形象设计为例,在元宇宙兴起的背景下,通过文献分析、设计过程阐述和成果展示,探究了壮族文化元素在餐饮品牌IP视觉设计中的创新应用。从IP形象构思、视觉风格定位、衍生应用拓展等全流程设计实践,为民族地区餐饮品牌的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具体参考,验证了传统民族艺术与现代设计语言融合路径的可行性。将壮族服饰纹样、传统器具等文化符号进行现代转译,有效增强了品牌的文化辨识度与市场竞争力。同时,IP形象作为品牌传播的重要媒介,其生动形象的视觉特性在建立品牌与消费者情感连接方面具有独特优势。本研究通过这一探索不仅为传统文化在数字时代的创新传承开辟了新路径,也为相关领域从业者提供了可借鉴的设计思路与实践案例,对推动民族文化的当代传播与商业转化具有积极意义。

### 参考文献:

- [1] 向华静,杜彩兰.元宇宙概念下立体化视觉设计研究[J].艺术教育,2023,(10):210-213.
- [2] 毕经猛.元宇宙背景下品牌形象传播与设计研究[J].上海包装,2023,(10):33-35.
- [3] 郭梅雨.元宇宙视域下广告视觉想象空间的建构[J].青年记者,2022,(24):113-116.
- [4] 赵一遥,王进华.元宇宙下视觉设计的表现与未来[J].湖南包装,2022,37(02):13-16.
- [5] 肖冀芊.卡通形象在品牌设计中的优势和应用[J].鞋类工艺与设计,2025,5(05):42-44.
- [6] 刘芳.基于民族审美认同语境下广西壮族蛙纹在品牌形象设计中的应用研究[D].广西大学,2022.
- [7] 姜宇.传统文化元素在吉祥物设计中的艺术表现[D].天津美术学院,2022.
- [8] 张宇.产品同质化时代增强华服品牌形象战略探析[J].辽宁丝绸,2024,(02):68-69+42.
- [9] 王炎磊.新媒体时代企业IP形象创意设计与传播策略[J].艺术市场,2023,(10):100-103.

- [10] 程培岩.新媒体背景下动态海报的应用研究[D].青岛科技大学,2022.
- [11] 赵禹贺,程亚鹏.新媒体背景下动态海报的设计与应用[J].丝网印刷,2023,(24):70-72.
- [12] 王钰,黄茜.新媒体视觉形象在品牌设计中的应用[J].上海包装,2025,(04):142-144.
- [13] 田泽.动态海报的表现方式研究[J].天工,2025,(11):25-27.
- [14] Kępińska A, Wiśniewski R. Metaverse and its creative potential for visual arts[J]. Acta Universitatis Lodzianae. Folia Sociologica, 2023 (85): 57-75.10.18778/0208-600x.85.04
- [15] Wei L, Xiaoyu C. Immersive Creativity: Redefining Artistic Expression in the Metaverse Era[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rt, Design, and Metaverse, 2025, 3(1).
- [16] Xu M. Construction and Research of Ethnic Cultural Elements in Visual Communication[J]. Journal of Humanities, Arts and Social Science, 2024, 8(3).
- [17] Jing Z. Analysis of the application of national cultural symbols in visual communication design[J]. Frontiers in Educational Research, 2020, 3(1): 149-154.
- [18] Yudhanto S H, Risdianto F, Artanto A T. Cultural and communication approaches in the design of visual communication design works[J]. Journal of Linguistics, Culture and Communication, 2023, 1(1): 79-90.
- [19] Song Z. The Strategy Research of IP Image Design Based on Visual Context—Take “POP MART” as an Example[C]//4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Language, Art and Cultural Exchange (ICLACE 2023). Atlantis Press, 2023: 274-282.
- [20] Wang Y. Research on the Application of IP Visual Presentation Design in Museum[C]//7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rts, Design and Contemporary Education (ICADCE 2021). Atlantis Press, 2021: 455-461.
- [21] Hu, J., Lee, J. & Yi, X. Blended knowledge sharing model in design professional. Sci Rep 13, 16326 (2023).
- [22] Hu, J., Lai, Y. & Yi, X. Effectiveness of social media-assisted course on learning self-efficacy. Sci Rep 14, 10112 (2024).

## Strategies for Applying Zhuang Ethnic Elements to Catering Brand IP Design in the Metaverse Era

Shufan Yang<sup>1</sup>, Chunyi Liu<sup>1</sup>, Wenlan Chen<sup>1</sup>, Jiaying Hu<sup>1\*</sup>

<sup>1</sup> Nanning Normal University, Guangxi, Nanning 530000, China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the emerging Metaverse,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application of Zhuang ethnic cultural elements in the visual design of dining brand IP. Through a case study of the Guangxi Hengxian Yu Sheng brand image, we outline the design process from cultural extraction to visual translation using literature analysis and design practice. With a focus on the “Guochao” (China-Chic) aesthetic, this research explores how traditional Zhuang culture can be mediated through contemporary consumer contexts. By integrating Zhuang elements into the Metaverse’s immersive and interactive framework, the resulting IP design not only strengthens brand cultural identity and emotional engagement but also offers replicable strategies for the digital revitalization of traditional culture.

**Keywords:** Zhuang Ethnic Elements; IP Visual Design; Brand Identity Design; Guochao Style; Hengxian Fish Sashimi

# 新媒体语境下视觉传达设计的色彩运用与文化心理适配性研究

吴鑫馨<sup>1</sup> 贾涵迪<sup>1</sup> 年政旭<sup>1</sup> 孙旭<sup>1</sup>

(1.黑龙江大学,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

**摘要:** 探究新媒体语境下视觉传达设计中色彩运用与受众文化心理的适配规律, 为跨媒介视觉传播的有效性提升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路径。采用文献研究法梳理色彩心理学、视觉传达设计及跨文化传播相关理论, 结合案例分析法解析不同新媒体平台色彩运用的媒介特性适配逻辑, 通过问卷调查与眼动实验相结合的实证研究, 验证文化心理差异对色彩解读的影响及适配策略的有效性。明确了新媒体语境下视觉传达设计色彩运用的媒介适配性、功能导向性与动态交互性特征; 揭示了文化背景、群体属性等因素对色彩认知的作用机制; 提出了兼顾文化适配与媒介特性的色彩选择、组合及动态呈现策略。新媒体视觉传达设计的色彩运用需以文化心理为核心适配维度, 结合不同传播媒介的技术特性与传播规律, 构建文化认知与情感共鸣的三维色彩设计体系, 才能提升信息传达效率与文化认同感, 契合新媒体时代视觉传播的发展需求。

**关键词:** 新媒体; 视觉传达设计; 色彩运用; 文化心理; 适配性

DOI: doi.org/10.70693/rwsk.v2i3.306

以数字技术、网络技术为核心的新媒体浪潮, 推动视觉传达设计从传统平面静态传播向跨媒介、动态化、互动式传播转型。短视频、社交媒体、互动广告等新型传播载体的涌现, 使得视觉信息的传播速度更快、覆盖范围更广, 同时也对设计的信息传达效率与受众接受度提出了更高要求。色彩作为视觉传达中最具直观性与情感感染力的核心元素, 其运用效果直接影响受众对信息的捕捉、解读与记忆。在全球化与文化多元化并存的背景下, 不同民族、地域、群体的受众因文化习俗、价值观念、审美倾向的差异, 对同一色彩符号的认知与解读存在显著差异, 这种差异往往导致视觉传播中的信息偏差甚至文化冲突。

当前, 新媒体视觉传达设计中普遍存在色彩运用同质化、忽视文化心理差异、与媒介特性适配不足等问题。部分设计盲目追求视觉冲击力, 过度使用高饱和度色彩, 忽视了不同媒介的显示特性与受众的视觉疲劳阈值; 部分跨文化传播设计未充分考量目标受众的文化背景, 导致色彩符号的解读偏差, 影响传播效果。因此, 探究新媒体语境下色彩运用与文化心理的适配规律, 构建科学合理的色彩设计体系, 成为视觉传达设计领域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

## 一、核心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一) 核心概念界定

#### 1. 新媒体语境

本研究中的新媒体语境, 特指以数字技术为支撑, 以网络传播为核心, 涵盖短视频平台、社交媒体、互动广告、电子杂志、移动终端 APP 等多元传播载体的视觉传播环境。其核心特征表现为传播的即时性、互动性、跨媒介性与受众的个性化、碎片化接收特点, 这些特征直接决定了视觉传达设计的色彩运用逻辑。

#### 2. 视觉传达设计中的色彩语言

在视觉传达层面, 色彩是对来自外界的感受刺激, 具有象征性和联想性, 是能够诱发多种情感的情感语言<sup>[1]</sup>。色彩语言是视觉传达设计的核心表达工具, 由色相、明度、纯度三大基本要素及色彩对比、调和等组合规律构成。在新媒体语境下, 色彩语言不仅包括静态的色彩搭配, 还涵盖动态的色彩渐变、切换、节奏变化等动态表达形式, 其核心功能是实现信息的分层传递、情感的精准表达与受众的视觉引导。

**作者简介:** 吴鑫馨(2003—), 女,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视觉传达设计;  
贾涵迪(2003—), 女,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视觉传达设计;  
年政旭(2002—), 男,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视觉传达设计;  
孙旭(2002—), 男,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视觉传达设计。

**通讯作者:** 吴鑫馨

### 3.文化心理

文化心理是指特定群体在长期的文化积淀中形成的稳定的心理倾向,包括价值观念、审美偏好、思维方式、文化习俗等。在视觉传达色彩解读中,文化心理表现为受众基于自身文化背景对色彩符号产生的认知、情感与态度反应,是影响色彩传播效果的核心变量。

## (二) 理论基础

### 1.色彩心理学理论

色彩心理学最早由有国外学者马克斯·吕舍尔提出,主要是研究色彩与人的心理之间的关系,是人们在社会活动中主观上对色彩刺激所产生的一系列认知、记忆、思考和情感变化等反应<sup>[2]</sup>。色彩心理学认为,色彩通过刺激人的视觉神经,引发相应的情绪与认知反应,不同色彩因波长不同,会传递出不同的情感信号。该理论为分析色彩运用与受众情感共鸣的关联提供了核心支撑,是探究色彩设计适配性的基础理论。

### 2.跨文化传播理论

跨文化传播是在不同的文化背景间展开的一种信息传递和意义共享活动,跨文化传播为人类社会发展及人类文明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sup>[3]</sup>。跨文化传播理论聚焦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信息传递与解读规律,认为文化差异会导致受众对符号的解码偏差。霍尔的高低语境理论、霍夫斯泰德的文化维度理论等,为分析不同文化群体的色彩认知差异、构建色彩运用的文化适配策略提供了重要理论指导。

## 二、新媒体语境下视觉传达设计的色彩运用特征

### (一) 基于不同传播载体的色彩呈现规律

不同新媒体传播载体的技术特性与传播场景存在显著差异,决定了色彩运用的适配逻辑各不相同。在短视频平台,由于受众多为碎片化、快速化浏览,色彩运用需具备强视觉冲击力,通常采用高饱和度、高对比度的色彩搭配,同时需适配移动终端的屏幕显示特性,避免因屏幕色域差异导致色彩失真。像抖音平台的政务类短视频,多采用鲜明的主题色与白色背景搭配,既保证了视觉清晰度,又增强了信息的辨识度。

在社交媒体平台,受众的浏览场景更为多元,色彩运用需兼顾美观性与可读性,多采用低饱和度、柔和的色彩基调,搭配局部高饱和度色彩作为视觉焦点。以小红书的美妆类笔记设计为例,多以米色、浅粉色等柔和色调为背景,产品展示部分采用高饱和度色彩突出主体,既符合女性受众的审美偏好,又保证了长时间浏览的视觉舒适度。

在互动广告与移动APP界面设计中,色彩运用需结合互动逻辑,通过色彩的动态变化引导受众操作。参考购物APP的“立即购买”按钮,通常采用高饱和度的红色或橙色,并在点击时呈现色彩深浅变化,通过色彩的视觉提示与反馈,提升互动转化率。此外,这类载体的色彩运用还需考量不同操作系统的色彩适配规范,确保跨终端的视觉一致性。

### (二) 色彩的信息传递与情感共鸣功能

色彩最深刻的功能是它能具象化看不见的抽象概念、感情和品牌价值,达到更深的精神交流<sup>[4]</sup>。在新媒体视觉传达设计中,色彩通过明度、纯度的差异实现信息的分层呈现,帮助受众快速捕捉核心信息。通常,核心信息采用高纯度、高明度的色彩,次要信息采用低纯度、低明度的色彩。比如财经类新媒体的资讯海报,核心数据采用红色或绿色的高饱和度色彩,说明文字采用灰色的低饱和度色彩,实现了信息的快速区分与传递。

色彩通过引发受众的情感反应,实现与受众的心理共鸣,提升传播效果。不同类型的新媒体内容,对色彩的情感导向要求不同。在公益类新媒体广告的设计中,设计师常常会选用蓝色、绿色这类色调柔和且自带暖意的色彩。这些色彩不张扬、不刺眼,能自然传递出满满的关爱与希望,让受众在看到画面的瞬间,就能感受到公益项目想要传递的温情与善意。而娱乐类新媒体内容则截然不同,为了贴合其轻松、热闹的属性,设计师更偏爱用红色、紫色这类饱和度高、充满活力的鲜艳色彩。这些色彩视觉冲击力强,能快速调动起受众的情绪,轻松烘托出欢快热烈的氛围,契合娱乐内容带给人愉悦体验的核心需求。

不仅如此,色彩的情感共鸣功能还需要与具体的传播主题深度绑定。就拿节日类内容来说,红色象征喜庆、金色代表吉祥,这类色彩本身就自带浓厚的节日调性,将它们运用到设计中,能快速唤醒受众对节日的美好联想,进而唤起内心的情感认同,让传播效果更贴合主题诉求。

### (三) 新媒体时代的色彩表达新形态

与传统平面设计的静态色彩不同,新媒体语境下的色彩运用具有鲜明的动态交互性特征。一方面,动态色彩成为重要的表达形式,通过色彩的渐变、切换、流动等动态变化,增强视觉吸引力,传递更丰富的信息。例如,短视频平台的开场动画,通过色彩的快速渐变与节奏变化,在短时间内抓住受众的注意力;天气类APP的界面设计,通过色彩的动态变化模拟不同天气场景,提升用户体验。另一方面,色彩的运用与受众的互动行为紧密关联,形成用户操作得到色彩反馈的互动闭环。参考交互式H5设计中,受众点击不同按钮时,会触发对应的色彩变化,通过色彩的反馈提示,引导受众完成后续操作感。动态交互性色彩的运用,打破了传统色彩设计的静态局

限,使色彩成为连接设计与受众的重要互动媒介。

### 三、文化心理对新媒体视觉传达色彩解读的影响机制

#### (一) 文化背景差异

不同文化背景下,色彩的象征意义存在显著差异,这种差异直接影响受众对新媒体视觉传达色彩的解读。在中华文化语境中,红色象征喜庆、吉祥、热情,广泛应用于春节、婚礼等喜庆场景的新媒体设计中。但在西方文化中,红色更多象征警示、危险、暴力,除情人节等特定场景外,较少用于喜庆主题的设计。

此外,不同民族的文化习俗也会影响色彩偏好。在伊斯兰文化中,绿色象征生命、和平与神圣,是最受推崇的色彩。但在日本文化中,绿色则与森林、自然相关,同时也有“不吉利”的特殊含义。在新媒体跨文化传播设计中,若忽视这种文化差异,极易导致色彩符号的解读偏差,影响传播效果。

#### (二) 群体属性差异

除文化背景外,受众的年龄、性别、职业等群体属性也会影响色彩心理偏好,进而影响对色彩的解读。从年龄维度来看,青少年群体更偏好高饱和度、鲜艳的色彩,这类色彩符合其活泼、叛逆的心理特征;中年群体更偏好低饱和度、柔和的,体现其沉稳、理性的心理需求;老年群体则更偏好明度较高的色彩,便于视觉识别,同时也符合其对温暖、祥和的心理追求。

从性别维度来看,女性受众更偏好柔和、温暖的色彩,男性受众则更偏好理性、沉稳的色彩。从职业维度来看,职场精英群体更偏好简约、低调的色彩,体现其专业、严谨的职业形象;创意行业从业者则更偏好个性化、鲜艳的色彩,彰显其创新、活泼的职业特质。这些群体属性差异导致的色彩偏好,要求新媒体视觉传达设计的色彩运用需精准定位目标受众群体。

### 五、新媒体视觉传达设计中色彩运用与文化心理的适配策略

#### (一) 色彩选择的文化适配原则

尊重文化习俗,规避色彩禁忌。开展跨文化传播的新媒体视觉传达设计时,需提前调研目标受众的文化背景,明确其色彩象征意义与禁忌。针对印度文化群体的设计,可选用红色、橙色等吉祥色彩,规避象征丧葬的黑色。通过尊重文化习俗,规避色彩禁忌,确保色彩符号的正向解读。强化色彩象征意义的正向关联。结合目标受众的文化心理,选择具有正向象征意义的色彩。针对中华文化群体的节日类设计,选用红色、金色等象征喜庆、吉祥的色彩。而针对西方文化群体的圣诞主题设计,选用红色、绿色等具有节日氛围的色彩。通过强化色彩象征意义的正向关联,引发受众的情感认同。

#### (二) 色彩组合的媒介适配方法

依据媒介显示特性优化色彩组合,不同新媒体媒介的显示特性存在差异,需针对性优化色彩组合。如移动终端屏幕的设计,需考虑屏幕色域、亮度的差异,选用兼容性强的色彩,避免因屏幕显示偏差导致色彩失真。而户外电子屏的设计,需考虑强光环境下的视觉可读性,选用高对比度、高明度的色彩组合,确保受众在强光下能清晰识别信息。不同传播场景的受众状态与视觉需求也不同,需结合场景优化色彩组合。如夜间传播的新媒体内容选用低饱和度、低明度的色彩组合,避免强光刺激受众眼睛。嘈杂环境下传播的内容,选用高饱和度、高对比度的色彩组合,增强视觉吸引力,确保信息有效传递。

#### (三) 动态色彩的文化心理适配技巧

动态色彩的节奏与频率需契合目标受众的文化心理与视觉习惯。例如,针对青少年群体的动态设计,可采用较快的色彩切换节奏与较高的频率,符合其活泼、好动的心理特征;针对老年群体的动态设计,需采用较慢的色彩切换节奏与较低的频率,避免视觉疲劳;针对中华文化群体的节日类动态设计,可采用渐变式的色彩节奏,模拟传统节日的氛围营造。动态色彩的变化也要传递符合目标受众文化心理的情感导向。例如,针对公益类动态设计,采用柔和、缓慢的色彩渐变,传递温暖、关爱的情感;针对体育赛事类动态设计,采用快速、强烈的色彩切换,传递激情、拼搏的情感;针对跨文化传播的动态设计,选用不同文化群体共同认可的色彩动态变化(如蓝色到绿色的渐变,象征和平、自然),实现情感的跨文化共鸣。

#### (四) 跨文化传播场景下的色彩设计方案

采用通用色彩与文化特异性色彩的组合模式,通用色彩是指不同文化群体普遍认可的色彩,文化特异性色彩是指目标文化群体特有的吉祥色彩。通过通用色彩确保信息的基础传递,通过文化特异性色彩引发目标受众的文化认同。跨文化传播的新媒体视觉传达设计,应尽量简化色彩符号,避免使用复杂的色彩组合与模糊的色彩象征意义。采用简洁、清晰的色彩搭配,确保不同文化背景的受众都能快速、准确地解读信息。像国际组织的公益新

媒体广告，多采用白色、蓝色等简洁的色彩组合，避免因色彩符号过于复杂导致的解读偏差。

## 七、结论与展望

随着设计学科不断向前发展,色彩研究也从单纯的 美学考量,转变为融合心理学、认知科学以及人类学等 多个学科的交叉性探索。优秀的色彩设计不只是艺术感 的一种呈现,更是科学性与策略性的结合<sup>[5]</sup>。本研究系统探究了新媒体语境下视觉传达设计的色彩运用与文化心理适配性问题,发现,新媒体语境下视觉传达设计的色彩运用具有媒介适配性、功能导向性与动态交互性三大特征,不同新媒体载体的色彩运用需遵循各自的媒介特性与传播规律。其次,文化背景与群体属性差异会导致受众对色彩的认知与解读存在显著差异,文化心理是影响色彩传播效果的核心变量。同时,构建文化认知与情感共鸣的色彩设计体系,通过色彩选择的文化适配、色彩组合的媒介适配、动态色彩的心理适配及跨文化传播的差异化设计等策略,可有效提升新媒体视觉传达设计的信息传达效率与文化认同感。

### 参考文献:

- [1] 智英斌. 色彩在包装设计中的应用[J]. 包装工程, 2018, 39(20): 319-322.
- [2] 曲兴卫, 王自珍. 基于色彩心理学分析商品包装设计的色彩选择[J]. 智库时代, 2018(39): 139.
- [3] 范红, 崔贺轩. 从文化认同到跨文化认同: 中华文化对外 传播的交际伦理转变[J]. 对外传播, 2023 (3) : 52-55.
- [4] 季添熠. 视觉传达中色彩设计的通感转译研究[J]. 汉斯, 2023, 8(3):1087-1094.
- [5] 李雅芹. 平面设计中色彩设计对视觉传达效果的影响研究[J]. 色彩, 2025, (10):75-77.

## Study on the Use of Color and Cultural-Psychological Adaptability in Visual Communication Design in the Context of New Media

Xinxin Wu<sup>1</sup>, Handi Jia<sup>1</sup>, Zhengxu Nian<sup>1</sup>, Xu Sun<sup>1</sup>

<sup>1</sup>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eilongjiang, Harbin 150080, China

**Abstract:**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adaptation rules of color usage and audience cultural psychology in visual communication design within the context of new media, providing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ractical pathways for improv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cross-media visual communication. By using literature review, it organizes relevant theories on color psychology, visual communication design, and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Combined with case analysis, it examines the media characteristic adaptation logic of color usage across different new media platforms. Through empirical research combining surveys and eye-tracking experiments, it verifies the impact of cultural psychological differences on color interpretation and the effectiveness of adaptation strategies. The study clarifies the media adaptability, function-oriented nature, and dynamic interactivity characteristics of color usage in visual communication design under the new media context; reveals the mechanisms by which factors such as cultural background and group attributes influence color perception; and proposes strategies for color selection, combination, and dynamic presentation that consider both cultural adaptation and media characteristics. Color usage in new media visual communication design needs to center on cultural psychology as the core adaptation dimension. By integrating the techn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communication rules of different media, it is possible to build a three-dimensional color design system that aligns cultural cognition with emotional resonance, thereby enhancing information transmission efficiency and cultural identity, meeting the developmental needs of visual communication in the new media era.

**Keywords:** New media; Visual Communication Design; Use of Color; Cultural Psychology; Adaptability

# 多元与在地的交织——两湖水彩表现题材的当代维度延展

马世杰<sup>1</sup>

(1.湖南师范大学, 湖南 长沙 410012)

**摘要:**回溯历史,两湖水彩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和历史特色,在承续既有的面貌上,其逐渐吸纳了诸多当代性的表达范式,对传统题材的表现与延展便是典型案例。该文章以两湖中青年水彩画家群体为研究起点,结合相关创作案例,对静物、风景、人物三个层次的表现题材进行探索。通过对画面元素的形式分析与内容考察,笔者认为:两湖水彩对传统题材类型的表达已超越固有文本,转向超静物、场景以及人文等多元层次的深度挖掘,虽然它们均源自对地域经验的体悟,但却在向内的路径中呈现出超越性的面貌,即多元化与在地性的交织。

**关键词:**两湖水彩; 题材; 当代

DOI: doi.org/10.70693/rwsk.v2i3.333

## 引言

自1984年第六届全国美展开始单独设立水彩展区起,诸多地方性水彩乃至中国水彩,便不断受到开放与多元的意识形态冲击,学术界普遍在追问“何为新”“何为中国水彩发展的本土路径”等诸多问题。两湖地区作为中国水彩发展的前沿重镇,自然也在二十几年来的探索中寻找着回应这一文本的路径。基于历史文脉,其坐拥楚文化的纯正血统,并在20世纪中后期形成了细致严谨的水彩教学体系,二者为两湖水彩的在地性奠定了扎实的发展基础;而以湖北美术学院、湖南师范大学、湖北大学、湖南科技大学等高校为主的教育高地,则不断拓宽着水彩的边界,积极寻求表达的多元可能,中青年画家群等诸多后起之秀得以有赖以生存的学术土壤,传统的表现题材也因此焕发着更加澄明的光辉。

## 一、静物到超静物——物我合一的精神编码

静物画在两湖当代水彩创作中,从对客体的描摹逐渐转变为对物象的编码。通过非典型物象的选择与情景化的布置,使之成为承载观念的“超静物”,达到物我合一的精神同构,这与传统的构型手法与表现逻辑有着本质区别。

西方艺术中,“静物”(Still Life)本意为“静止的生命”或“死去的自然”,表现对象多为无生命体征的客体,如死去的动物、离枝的蔬果花卉等。审美取向也因此追求精微细腻的质感,反映了文艺复兴以来的科学艺术精神。早期的静物画多依附于教堂壁龛,直到“劝世静物画”(Vanitas)的出现才独立成章。作为圣经画背景中的辅助元素,静物随着人文思想的解放也逐渐走向前景,这背后证实了即便再寻常的物象,也足以承载审美价值,如此简单的画题(Motif)也可以成为独立的绘画题材。时至今日,静物画的题材维度早已超越其传统母题,艺术家将视角放到了并不具备传统意义上“典型性”的物象,甚至是毫无美感的实用物件,用以承载观念,实现对传统意义上“静物”的超越。

陈勇劲的静物作品源自“刘家样”<sup>[1]</sup>的学院品格,虽然延续了传统湖北水彩肃穆的形式语言,但却抛弃了典型性静物的造型美感,呈现出对“非典型”的钟爱,将视角转向那些常见,却处于主流审美之外的工业制品与自然遗存。《电动机之二》将刷有蓝漆的物料箱作为桌面,和时代相隔甚远的老式电动机被放置在箱上,箱体表面不均匀的粉刷痕迹和电动机粗糙的质感,亦是陈勇劲静物表达的一部分,与电动机共同反映了工业年代的视觉记忆。而在《海螺》中,五枚形态各异的海螺兼具轻盈沉重之态,似乎封存了作者远去的童年记忆。二者在表现上均采用了与视平线平齐的视角,并将展陈物品一字排开,模糊了视觉中心,更加强调各个海螺的独立性。虽然如同展品般被陈列在画纸之上,但仍带有物物相连的隐匿性。如果说选用电动机和海螺是对静物的反叛,那么《减震》与《粹》系列便是寄情于物的精神体现。《减震》(图1)选择了盛装鸡蛋的瓦楞纸托,整体色调以优雅的黑灰色为主,俯观视角让构图更具隐喻含义,分离的块面暗示着人际关系的复杂:鸡蛋作为独立个体,理应被放置于量身打造的减震凹槽,象征着容纳、保护及对外部结构的塑形,二者之间的“塑与被塑关系”,于物理层面的缓冲中,暗喻了人际的平衡。汪安民在对《粹》系列作品解读时提到:“他将水果这一物质进行切割,将它们碎片化,让水果留下刀片的痕迹,并将水果的内在性,它的质地,它的白色果肉暴露出来。”<sup>[2]</sup>黑色背景上,不

**作者简介:**马世杰(2001—),男,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绘画创作与研究。

**通讯作者:**马世杰

同的水果碎片不分主次、没有焦点地展示，观者既可以将其组合起来，也可以将之视为单独的局部，但每一次组合都会形成局部之和大于整体的视觉感受，在对格式塔心理学的应用中折射自身对存在状态的思考：穿越皮肤形象抵达内部，才是一个物体真正的样貌。



图1 《减震》陈勇劲 2018 54cm × 74cm

石明祥的《太湖石》系列作品，同样有着深沉的精神指向。庄子言：“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这种基于天地造物，任其分合的超逸现实观念，昭示了物我合一、格物致知的精神，太湖石折射的至高境界也根植于此。尽管受教于西方写实的造型艺术，但石明祥自始至终都在西方的视觉认知维度上，用中国传统文化、文人画的审美取向打开一个新的叙事空间，以承载孤寂、静谧的生命本源之美。太湖石本身极具中国文化特色，虽然表面瘦、皱、漏、透的形式有反复推敲的形式意味，但它的奇、异、空、灵折射着天人合一的价值观与文人审美取向，似乎每一个变幻莫测的孔隙都是文化血脉流淌的痕迹。《太湖石》系列一改传统静物的空间纵深感，将背景替换为简洁平面的纯色，使太湖石无影无依地悬浮于画面中央，下方笔直的水迹，打破了视觉上静止封闭的感受，引导思想流转其间。这种将二维空间结构意象化的表现方式，暗合中国古典园林虚实相生的造景哲学，将观者引入一个超越物我的精神世界，指向亘古而常新的“天人合一”之境。

此外，80后艺术家张昊，90后青年艺术家杨帆、叶凯、李源等人，均在静物题材的创作中呈现出鲜明的超越特性：张昊擅以古朴凝重的色调重构古典氛围，营造诗性情调；杨帆则借助超现实主义的表现形式，选用互相具有矛盾感的物象，借光怪陆离的色彩构建视觉叙事；叶凯与李源等人则进一步拆解静物画固有的场景，呈现若即若离的当代感。此外，他们对物象形态的把握也极为耐人寻味，强调形态所传达出来的精神共鸣，正如王肇民在《画语拾零》中所言：“任何一种造形艺术，不是‘形神兼备’，而是‘形是一切’；不是‘以形写神’，而是‘以形写形’，形备神全，写形而神自来。”<sup>[3]</sup>

## 二、风景到场景——湘鄂叙事的当代构建

两湖的自然风貌作为视觉艺术赖以生存的土壤，为绘画提供了极多的表现素材，但传统的一花一木、一树一村已无法完全承载当代人的共同记忆，这意味着风景的维度逐步向更广义的场景过渡。厂区、街巷、公共空间等现代化场所亦能承载同小桥流水般的审美情绪，历史记忆、社会变迁与人文活动等时代图景也因此得以呈现。

水彩画在起源初期，曾被作为绘制地形图的工具，直到17世纪才逐渐摆脱实用主义，成为独立画种。以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为例，一些地形勘探员和艺术家发现，水彩极其适宜表现英国的自然环境、生活趣味以及民族特色，由此开创了以表现自然风貌为核心的水彩风景传统。如上所言，若联系艺术史来思考，这一表现传统经由学院教育与艺术交流流入两湖地区，并在湘鄂独特的江河湖泊中寻得了生长土壤。相比之下，当代语境下的风景画已不再满足于过去既定的框架：深入自然、选景、作画，被动而客观。而是希望借助现代化的场景，赋予所见更深的叙事性与身份感。



图2 《大江大河》 2019 110cm × 150cm

白露洋出生湖北于武汉，这片江河之地、百湖之城，亦是拥有多元工业化体系的工业大城。他的《大江大河》（图2）系列，以独特的俯瞰视角展现了我国工业发展的壮阔之景，跳脱出两湖以自然水文为核心的传统风景范式，转向对现代工业景观的视觉叙事，亦是对这座英雄城市巨大贡献的讴歌。他选择了中国第一个特大型钢铁联合企业——武汉钢铁集团（简称“武钢”），将1957年流出新中国第一炉铁水的一号高炉置于视觉中心，并以当下的无人机技术，摘录了这座形体交错的钢铁巨物。画面中的管道钢架，以几何化的形态呈现出硬朗精确的走势，并于杂乱中构建有条不紊的秩序，似乎比拟了生产环节中的力量制衡。“这种构图并非简单的空间呈现，而是对工业文明内在结构的视觉隐喻，在二维平面上搭建起一个三维乃至四维的空间想象，让观者得以感受工业生产空间的深度与广度。”<sup>[4]</sup>

邓涵与白露洋相似，在乡愁和记忆回溯之中始终贯穿着深沉的地域情怀。他的作品往往呈现出冷峻、理性而神秘的气质，常以建筑空间、结构场景作为表达的载体。2003至2007年间创作的《协奏曲》系列，是继早期《红门》之后的重要探索。彼时其毕业留校，任教于环境艺术系，工作经历使他大量接触建筑，激发了他对空间、场景氛围的思考。在《协奏曲之十》（图3）中，画面所选取的场域透露出苍凉与神秘并存的工业气质，似是废弃厂房的一角。冷色调的运用及胶片般的质感，突显了时光老去的痕迹；强烈的外景光与昏暗的内部氛围，放大了墙面斑驳脱落的痕迹。结合邓涵的成长经历，不难辨识出这些视觉经验与黄石这座工业城市的记忆紧密相连。此外，2014年的《空间》《通道》等作品均以管道、建筑、围栏、铁锈等工业元素为表现场景，与《协奏曲》系列互为映证指向黄石的“华新水泥厂”。这些时代回响似乎常以碎片化的形式出现在邓涵的脑海中，因此艺术家也恰如其分地强化了这些昔日场景的陌生感，以此重构自身的记忆，正如他本人所言：“《满堂围》系列和《协奏曲》系列在表现方式上与怀斯的绘画思路有某种相通，不同之处在于，我所呈现的是属于中国的记忆。”

关于风景向场景的构建，再现向叙事的转型，中青年画家群体正源源不断地描绘着自己的所见所想。湖南艺术家焦立强将视角聚焦于湘潭的工业厂矿，用画笔记录了长株潭经济带的发展。《工业备忘录之二沸腾的船坞》中，锈蚀的机械结构与氤氲的水色相互渗透，全无唯美主义的灵巧之气，以水为迹在工业痕迹中注入深沉的个人情怀。向好的《故乡情——美丽村落》、刘爱军的《新农村》系列、燕杰的《律动的故园梦》等作品则扎根新时代的乡村建设。陈勇劲曾在《陈勇劲节选了一出戏，只留下个人的痕迹》中提到：“不论是气势感人的大场景，还是满含诗意的某个角落，只要去发现能够被感动的线索，就会主观地选择对象，直至作品完成。”<sup>[5]</sup>由此可见，正是从一定景色中发现相关的历史痕迹与现实线索，才赋予了题材“从风景到场景”多维延展的能量。



图3 《协奏曲之十》邓涵 2004 60cm × 120cm

### 三、人物到人文——两湖文化的视觉抒写

不同于传统的人物肖像画，当代两湖水彩的人物题材总乍现出一丝人文光辉。人物形象不再服务于肖像审美下的既定论调，而是与文化、日常状态以及个体情愫相关联通，完成精神面貌的升华。

狭义的“人物”(Character)源自生物学或社会学范畴，指代个体形象。古典肖像画中，人物是绝对的中心，因此外貌、神态等独特属性都会被精准捕捉，其价值在于形象真实性，即独立的“社会原子”。而“人文”(Humanities)则超越了人物的物性范畴。《易经》提到：“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因此人文集合了当下社会形成的文化传统、集体记忆与精神气质等诸多因素；这也就是说每一个“人物”都处在特定的“文化场域”环境中，人物不再是孤立的社会原子，而是折射其所属人文世界的棱镜。表现两湖人物的创作作品正是如此，亦可以被理解是“人本人向人文人”<sup>[6]</sup>的过渡。“人本人”模型强调人类共同特质，艺术表达往往倾向于普适性，某种程度上消弭了文化与地域的独特印记；而“人文人”模型则认为人是“社会的存在”，其本质由特定社会、传统等多重维度塑造。因此两湖地区的人文谱系，从悠久的农耕文明，到近现代的工业浪潮，乃至当代高新探索与民族文化的绵延传承，正在通过这一视觉图景层层呈现。

生于湖南新化的刘永健，将视角转向故乡，用鲜明的人物形象诉说着人文的光辉。《出生地》中正在剥玉米的老农和躺卧在玉米堆中的小孩，构成了湖南本土乡情浓郁的和谐之境，劳作与休憩之间，不仅是人物特征的撰写，更是作者对家乡文化的情感流露。艺术家摒弃了传统“人物为中心，场景为陪衬”的构图范式，反而将玉米皮堆积的农田作为画面的主体内容，而老农和小孩则作为其中的有机元素，隐入玉米地中，成为“场景人物”。散落的叶片强化了画面的形式感，暗喻着农耕文明的内在结构；作者更在大地的现实主义色彩下，精心点缀若干高饱和色块，与颜色单一的主体人物形成对比，突出了现实的厚重感和浓浓的乡愁。他的《家园》《小主人》《暖阳》《边城》等作品亦是这一视觉抒写的延续，持续保持着人文情怀的微妙张力，不矫揉造作，亦回应现实。

对故乡人文图景的关注，始终是两湖大地不可绕行的母题。生于湖南溆浦的戴永强作为一名湘西汉子，对苗家文化极为敏感，他笔下的岜沙人物苍劲浑厚，充盈着雄健的生命力量。《岜沙男人》(图4)中果敢的岜沙汉子身穿传统服饰，手握芦笙吹奏起舞。律动的人物形象与背后的参天古树虚实相生，背景以暖黄色调为主，间以数块低明度的深绿，生动传递出大山深处朴拙的自然气息。仿佛通过具象转译了芦笙的乐律起伏，以此传达出对族群庇护的虔诚祈愿。尽管《岜沙男人》系列取材于贵州黔东南州从江县岜沙苗寨，但其在地理位置、文化气质上与湖南怀化湘西等地高度契合，因此极具两湖面貌。戴永强对苗族文化的深刻捕捉，不仅是其自觉的身份认同，更是将个体艺术表达融入人文景观中的生动实践。

湖湘青年艺术家仇琰的作品《我在家乡》深刻展现出了对湖湘农耕文明的人文关怀。画面以纯净的湖蓝色统摄全局，其中的清澈之感是对水乡意境的呼应。前景中劳作的人物高低错落，形成了深邃的空间纵深感；竹筐等劳作工具，通过与人物张弛有度的关联，突显了劳作瞬间的纪实性。在人物细节的块面处理上，仇琰充分调用了平面化的抽象色块，并用中国画的写意方式展现人物形态的微妙变化，使地域性的人文痕迹得以在当代中散发光辉。

两湖文脉源远流长，其中散发着人文之光，为水彩人物创作提供了丰沛的精神源泉。悉数各大展览中两湖的优秀水彩作品，有极多的人物创作均是对这“两湖熟，天下足”的人文抒写，画面中的人物作为文化典型性的标志，深刻映射着作者内心的情感。唐晓明的《美丽乡村进行时》、周禹的《洪峰过后》等作品或是宏大叙事，或是建设记录，均不以“画得像，画得细”为追求，而是以人文精神，高度凝练形象的表征，深入本质内核，使其能够传达个体视角下的集体情感，谱写具有时代温度的人文关怀。正如徐复观所言：“常理参透象外，道存乎其人，观物必造其质。”<sup>[7]</sup>



图 2-10 《岜沙男人》戴永强 2013 108cm × 156cm

## 结语

两湖水彩表现题材的延展，并没有步入形式至上或是消费主义的陷阱，而是依旧在日常与传统中进行耕耘，于区域性的元素中找到适切的表达方式，走出一条跻身多元但不脱离固有文本的革新之路，既不脱离实际，又不刻板效颦潮流。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两湖中青年水彩画家开始在全国性展览中展露头角，但他们诉说自身的方式恰恰也回应了两湖水彩这一在地与多元交织的发展路径，也为理解“地域美术如何在多元语境下实现价值重构”提供了典型案例。

## 参考文献:

- [1] [2][5]陈勇劲.之前——陈勇劲[M].鲁虹编.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025:7,98,9.
- [3]王肇民.画语拾零[M].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1983:43.
- [4]白露洋.当下——白露洋绘画艺术[M].武汉:湖北美术出版社,2025:19.
- [6]朱阳.从“人本人”到“人文人”:人类表征系统的全球化隐喻转型[J].民俗研究,2022,(06):42-49+155.
- [7]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M].北京:九州出版社,2020:360.

## The Interplay between Pluralism and Locality: The Contemporary Dimensional Extension of Subject Matters in Watercolor Painting in Hunan and Hubei

Ma Shijie<sup>1</sup>

<sup>1</sup>College of Fine Arts,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Hunan, Changsha 410012, China

**Abstract:** Historically, watercolor painting in Hunan and Hubei has developed distinct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while progressively incorporating contemporary modes of expression—most notably in the treatment of traditional subject matters. Focusing on the region's mid-youth watercolor artists,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ree thematic categories: still life, landscape, and figure painting. Through formal and contextual analysis, the author argues that these conventional subjects have been reimagined, evolving into "super-still life," "scene," and "humanistic expression." Rooted in regional experience yet oriented inward, these transformations embody the interplay between pluralism and localit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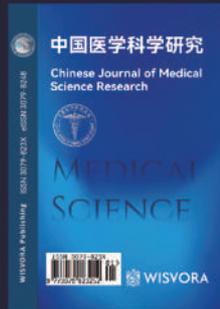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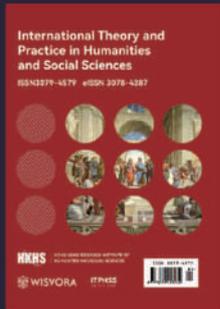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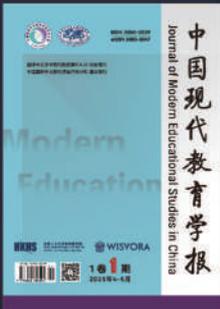
**Keywords:** Watercolor Painting in Hunan and Hubei; Subject Matter; Contemporary



# WISVORA

WISVORA 出版社：专注于学术出版管理，WISVORA 出版社提供期刊编辑、论文出版和国际索引、期刊创办、期刊托管等服务，增强学术研究的全球传播和影响力。

[www.wisvora.com](http://www.wisvora.com)



##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刊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刊》是由香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主办的学术期刊，致力于为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者提供一个高质量的学术交流平台。本刊重点关注学术研究中的理论创新与实践应用，旨在探讨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的核心议题，促进知识的广泛传播与共享。作为一份面向全球中文学术界的专业期刊，本刊倡导跨学科、跨文化视角的学术探讨，为学术界和实践领域之间搭建桥梁，推动社会科学知识的进步与应用。

印刷出版 ISSN 3079-4579

电子出版 ISSN 3078-4387

ISSN 3079-4552



学术赠阅

### 权责声明

期刊所刊载的评论、意见、观点等均出自文章作者个人立场，不代表本出版社的观点或看法。对于文章任何部分及文内引用材料给任何个人、机构、及其财产所带来的任何损失及伤害，本出版社均不承担任何责任。我们郑重声明，本出版社的出版业务，不构成对任何产品商业性能的保证，也不表示本社已承认本社出版物中所述内容适用于某特定用途。如有疑问，请寻找专业人士协助。